

## 出版说明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原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西共理论刊物《我们的旗帜》社长，西共党内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负责西共的国际工作，后因同原西共总书记卡里略在如何贯彻欧洲共产主义路线以及党内民主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于一九八一年底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于是写了这本书。

作者在书中叙述了革新派同卡里略为首的西共领导机构分歧的由来，同时对苏联国家的性质、革命与改良的分野的根源、共产主义运动同社会运动的关系、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同党内垂直领导结构的矛盾等一些重大问题阐明了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欧洲共产党内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全文译出，供研究参考。

## 前 言

1981年11月12日清晨我才回到家里。我同其他五个同志一起刚刚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前天，巴斯克的四个同志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我脑子里老在转着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到底怎么了？我已经65岁了，从17岁起我就参加了共产党。我一生都把党的工作作为我的专业。昨天我还在党内很负责的岗位上工作，而现在我却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办，那就是回到我在西班牙共产党总部的办公室去收拾我的私人文件和书籍，然后回家。

为什么在我的生活中会出现这样的决裂？我随即十分清楚地觉察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只是个人私事，它牵连和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也因此在我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之后的这几个小时里，我下定决心：必须把事情弄明白和讲清楚。

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已经弄明白了，尤其是西班牙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同更广泛范围内欧洲共产主义遇到的危机的关系。我在开始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把它同苏联的作用、现实社会主义的作用、国家的危机、密特朗的经验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内的争论联系在一起。我试图以向前看的态度来探索这些

问题。但是，我的这些思索必须完全是敞开的，尚待充实的。

除此之外，我也有必要让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公众舆论了解导致我被开除的整个过程的具体经历。这些经历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则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写这本书是我为了向自己和其他人解释所发生的一切而作的努力的结果。在我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最后一段时期，我十分坚持西班牙共产党有必要成为一个开诚布公的党和进行开诚布公的争论。今天我愿为这种开诚布公作出贡献。

我是根据我的观点和我的笔记写的。我无意要表现自己是公正的。我写的是我亲眼见到的事情。我也可能犯错误：个人的，从而也是片面的看法总是有这种危险性的。但我可以保证一点，即我是诚恳的，我对书中写到的一切都是深信不疑的。

这本书还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讲的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当然，要是时间富裕些，并且按历史学家的“精确性”来要求，那么也许还可以引用更多的资料和搞得更确切些。读者在本书中看到的是我对一系列问题的回忆和思考。这些思考是从1980、1981年就开始的，甚至还要早一些，其中有些想法是在写书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某些问题上修正了我过去的看法。我力求把我的思想变化过程清清楚楚地叙述出来，因为我认为这种变化是同广大共产党人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再推而广之，则也是同左翼中许多人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整个脑海里占很大位置的是几十年来累积起来的想法，是我亲身经历中的体会。这些体会能使人充实起来，但有

一个条件，就是要意识到这些体会同时也包含着使人墨守成规、老是往后看、缩手缩脚的巨大危险。我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危险，首先应该归功于在《我们的旗帜》<sup>①</sup>编委会中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以及其他的革新派共产党人小组。他们帮助我用更为切合现实和放眼于未来的见地来研究事物。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

<sup>①</sup> 西班牙共产党理论刊物。——译者

# 目 录

前言 .....	1
----------	---

## 第一部分 矛盾的由起

第 一 章 1980年的休假 .....	3
第 二 章 常务委员会上出现的裂痕.....	8
第 三 章 初步回顾我同卡里略的关系 .....	14
第 四 章 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 荒谬态度.....	19

## 第二部分 西班牙共产党同苏联的关系

第 一 章 今天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 .....	37
第 二 章 西班牙共产党漫长的独立道路.....	46
第 三 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 .....	52
第 四 章 要列宁主义,不要列宁主义 .....	61
第 五 章 1974年苏联对我的攻击 .....	71
第 六 章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对 “现实社会主义”的态度.....	78
第 七 章 “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	90

### 第三部分 走向十大的复杂道路

第一章	现实与挫折 .....	101
第二章	我们做错了什么 .....	106
第三章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全会 .....	118
第四章	害怕发表会议纪录 .....	132
第五章	行不通的两分法 .....	137
第六章	“二·二三”政变和国家危机 .....	147
第七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回答 .....	157
第八章	党内危机的加剧 .....	168
第九章	知识分子为什么退党 .....	179
第十章	《我们的旗帜》和所谓的 革新派“小集团” .....	198

### 第四部分 处在危机中的大会

第一章	密特朗和欧洲左翼 .....	231
第二章	有可能建立一个欧洲 共产主义的党吗? .....	245
第三章	革新 .....	271
第四章	克维多影院发生的意外事件 .....	277
第五章	朝着旧式党发展 .....	283

### 第五部分 开 除

第一章	权力重新集中在书记处 .....	299
第二章	我离开了《我们的旗帜》 .....	307

第三章	巴斯克问题:对新事物视而不见.....	310
第四章	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在马德里 发表演说 .....	326
第五章	开除十个人,先四个后六个 .....	332
第六章	执行纪律和党的解体 .....	352

## 第六部分 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

附件一	西班牙共产党前律师基层委员会致 第一届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艺 术家代表大会的通知.....	389
二	争取建立革新的欧洲共产主义.....	394
三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在中央委员 会 1981 年 9 月 25 日会议上的讲话 .....	401
四	对西共十大第七部分决议全文的 修正案.....	407
五	西共十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	426

# 第一部分

## 矛盾的由起





# 第一章

## 1980年的休假

我1980年的休假是从桑坦德大学暑期班开始的。我和妻子驾车先到桑蒂亚娜德尔马尔耽了一天一夜。我们不光赞叹那如画的建筑,并且在一种由住家和宫殿、小巷、广场和庭院异常协调地组合在一起的气氛中漫步,“体会生活的乐趣”,在美的享受中交杂着脱离现实生活而沉浸在十七、十八世纪城市中的奇异感受。我对妻子埃斯特尔说:“这种感受同我一个半月前在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古代威尼斯人称之为拉古萨的地方漫步时一样。”……现在很少城市能够如此使人感到身处艺术和历史包围的气氛之中。

我在大学生们一片“嘈杂喧闹”中到了桑坦德的马格达莱纳宫殿。可以说,在那里所有的科目,什么绘画、文学、园艺、兽医、生物、政治、神学……统统都几乎同时研究和讲授。我讲的是国际问题,题目是:《欧洲和地中海》。同一天,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sup>①</sup>在那里讲工会的作用。看上去好象是一次

---

<sup>①</sup> 现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原为工人委员会负责人,西班牙共产党十大时当选为总书记,1982年曾因同当时的总书记卡里略发生矛盾而自动辞职。在卡里略辞去总书记后,他复于1983年底在西班牙共产党十一大时当选为总书记。——译注

题材广泛、思想丰富的“共产党宣讲日”。其实不然，那天讲学的还有费尔南多·萨瓦特，安东尼奥·德塞尼洛萨，里卡多·古略翁和米盖尔·科尔德罗（他是我1977年在莱昂省的竞选运动中结识的）。当然更不用说这些讲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劳尔·莫罗多，安赫尔·比尼亚斯和曼努埃尔·梅迪纳。<sup>①</sup>

从桑坦德到加泰罗尼亚，一路平安无事，唯一的意外是比预计早到了半天，尽管我是本着“不着急”的念头开车的，但是高速公路的活力逼着我快速往前开。我们准备8月份在埃布罗三角洲交界处的安波利亚海滩同我女儿卡门和外孙迭戈一起度过。

我准备一离开桑坦德，就彻底休息。这样安排是一反我以往的习惯的，我不想为制订什么长期计划伤脑筋，既不想为《我们的旗帜》写文章，也不打算为可能出版的书写短文或章节。我既没带笔记本，也没带我常常用来口授的磁带录音机。我只带了几本历史书看看，一本是利奥波德·博伊西尔、多伊彻和卡尔合著的《异教邪说的终结》，还有一本是艾瑞迪编的《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册。

在假期的头几天，我心情很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抛开所有的具体计划来思考些问题。

前几个月，我参加了一连串的国际性会议。5月在罗马参加了一次有关东西方关系的讨论会，参加的有欧洲左翼的一些知名人士，如英国工党议员斯图尔特·霍兰德，西德社会民主党副主席布鲁诺·弗里德里希，意大利社会党议员隆巴

---

<sup>①</sup> 上面列举的都是西班牙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各党派都有。——译注

迪,鲁福洛和西尼奥里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普隆杜,意大利共产党议员吉安·卡洛·巴叶塔,乔治·纳波利塔诺和罗马诺·莱达,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德布鲁韦尔,美国代表中有比亚勒教授,威廉·格里菲斯和原基辛格在华盛顿国务院的助手索南费尔德。我们在罗马附近一家旅馆里的讨论中明确地谈到里根获胜的具体威胁,美国更趋强硬的前景,缓和的告终以及军备竞赛的重新开始。

一个月之后,我在杜布罗夫尼克参加了南斯拉夫组织的一次关于地中海问题的“圆桌会议”。我在那次会议上同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国际关系负责人格雷梅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格雷梅斯以“西班牙劳动人民利益”为论据反对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十分凑巧,接下去就轮到我要发言。我事先来不及准备怎么回答他。我首先对他作为法国共产党人居然表达西班牙工人的利益表示感谢。我对他说,为了礼尚往来,也许我应该象他一样,以法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名义来反对法国共产党的立场,这样下去,事情又会到什么地步呢?在我结束发言时,我奉劝他最好还是注意反对沙文主义倾向,因为近日来就是这种倾向驱使法国农业主袭击和焚毁西班牙运载水果和蔬菜的卡车。……会后在走廊上格雷梅斯称我为“挑衅分子”,但是他不敢在正式会议上答复我。他没等开完会,前一天就回巴黎去了。

不过,这只是件区区小事。我认为真正严重的是另一种情况,特别是在会议期间我同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的交谈中证实了这种情况,就是在苏联的作为中,大国政策,霸权政策日益明显地、甚至明目张胆地占了主导地位。这一政策导

致它入侵阿富汗，并且还可能采取其他措施。从前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从阿富汗事件以来，我在思想上愈来愈肯定一点，即苏联的军人在国际问题的决策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苏联的国家政策是通过对其他各国共产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把它们当工具利用的办法来实现的，在这方面法国的例子最为明显。我们能抗得住这种压力吗？我们能真正在西欧确立欧洲共产主义政策吗？也就是说，我们能坚持反对集团政策、争取解散军事集团、开创和平主义的、进步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思潮吗？反对帝国主义是可以的，但是也能反对莫斯科的霸权主义吗？面对法国共产党亲苏的宗派主义，我们又如何来表明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呢？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家的力量够么？尤其糟糕的是西班牙没有参加欧洲议会，使我们脱离了有可能着手制订“欧洲左翼”前景的一个中心。

我在杜布罗夫尼克同意大利共产党的国际关系负责人吉安·卡洛·巴叶塔谈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巴叶塔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脸部反映出他有长期斗争的经历，但是他的笑容却永远是年轻的。他象所有的意大利人那样表情丰富，话尤其多。他自己承认说：“我只要高兴讲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就可以使谈判失败，或者使自己在选举中丢票……”。不久前，苏联报刊发表了攻击他的文章。他情绪十分激动，反应之强烈使我惊讶。他即将去苏联“度假”，他要“强迫”苏联人撤销对他的批评。我开玩笑说，想必他在那里会无聊得要命。实际上这个例子证明我的一种忧虑，即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尽管吉安·卡洛比我年纪要大得多）之

间,即使是在内部和个人之间要想采取真正独立的立场、毫无拘束地批评苏联是如此之难。这是因为多少年来人们相信(其形式无疑同宗教信仰相似)那里有更为公正、更为自由的新文明。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和反希特勒主义战争中的作用,使这种信仰得到加强。在革命斗争最艰巨的年代,也许这种信念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促使人们临危不惧和勇于牺牲。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1947年从切身体会中就发现并指责了斯大林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他们确实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榜样。1980年6月在杜布罗夫尼克进行的交谈,尤其是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国际关系负责人亚历山德罗·格里切柯夫的交谈,使我能再次有机会欣赏他的才干和洞察力。在谈到欧洲、中东和地中海问题时,他的分析是多么精辟,能洞悉现实世界上最复杂的事物。他冷静地斟酌各种可能的假设,包括危险性最大的假设。当时有些问题已经很尖锐,例如,如何使性质复杂的不结盟运动(参加的国家有右的,有左的,文化和宗教信仰都很不同)避免由于受到华盛顿和莫斯科为首的军事集团愈来愈大的压力而破裂。

然而,当我每天早晨在卡拉马利亚海滩、卡普罗伊格海滩和尤卡利普托斯海滩无止境地洗海水浴时,当我在傍晚看书读报时,或当我在埃布罗三角洲的稻田间散步闻着稻子开始结穗时散发出的酸甜酸甜的香味时,在我脑子里盘旋得最多的并不是罗马和杜布罗夫尼克的那些讨论会,而是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假期前夕在马德里为准备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举行的会议的情况。

## 第二章

### 常务委员会上出现的裂痕

在当时来说，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是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中最行之有效的机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常务委员会内部在某些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意见分歧，也有一些甚至是对卡里略<sup>①</sup>立场的批评，最开始提意见的主要是当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迪亚斯。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组织结构是：中央委员会，成员有100多人，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成员有30人左右，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但我现在所讲的那个时期多达45人；书记处，由10至20人组成，也由中央委员会选出。

1978年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正是由于执行委员会人数太多，活动不方便，决定在执行委员会内部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授予负责党的日常工作的政治权限，把书记处的职权只限制于组织和行政管理工作。

常务委员会原则上每周开一次会（几乎总在星期一下午）

---

<sup>①</sup> 当时为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82年西班牙共产党在大选失利后自动辞去总书记职务。——译注

讨论政治问题, 共由18个人组成, 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总书记, 巴斯克地区、加里西亚地区和安达卢西亚地区党的总书记, 还有卡马乔<sup>①</sup>、萨托里乌斯、比拉尔·布拉沃和塔马梅斯<sup>②</sup>。我在当选为常务委员会成员后就没有再参加书记处。我认为常务委员会的作用是积极的, 因为有好多次会上的讨论比我参加过的其他机构的讨论都要集体性强, 较多地开展批评和更为实际。

1980年7月21日, 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迪亚斯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时, 开始引起了争论。他的汇报很少有“政治内容”, 更确切地说他是在解释大会决议草案起草情况, 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和大会组织结构等等。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党章起草小组委员会的协调人是塞拉德尔, 他是个传统的“正统共产党人”, 长期从事秘密斗争, 但对苏联无条件服从。而大会章程起草委员会的协调人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组织书记特里维斯, 他属于较为年轻的一代, 但他的观点是同塞拉德尔一样的。

无论古铁雷斯还是格里戈里奥·洛佩斯·雷蒙多<sup>③</sup>都说在讨论中, 有两个问题是有争论的: 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政策和蒙克洛阿协议等的评价; 对国际问题, 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

在这两位加泰罗尼亚人发完言后, 圣地亚哥·卡里略第

---

① 系西共领导的工人委员会总书记。——译注

② 经济学家, 曾任西共马德里市副市长, 后退党。——译注

③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主席。——译注



一个讲话，他说他宁愿敞开讨论，不忙作结论。他一上来就说，他认为决议草案中关于国际形势、社会主义国家和反帝斗争部分都是正确的，方针都是对的。

他接着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大”的决议草案中关于过渡时期问题，尤其是关于加泰罗尼亚的民族问题上提出争议，他指责决议草案中关于加泰罗尼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这样提是不恰当的，因为会使人理解为加泰罗尼亚的“道路”同整个西班牙的道路不一样。他批评决议草案中关于“自决权”的提法，认为应该承认加泰罗尼亚有两种文化和两种居民<sup>①</sup>的现实存在。他还批评决议草案中用“加泰罗尼亚两种地区”这种字眼，尽管草案上指的只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现实情况。

卡里略发言的主要部分集中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上。

他发表的这些意见为以后的讨论定了基调。安东尼奥·帕洛马雷斯和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指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同西班牙共产党拉开距离的问题上提供了“不好的榜样”，对其他地区性的党组织也有影响，会引起危险的离心倾向。

这次会上使我最感不安的是卡里略关于国际问题的看法。我感到他发言中有些东西是新的，听起来很怪，我不懂他的意思。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五大”决议草案中在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对苏联的批评方面有一系列用词

---

<sup>①</sup> 这里指本地人和外地人之意。——译注

和概念确实意味着明显的倒退，同我们几年来所反复强调的不一样。我在发言中表示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评价，除个别例外，都过于肯定。草案在后面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阴暗面和矛盾”，但作为唯一的反面例子只引了中国，而且完全是重复苏联宣传中的论据来反对中国。与此相反，在讲到苏联时，草案只说，“作为一个集团的领导国的地位，有时使它提醒人们注意它的战略利益”。草案中在国际战略方面建议由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和人民大众以及第三世界的各国人民建立“三方面力量组成的世界反帝阵线”。这完全是苏联人的提法。根据草案中赋予“社会主义国家”的含义，这种建议就等于采取了支持苏联集团的立场而不是反对所有军事集团的立场。

我在发言中叙述了我几天前参加马德里南面一个区的党组织会议上的个人经历。在那次会上，我们开始谈到阿富汗问题，但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使我不得不谈到苏联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特点。工人们最关心的是：苏联的工人阶级起什么作用？工会的情况怎样？在苏联制度内部谁是真正的统治者？

我明确地讲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苏联是由一个官僚集团在统治，工人没有自由，起不了什么作用，工会只是听上面指挥的官僚机构……这一切同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这个例子我在常务委员会上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这样来作解释，讲明真相，否则孤立地在阿富汗问题上批评苏联会使人感到气愤，并且无论如何不可能说服人。

我还提出了一个会上没有别人提过的问题，即党的理论基础问题。第九次代表大会阐明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民主的党”，并且在党的定义中摒弃了“列宁主义”的提法。而这次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决议草案却提出，党以“马克思主义原则、列宁主义原则和革命实践和革命思想的其他贡献为基础”。毫无疑问，这讲的是另一个党，但是这个党是要出席西班牙共产党下次代表大会的，而这个党在决议草案中重新提出列宁主义问题，并且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并列为党的理论。我表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要么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新提法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没有取得胜利，要么是还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斗争。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在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上（关于两种居民、两种语言和“加泰罗尼亚两个地区”的提法等等），我表示不同意卡里略的看法。

卡里略则在最后发言中再次强调有必要检查一下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间关系恶化的问题。他说，如果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要完全独立，那么就应该作出结论，索性走到底。他坚持说国际问题上和列宁主义问题上都“没有实质性”的分歧。

会议开到最后还是模棱两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古铁雷斯在国际问题上和列宁主义问题上一言不发，而在过渡时期政策问题上和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上，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卡里略的意见。会上否决了帕洛马雷斯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发表声明公开批评加泰罗尼亚决议草案的不恰当的建议。

会上决定 9 月再开会，专门讨论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问题。

## 第三章

### 初步回顾我同卡里略的关系

我在参加了1980年7月底的那次常委会后，得出了三点相当痛苦的结论。

一、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接近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在国际问题上屈服于教条主义者和亲苏派的压力。卡里略接受了这种倒退的做法，而我的立场却在向相反的方向演变。

二、从卡里略的表现来看，他对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中的最本质的方面不能理解，看来他准备从我认为是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进行斗争，这就有可能在又一条战线上发生冲突。

三、卡里略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在同所有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中重新树立中央的“权威”（说到底就是他个人的权威），甚至包括在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上，尽管后者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这一点也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同卡里略可能发生分歧和冲突，对我来说，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从1937年开始我就同他一起在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里工作。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内战前夕在1936年人民阵线高潮时期由社会党青年团和共产党青年团合并组成的。当时卡里略任总书记。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他的

直接领导下工作。内战失败后，我仍同他一起工作过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想他当时对我还是欣赏的。他在1960年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当时已是非斯大林化时期。我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那个时候，根据苏联的传统做法，中央委员会分两种，一种是正式的，一种是候补的）。我认为卡里略破除了象维森特·乌里维那样的西班牙共产党老一代领导人所制定的清规戒律。也许由于我不是工人家庭出身，因此那些领导人反对委任我以领导责任。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处在配合别人工作的“助手”或“副手”地位。

我当时自认是列宁所指的那种“职业革命家”。我父亲1936至1939年任西班牙共和国驻伦敦大使。在内战失败后，他让我到牛津大学去继续我的学业。我却对他说，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我1940年3月从英国回到法国，果真参加了二次大战抵抗运动时期西班牙共产党的斗争，在法国负责某个德占区的党组织工作。在那个时期，我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其他方面的任务。

我在卡里略直接领导下工作是从1964年开始的。当桑多瓦尔<sup>①</sup>在马德里被捕以及克劳丁和森普龙被开除出党之后，他让我负责学生和知识分子方面的组织工作和制订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我从那时开始参加执委会，不久后当选为执委。从1968年开始我越来越多地负责国际问题。我的印象

---

<sup>①</sup> 现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西班牙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译注

是，在西共同苏联拉开距离、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坚持独立立场和制订新的革命战略，即我们后来所说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整个复杂过程中，我同卡里略的意见特别一致。

在某些问题上我的观点无疑要比他更“拔尖”一些。但他从来没有为此指责过我，我甚至感到他也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快，或认为这样做不对。我为他抵挡了一面，苏联和受苏联影响最大的人发起攻击时，首先得和我交锋。

现在这种情况会起变化吗？卡里略是否会在国际问题上转向更为模糊的立场而我却认为应该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呢？

然而，还有一个也许是私人关系上的问题。对我来说，无论在什么问题同卡里略发生意见分歧，都会在感情上留下伤痕。为什么卡里略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呢？这当然同我们在各个阶段长期共同从事政治工作有关，并且几乎一直是在秘密状态下工作，即使在法国时也是这样。在秘密状态下，除了工作本身的联系更为密切外，彼此间忧患与共，使思想感情容易接近。

我不想再往前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卡里略从1956年开始提出的一些政治倡议，曾使我对他的胆略和智慧十分钦佩。他在1956年提出了全国和解政策，1967年提出了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1968年从新的角度研究青年问题，从而使西班牙共产党人避免了法国共产党人在那个重要时期所陷入的滑稽可笑的局面。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他也提出了不少政治倡议，打破了共产党僵化的公式。在执行委员会历次会议上，卡里略总是表现得比其他人要明显地高出一头。也许他这样做

并不是偶然的，甚至象在开除克劳丁这一类问题上，他也要设法表现得比别人高明，尽管我没有参加那个时期的工作，但对此我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我并不认为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会对我有过大的影响。当然我同卡里略在各个时期都保持着友谊，但两人之间也总有一定的距离。从1976年回到西班牙后，由于工作的性质更加公开，同各方面的联系大大增多，在这种新的气氛中，我同卡里略之间的距离也在加大。

在领导集团内部，卡里略作风的特点是十分专断，有优越感。他靠发号施令来进行领导，总是自信绝对正确，不允许别人提不同意见。如果有人惹他不高兴，他甚至会十分粗暴。他认为正常的讨论就是在接受他的看法的基础上，大家议论议论，补充补充。就这样在党内形成了夸大卡里略权力的习惯，习惯于他一个人说了算。

我好久以来就看到了这一点，但过去我一直认为他的优点要胜过他的缺点，尤其是对象我们这么一个必须面临斗争考验的党来说，他的优点占主要地位。

卡里略综合能力的特点突出。他能在讨论后抓住问题的要害，把它贯彻到决议和具体工作任务中去。在一个接一个的会上，他都突出地表现了这个优点。

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尤其在非法的工作条件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有高居于所有其他领导成员之上的实权。许多事情要他来拍板。无疑这种实际情况对他是有影响的，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

此外，出现所有这些现象还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遗传



下来的一种很不好的传统所造成的气氛。尽管 1956 年谴责了“个人崇拜”，但授予总书记“特殊地位”的倾向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种荒谬的做法使集体领导以及必要的更新和换班变得十分困难。除南斯拉夫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内都存在这种情况。

想到 9 月回去上班后有可能出现同卡里略以及其他大多数领导成员发生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前景，我思想上感到惴惴不安。

## 第四章

# 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荒谬态度

1980年8月14日，发生了一件改变欧洲和国际生活中许多事情的大事，当然对西班牙共产党内事态发展的进程也有相当大影响。

在那一天，发生了格但斯克造船工人的罢工，并很快蔓延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波兰城市。8月24日平科夫斯基代替巴比乌赫当政府首脑。波兰过去已多次成为强大的工人斗争和工人运动的舞台。1956、1970和1976年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但是这次出现了崭新的事物，出现了罢工工人的组织。

8月29日上西里西亚的矿工举行了罢工。31日在不可遏制的运动面前，经过在格但斯克进行的谈判，政府同工人代表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工人的21条权益要求，其中除涉及经济和社会问题外，也包括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要求，如承认劳动人民建立的新工会，承认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9月1日罢工工人复工，5日波兰共产党（由于历史原因，它的正式名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这是因为波兰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斯大林时期，为第三国际所解散，后来又重

新建立,吸收了一部分前社会党人参加,因此改为现称)中央委员会罢免了1976年以来它的最高领导人盖莱克,选举了卡尼亚代替他。卡尼亚当时以愿意同用“团结工会”命名的新工会合作的姿态出现。

9月8日西班牙共产党在假期之后首次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会议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形势。

会议不可避免地讨论了波兰问题,后来还毫无困难地通过了由我和其他同志起草的声明。这是西班牙共产党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文件之一。它不只在措辞上毫不含糊地声援了波兰的劳动人民,并且第一次提出两大重要问题:第一,如果其他东方国家不愿看到自己卷入极为严重的危机,那么波兰的例子就应该促使这些国家采取民主化措施。第二,西方各国中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同东方国家中争取民主化的斗争是相互影响的。这已不是要求尊重几个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问题,而是近乎肯定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斗争同争取改变“现实社会主义”的工人斗争之间相互声援的问题。

与此同时,会议还十分广泛地讨论了国内的政治问题、当时形势的严重性以及动员群众抵制政府日益明显向右转的必要性等问题。然而,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会议开始时的报告以及他在随后的几次发言中,都强调党内“离心倾向”的危险性和地方分裂主义的威胁。他实际上是把加列戈在7月引起的话头重新拣起来并加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卡里略比在7月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走得更远。他甚至象最后通牒似地在会上摊牌:要么两个党在政治路线上、在原则上、

在议会里继续组成一个统一整体(尽管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是独立政党);要么两个党各自为政。在第一种情况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义务遵守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第二种情况下,就要中断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传统关系,在两党之间确立完全平等的新关系;两者必取其一,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保持目前模棱两可的状态。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主席格里戈里奥·洛佩斯·雷蒙多不同意这样提出问题。他说,如果把这种抉择公布出去,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他认为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无论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还是西班牙共产党,都需要采取其他的领导方法。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迪亚斯强调,现在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即党如何适应地区自治的进程?在从中央集权十分利害的国家向地方自治国家过渡的这个阶段中西班牙共产党如何来进行领导?他认为西班牙共产党如果不能加强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党组织本身的领导能力,那么有可能使这些党组织发生分裂。卡里略的建议并不是解决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问题的办法,也不是解决西班牙共产党同其他地区党组织关系的办法。

霍尔迪·索莱·图拉也同样坚持这是个政治问题,用“组织”办法是解决不了的,而是要选择一条最好的途径以解决欧洲共产主义政策遇到的困难。

由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展得这么开,以至有必要几天之后再开会讨论。我早已预定去罗马和贝尔格莱德旅行,由于时间冲突,无法参加第二次会议,但我考虑应该表明自己的看

法，因此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全文如下：

“我想对讨论中有些使我感到不安的问题发表点看法，由于会议延期，我无法参加，故留下一个书面意见条。

“我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内的一系列观点，主要是关于党的理论基础和国际问题的观点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和批评。我现在不再坚持这些意见。我认为最近在波兰发生的情况已经更加有力地表明有必要用与上述决议草案不同的方法来探讨有关东方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第一项议程中讨论过了，并且会议通过的决议也反映了我们的实质性意见。

“在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上，我认为最根本的在于政治方面，这是一场党内确立欧洲共产主义方针的斗争，我们在这场斗争中遇到了困难和阻力。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推行欧洲共产主义的方针上，尤其在国际方面和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很大的抵制和阻碍。

“问题是怎样才能更好协助这一政治和理论斗争，争取欧洲共产主义向前发展。（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理解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的内容，不需要象其他地方那样进一步作解释。）

“在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上，我认为组织和方法方面都不是决定性的。如果说现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困难比较大，那是因为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部存在这种政治斗争的缘故，当然西班牙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只是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困难更大。

“在两党关系上，我认为应该避免提组织方面的问题，否

则会给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人提供有利于扩大他们影响的讲坛和借口。

“具体来说，我认为任何限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现有特性和自治程度的建议对两党组成这样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事实就是这样，而且是建立在欧洲共产主义基础上的‘完整的统一体’）会起十分消极的作用。同时我也认为要迫使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作出卡里略所建议的选择也会起消极作用，会起同我们寻求的目标相反的作用，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在寻求两党之间最大的一致性，在共同的革命进程中的共同方针。

“在我看来，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间从实践中诞生的、带有独创性的这种关系体制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当然这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不够明确，这也许是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可行的。我相信大家都羡慕我们这点，也都想仿效。问题是要看看这种体制在当前还有哪些运转不灵的地方，还有哪些方面需要修改。我想如果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机构在这样的基础上举行预期的会议，那么是会取得具体成果的。我在这里准备指出两点，当然绝不只是这两点。

“第一点是如何使西班牙共产党的同志在参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不只是形式上摆样子，而是具有有效性和政治性。我曾经几次参加过这种会议，每次给我的印象都不一样。有几次我感到自己真正参加了讨论。但我也记得有一次则纯粹是摆样子，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过错。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起变化和有所改进，这也许是很重要的。

“另一点是关于两党的代表大会筹备问题。我认为可以研究将来在一些必须是共同性的问题的讨论中，采取更有启发性的、对两党讨论都更为有利的方式，从而通过这样的讨论，达到尽可能多的一致性。我不认为在两党关系上要硬性贯彻民主集中制，但是在有关日期和筹备方法等方面我认为的确是可以进行研究的，是可以避免和纠正今天看到的消极方面的。

“我认为这次讨论十分重要。应该从筹备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角度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并研究地区自治的国家中党的结构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深入谈这个问题了，尽管它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想以后还会有机会谈，并且我还想再多思考一下。但是，我们所遇到的现象同其他国家是很不相同的，例如，意大利的地区制度同西班牙的地区自治是十分不同的，不仅法律规定不同，而且人们的觉悟也不同。我们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建立各个地区党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革新者。我们还必须继续当革新者，根据我们所创建的新现实来革新组织结构。”

我自国外旅行回来后，卡里略对我说，我留下的书面发言对会上的讨论毫无帮助。他说我弄不清楚问题在哪里，说我的立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十分不高兴的口气。

在那次我未能参加的会上，指派卡里略、桑切斯·蒙特罗和萨托里乌斯去巴塞罗那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会谈。

在巴塞罗那，卡里略或多或少重复了自己的立场。他企

图使加泰罗尼亚人处于两者必择其一的局面：要么在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上贯彻“民主集中制”，也即承认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方式；要么就决裂，成为两个“兄弟”党，这种提法有着未明说的含义，即西班牙共产党有可能在加泰罗尼亚的外地人中另外建立一个小组。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几乎全体拒绝接受这种二难推论，或者说卡里略的威胁。古铁雷斯·迪亚斯却不局限于采取守势。他把三个问题放到桌面上：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内部缺乏集体领导；欧洲共产主义政策遇到困难；西班牙共产党的职能有必要适应地区自治国家内在的变化。至于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关系，最好是重申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章第20条<sup>①</sup>和西班牙共产党党章第42条<sup>②</sup>，不予变动。

加泰罗尼亚方面一连串的发言坚持两党之间的根本问题是两党内部在政治上遇到了困难。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机

---

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章第20条：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保持同西班牙共产党完全一致的关系，共同决定保持相同的原则，相同的政治总路线和相同的组织方法。

同样，为了有助于制定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路线，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根据西班牙共产党有关召开代表大会的规定派代表参加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大会。参加的代表享有同出席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同样的权利和负有同样的义务。

② 西班牙共产党党章第42条：

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保持完全一致的关系，共同决定保持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相同的政治总路线和相同的组织方法。由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拥有参加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充分权利。



关报《劳动报》社长布斯克斯谈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部对孤立和击败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斗争不力。

奇怪的是，加泰罗尼亚人当中对西班牙共产党建议反应最好的都是象塞拉德尔<sup>①</sup>这样的教条主义分子，这些人一向无条件追随苏联，但同时长期来已习惯于在卡里略的领导下工作。

桑切斯·蒙特罗和萨托里乌斯 10 月 13 日向常务委员会汇报巴塞罗那会谈的情况时，问题已经很清楚。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的这次旅行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它的建议遭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绝大多数人明确的拒绝。此外，这个问题理所当然也就在报上登了出来，把西班牙共产党置于企图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进行“党纪处理”的难堪境地。萨托里乌斯说加泰罗尼亚人搞不懂为什么恰恰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关系问题来，他认为现在必须采取不象原来那么绝对的态度来找出解决办法。

后来在巴塞罗那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重复第一次会议情况，只是调子降低了一些。最后通过了一个公报，简要内容如下：

“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行委员会认为，鉴于对两党党章相应的第 42 条和第 20 条的尊重，应努力改善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共同工作，两个既独立又在共同原则的鼓舞下采取相同的总政策和组织方法，并在同一个变革社会的过程中进行团

---

① 塞拉德尔后来分裂出来另组亲苏的党。——译注

结战斗的党所应做的共同工作。”

这就是说一切仍然依旧，用洛佩斯·雷蒙多 1980 年 10 月 25 日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上的话来说，就是双方认可“近 25 年来，而且基本上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以来，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所保持的关系体制”。

12 月 12 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桑切斯·蒙特罗的汇报，又研究了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会谈情况。卡里略在发言中说，他对目前达成的解决办法，也即指上述公报，感到满意。这同他在夏天的讲话（当时他说“最糟糕的莫过于使目前模棱两可的状态继续下去”）相比是转了 180 度的大弯，实际上是接受了他个人的一次失败。此外，关于列宁主义问题，他说他同格里戈里奥·洛佩斯·雷蒙多一致认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提法（其中包括列宁主义）同西共的提法（在九大上删去了列宁主义提法）并没有矛盾，不必使讨论“纠缠于意识形态问题”。

一个月之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取消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在国际政策上作了很大的修改（比原来的草案还要糟糕），同华沙条约军事集团结盟和同苏联政策保持一致，从而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政治风暴。洛佩斯·雷蒙多和古铁雷斯·迪亚斯拒绝继续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主席和总书记，于是由坚持传统思想的老一代领导人佩德罗·阿迪亚卡当主席，由工人委员会的干部弗朗西斯科·弗鲁托斯当总书记。弗鲁托斯曾在西班牙共产党九大维护少数派的意见反对在党的定义中删去“列宁主

义”的提法。

在这个问题上，卡里略个人无疑要负很大责任，他尽管使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内多数人跟着他走，但是犯了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是我第一次指出，起码是第一次这么明确地指出的错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演变无疑是1981年加深和加速西班牙共产党危机全过程的一个因素。因此有必要对以下的问题作出答复：哪些理由和目的促使卡里略主动采取了我前面叙述的做法？

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在那次行动中考虑的并不是维护或拯救欧洲共产主义。就象前面好几个例子所表明的，他完全低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决议草案中在国际问题上屈服于苏联观点压力的明显倾向，他甚至还接受在草案中继续保留列宁主义的提法，而不久前这个问题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部还是争论的焦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态度鼓励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内部业已相当强烈的对苏眷恋之情，在国际问题上愈来愈让步。也因此古铁雷斯·迪亚斯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大前夕对《星期一报》发表的声明中说到“苏联所犯错误的出发点是它想从有利于和平、缓和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角度来帮助对社会实行革命变革的愿望”。古铁雷斯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在讲到“真正的革命变革”时，把阿富汗同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相提并论。

另一件重要事情是任命伊格纳西奥·加列戈<sup>①</sup>率领西班

---

① 加列戈是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亲苏派，后在苏联支持下于1984年1月聚结从西班牙共产党内分裂出去的几个亲苏派组织成立了西班牙人民共产党，加列戈当选为该党主席。——译者

牙共产党代表团去参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正当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时，加列戈在会上发言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其他没有别的话要说”。对那些要求取消欧洲共产主义回到“纯共产主义”的“亲苏”的教条主义者来说是一种鼓励。

经过了相当时间的回顾之后（我当时脑子里对今天要在这一页写到的思想是并不明确的），我归纳出三点促使卡里略在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关系方面犯了大错的因素，主要如下：

一、他想削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把能听他话的人放在该党领导地位。他不是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1977年取得21%的选票的情况以及该党由于本身的机能所产生的民主活力看成是西班牙共产党向欧洲共产主义方面革新的起点，而是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力量看成是有可能在改变党内生活传统习惯方面扩散影响的危险焦点。由于古铁雷斯·迪亚斯所持的批评态度，他把古铁雷斯看成是一个必须要铲除的坏榜样。他甚至信任象塞拉德尔那样的老党员，认为这些人出于一种传统的忠诚会在这方面助他一臂之力。而事实上恰恰就是这种类型的忠诚使塞拉德尔对苏联无条件的服从，这是合乎逻辑的。

这里正好证明共产党内特有的情况，即：共产党在有些事情上表现出没有能力去解决，如更新它们的总书记。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的困难是同官僚机构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在西方情况也是一样。几乎看不到在没有创伤的情况下及时换班的例子。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格里戈里奥·洛

佩斯·雷蒙多所采取的态度，他运用自己无可争辩的全部权威主动让古铁雷斯·迪亚斯来替代他。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一个时期曾是欧洲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取胜的基础和希望。这种希望之所以落空乃有各方面的原因，无疑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是原因之一，但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责任也不小。

二、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并且具体到在西班牙所需要建立的民主政权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中央集权的残余思想。我应该说（尽管我这么说有点发岔）我对主张中央集权思想的力量，不管是西班牙的右翼还是左翼，都有反感。

我至今还记得我父亲，他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自由派和共和派，在内战期间曾深切地同情象内格林这样的左翼社会党人，甚至共产党人，然而他在民族问题上对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总是疑虑甚重。最怪的是他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曾是国际联盟的少数民族处处长，负责视察国际条约中保障当时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众多的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和享有教育等权利的条款主要在中欧是否受到尊重。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历史上的几个阶段，具体来说在当前民主过渡时期犯了大错，有些错误的根子也就在于这种中央集权思想。

我相信有不少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在思想上还强烈地残留着中央集权的思想（尽管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献在做法上与此不同）。他们倾向于把地区自治只看成是关系到国家体制上的地方分权，是为了使各级决策性机构接近选

民的方便。

他们对民族问题的实质却谈得愈来愈少。而民族问题并没有过时，相反地甚至在西欧又在重新出现。

象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这样一些人民和民族有权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甚至有权同西班牙其他地方分离，如果它们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话。革命的民主力量不能否认他们有这样的权利。为了避免最终分离或避免走向分离，唯一的道路是要采取政策加强西班牙各族人民继续在一个国家中共同生活的政治愿望，概括起来讲，就是所谓有自决权。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宪法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了十分严肃和决定性的一步。尽管我个人认为真正的解决办法是采取联邦制(恰恰是因为西班牙的解体将是一场灾难)，但看来宪法的付诸实施将允许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积累有历史意义的经验。也许这些经验本身在最后阶段会从联邦制的意义上提出改革性建议，这已是属于未来的问题。当前的危险乃是以民主中间派联盟为代表，企图用所谓的自治进程协调组织法使宪法失效(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受到工人社会党的支持)，这样做有可能围绕民族和地区自治问题上的矛盾和敌视而造成一种充满怨恨的灰色气氛。

为了使军事政变分子没有借口，为了使武装力量相信宪法会保障西班牙的统一，我们各种革命力量在这个斗争中必须肩负不同于民主中间派联盟或其他民主阶层的特殊作用。也因为如此，修改或掩饰我们固有的原则立场是无效的，也是适得其反的。因为这样做会使人以为我们在玩弄花招。最好还是表明我们把宪法作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致点，甚至各人

的出发点可以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思想的消除,无论如何将是另一个历史阶段解决的事情(是否要改革,是否要实行联邦制),并且必须是通过民主方式解决。

言归正传,我认为卡里略和西班牙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这种中央集权思想的残余使他们难以充分理解加泰罗尼亚要保持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意义。他们看到表面现象就津津乐道,例如我曾听到卡里略作过一个夸大其辞的结论,说在巴塞罗那的街上,同他打招呼和鼓他掌的人要比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打招呼的还要多。

卡里略(甚至工人阶级内部)低估了加泰罗尼亚的民族问题,结果无疑导致他向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提出了诸如在加泰罗尼亚存在**两种文化、两种居民**的荒唐思想,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这种态度毫无疑问是帮了倒忙,让欧洲共产主义的敌人扩大了活动范围,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把保卫加泰罗尼亚民族的旗帜交给了他们,使他们把欧洲共产主义同中央集权倾向联在一起。

三、上述问题在西班牙共产党本身的内部生活中也有反应。

西班牙共产党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规定通过地区委员会确立其建制,只有加利西亚和巴斯克两个地区除外,因为当时那里都已建立“民族地区党”,它们作为西班牙共产党的组成部分参加西班牙共产党。但是大会通过的党章的临时附则中却还提到加那利群岛共产党、巴伦西亚国共产党、巴利阿里群岛共产党的存在,并且还补充说:“在中央委员会的同意下,根据各有关地区情况的需要所建立的党组织可以具有本章程第

41 条所规定的职权”。这第 41 条就是关于巴斯克共产党和加利西亚地方共产党的那一条，它规定这些党可以建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并拥有自己特殊的党章。

事实上这种地方分权的潮流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卡斯蒂利亚—莱昂除外)。党领导机构对这一过程作出了反应，采取了两面性的态度：表面上采取“自由主义”，听任那些由自己命名和有自己建制的党出现；但在看待这一新现实，研究党的新的领导形式和新的职能时却用狭隘的老眼光。1980 年夏天有一个思想缠住了卡里略，使他久久不能摆脱，就是如何防止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间的这种特别灵活的关系会作为榜样扩散到其他地区，破坏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和整体性的传统。

在那个时期，古铁雷斯·迪亚斯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他不仅代表了加泰罗尼亚的看法，而且对西共整体来说，也是正确的。他当时提出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专门研究如何使党能适应地区自治问题。一开始没有人表示反对，但也从来没有召集过这样的会议。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当时已经摆在面前，直到今天还有待于解决。

而卡里略所关心的则恰恰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独立性。而他所犯的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搬起石头砸了他自己的脚。我们已经看到维护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个性的正义事业在某些人的思想中却成了共产主义的斗争。





## 第二部分

# 西班牙共产党同苏联 的关系



# 第一章

## 今天做一名共产党员 意味着什么？

在说到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具体情况时，如果不从正面去研究带根本性的大问题，那些能决定各国人民命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强烈地影响到人们生命的抉择，那就是十分可笑的。

我们生活在进行重大变革的时代。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进展，其中包括微电子、新能源、遗传工程和新的信息潜力，使人类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如果想用某种方式来说明它同过去几个世纪相比，飞跃之大可以称之为“后工业时期”。在技术上，人类已有可能获得完全新型的自由，不必象千百年来那样被迫为生存而劳动。今天在人类生活中已不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而是绝大多数的人，有可能拥有充足的空闲时间和自由创作的广阔天地。

但是我们所处的那种产生人的异化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使我们面临人类毁灭的史无前例的危险，即使不是这样，也要在任何情况下维持和加剧亿万人民遭受失业、贫困、奴役，甚至忍饥挨饿的非人状况。

恰恰是在历史的这一十字路口，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

即(不管你承认与否)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进程中所诞生的那个制度,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

波兰事件并没有什么新发现。但是这一事件却有助于人们强调它所涉及的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我们这些正是为了促进人类能够向自由、向结束剥削和异化前进而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人,我们这些相信俄国革命正是开辟了这条道路的人,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一革命产生的制度并没有提供人类解放的道路。

就是因为这点,我不得不在这一部分书中再次提到决定了我生活道路的一些疑问。

我是1933—1934年成为共产党员的。我先在日内瓦参加了“反法西斯、反战青年委员会”,那时我同我父母一起住在日内瓦。我在卡尔维诺开办的中学学习。几个月后,1934年9月我在马德里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曼努埃尔·图尼翁·德腊拉说服我,引导我跨出了这“决定性”的一步。

我当时无疑是怀着反对法西斯的思想参加共产党的。那时希特勒刚刚在德国上台,追禁民主派人士,挑起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在广场上焚烧“黑”书……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态度最坚决,因而在法西斯的镇压和恐怖主义活动中,他们总是首当其冲。甚至在马德里,我们上街推销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报《红色青年》,就要冒在长枪党人的枪弹下被杀害的危险。

但是,我信仰共产主义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对第一共和国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具体地说,对社会党的主要人物(其中有的人,如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同我家关系很亲

近)“参加”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和社会感到失望。

对我来说,(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苏联不仅代表着没有剥削、没有贫困、没有贫富之分的、平等的国家,而且还代表着一种根本不同的文明;可以自由恋爱,有堕胎权,男女之间保持新型的关系、出现完全新的艺术和文化……当时我们所接触到的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现实(当时这种镇压性的、保守的现实已经在苏联占统治地位),我们受到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格拉德科夫的小说和爱森斯坦的电影所反映出来的1917年革命大风暴的光辉的辐射。

尽管这些个人经验已经是遥远的往事(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化),但是我不能把它们同当前(1982年)我所认为的主要理论问题分割开来。今天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如果共产党最初的特征渊源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且如果我们承认,这一革命产生的争取解放的历史浪潮已经枯竭了(意大利共产党最明白不过地这样宣布过,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却不愿意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问题并不是我们当代西方共产党人企图要比苏联人更好地实现1917年俄国革命的内容。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82年1月发表的文件中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恰恰就在于它推崇这种荒唐的做法。而它在理论上却并没有能够跳出传统的死胡同,尽管它反映了这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的意见是,现在只有回到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上去寻找出路,舍此别无其他挽救办法;资本主义由于本身

的作用和固有的生产关系,使劳动者基本上产生两种态度、两种心情或者说两种反应。一种态度倾向于改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这种态度属于量的领域,偏于改良。

另一种态度是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建立另一种制度、另一种生产关系而斗争。它更多地属于质的领域,寻求对剥削,对使人异化的总问题的解答,倾向于革命。

我认为,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在好几个部分明确地解释了这种矛盾现象。这里,我冒昧地引用几段,请读者自己去作出判断: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sup>①</sup>

与上述引言所表明的内容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出了劳动者的另外一种倾向,即走向反抗的倾向: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

---

<sup>①</sup> 《资本论》,第一卷,805—806页。

深，而且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sup>①</sup>

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资本区别于以前一切生产方式的两个特点是：它生产剩余价值以及为此把人本身变成商品。工人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是被剥削者，受不平等权利支配。但是由于工人已成为商品，成为纯粹的劳动力，因此成为异化的客体，他已不复作为人而存在，变成了活的机器的附件。这两个方面彼此紧密联系，却并不是同一的。第一个方面促使工人采取改良主义的态度，而第二个方面则促使他采取革命的态度。

列宁以工人贵族为出发点，解释社会民主党，认为工人贵族产生于掠夺殖民地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我个人认为，更确切地说，这种解释只反映了附带现象，只反映了现实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其根源。这个论点在政治上把社会党人几乎置于对本阶级“犯罪”的位置上。这种做法，在某些时期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后果。

我是想强调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产生改良主义态度和革命态度的根源。但是很明显，它在这样或那样一些情况下的产生和发展，还会有别的因素起作用。

工人运动中改良和革命的分歧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

<sup>①</sup> 《资本论》，第一卷，831页。



的性质。这种分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因此,从这两种态度中引伸出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区别,把它看作这两种态度的朴素反映,那就简单化了,就是陷入荒唐的、非历史的机械论。事物要复杂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已经存在改良与革命这两种倾向的冲突。

不过,把一切例外的情况撇除在外之后,我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采取革命态度的人都集中于共产国际的周围,而采取改良主义态度的人则主要汇集在第二国际的各个党内,即社会民主党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工人革命在德国遭到挫败,魏玛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了德国皇帝。与此相反,革命却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俄国的这一范例成了革命力量(在欧洲,这种革命力量在人数上无疑要小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力量)的中心和核心。并且革命倾向还由于民族解放和反封建的农民起义等其他因素而得到加强,它的影响开始扩展到其他各洲,扩展到中国、印度、拉丁美洲(例如在巴西,普列斯特斯进行了伟大的业绩)。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是在预计要爆发国内战争和起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的二十一项条件中有一条就是这么说的:

“在当前这种剧烈的国内战争时期,共产党只有以尽量集中的形式组织起来,只有保持铁一样的,近似军队的纪律,只有它的中央机构具有广泛的权力,行使无可争辩的权威并得到党员一致的信任,才能发挥作用。”(第十二项条件)

这种类型的组织一开始就是模仿布尔什维克党,希望重

复俄国的先例。到三十年代,在反法西斯的斗争阶段(不仅仅在西班牙内战中,而且在欧洲各国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中)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苏联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类型的组织第二次得到了某种正统的地位。同样,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和中国,朝鲜和越南的解放战争中,也取得了正统的地位。

我们共产党人在西欧起着比较突出的历史作用的,是在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或者地下斗争的时期。在那个时期,自然我们的作用超过社会党人。正因为这样,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我们是一批专会打枪和反抗迫害的人的形象。这是一种无可争辩的光荣形象。但是,在我看来似乎我们还不懂得如何清除把斗争的暴力形式同革命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等同起来的思想。后者确实是我们的态度,而前者却是相对的,在过去某些阶段是必要的,今天在特定的情况下,不仅对共产党人来说,而且对天主教徒来说也是必要的,例如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就是这样。但它并不是同共产党人的态度形成不可分割的同一体。相反,在我们社会上出现的恐怖主义,尽管口头上用的是革命辞藻,但只是服务于或有利于社会上保守势力。

判断一场社会变革的革命内容不是看是否用暴力的方法实现,而是看劳动者是否掌握政权,看生产关系和文化生活是否有变化,看是否存在劳动者的自治,看公民是否享有切实的自由权利。

今天作一名共产党人的意义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变革(不是数量方面的,而是质量方面的变革)的必要性;在于要求结束男男女女在资产阶级社会遭受异

化的必要性；在于这一制度没有能力去解决当代的问题，包括人类生存的问题；在于一些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的崛起和存在，这些力量有可能建立足以进行这种革命的新的历史集团。作为共产党，只有为促进变革作出贡献并为实现变革所需要时，才有存在的意义。

我认为共产党人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对我们周围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变革采取革命的态度，尽管这么说有点抽象。另外我想澄清一点，改良和革命的对立，从两层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互相排斥的。革命态度包含着接受和进行改良。不过这种改良是导致质的变化，导致建立另一种制度的进程中的改良。典型的改良主义态度则意味着局限于改良，因而局限于保存现有制度并使之更加完善，虽然这种态度也可以伴随着一些甚至是偏激的言词。判断这两种态度的法官不是言，而是行。

在这之后才能提得上采取什么战略、运用什么手段、今天达到哪些目的、明天又争取什么目标等一系列问题。但是最根本的是革命态度。就我本人来说，那种把我在1934年的抉择同我当前的态度以及对未来的态度贯穿起来的就是一种革命态度。

共产主义作为观点，甚至作为政治，是先于俄国革命而存在的。我认为把十月革命当作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向墨守成规让步，向传统让步。这对革命者来说是不恰当的。十月革命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它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摧毁了半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它鼓舞了世界上广大地区的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但同时，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创的

进程今天却导致了这样一种制度，它宣称自己的目标社会主义，但又拒绝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澄清我们西班牙共产党同苏联的关系，完全打破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文化上的依附态度，我看是势在必行。

## 第二章

### 西班牙共产党漫长的独立道路

西班牙共产党从最初阶段开始，它的国际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即 30 年代初，共产国际通过其驻马德里代表，阿根廷人维多利奥·柯都维拉进行了十分直接的干预，把布列霍、阿达梅、特里利亚等排除出领导机构，又用何塞·迪亚斯为首的新领导机构取而代之。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共产国际是否“忠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接受”为标准的。

后来，在西班牙战争中，苏联提供了军事援助，而英国，甚至法国（当时是莱昂·布鲁姆的社会党政府）却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从而决定了西班牙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了特别“亲苏”的立场。这不只是领导机构的问题，那时对苏联的爱戴、敬慕和无条件的信任的心情在党员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具体表现就是 1947 年苏联共产党发动对铁托的谴责时，以及稍后一点，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人发起攻击与诽谤时，西班牙共产党都是盲目追随苏联共产党的。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但是由于赫鲁晓夫那种在象莫洛托夫这样的斯大林主义者仍然掌握着非常强大的权势时，敢于进行

揭露的勇敢性格,以及由于他那种不拘礼节,直统统的作风,才使苏联共产党保持了自己的声誉。在赫鲁晓夫当权的初期,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只有陶里亚蒂一个人明确地指出,斯大林使社会主义制度“蜕化”了。而当时正式的提法却是承认斯大林有罪,有严重的个人崇拜,但是“党”并没有犯错误,对苏共的迷信还应继续。为此而采取了象某种中世纪繁琐哲学那样的“两个真理”的逻辑。至今,苏联的态度或多或少还是如此。

尽管如此,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摧毁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过去对苏联几乎是不近情理的盲目信任态度。圣地亚哥·卡里略在1960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总书记。在以后的几年里,西班牙共产党开始对苏联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初步的公开批评。尽管这些批评只涉及到一些个别的方面(如反对苏联对作家达尼尔和西斯尼亚夫斯基的判决,批评苏联对佛朗哥政权态度太软),但是却代表了对以往共产党人传统习惯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不过,第一次严重的决裂发生在1968年,是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起的。

1968年初,我正全力投身于党的国际工作。门德索纳、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和我组成一个代表团,参加布达佩斯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筹备196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

布达佩斯会议是在有点卡夫卡式<sup>①</sup>的神秘气氛中举行

---

<sup>①</sup> 卡夫卡系奥地利作家,其作品多带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在当代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译者

的,为了不让外人了解内情,座落在匈牙利美丽首都布达佩斯的豪华的盖莱尔宾馆整天大门紧闭。苏联人在会场里主宰一切,要求凡事都由他们过目。在讨论会议程序时第一次出现了问题,罗马尼亚人就退出了会场,尽管后来他们又回来参加了以后几次会议。那时,在捷克斯洛伐克,短短几个月的杜布切克时期已经开始。参加会议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中有一位就是克里格尔博士。他曾是西班牙国际纵队中的一名老战士,后来又参加过中国人民军队。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鸣。西班牙代表同意大利、罗马尼亚、捷克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一起,主张采用一种新的讨论方式,以便在准备国际会议的决议草案时,能够开展最起码的民主辩论。我们开始注意到苏联对我们态度冷淡。我从会议一开始就发觉,他们企图在我们三名西班牙代表中间进行离间。

这几个月,我几次去布达佩斯都路过布拉格。我直接觉察到杜布切克的新政策是多么得人心,一种得到人民支持的社会主义正开始诞生。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大大地有助于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对1968年8月的苏联军事占领采取了毫不含糊的谴责态度:那时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一百多名侨居在那里的西班牙共产党员,他们几乎同捷克公民一样地在工厂里劳动和生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最好不过的情况。我们就这样从第一手材料中了解到苏联政府和党编造的一切借口(什么“社会主义受到威胁”呀,什么“反革命分子掌握了武器”呀,等等)都是一些无耻的谎言。苏联的坦克在布拉格直冲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这是一次为了摧毁这个国家的独立,阻止民主的、得到工人和人民支持的真正社会主义的发展

而发动的入侵。

西班牙共产党的谴责或许比西方其他共产党，甚至比意大利共产党都要更加激烈。从此，西班牙共产党无疑成了对苏联政策中我们认为违背各国人民与和平利益的方面最鲜明地采取批评态度的党。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几个月后，再次在布达佩斯举行筹备会议。我们决定出席，但是一到达，我们就要求同苏联代表波诺马廖夫和卡图切夫（他们两人都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会谈。当我们提到我们建议会议谴责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干涉时，他们表现得十分紧张。他们只是重复他们自己在宣传中散布的那些谎言。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位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人，然而他们却没有进行讨论的能力，习惯于不管他们说什么别人都得举手通过。简直没法同他们进行辩论，至多只是一些近乎外交的词令。

196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的世界性会议上，（既没有中国人，也没有南斯拉夫人出席，当然这也是这一类会议的最后一次）苏联领导集团，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都对西班牙代表团施展了真正的讹诈手段，要西班牙代表团从发言稿中删去谴责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话。勃列日涅夫对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和圣地亚哥·卡里略说，如果他们要保留这段话，那就等于同一个有二亿多人民和一千多万党员的党对抗。这件事发生在西班牙共产党在会上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伊巴露丽和卡里略回来得很晚。我们在“苏维埃”旅馆的一间房间里召开了代表团全体会议。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除了利斯特尔保持沉默，因为他完全意识到安装在旅馆



房间里的窃听器会把所有谈话都录下来),都认为必须把这种威胁顶回去。第二天,圣地亚哥·卡里略全文念了讲话稿。而且在通过决议时,我们提了保留意见。

显然从此开始,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同以往关系的性质不同了。西班牙共产党不仅在西班牙国内问题上,而且也在国际政策上,都作为独立的党行事。

但是,象卡里略所起草的、由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82年11月10日通过的决议中所说的那种话,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决议是这么说的:“早在1969年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就已经清楚表明,西班牙共产党抛弃了同苏联共产党的一切特殊关系,而且此后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条路线。”这种把还没有做到的说成是已经做到的作法是非常危险的。

1969年以来,西班牙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步骤(无疑还有必要采取其他的步骤),以便达到真正可以说同苏联共产党不再存在特殊关系的地步。在这方面,我认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在1981年12月30日发表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声明中阐述的立场要更加明确和真实。声明说:“意大利共产党愿意在思想和政治行动中保持绝对自主的基础上,在不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系的情况下,同所有共产党,也象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和进步的力量一样,保持正常的关系,但不同任何党保持特别的或者优惠的关系。意大利共产党重申,它认为同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力量,亦即同社会主义运动、进步运动和解放运动相分离的,清一色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已经过时了。”

我不是要降低 1969 年事件的重要意义。但是那一事件并没有结束同苏联共产党,推而广之,同执政的共产党保持优惠关系的历史时期。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1969 年以后又过了 12 年的今天,西班牙共产党的态度中还有问题需要解决。在布拉格出版一种所谓《国际杂志》。这是不断攻击中国共产党人的、可怜的苏联宣传工具。它名义上是 50—60 个共产党联合出版的,尽管实际上完全操纵在苏联共产党的官员手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它的编辑部里没有西班牙共产党的常任代表。但是在它的出版委员会名单里还有我们的名字。我们还必须参加在索菲亚、东柏林等地召开的、特别为宣传苏联立场服务的一系列会议。尽管我们是持批评的态度,但是我们出席会议本身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仍然是过去留下来的做法。

为了使西班牙共产党能够在国际上采取新的立场,真正结束同苏联共产党和其他执政党保持“优惠关系”的时代,我认为需要纠正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改正对一系列问题的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为了便于研究这些问题,我把它们分为以下三组:

一、存在不存在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用苏联官方的话说)?

二、什么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列宁主义吗?

三、在苏联及其军事集团的成员国中存在的是哪种类型的政权?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权?

## 第三章

###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

这不是名词术语问题。我认为如果一个政党把自己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或成员，那么它就会在事实上接受同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保持“优惠”关系，它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哪怕是以批判的形式)参加到苏联在世界工人力量中强制推行其霸权主义的战略中去。

西班牙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所采取的立场，就是为改变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关系而斗争，争取每个党的不同观点和独立得到尊重。我还记得我前面提到过的在布达佩斯筹备 1969 年莫斯科会议时，出现了一个令人十分憋气的场面。有一天晚饭之后，一位显然已经喝得醉熏熏的苏联代表接连几个小时指着我们的鼻子，说我们对会议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是异端邪说。我们在修正案中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之间有必要建立没有“中心”、没有“领导党”的一种“新的团结”。他暴跳如雷地对我们说：“什么新的团结？是同社会民主党人、同敌人去团结吗？这成了什么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异端邪说”得到会议通过。我们在连原来同意我们的人都开始抱怀疑态度的情况下，还是一再坚持我们的修正意见，一直到有一天一位匈牙利的老资格领导人开始发表对我们的立场

有利的言论。毫无疑问，他是根据苏联人的意见来寻求解决方案的。这个问题的禁区终于冲破了。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中，虽然没有提“新的团结”，但确实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没有中心，也没有领导党。

这是向前跨出了一步。之后的斗争是如何把这些话变成现实。苏联共产党实际上的做法是把这些话变成一纸空文，变本加厉地把其他各国共产党当作为苏联政府政策服务的工具。面对这种情况，西欧各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要把这些话付诸实施。

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空的。最后，那些采取批判态度、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制订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方案的各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和那些对苏联无条件服从的共产党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当然，不管怎么说，一致的东西还是有的，如声援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人民、裁军……但在这些问题上，就是同非共产党、社会党、解放运动也都有一致的地方。这几年，我最直接地体会到，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同左翼社会党人、非教条主义的托洛茨基分子有更多一致的看法，却不能同那些可以称之为“崇拜苏联”虔诚备至的共产党人有一致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在名称上的一致还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就有必要问一下，今天什么是世界革命运动？世界革命运动是指正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和剥削的结构进行斗争的运动，但并不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在我们面前

有两种进程,它们可能互相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回事。在当前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我们曾经有过一种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接替的观点庸俗化并用它机械地解释未来:社会依次从奴隶制、封建主义、发展到资本主义,现在该轮到社会主义了,而且凡反对资本主义的,就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在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会导致严重错误的推断。

现实的情况是,在当今世界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进程是异常复杂的:一方面是集中在苏联周围的,自称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或“现实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是在第三国际范围内开始自己的革命进程,但是后来自己又独立出来并且开始制订自己的模式;特别是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不结盟运动中起了特殊作用而影响很大的南斯拉夫也是属于这种情况,此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然后,还有世界上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家,它们已经摆脱了殖民枷锁,建立了由各种方针指导的政权,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想强调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却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明显想法;当然也都有回避两个军事集团两极对立的明显愿望。

在这一现象中,还有一些不寻常的矛盾现象,如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1980年我有机会访问了这个国家。那时还是巴尼萨德尔当总统。我在同他的会谈中得的印象是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努力使自己的国家沿着民主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尽管宗教狂热占领统治地位。

很难想象宗教狂热达到什么程度。在访问清真寺林立的伊斯法罕城市时,一位同伊朗人结婚的西班牙女郎告诉我,当

四面楚歌的国王下令向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开枪，造成几千人死亡时，妇女们同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街游行，她们确信孩子如果被打死，肯定会升入天堂。没有这种狂热，作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如此重要地区的主要堡垒的国王会被推翻吗？

当然，在有些民族解放运动中，宗教因素的影响无疑是对群众斗争的一种鼓舞，但是宗教因素也可能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为反动势力输送力量，甚至在一般性的反帝运动中也有这种情况。

不管怎样，我个人认为，如果西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同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国人民和还在为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这种复杂的运动没有某种形式的联盟和协议，那么就很难想象人类能够朝进步方向前进，能够避免战争，实现裁军，缩小南北之间的鸿沟，推广民主。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联盟，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面实际上不复存在的骗人旗帜，因为这面旗帜不但无助于同第三世界，同解放运动建立国际主义团结的新关系，反而会起完全相反的作用。

确实，有一系列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需要而且寻求同苏联的关系。但是，在这些关系中，即使是“良好”的，也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苏联企图利用这种关系，在一切领域里，包括军事领域里，来推行它超级大国的政策。解放了的国家却关心自己的独立发展，希望不要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拿它们当抵押品。

为此，各欧洲共产主义党同各民族解放运动保持关系的目的是与苏联可能追求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当然后者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低估这一点是荒唐的，但看不见苏联人把这一目的纳入两极战略，也是荒唐的，因为苏联这样做意味着有冒险和倒退的危险。与此相反，西欧工人和知识分子力量同第三世界建立联盟时所关心的是真正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结束两极体系，促进国际关系新体系的建立，在这一体系中，联合国将起更大的作用，不结盟国家、中国、当然还有西欧都会有更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解决欧洲危机的进步办法要求同发展中国家建立这种新的关系。这样的欧洲政策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措施：

一、不属于帝国主义中心的、落后的国家能更自由地、更多地获得技术。

二、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第三世界原料和能源生产国同这些产品的消费国之间的协商，调整原料和能源产品的国际市场。这是平等基础上的调整。它应包括正常供应，自动调节价格的形式，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护人类的生态和生物环境的国际性计划，以及保证输出国的工业、技术和财政利益。

三、建立一个主要不依赖某一种货币或金属的新的国际财政体系，以便建立一个能自己经营国际货币的真正的世界银行。

四、在世界范围内，对农业资源和农产品加工工业实行合理的计划，以便更加正确、更加合理地分配粮食储备和对付八十年代的粮食危机。

所以，欧洲左翼力量和各解放运动结成联盟是有客观基

础的，不只是国际主义团结问题，尽管这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面对世界上这么广泛，复杂的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具体地说是代表什么呢？

一方面，除了围着苏联转的执政党外，主要还有为数众多的，在各自国家里影响非常有限的党，这些党对苏联继续无条件服从，受到苏联的支持，首先被视为它的宣传工具。

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如法国共产党。这个党特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70年代采取了类似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但是这个党拥有由脱产干部组成的庞大机构。它的政治路线变了，但传统思想并没有随之改变。依然保持列宁主义式的党，“真理”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里，一切活动都是以接受和执行这一真理为基础，没有真正的自由讨论。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就相对地容易回到“老式共产主义运动”上去。

另一方面，是另外一些共产党，它们在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并且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过时了。

除此之外，不仅有必要坚持结束同苏联的“优惠”关系的问题，也还需要同罗马尼亚或北朝鲜这样的国家保持距离和采取批判的态度。我钦佩这两个国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保卫自己独立的坚定态度。我可以试图理解亚洲国家的具体文化和历史因素，但是我认为，这些国家的现存政权不是社会主义的，它甚至比苏联集团中的其他国家更加专制。

至于中国，尽管我在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同它有分歧，



但是我认为，进步力量关心的是中国在国际生活中能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西班牙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行动运动和一些社会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已经做到了我所能做的事，1979年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旅行就是为卡里略为首的正式代表团访问中国打前站。

但是，我前面说过的话并不是为有些不够严肃的态度辩解。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不够严肃的态度给人以完全丧失批判精神的印象。比如卡里略竟重复中国官方对“四人帮”的看法，或者过分赞扬金日成。

1981年12月，波兰实行军事管制后，意大利共产党跨出了重大的一步。它在前面提到的决议中声明，它认为一个同整个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和进步的力量相分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已经过时了。

西班牙共产党的立场却与此很不相同。

人们可能觉得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关于国际部分的决议中取消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提法，而且认为这并非偶然。九大的文件中确实还有这个提法，但是1978年以来，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有所发展。十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决议中表现了这一点。在这一决议中提到欧洲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团结起来，提到需要走一条既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又非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新的道路，提到反帝运动的团结，提到不管有什么分歧，要同一切共产党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没有提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奇怪的是十大结束后三个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提法

又出现了。在这里我要插一段话，往前跳一大步，谈谈本书所涉及的关键时刻之一，即我被开除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情况。那是1981年11月12日清晨，在通过把胡利奥·塞古拉、皮拉尔·布拉沃、皮拉尔·阿罗约、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海梅·萨托里乌斯和我本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之后，卡里略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他说：“在这一阶段，我们要重新确认党的特征。”“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持独立的立场。我们党不同意那种在其会议上确定所有共产党的总方针的、封闭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念，更不能同意有领导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念。”“但是我想说，西班牙共产党并没有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党断绝关系。西班牙共产党仍然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运动独立的、持批判态度的组成部分，而且力图通过这条团结的道路来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何塞·卡洛斯·毛里西奥今天在这里说的看法。我们昨天已经结合这个讲台上听到的某些言论进行过议论。”（见1981年11月20—26日号的《工人世界报》第41页）

何塞·卡洛斯·毛里西奥说了一些什么呢？我没能亲耳聆听他的发言。卡里略为了开除我们，在创记录的短短两天时间里匆匆忙忙地举行辩论，而我却为了准备我自己的“辩护词”，不得不缺席一部分会议。不过，关于毛里西奥的讲话，《工人世界报》作了这样的报导：“他认为上述六位中央委员（就是指要开除的那六个人）的立场是企图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断绝关系，同党的共产主义传统断绝关系。西班牙共产党确立了欧洲共产主义战略，但不管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有什么错误，它仍然主张支持这些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它认为，尽管有这些错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仍然起了最积极的平衡作用，这并不意味着要维护一个教条主义的党。”（见同期《工人世界报》第 37 页。）

圣地亚哥·卡里略声明同意的就是这点。

《世界报》从巴黎约我写稿时，我显然犯了一个错误，我在仓促的情况下写的稿件里说过，开除我出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没有涉及到国际问题，事实并非如此。在毛里西奥和卡里略看来，对我们采取这种措施，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同西班牙共产党继续宣布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哪怕是持批判态度的，怎么说都可以）组成部分的做法是相违背的。

我们的立场确实就是卡里略和毛里西奥所指责的那种立场，我们不想加以隐瞒。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不存在，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将所有自称共产主义的政党包括在内的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词已经成了苏联人为使自己称霸的企图合法化而使用的意识形态词典里的一个字条而已。对欧洲共产主义党来说，接受这种提法就是拖延和增加模棱两可的态度，使党更容易解体。

## 第四章

### 要列宁主义，不要列宁主义

蓦然一看，也许会觉得如果说西班牙共产党在某个领域作出了旗帜鲜明的、毫不含糊的，而且是付出了代价的抉择的话，那就是确定了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在公众舆论和大部分党员面前，它在1978年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成了“摒弃列宁主义”的代表大会。似乎党的最高层已经不得不对是否继续当“列宁主义者”作出抉择。代表大会之前和在大会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最后以968票赞成，256票反对，40票弃权，通过了党的新定义。

这一新的定义说：“西班牙共产党是革命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以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为启示。西班牙共产党吸取一切继续有效的列宁主义贡献，就象吸取其他伟大革命家的贡献一样，但其基础是今天已不能继续坚持‘列宁主义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限制性的思想。我们自认是以列宁为首的革命者的继承人，他们在1917年俄国的困难条件下领导了开创我们今天世界革命进程的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定义在把“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作为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东西”加以摒弃之后，补充说，西班牙共产党“摒

弃一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并努力“以批判的精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我绝对不想贬低由绝大多数人通过的这项声明的重要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共产党人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树立起一个不那么教条主义和令人不能容忍的、对当今现实开放的、更为灵活的新形象。我全力支持为确立共产党人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列宁主义者”这一新定义而开展的政治斗争。我坚信我是做得对的。

但是从1982年以来我对“摒弃列宁主义”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产生了一系列怀疑，我想诚恳地将它们讲出来。因为这样做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后来所爆发的一些问题的根源。

首先，当时采取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一开始是卡里略在事先没有同大家讨论的情况下向报界发表的谈话。后来，我们大家不得不为把卡里略的个人谈话变成党的正式立场而进行斗争。事实上，这一行动不过是为了在民主过渡时期争取某些政治上的暂时优势而开展的虚有其表的举动而已。是同传统共产主义用语及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拉开距离的一种形式，也是使西班牙共产党人具有更现代的、异端的、能吸引社会上广泛阶层的形象。

从政治观点看，我怀疑1978年是否是实行这一变化（这一变化本身当然是必要的）、结束党的列宁主义定义的最合适时机。那时我们取得合法地位还不到一年。我们在1977年第一次大选中遭到了惨败，我们得票不多，而社会党人却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绩。在过渡时期（一个没有同旧政权决裂的过渡时期）造成的客观形势下，党不得不把民主斗争放在首

位，尽管这种民主斗争具有同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感情极为不同的特点，如继续采用佛朗哥政权的两色国旗和君主制、保留从佛朗哥时期继承下来的军队、警察和司法制度等。因此，让最激进的共产党人接受这样的政策必然是十分困难的。在这样的时刻，把摒弃列宁主义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后果只会是增加新的障碍，给传统共产主义的习惯和感情留下了更广泛的活动余地，促使党内形成以支持苏联国际政策和回到“永恒真理”为基础的对派。

与此相反，（而且我认为这是“摒弃列宁主义”这一做法最消极的方面）有一件事却没有做，甚至受到党的最高领导层抵制的是在党内为争取变革、革新和真正结束列宁主义而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开展真正的斗争。表面上是有了变化，但是到此为止，在变革必须深入下去的时候受到了抵制。实现这些变革不可能象开一次代表大会那样快。它要求，而且现在还要求进行长期的内部斗争，再教育和在共产党内进行类似文化革命那样的东西。

特别是理论领域里，并没有废弃九大所通过的文件中那种所谓“一切继续有效的列宁主义贡献”的极为含糊不清的提法。列宁的哪些思想还继续有效呢？不回答这个问题（不只是形诸文字，而是通过真正的理论讨论来回答），显然就不可能废弃列宁主义，至多只能产生理论上更大的混乱。

为了开展这种理论讨论，也有人作过某些认真的努力：一方面《我们的旗帜》杂志编辑部在第92期上以大量篇幅刊登了研究列宁主义的文章。作者有巴莱里亚诺·博萨尔，埃内斯托·加西亚，胡安·特里亚诺·贝哈拉诺，安东尼·多梅内

奇,胡利奥·塞古拉,何塞·桑多瓦尔和我本人。还有一次是就海梅·巴列斯特罗斯所写的关于党的文章开展的讨论,参加的有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皮拉尔·布拉沃,丹尼尔·伊里瓦尔,何塞·路易斯·马洛·德莫利诺,塞莱斯蒂诺·桑切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阿尔弗雷多·特赫罗,玛尔塔·罗德里格斯,费利佩·阿尔卡拉斯(当时是哈恩省委书记)和我本人。

最重要的一步还是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的。它于1980年10月组织了一次“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讨论会”。邀请了欧洲几位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参加。会议开了4天,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欧洲共产主义的形成;欧洲共产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在危机时期的经济改革;革命的主体和联盟政策;进步的社会和政治集团;政党和新的社会主体;多数人的革命。

在会上作报告的外国人当中有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亚当·沙夫,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成员彼得罗·英格拉奥和阿尔多·托尔托雷利亚,研究葛兰西而著称的克里斯蒂娜·比西—格吕克斯曼。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过报告的西班牙人当中有安东尼奥·埃洛尔萨,哈维尔·佩雷斯·罗约,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胡利奥·塞古拉,霍尔迪·索莱·图拉,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埃内斯特·加西亚,伊格纳西奥·索特罗(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成员),费尔南多·克劳汀(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主席)和我本人。

这次讨论的深刻程度在西班牙是空前的,或许还是近几年来在欧洲举行的最重要的一次理论讨论会。因为它为在共

产党内开始和发展意义深远的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工作，为逐步解决列宁主义问题，为逐步建设适应当代革命进程的党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胡利奥·塞古拉、丹尼尔·伊里瓦尔等同志则为革新党的干部学习班的教学方法，让干部掌握真正欧洲共产主义的内容作出了努力。

但是，《我们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同志们的这一切积极行动，非但没有得到党的领导机构的多数人的支持，反而招来了一系列排斥和打击措施，以使事物回到原样。卡里略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对《我们的旗帜》发起的活动大为恼火。他对我说：“你们是什么人，竟然讨论起党的活动来了？”在他看来，这是个犯忌讳的问题，只有他的那些传声筒才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

从那时起，《我们的旗帜》就成了党内最高领导人所发动的指控和诽谤运动的对象。卡里略把关于“民主道路”理论探讨的那本书说成是坏书，连该书的摘要都不准在《工人世界报》上刊登。为了把这本书打入冷宫真是竭尽一切之能事。负责筹办干部学习班的培训委员会负责人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在象达米安·普勒特尔这样一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培养出来的人（尽管达米安有适应新情况的明显愿望，但还是带着那种教育的烙印）的协助下，硬是把学习班的教育拉回到了那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去，这种马克思主义尽管是用欧洲共产主义的词句装饰起来的，但是简直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时期的教条主义理论（从“党的哲学”开始）一模一样。

其实，围绕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爆发出来的（只



要看一下我在前面几段提到的名单,就一目了然了)某些主要矛盾是由下面两种看法产生的:一种是从政治目的,甚至从竞选目的出发,把废弃列宁主义问题看作手段,另一种是把它看成是进行历史性决裂,对党进行重新教育和革新的长期的和深刻的理论和政治进程。

由于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党的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全部权力,今天谁也不会怀疑他完全采取了第一种立场,并开始把第二种立场视为必须消除的危险。

其实,就在1978年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进行的辩论中,也很难分清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和弗朗西斯科·弗鲁托斯各自维护的观点中(今天重新读一读他们的讲话稿,就会发现这一点)那一种立场更加正统,更加“列宁主义”。他们用以证明新的提法的正确性和回避真正理论探讨的论据主要是围绕下面一些问题兜圈子,即:列宁生活的是在另一个时代,距今已有60多年,今天的条件与当时不同等等。但是这样解释不了我们为什么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更远,情况更不同。

用这么可怜的方式来达到废弃(多半并没有成功)列宁主义问题的理由会是什么呢?

有一种解释在我看来反映了部分真理,那就是废弃列宁主义意味着要改变建筑在领袖的魅力、权威以及那种认为真理来自最高领导、应自上而下地加以“贯彻”的思想基础上的党的机制,就要建设一个党员更多参与的、各级都在政治上富有创造性的党。这在当时意味着每一级要吸收甚至提拔这样一些干部,他们有搞政治、制订政策并使人们相信这些政策的

能力,因此,如果他们不同意来自书记处的意见,也能够进行批评和斗争。

也因此卡里略把允许党内搞这种变革看成是对他的权威和权力的一种威胁;他宁愿支持历来惯于对他唯命是从的干部(哪怕是搞最过时的列宁主义教条主义的干部),也不能容忍那样的干部前进一步,他们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表现出自己有能力使欧洲共产主义充分发挥作用,使共产党具有开放性的、现代新形象。

但是,我认为还存在更为深刻的根源,那就是圣地亚哥·卡里略本身理论观点的局限性。从本质上讲,即使是他写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这本书(我很喜欢这本书,特别是因为它打破了一些“禁区”,批判了“现实社会主义”一些重要方面)也根本没有跳出狭窄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圈子。确实,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卡里略就表现出一种倾向,即重新开始越来越多地引用列宁的话,把列宁主义作为有权威的依据而加以援引。

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前后十分不一贯的地步,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第九次代表大会对我在前面引用过的方案和弗鲁托斯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表决。弗鲁托斯的方案就是现在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里起指导作用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其他革命理论贡献”的基础上的。但是在1978年全面开展列宁主义问题的斗争以后,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卡里略在1980年12月12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说,他认为这两个方案并没有什么矛盾(我再说一遍,这两个方案恰恰是在九大表决时互相对立的)。当理论问题被随机应变到了这样的地步,也就是说,

理论被轻视到这样的地步(我不反对在政策上权宜之计的重要性,但是我不能接受使理论屈从这种权宜之计的做法),以致党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将不可避免地遇到灾难性的后果。

问题的实质几乎完全避而不谈,被撇在一边。实质就是在理论领域里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完全相同。可以说它既是包括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的;但同时它又使马克思主义缩小了,片面化了,变得狭窄了。我1978年春天在《我们的旗帜》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就有下面一段话:“然而,列宁主义的局限性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我谨提出一个问题(肯定有别的问题)供大家讨论,即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在理论上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列宁关于国家的理论是缩小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把它说成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在这一革命中,国家的变革和摧毁是根本要素之一,而在列宁的理论中,几乎把这一要素绝对化了。”<sup>①</sup>

我们暂且把决定和导致列宁提出关于革命的思想的空间和时间放在一边。因为这需要进行历史研究和调查,这一工作在西班牙还做得很少。但是,列宁的这些思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形成了各国共产党的全部观念和理论,这却是政治事实。

这正是需要改变,而实际上又没有改变的方面。因为我这一代的绝大部分领导人还完全是列宁的这些思想熏陶出来的。或许还是卡里略写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一书会给我

---

<sup>①</sup> 《我们的旗帜》第92期,第18页。

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本书根据的就是革命的国家观念，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念，就是工人阶级应该夺取国家政权的思想，可以有各种道路：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尊重民主的或不尊重民主的，同这些人还是同那些人结盟（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夺取国家政权。然后由国家政权来推行改革，进行革命。

所谓列宁主义的核心就是这种把国家政权问题置于一切政治思想的首位、把夺取国家政权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的态度。这当然使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接近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社会民主党人也把国家看作变革的轴心（不同的是后者尊重资产阶级的国家）。

这种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念正是现在需要克服的观念。欧洲共产主义要想有前途，就必须走这条道路。如果不想把自己关在没有出路的螺旋形圈子里，一会儿为了延缓已经过时的思想的寿命而采取装璜门面的策略，一会儿又受到改良主义的诱惑和纯粹竞选主义的尝试，那么就必須走这条道路。

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念在民族问题和地区问题上，正象我们前面分析的，几乎必定要产生中央集权的倾向，会使人几乎无法克服地眷恋于那种由中央来领导的、没有自由讨论的类型的政党，在这种党内，安分守己地接受和重复来自上面的意见代替了创造性地进行政治活动。

克服这种观念的必要性来自事物本身。今天恢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立场，就意味着在理论上走出过于狭窄的小胡同，否则，就难于看清今天世界的现实，难

于找到使我们能全面参与制订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道路和开展对东方和西方几十年来的经验进行批判的分析方法。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矛盾(不只是生产关系方面的矛盾,还有城市生活、文化生活和教育方面的,个人关系等方面的矛盾),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观点(我还要说明更多的是“葛兰西式”的观点)上去,以便提出得以把客观上开辟这条道路的丰富多彩的新现象都结合进去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除了“严格”的政策外,带有直接民主和自治形式的各种社会运动就能获得它们应有的、非辅助性的根本地位。

此外,革命的国家观念的结果又怎样呢?波兰悲剧性的现实说明,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创立的国家如何成了用以压制劳动者自由愿望的军事专制国家。这样,在具体事实下面,以爆炸的形式揭示出“现实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组成部分这样一个深刻的现实。

## 第五章

### 1974年苏联对我的攻击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清楚地表明，苏联的国家制度在历史进程中，会站在反对社会主义前进的一边，在那个时候已经提出1917年十月革命唤起的解放潜力枯竭的问题。尽管西方各国共产党都谴责了这次入侵，但是我仍然认为这些党缺乏研究问题实质的决心，或许还缺少理论能力，至少西班牙共产党是这样。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向全体党员解释苏联之所以能够侵犯一个友好的盟国，一个探索如何建设更完善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是因为在苏联执政的并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圈子很小的一个阶层，是官僚集团。它感兴趣的只是阻止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取得进展，保持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地位以及物质上的优越地位。一般地说，我们那时在批评苏联时所作的解释中回避了政权问题和阶级问题。更多的只是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严重的缺陷和弱点，缺乏民主；只是指出这一模式无论如何都对我们不适用，我们渴望的不只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而且还希望建立自由的、政党多元制的、轮流执政的和普选制的社会主义。

我认为，在共产党机构里，我应该在进一步说明苏联制度的性质方面发挥特殊作用。而且恰恰是苏联人自己在某种程

度上迫使我去完成这一职责的。

1973年9月，我在中央委员会做了一个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国际政策的报告。会议是在巴黎附近由共产党人执政的市政府所辖的休养区举行的。出席会议的人相当多，有不少人都从西班牙赶来参加，只好在草地上搭起帐篷住。我在这个报告中，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有必要采取一项面向欧洲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我说：“面对‘新的大西洋主义’，我们共产党人要同社会党人、工会、进步的天主教徒等一起提出一项能保证本大陆所有国家安全的、真正欧洲的替代方案。我们希望有一个不屈从于任何一个大国霸权的欧洲，不当大西洋主义的抵押品，而是既同美国，又同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欧洲；一个各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结束了垄断枷锁的、消除了压迫和剥削的欧洲；一个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欧洲。看到今天这个受大西洋主义制约的、受垄断集团（大多数是多国公司）统治的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独立的欧洲，人民的欧洲，劳动者的欧洲，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欧洲。”

(2)勃列日涅夫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导致巩固政治和社会“现状”的危险，堵塞一切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前景。

(3)在谈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极现象时，我说：“虽然它们的道路很不相同，它们的形式也很不相同，但是我们在这些国家都看到把党政合并成为权力工具的现象。这种歪曲社会主义的实质、限制或取消社会主义民主的做法（至少在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上是这样，这都是由一小撮领导人决定的）决定

了工人阶级和群众的作用和影响受到削弱和限制，降到了次要地位。而国家（由于所有国家，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就象列宁所明确解释过的，都还有社会主义前的东西，资本主义的残余）却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在那里发号施令。在国内出现官僚化进程之外，还要加上对外革命立场倒退。我认为诸如把外交、军队和安全部门的领导同志统统选进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做法是很典型的，就象过分夸张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个人作用是令人担心的一样。

（4）西班牙共产党反对召开新的世界性共产党会议的意图，会议的目的显然是要肯定苏联共产党的霸权地位和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

这一报告在中央委员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我应该承认，当我几个月之后在巴黎书亭买了《世界报》，看到头版大字标题有我的名字时，我是感到十分惊奇的。

事情是这样的：苏联官方杂志《党的生活》在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我发起了气势汹汹的攻击，把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报告说成是“曼·阿斯卡拉特的文章”。苏联电台广播了那篇攻击我的文章。西方报刊对这件相当引人注目的事情作出了反应。

下面就是苏联这篇文章的论据和对我的指控：

（1）关于欧洲问题：“曼·阿斯卡拉特特别详尽地分析了欧洲资本主义地区的形势，说明了他对这一地区发展前景的预测，提出了一个‘欧洲替代方案’，企图把它强加给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但是他的这个‘方案’却散发着刺鼻的民族主义的气味。试想一下，他是想看到一个‘民主的和社



会主义的欧洲’，而这个欧洲却同当今存在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毫无联系。”

(2)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曼·阿斯卡拉特在他的报告中粗暴地篡改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质，歪曲了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活动，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同革命运动的利益之间存在所谓矛盾的虚构的论点。比如，他竟然宣布说，当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论国际问题时，‘一般都是只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说话的’，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几乎总是受到外交考虑的制约’，所以，看来并不为革命者所接受。”

“曼·阿斯卡拉特在他的报告的另一部分建议把国际主义形式同国家问题‘分开’。”

“因此，不管阿斯卡拉特是否这样想，事实上他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同革命运动的利益，同某些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要知道，这样提出问题的方法是同社会主义的原则截然对立的，也是同革命斗争的实践截然对立的。”

(3)关于苏联国内问题，“谁也不能对阿斯卡拉特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保持缄默。在苏联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扬，群众创造性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曼·阿斯卡拉特却居然跟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开敌人，发表什么苏联没有民主之类的种种杜撰。”

“从我们两党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报告，只能说一点：它根本无助于加强两党关系。确实，阿斯卡拉特实际上是怀疑苏联在国际关系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执行的原则路线。尽管他在文章中屡次提到众所周知的党与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原

则,但是他自己却厚颜无耻地践踏这些原则,甚至粗暴地干预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表示在我们党的领导机构里他愿意谁当选,谁不当选。如果阿斯卡拉特这样说不是一时的失误,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一报告是不是有意要恶化苏联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而且可以万无一失地说——类似的报告无助于加强友谊,甚至无助于发展西班牙共产党同其他共产党,特别是那些直接受阿斯卡拉特在报告中诽谤的共产党的正常关系。”

(4)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曼·阿斯卡拉特拿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组织中心的神话来自欺欺人,实际上是在暗示别的东西。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反对各国共产党在国际会议上共同研究反帝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从而作出关于这些问题的一致结论。曼·阿斯卡拉特认为这样做对兄弟党的独立和自主构成威胁。”

“因此,从阿斯卡拉特提出兄弟党的独立和权利平等的问题的方式来看,没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他根本不把革命斗争和提高这一斗争的成效以及互相声援、互相帮助放在心上。”

“曼·阿斯卡拉特在对其他兄弟党进行诽谤的同时,还凌辱了他在其他国家的战友,提出了他那套关于独立和关于国际主义的新准则。这个准则结果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保持独立。实际上,这一提法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中国领导人的政策采取完全宽恕的方案,对两种政治思想观点,一方面是绝大多数兄弟党的观点,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保持等距离的方案。这类建议能称得上是有原则的吗?我们

说，绝对不能。”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反应是把我的报告和苏联文章的全文收集在一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还加了按语，指明苏联文章所引我的话中有哪些是篡改过的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西班牙共产党重申它的国际主义的观点。

我认为向全体党员毫不隐瞒地公布苏联对我攻击的原文是非常有益的。或许这就是某些人把我叫做“反苏分子”的根源，不过这些人是极少数。我认为这件事的经验首先表明当时可以更清楚地向党员讲明苏联的现实。

不管怎样，苏联对我的攻击矛头所向远非我个人，甚至远非企图只是对西班牙共产党施加压力。在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即恰恰在几个星期以前，1973年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西欧共产党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各个党的总书记，特别是贝林格、马歇和卡里略都参加了。尽管会议收获不大，但说明有可能把欧洲共产主义力量聚集到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周围，以及同苏联日益疏远。

散布对我进行攻击的文章就是想阻止或消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后来苏联人改变了策略。在《党的生活》对我发起攻击之后几个月，苏联人接受不同寻常的做法，同意举行苏联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会晤，我参加了以圣地亚哥·卡里略为首的西班牙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是由苏斯洛夫率领的。从这次会晤中，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印象：他的书面发言只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用教科书上的马列主义来进行宣传。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继续了几个月，参加的

有莱昂诺尔·博尔娜奥、费德里科·梅尔乔和安塞尔莫·奥约斯。在最后公报中，西班牙共产党要求写上承认两党之间存在分歧的词句。波诺马廖夫说，没有这样的先例。最后，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最后总算加上了。

苏联共产党采取这种比较灵活的做法，是因为他们开始发动重新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这就是后来召开的1976年柏林会议，但是会议也没有取得使他们满意的结果。

至于我个人，苏联1974年对我的攻击使我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更深入地研究苏联的政策和现实。

我在1973年做的，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报告，也是我最后一次在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我也从来没有具体查找过原因。但是，不管怎样，从1973年开始，国际政策问题都写进圣地亚哥·卡里略向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做的总报告中去了。

## 第六章

###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 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态度

我是于1958年12月第一次到苏联去的。到达莫斯科时正是清晨两点。由于天气不好，飞机晚到了好几个小时。虽然天还没有亮，我还是决定去旅馆之前先去拜谒红场。从这一轶事中可以看出当时我是多么真心实意地把莫斯科和红场视为我一生从事的事业的象征。

在莫斯科，我住了四年。在这期间，我在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主持的一个小组里主要利用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研究和编写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然后编写西班牙国内战争史。这四年时间对我的一生颇有裨益。因为我和苏联居民同住在一层楼上，还常常和我上学的儿子上街采购。我虽然享受一定的优待，但是还能直接接触到基层苏联人的生活。我认真地学习俄语，此外，内战后居住在苏联的西班牙侨民对于了解苏联的生活给了我无法估量的帮助。

我在莫斯科生活的几年却使我心中的神话破灭。当然，早在1956年我就已经受到过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揭露斯大林主义的冲击。但是那时我认为一个执政党能够揭发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是有积极意义的、令人佩服的举动。我对赫鲁

西班牙共产党

晓夫敢于进行这种揭发是非常钦佩的。而且我在莫斯科居住的这几年正是苏联生活中相对“自由”的时期。现在大家都对我说，后来在许多方面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了。

但是我对苏联的现实感到失望是由更为深刻、持久的现象引起的，是缓慢地一点一点形成的，我费了好大劲才承认这一点。（对此，我的妻子和儿子都能证明，常常是他们把在街上或在学校里发生的生动事实告诉我的。）

这里不是谈论我在莫斯科生活经历的地方。毫无疑问，我还会找一个别的机会来做这件事。不过，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某些使我刚到苏联时的那股热情和希望逐渐破灭的事件。或许第一件使我反感的東西就是那一整套的制度，尤其是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的等级和特权制度。这和平等的王国是截然相反的。不过，这并不等于否认（一切概括都免不了有片面性）那里的社会流动性比较大，例如，工人的子女有更多机会成为工程师。

其次是完全没有自由。人们对官方报纸上说的事情连起码的信任感都没有。西方电台广播的影响却反而要大得多。《真理报》象一块帷幕，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可以让公民知道的事情隔开。不过报刊上说的都是必须说的东西。这样就出现了“两重真理”的荒谬的、令人窒息的气氛。我参加过一些选举，结果都是以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选出唯一提出来的候选人。就是说，这是一种完全虚假的政治代表制。

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共产党被看成那些肆无忌惮的人往上爬的地方。因此，那些最有作为的，比较尊重人格的青年都追求科学、技术的前程，离政治远远的。看上去这并不是

件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年复一年，就出现一种以次代优的选拔，把一些无能的人选到党的高级岗位上去，从而也选到政府的高级岗位上去，助长了高级干部中任人唯亲和腐败堕落的情况。

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官僚主义，甚至表现在最细小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由于这些因素及其他许多因素的缘故，无疑使人们产生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对市民生活的有关一切都被动消极的倾向。

我再说一遍，这一切只不过是顺便提及的几笔，它丝毫不影响我高度评价苏联男男女女高尚的品德，我曾成千上万次赞叹过这种品德。我这里提到这些情况，只是想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那些有助于我个人在处理一些党内，特别是六十年代向我们提出来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时可以作为依据的基础。

长期以来，我都是接受党的正式文件中阐明的论点（主要是由卡里略阐述的），即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有许多缺陷的原始的社会主义，由于客观原因（俄罗斯的落后，受到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和主观原因（主要是斯大林主义），没有能够实现我们所说的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要求。

1977年，在我回到西班牙不久同费尔南多·克劳丁发生的一场辩论中说明，我那时的立场还只是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胜利》杂志报道了我们之间的辩论。我当时说在苏联问题上我更接近托洛茨基的观点，即社会经济结构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同官僚机构，同党政机构分开，把党政机构看作是蜕化的根源。

1980年夏天,根据我在前几年阅读的材料和进行的思考,以及8月份在地处波罗的海海滨的波兰所发生的激动人心的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我得出必须改变自己立场的结论。我决定在前一章中所提到的那次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国际会议上公开表态。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安东尼奥·埃洛尔萨建议我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当前社会主义问题的报告。我的这份报告取题为《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且于10月份在孔普鲁屯大学的政治科学系里宣读了一遍。在我念完后,坐在我旁边的教授何塞·希门尼斯低声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发表这么大胆的声明”。我认为我自己在这份报告中提出的新东西是以下的声明:

“马克思在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具体描绘社会主义社会会是什么样。但是我认为马克思无论如何不会把社会主义只看成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作为一种过渡阶段,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

正是由于这个阶段在本质上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要把人类从资本主义引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决定性的组成部分(当然另一方面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自治,或者说,至少是使劳动者的这种自治有越来越有效的趋势。

社会主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是一种更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日益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拥有更大的自由,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越来越多地干预和参加有关国家和自己生活的决定;劳动者的自治更加富有成效。”

“根据社会主义的这一概念,我认为不能承认苏联和与之



结盟的其他国家今天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缺乏社会主义理想和概念的确定性的和本质的条件。”

“我认为即使是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本身，尽管没有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具有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特点。没有罢工的权利。工会国家化的结果是工人捍卫自身利益的手段少得可怜。国家对物质和收入的再分配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差别。这种差别或许还会扩大和固定下来，虽然社会流动性要比西方大一些。”

“我的看法是苏联现实同社会主义存在较大距离的因素是在于苏联国家的类型。”

“党同国家合而为一。党内没有民主。完全是自上而下进行领导。提拔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的办法，主要看是否听话。这就为裙带关系打开了大门，难以推行最为必要的更新，从而领导班子老化。”

“国家对内拥有强大的强制性机构。即使可怖的斯大林主义式镇压已经消失，但是这种强制性机构的作用还有加强的趋势。”

“决策中心只是由为数极少的一小撮人组成，即由国家、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层组成，采取专制方式进行统治。没有政治生活，对国家的重大决策没有真正的讨论。不同意上面的决定很容易变成罪状。”

“苏联社会的这些特点只能说明社会的现实同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向往的并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的

理想之间的差距。”

波兰事件对我跨出这一步，宣布我认为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现行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杜布切克领导的变革是从共产党内部，在某种形式上也是从制度内部开始的。这是为企图纠正和改善这一制度所作的尝试。

相反，波兰事件却说明，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一场来势凶猛的、深入的、自发的运动中，十分迅速地自己组织了起来，同国家和党对立，并且同拒绝群众参与的社会关系本身对立。工人阶级与制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已经不可能把这种现象说成只是制度的缺陷或错误了。首先这个制度本身就解决不了基本经济问题，不给工人群众提供表达他们愿望和需要的渠道，因此这样的制度否定了社会主义根本的要求。所以，我想，必须抛开外交词令，直接了当地说，这些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即使它们是用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是十月革命的成果。

我讲完后，有些人向我祝贺，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党的一些领导人对我态度冷淡。

几个月之后，即1980年12月的一天，我和卡洛斯·萨尔迪瓦一起在卡里略的办公室里。当时有一位意大利记者打电话来，要求我们发表对波兰问题的声明。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系列材料表明苏联干涉的危险在增长。卡里略说他不愿发表什么声明。他问我是否准备发表声明。我告诉他我准备发表，而且如果要发表声明的话，就说如果苏联干涉波兰，西班牙共产党就不仅限于发表声明抗议一下完事，而是要同苏联的党断

绝关系。我也确实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不过不只是向外国报纸，而且向国内几家报纸发表的。第二天就见报了。

1980年12月22日，召开了西班牙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开得相当紧张，因为已经开始讨论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会上，有人开始就我向报界发表的关于苏联一旦干涉波兰我们就将作出反应的声明提出了批评。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事后对我说，他由于考虑不周，第一个对我提出了批评，在会上说我在这次和其他几次关于国际政策的声明，“不够严谨”。由于尼古拉斯并不是一个特别倾向于苏联观点的人，他这么一说就等于起了打开禁区的作用。于是，各种各样的指责都开始向我飞来了，说我没有权利向报界谈论党的机构尚未决定的观点。加列戈、帕洛马雷斯，特别是洛瓦托坚持认为这样会使基层的同志搞糊涂。我记得，莱昂诺尔·博尔娜奥还为我辩护，她说，为了维护党的独立路线，有时也需要“带点刺”。

卡里略的态度很重要。他一方面说他是支持我向报界发表声明的，这是我的个人声明，并不代表党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又说，当然在某些国际活动中是犯有错误的，接着他举了三个例子：

——同东方国家的“不同政见者”一起开座谈会。这是指我出席了《老鼯鼠》杂志在巴塞罗那组织的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贝利康（布拉格之春时期任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视台台长），还有鲁道夫·巴罗、阿方索·格拉、费尔南多·克劳丁等。

——在判断东方各国政权的性质时，也同样犯了错误。这

显然是指我在10月做的报告。

——然后提到《工人世界报》上刊登的一张讽刺勃列日涅夫的漫画。

我在回敬这些指责时，趁机再一次指出，我们在向共产党员宣传解释1978年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国际观点方面工作做得很差。无论是昨天在阿富汗问题上还是今天在波兰问题上，只发表几个孤立的声明是不够的。需要对苏联发生的一切作出系统、深入的解释。我坚持认为我几天前在莫拉塔拉斯和瓜达拉哈拉做报告时取得了积极的经验。我说，那种认为一批评苏联会伤工人干部感情的说法本身就是“虚构出来的问题”。我个人的体会是工人党员比谁都愿意有人给他们认真地解释苏联政策上出现的一切消极东西的原因。

后来我才了解在那个时期对我的指责已经不局限于那次执行委员会上发生的事了。有的基层委员会还给我写信或作出决定，抗议我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

唐法特里格镇基层委员会来信的内容如下：

鉴于1980年12月12日刊登在《国家报》上的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的声明，西班牙共产党唐法特里格镇基层委员会谨向该同志提出下面几点具体意见：

(1) 苏联并没有发表声明要入侵波兰。

(2) 波兰还没有被苏联占领。

(3)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由整个党来作出某种决定。

(4) 关于那种令人不可信的同苏联决裂的可能性以及认为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要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

富汗造成的影响小得多，那么说明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是如此不了解西班牙共产党基层党员的意见，也说明他多么脱离基层。

西班牙共产党唐法特里格镇基层委员会奉劝阿斯卡拉特不要去填补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在波兰问题上留下的空白，因为这种关于波兰问题宣传的使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混淆波兰事件的真相。

多党制在一定情况下能改善资产阶级独裁国家的经济，但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那是不可信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阿斯卡拉特同志，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反对苏联的。不过，我们要告诉你，苏联为争取各国人民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争取各国人民的和平作了最坚决的斗争，总之，由于苏联共产党，世界上许多共产党人才能享有自由。

同志，你还是多用一点时间去写写苏联取得的进步吧，这方面有很多东西可写的。去写写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吧！去写写侵略各国人民、占领别国领土、破坏世界和平、发动政变、支持那些取消自由权利、实行严刑拷打和大屠杀的法西斯国家（如智利、阿根廷、萨尔瓦多……还有西班牙）的美国国际政策吧。总之，写写那个真正侵略别国、在世界上发动战争的美国吧。让敌人去对我们的错误说三道四吧。就是我们没有错误，他们也会制造出一些错误来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致

## 共产党人的敬礼

唐法特里格镇基层委员会

1980年12月18日

在这一时期，当时的哈恩省委书记和该省议员费利佩·阿尔卡拉斯也给书记处写了一封信，抗议我在国际政策上的观点（这是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一次个别交谈中亲自对我说明的）。我不知道他是否提出要撤我的职，因为这封信从来没有给我看过，也没有向哪一个领导机构通报过。

关于西班牙共产党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问题，在负责起草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起草委员会里又提了出来。他们让我起草决议中国际问题部分。这几乎是由于考虑到我在领导机构里担负的责任而勉强履行公事。

我提出了一个争取尽量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草案。我考虑到近几年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解释工作做得这么少，不能希望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下子就作出完全一致的决定。我的草案只是提供一个基础，便于西班牙共产党通过讨论真正了解和掌握苏联制度的实际情况。

在起草委员会的第一轮讨论中，我就遭到比我预料还要广泛得多的批评和反对。

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往往都是围绕某几句话，甚至某一个用词展开的。这次讨论也不例外：招来是非的就是我的草案中这么一句话：“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同民主、自由、劳动者和全体公民的参与和各族人民的自治要求相一致的。”

如果不带恶意就这么念，那么这句话几乎是句老生常谈，谁也不至于直接对它提出疑问。可是有人就是出来反对，他

们说，前面刚说过苏联没有民主，两句话接起来就等于说在苏联没有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不想说的东西。

起草委员会里，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相对明确立场的人只有胡利奥·塞古拉（他是和我一起起草的）、皮拉尔·布拉沃和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我说“相对”，是因为为了寻找一种出路，最终我自己作了让步，就是在引的那句话的开头，加了一句类似导语的话，这样就无疑把原来的思想变得缓和多了：

“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观念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同民主……相一致的。”

决议就这样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不过，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问题，我有过一段很可贵的经历：

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修改和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提出大会决议中关于国际问题的定稿。事情就发生在这个特别委员会里。代表大会第二天晚上，委员会在康文沁旅馆的一个大厅里开会到深夜。出席的有各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团指派的128人。理所当然会上提出许多互相对立的观点，有的甚至很激烈。我记得我看到菲德尔·阿隆索出席了，至少在辩论开始时，他在座，但是他一言不发。伊萨贝尔·比利亚隆加坐在第一排，她十分活跃，还是那样风度翩翩，幽默诙谐……讨论最后在得到相当可观的多数人支持的巴斯克共产党修正案（是由安东尼奥·埃洛尔萨提出来的）的基础上，对东方各国周期性危机的社会根源进行稍加深入的分析。这一段修改过的文本就成了这样：

“这些政治制度事实上都是靠限制或取消公民自由权利的专制和官僚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的，靠党政合一来维持的，因而，跟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差得很远。这表明，如果没有社会的自治，没有劳动者以及人民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个领域里参与决定，光是生产资料国有化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在没有这种民主的气氛下，由于劳动者不满而引起的周期性危机，表明存在一些使人们对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可信性产生疑问的矛盾。”

这一经历证实了在我头脑里日益生根的一个想法，即妨碍对苏联现实进行认真、深入分析的阻力不在党的基层，不在“工人干部和工人党员”中。障碍和阻力来自党领导机构中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并不是出于无知，他们所知道的情况要比我多得多，在私下交谈中，他们对苏联最消极的现实情况谈得十分直率。这个问题要深刻得多，我不想用几句话来解决它。毫无疑问，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我想强调其中的几个因素是：由于理论上的某种局限性，使人们很难抛开“历来”延用的、以“非好则坏”这一公式出发来解释问题。他们担心（有可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是也有的由于权迷心窍和官迷心窍之故）共产党人传统思想的变化会结束神话王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理性开辟道路。如果苏联的神话最终破产，那么还有什么别的神话可以站住脚呢？党的生活又将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变革呢？

因此，我认为，对苏联和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是欧洲共产主义，更具体地说，是西班牙共产党当前陷入危机的核心。



## 第七章

### “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社会主义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进程，因此把社会主义看成是静止的，只是简单地用“是”还是“不是”来下定义，那就会带来严重的危险，不是陷于进行宣传，就是用于意识形态目的。

十月革命是在1917年非常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一次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性决裂，它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我是坚信不移的。至于苏联及其盟国今天在全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什么地位，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在1917年，即使是进行了这次革命的那些人本身也都认为俄国将是一根导火线，有助于在拥有组织起来的、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国家里，首先是在德国，点燃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他们认为，一俟发生这种情况，俄国作为落后国家又会列在由别的国家率领的进程的末尾。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的。俄国尽管落后，却成了世界上社会主义的“首领”。不过，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吗？这还是个大问号。

西班牙共产党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卡里略多次阐述过这种立场，其主要理论根据可以作这样的归纳：

如果说在产生法国革命先进的国家政体之前，君主专制制度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体，或者说曾经是介乎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之间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与此相仿，目前苏联的国家是一种充满资本主义残余的上层建筑，但是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它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的。

这种同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比较的做法，在理论上是自欺欺人的。因为它把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东西硬扯在一起：一种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但是二者都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另一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劳动者的剥削应当消灭，这是它存在的理由。

人们完全可以分析在各种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权如何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资本家阶级手中，以及后来资本家阶级又如何如何在共和制和议会制的范围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诉诸于法西斯的残暴行为。

但是卡里略谈到苏联的国家政权时，避开了一个问题，即究竟是哪一个阶级通过国家来行使政权？难道是工人阶级吗？

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苏联通过其强大的新闻媒介进行的全部宣传和“理论”，令人厌烦地反复讲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不久前我们自己还在讲的问题。可以从把阶级斗争简单化的解释中引出这样的结论。对这么重大的问题是不能采取暧昧态度的。如果只说没有“真正的工人民主”，那就是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认为需要表明并论证(至少我们从1968年以来所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没有这样做)苏联的国家政权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是统治着苏联的另外一些人的政权。西班牙劳动者,任何国家的劳动者同这种另外一些人没有任何阶级关系,在阶级斗争领域里,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这种另外一些人又是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说清楚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意味首先对共产党人的可怕镇压,在肉体上消灭十月革命绝大部分领导人。它还葬送了这一革命所建立的工人政权。因此,在国家政权、经济结构、党、警察和军队里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阶层。他们通过国家机构(不是通过私有制)逐步巩固了以劳动者的劳动为代价的,更确切地说,靠对劳动者的剥削所取得的特权地位。

苏联同英、法、美结盟所进行的反对希特勒侵略的伟大卫国战争是一部辉煌的史诗。2,800万苏联人为使人类免遭法西斯的野蛮蹂躏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至于在国内体制上,则掌握政权的阶层经过战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军事部门。

在苏联国家政权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十七、十八世纪的君主专制制度演变情况相比拟。在那个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内部,当时代表进步力量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在逐步确立自己的权力。而在苏联,工人阶级日益巩固的政权又在哪儿呢?哪儿也没有。情况恰恰相反。

且不谈对历史的研究,我同意意大利共产党人布鲁诺·特伦汀所发表的意见。他说,苏联国家政权及其专制阶层事实上使国有化初期开始的经济结构变革(列宁本人把这种变革

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处于停顿状态。从那时起苏联经济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关系意义上的变化吗?我并不这么认为。这种由国家自上而下领导的生产制度,没有工人参与,没有工人的自由权利,没有罢工权利,经理拥有巨大的权力,工会是“国家化”的工会。这种生产制度能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吗?

那里确实存在过,尤其在结束斯大林主义镇压之后,存在过国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某种“妥协”,保证了劳动和就业的某种稳定性和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险、医疗和教育以及进入统治阶层(这个统治阶层并不是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的,而且本身也不是世袭的)的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于保持政权合法化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政权合法化的思想是建立在十月革命“延续性”的基础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成了世界上第二大国。它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从俄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同资本主义国家分割了势力范围(包括分割领土在内,因为千岛群岛、东普鲁士都划进了苏联的版图),无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

苏联,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把自己党政合一的模式和政经合一的模式输出到其他一系列国家中去。苏联把这些国家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之后,又把它们拉进华沙条约军事集团。华沙条约是1955年为了对抗美国组织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建立起来的,但同时它也成为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意识形态集团,在这个集团内部,甚至在用军事干涉的威胁下,强制推行所谓“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直到现在为止都是运用“有限主权论”(用苏联的语

言这叫做“集体保卫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在另一些事件中，最特别的是在波兰事件中，苏联则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通过施加压力、进行干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手段，实际上阻止特定社会各种现实力量之间在协商和谈判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在1981年的波兰，这种协商一致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团结工会”那样拥有1,000万成员的力量至少需要拥有部分权力才能使政治解决成为可行。军事集团的体制不仅把苏联的模式输出到同苏联结盟的国家中去，而且还在这一模式发生危机时，阻止这些国家根据其特定社会里存在的现实矛盾和力量去探索合于本国情况的解决办法。

这个问题今天显得特别严重，因为苏联社会相对不变的特点开始出现裂痕。这种不变性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强制性的因素外，首先是因为这个社会具有下面两个特点：

一、它的社会经济体系的结构是十分刻板的，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来管理的。它总是不断地按照自己的老样子进行自我再生产，趋于取消或摒弃一切的变革或新的事物，即使吸收新事物，那也是极为缓慢的。

二、它的政治制度依据的是一种先验的假设，即人民把权力一劳永逸地委托给了共产党（实际上是委托给了国家机构，党只不过是国家机构的附属品而已）。这种委托是不需要受检验的。在市民社会与政权之间没有任何调节手段。政治权力是由最高领导层关起门来行使的。这种状况生动地表现在以下方面：这一制度在更新领导人的问题上表现得无能为力；领导层老化；总是对最高领导人进行个人崇拜；有些事使正常

人甚至感到滑稽可笑，如居然授与勃列日涅夫以文学奖。

然而，现代生产力，科技革命要求人们更加富于创造性地、更加自由地参与生产进程，要求提拔年轻干部。这种要求甚至是出于政治之外的原因。另一方面，苏联工业达到的水平和它在国际上的作用意味着文化水平的一定提高，市民社会一定的条理化，对外部事物有更多的了解，也使居民对经济管理的失败和低下的生活水平日益感到不满，因为已越来越不能用“反帝斗争”的理由为此辩护。

苏联体系的国家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危机向欧洲共产主义提出有必要用新的眼光来看问题，至少在我认为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问题上应该采取新的观点。

第一，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光是重申我们反对所有集团的态度已经不够了。必须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瓜分世界”的雅尔塔协定，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成为人类进步的阻力。各国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既不能让美国，也不能让苏联拿去当抵押。

我们迄今为止所维护的反对所有集团、但“偏向”苏联的立场已经变得过时和不起作用了。

我们多次说过，尽管苏联有自己的错误，但它却起着阻止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本作用。无疑，这一说法绝大部分是对的。但是也不能无视另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方面，那就是苏联侵略性的立场，对帝国主义来说是一种鼓励，给它提供了掩护和有利的借口。没有人侵阿富汗的事件，里根在大选中的获胜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都要困难得多。美国对中美洲各国人民的威胁借助于苏联对波兰的压力。

我们正处在美国帝国主义大力加强其侵略政策的阶段。正因为如此，对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避免重新陷入另一些时代的旧观点；认识到只有采取站在集团之外并反对集团的立场，才能束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那些认为加强苏联集团是阻止帝国主义的一种方式的人完全错了，因为事实上，他们便利了帝国主义的侵略。

无论是勃列日涅夫还是里根，都妄图把世界两极化的传统观点强加于人。在里根看来，渴望自由的萨尔瓦多天主教徒都是“共产党人”；而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我们这些欧洲共产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尽管这种想法是多么不现实，但是对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却都是极为有用的，因为这种想法都是支持，甚至扩大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瓜分。

美国之维护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它符合于统治和强权的传统思想。而苏联赞成这种想法，那只能说明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思想已经蜕化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一种想法是当今世界上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保守和最反动的东西。沿着两极化的道路走下去，人类的未来只能是要么核浩劫，要么完全保持现状。但是一切革命的前景都将被堵死，至少在工业化地区是这样，因而社会主义的希望将荡然无存。

第二，是我们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态度问题。这要求我们考虑这些社会中多少以隐蔽形式表现出来的矛盾的性质。根据波兰事件和其他国家不那么明确的事件来看，我认为那里存在某种形式的阶级冲突，其中同劳动者对立的剥削者就是国家机器，也包括党在内。在这一矛

盾中，社会主义事业（因而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支持的事业）是在大街上，是在工人当中，而不是政权所从事的事业，尽管这个政权是正式以共产主义命名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将加入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进程，不是去维护和死死抓住当前的国家结构不放，而是相反，要对国家结构进行变革，甚至采取激进的方式。

为了弄清在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种种矛盾中，进步力量应该处在什么地位，我们共产党人有必要克服两个障碍：一是帝国主义的宣传，出于两大集团的对立，它总是厚颜无耻地抓住一切认为对它有利的事件来同它的对手斗争；二是在波兰问题上发起的令人作呕的煽动，这种煽动就是那些支持土耳其、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拉圭等国的独裁者和支持屠杀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人民刽子手的人掀起来的。事实上，工人运动本身是进步的。当它同象波兰那样从外部强加于它的、受挫的、压迫性质的政权（但几十年来，这个政权都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发生对抗时，这些运动内部也可能出现我们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所意料不到的各种思潮。

但是，如果根据这些抗议运动的这些或那些领导人的思想来判断这些运动的性质，那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问题的实质是逃避不了的，那就是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国家结构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进程的主体。这么说一点也没有缩小苏联1917年革命的历史作用，它在亚洲和欧洲相当大的地区摧毁了资本主义并激发起强大的反帝运动的发展，正是这些运动，在近几十年来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并没有产生（或许还不可能产生）新的制度和更高



级的文明，即社会主义。

最可能的（我避免作简单的结论，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还需要进一步作认真的研究）是在世界史上，苏联的国家结构（这一结构后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当然在各个国家多少也有些区别）是世界上一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实现工业化进程的框架，但是工业化先于社会主义，它并不是社会主义。

与此相反，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清楚的，而且它在政治上已产生了直接的后果，这就是苏联关于国家的思想，根据这种思想，在苏联控制的那部分世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现实”，而且从这一“论点”出发，将逐步扩展开去。这种思想就成了使资本主义得以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保留下来的因素，因为它关闭和阻塞了当今世界上能够导致人们向这一方向迈进的道路，因此，在理论上以及在政治上克服和摧毁这一思想，也就是说肃清它在千百万人头脑里留下的影响，是我们这些渴望社会主义的人要着手和继续做的事情。

面对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以及同样处在危机中的“现实社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既不能赞成前者，也不能赞成后者，我们赞成的是别的，是共产主义。我们当然是站在一切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人民一边，这几乎是不用多说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但我们也站在受“现实社会主义”专制国家掠夺和压迫的劳动者（而且不只是在波兰）一边。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各国共产党能不能从这一新的历史地位出发及时作出结论。

## **第三部分**

### **走向十大的复杂道路**



# 第一章

## 现实与挫折

对西班牙共产党人来说，不容易在 1980 年的最后几个月找到令人欢欣鼓舞的理由。

最严重的事件是里根当选。至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还从来没有一任总统是靠在国际问题上这样赤裸裸地搞扩军备战和把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强加于人的纲领上台的。这是在核武器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国际冲突激烈程度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此外，里根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即“新自由派”，也就是说，国家减少对国内政策的干预，从而宣告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以“新政”开辟的时代的结束。并与此相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强的干预，不仅是针对苏联的，而且也是针对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的。尽管美国的欧洲政策尚未清楚地确定下来，但是可以预见它在欧洲大陆，从而也势必在西班牙进一步施加压力，以支持最反动的势力。

然而，甚至无须华盛顿肯定会提供的这种外力的帮助，西班牙政策本身的向右转已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对于相当一部分居民来说这是一个悲剧。蒙克洛阿协议签订已经两年，但必须承认几乎全部没有兑现。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失业人数的增加达到令人头疼的程度。苏亚雷斯刚刚对内阁进行了最

后一次改组，由卡尔沃·李特洛取代阿夫里尔·马托雷尔担任主管经济的副首相，使政府的政策更加倾向于完全为大资本的利益效劳。恐怖主义仍在进行残忍的犯罪活动，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几位领导人在巴斯克遭到暗害。政府似乎还想使这样一种棘手的局面复杂化，在自治问题上采取了荒谬的政策，不仅同巴斯克而且也同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发生了冲突，更不用说政府在安达卢西亚受到的损失。政府在断然反对安达卢西亚按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程序，即按宪法第151条取得自治之后，民主中间派联盟不得不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同意按第151条办。这样做严重地损害了民主中间派联盟及其政府的威信。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谣传纷纷，使人感到奇怪的准备工作已在进行。即使在民主中间派联盟内部也在谈论着成立“看守政府”的必要性，这等于是葬送议会制度和把宪法束之高阁。执政党内部各派之间相互倾轧。民主中间派联盟宣布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又宣布延期，造成内部勾心斗角和矛盾冲突，这些情况每天多少都有所披露。所有这一切表明，苏亚雷斯的力量遭到无可挽回的消耗，民主中间派联盟明显地在向右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时不得不经历十分倒霉的政治逆境。遇到暗淡的景况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在共产党内开始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倒还是件新鲜事，我不仅在正式会议上，而且通过同家人和朋友的私下交谈感受到一种幻灭与泄气的气氛。

1978年举行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还为经过艰苦斗

争在一年前取得了合法地位而欢庆。我们期待着在来年的大选中能使我们在1977年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绩大为改观。我们当时认为蒙克洛阿协议会使经济形势好转，使劳动者在民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

但是到了1980年底，对这一切已无可指望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昨天的幻想已经变成了失望。不管是在马德里某个区，或者是在其他省份，我每访问一个地方党组织的总部，都会听到同样的议论：基层委员会越来越没人来了，党员都不来，我们的总部常常变成了人们，尤其是老人们聊闲天的地方，没有青年人，也没有真正的政治生活。

1980年夏天我们遭受了合法化后最大的一次挫折，不可能继续出版《工人世界报》。也许1978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工人世界报》从周刊改为日报是过于轻率，没有很好地考虑客观条件。马德里大学经济理论教授胡利奥·塞古拉是唯一投票反对这一决定的中央委员；这说明除了他聪明之外，也还相当有点勇气，因为表决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在那样的气氛中投反对票似乎是一种对党的领导和政策的不信任。

日报开始出版了，起初给大部分党员带来了很大的幻想。不久情况便开始不妙起来。除了少数人外，没有人喜欢读它。一年半以后，迫于经济状况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1980年夏天，本应限于从事组织和行政工作的书记处，行使了它并不拥有的权力，决定暂时停止出版《工人世界报》。实际上，这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决定，书记处却避开了中央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当书记处在十二月把这个问题提交中

央委员会讨论时，早已成为现成事实。

共产党日报的消失主要意味着政治上的一次失败。这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因为销售量太小，只有六千份左右；这表明读者和工人不愿意看《工人世界报》，而从理论上讲，它是马德里唯一的一份左翼报纸。另一件叫人忧虑的事是在停刊前，为了鼓励党员通过各种方式推销报纸，曾组织过无数次的动员，但毫无成效。党员不支持为此所作的努力。

在编辑部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一种征兆。编辑部主要由青年人组成，他们通过在共产党机关报中工作的具体经验，开始不仅对报纸的工作，而且也对党的工作持十分激烈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遭受挫折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发表来自“上面”的指示太唯命是从，报纸的报道太狭隘，太教条。

如果能够对《工人世界报》的切身体会进行深入的讨论，并且再深入进一步寻找共产党作出了一系列错误决定的原因，那么也许能纠正，或至少能阻止某些将我们引向更大挫折的事态的发展。

从我个人来说，我几乎总是只埋头于“自己的事情”，即国际问题和理论问题。我犯的错误是对《工人世界报》失败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在党的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是用撤掉弗德里科·梅尔乔社长的职务来“解决问题”。这是鸵鸟政策，不愿正视现实。

然而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与此同时发生了党员同党疏远和越来越多的人自行退党的事情，在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中情况更加明显，但同时也有很多工人和老党员这样做。

卡里略曾企图在 1980 年春天，采取一种奇怪的紧急手段来“扭转党的局面”。他同所有的总书记举行了会议，其中既有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总书记，也有省委的总书记。他要求他们亲自负责扩大党的组织，为此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详细的计划送到马德里，以后还要开会检查。在一个时期里，这些都成了《工人世界报》大字标题的内容，但后来毫无结果。有些总书记送来了他们的计划，结果都堆在抽屉里。从此之后也没有再开过什么会。某些主观愿望只能起做做姿态的作用，但是却解决不了问题。

当十月底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开会开始讨论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时，会上讨论的多多少少也就是这些问题，当然不用说，还有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谈到的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冲突问题。

卡里略在那次会议上，就十大的准备工作做了个报告，说“只是提出一些想法，以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我现在对于这个报告的态度同我当初听报告时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我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我在现在条件下所作的批评是我当时头脑里就有的，那就是虚伪。我那时逐渐同卡里略在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不一致的看法，这些看法我已经或将要在书中谈到。但是，我不能只限于把历史纪录在案，我应试图解释共产党在西班牙正在解体的过程。1980 年 11 月发生的事情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第二章

### 我们做错了什么

一个不容忽视而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检查从上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进行自我批评,推广一些说,应该对共产党在整个过渡时期执行的政策进行自我批评。

卡里略在报告里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种辩解的态度。他的说法是:我们确实犯了错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由于从独裁统治向民主的转变没有经过决裂而是采取改革方式从而造成的后果。这种情况削弱了我们在选举中的力量,引起人们的失望。在蒙克洛阿协议问题上,我们确实犯了错误,那是因为我们过高估计了协议的结果,而没有考虑到那些阻碍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支持协议的因素。他在这里所讲的问题值得我们记住,因为我认为它说明了一个我还要回过头来谈的问题:即蒙克洛阿协议当时会使西班牙共产党和民主中间派联盟中的进步力量得到加强。接着,卡里略在这个问题上总结说,签订蒙克洛阿协议是正确的,“民主联合”的政策也是正确的,协商一致对于制定宪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需要重来一次,那么他还将重复他在过渡时期的做法。

卡里略的提法尽管引起过很多争论,但是一直到他以中

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十大作报告时，他仍然多少保留了这种提法，从而引起成千上万的党员离开了党，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证实：党的领导要么是没有能力去了解现实，要么是虽然了解了现实，却没有能力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这样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现在的意见是，西班牙共产党领导（自然我也包括在内，我不想逃避自己的责任）在西班牙开始实现民主的时期从右的方面来执行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在秘密斗争的漫长黑夜里，争取自由和民主的目标理所当然地具有决定性的绝对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同全国广大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当1976年12月16日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处成员遭到逮捕时，这一点表现得很突出，也很使人感动。

卡里略戴着他著名的假发在马德里和西班牙其他地方进行了近一年的非法活动。我是1976年1月初进入西班牙的。当时有通知不准给我发护照，但是我通过朋友关系，从苏黎士领事馆搞到了一份用我的名字颁发的西班牙护照。1975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接受了我所作的决定，我通过孩子们的帮助回到了马德里。我女儿从她住的巴塞罗那到佩皮尼昂来接我，她的两个朋友坐在另一辆车里跟在后面以了解“是否会出事”。在通过边境的时候，竟没有看我的护照。我从巴塞罗那来到马德里，住在我儿子家里，搞到了身分证，就这样合法地住下来了。

在巴黎的那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就同皮拉尔·布拉

沃和海梅·巴列斯特罗斯约好在欧洲大厦的一家叫《雷拉伊  
斯》的咖啡馆里碰头。从此之后我便立即开始在党的领导机  
关工作。当卡里略非法来到马德里时，我们一方面要进行党  
的正常的政治工作（那时已经可以相当公开地进行政治工作  
了，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秘密工作的规定，同卡里略接头和开  
会。

作为西班牙共产党在“民主联盟”中的代表，我同当时反  
对派的各种人物都有关系，甚至在皮拉尔所在区的一层楼里  
安排卡里略第一次在西班牙同非共产党的领导人华金·鲁依  
兹·希梅涅斯会面。

现在我回过头来再谈谈 1976 年 12 月 16 日书记处的会  
议，会议是在靠近繁华的奥多涅斯神父街的一层楼上召开的。  
参加的有皮拉尔·布拉沃，海梅·巴列斯特罗斯，西蒙·导切  
斯·蒙特罗，维克多·迪埃斯·卡迪尔，圣地亚哥·阿尔瓦雷  
斯和胡利奥·阿里斯迪萨瓦尔。会议结束时，圣地亚哥总是  
先走。胡利奥在窗口观察动静。忽然，他慌忙地把我们叫过  
去。大家都跑过去看，我们看到了有两个人靠近卡里略，同他  
谈了几句话就把他塞进了一辆小汽车，接着就象变戏法似的，  
大街上和附近地方停满的一连串汽车都开动起来了。

出了这件事后，警察化了半小时才找到我们所在的地方  
并把它包围了起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利用楼层的电话同  
我们所能记住电话号码的地方和人都通了话，他们有些是党  
员，有些是朋友，我们把情况告诉他们，号召他们行动起来。我  
同巴黎和罗马通了电话。贝林格立即提请意大利政府注意这  
一事态。后来人们可能有点夸张地对我讲，苏亚雷斯几乎同

时听到卡里略被逮捕的消息和意大利正式要求在对待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问题上要遵守众所公认的人权原则的意见。

当我走出一间颇有趣的审讯室（从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佛朗哥照片可以看得出来，多少年来法西斯警察无疑习惯于在这里拷打和折磨共产党人，但同时他们又有点惊慌，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走进另一间有阳台的房间时，我突然听到在太阳门游行的示威者高呼“释放圣地亚哥！”的口号声。我几乎不能相信。我仿佛是在看一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一个囚犯能听到示威者要求给予他们自由的呼声，那简直神了。那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发性的。

几周以后，当阿托查大街谋害律师的事情发生后，在举行葬礼时又再次爆发了我有生以来从未看到过的一次最大的群众示威游行。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动人的示威游行。

我相信这就是使西班牙共产党有力量迫使苏亚雷斯承认它的合法地位的原因。这并不贬低苏亚雷斯作出这一决定的功绩，他当时反对军队高级将领和国家机器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力量甚至公开表示的意见。

后来举行了1977年6月的选举，在那次选举中西班牙共产党得了不到10%的选票。我想这等于给所有的人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可能有些人比别人更泄气一些。最感失望的可能就是圣地亚哥·卡里略，因为他原来的幻想最大。我当时在莱昂省搞竞选。那次竞选活动搞得非常出色，参加集会的人完全超过了原来的预想，在体育场的三次集会都挤满了人。但不管怎样，我在内心深处从来不认为西班牙共产党在莱昂省能选出一个议员，我同我妻子和很知己的人都说过。使我

感到意外和失望的主要是全国的情况。

大选前两天，我有事去议会，在那里碰到了圣地亚哥，我们谈了几分钟的话。他当时深信我们一定能从莱昂省选出一个议员。他还对我说，甚至在卢戈也能选出一个议员。他肯定会很失望。工人社会党的得票情况尤其会使他失望，因为工人社会党的反法西斯活动要比我们影响小得多，但它却在竞选中取得很大成绩。

特别是从那次以后，在我们当中这样一种想法开始得势并且产生了过大的影响，这种想法是认为我们比社会党人更有能力和更有经验，我们责任感比他们强，因此尽管我们在议会中影响有限，但在建设和维护西班牙刚刚诞生的民主方面我们能起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接受君主制是对的。所有的一切都证实君主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君主制，也许民主进程就不可能实现。但是我认为我们没有把事情办好，在接受君主制的问题上，我们在左翼中表现得过于突出，甚至还想教训社会党人。我们本可以保留得更多一点，对于正在诞生的民主制度的一系列令人遗憾的方面，批评得更多一点。这对国家的稳定和对宪法都不会有什么危险。特别是当群众通过经验感到这个民主制度不能为他们解决或改善主要的物质条件时，更应该这么做。

在这方面，阿道夫·苏亚雷斯和圣地亚哥·卡里略建立的个人关系是一个消极的因素。卡里略无疑受到苏亚雷斯吹捧的影响，他津津乐道地对我们说，苏亚雷斯曾经对他说过：“在这个国家有两个政治家，您和我”。不久之后，又把“您”变

成了“你”。卡里略甚至于想通过这种个人关系使他对国家的重大抉择发生影响甚至可以比冈萨雷斯更有影响，虽然工人社会党在议会中居很大优势。

我同外交大臣奥雷哈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当然比起卡里略同苏亚雷斯的关系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比较经常地交换看法，我觉得相对来说他同我讲话是比较交心的，我当然对他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见往往是对立的，经常发生分歧，但总是想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由于政府同反对派之间在某些问题上是一致的（例如对库维略斯在非统组织关于加那利群岛的荒谬提法有必要表态的问题上），这种一致性推动奥雷哈开始在外交部采取了一些小的积极的改革措施，第一次召集非洲使节，外交部高级官员和各政党代表开会，从原则上讲这应该是一种新的尝试的开端。奥雷哈搞的另一项改革是吸收了各议会政党的代表组成西班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后来佩雷斯·略尔卡<sup>①</sup>改变了这种做法；奇怪的是尽管他在独裁统治时期参加过反对派，但正是他又退回到传统的老办法上去。不管怎样，党的领导在评论中也过高估计了我同奥雷哈的关系，似乎我们已可以对对外政策施加影响。

西班牙共产党政策向右转的根源之一是幻想我们能在基本的问题上同民主中间派联盟协调一致；认为这样甚至可以对工人社会党施加压力，且不说是破坏。

我至今仍深信西班牙共产党为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总的说是对的。那时没有其他政治路线。谁

---

<sup>①</sup> 继奥雷哈任西班牙政府外交大臣。——译注

也没有提出过其他明确的替代方案。但是，由于过份相信同民主中间派联盟合作的可能性，从而大大地毁坏了这条路线的名声。

1979年底，我个人在一次政治活动中担任了一个角色，后来什么也没搞成。在提前解散议会之前，阿夫里尔·马托雷尔和苏亚雷斯向卡里略建议民主中间联盟派代表团同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晤，以便研究是否有可能就未来的施政纲领取得具体的一致意见。常务委员会会议尽管对此颇存疑虑，但仍决定尝试一下；主要的理由是尽管很有可能失败，但即便如此，这种尝试也意味着民主中间派联盟承认西班牙共产党进入政府的“权利”。常务委员会决定由我率团，成员有塔马梅斯，索莱·图拉和胡利奥·塞古拉。民主中间联盟（或政府）的代表团里有阿夫里尔·马托雷尔，何塞·路易斯·莱亚尔，佩雷斯·略尔卡和卡尔沃·奥尔德加。我们在卡斯德亚纳街3号耽了整整一天，那是星期天，除了为我们的会议和为两个代表团一起用餐服务的人员以外，别墅里已空无一人。我们首先讨论政治问题，例如北约问题。阿夫里尔·马托雷尔说，他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佩雷斯·略尔卡沉默不语。后来讨论经济问题，何塞·路易斯·莱亚尔努力兜售他的“计划”；民主中间派联盟的主要目的无疑是要我们在这方面承担义务。会议没有导致任何结果；当时决定由我和佩雷斯·略尔卡作准备，交换一些“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始终没有拿出来。

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觉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同民主中间

派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上，而这种态度是基于一些很肤浅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对西班牙和欧洲的现实进行严肃的分析。

只是在民主中间派联盟向右转的倾向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时，西班牙共产党才提出左翼团结的战略，把同社会党人共同行动放到中心位置上，并认识到必须同他们达成协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民主中间派联盟执行了一种充满幻想和软弱的政策。民主中间派联盟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西班牙大资产阶级政党，它的成分是十分混杂的，这正适应欧洲资产阶级倾向于建立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强烈的政党的趋势，来克服战后基督教民主党模式的框框，寻找更为实用的方式把力量集中于政权的管理上。我们对民主中间派联盟政策最消极的影响是在很多党员中和在十分广泛的劳动者以及革命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中间，严重地歪曲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形象。

在过渡时期，西班牙共产党政策的右倾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以外，还有其他的表现。

首先，存在着偏重只在议会以及通过领导人之间会谈进行“上层”政治工作的倾向，把党和党员撇在一边，轻视了在民主制度所开创的新形势下建设新型政党的根本任务。

1980年10月执行委员会开会时对此只字不谈。后来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就非谈不可了；而且甚至承认这是党的主要错误，但是孤立地把它看成似乎只是组织方面的问题，提出“要更加关心基层”。但问题并不在这里。如果不同其他右倾表现联系起来，就找不到问题的本质，也就无法予以纠正。因此，十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提法尽管本身是对的，但



我认为并不能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存在党偏重于执行当前策略性任务的倾向，模糊了和忘记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害怕提出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和革命的内容，而这正是共产党存在的理由。

保卫民主和自由(尽管今天还有不足之处)，尤其是在政变的威胁面前甚至把这个列为首要任务，这与同时坚持和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任何矛盾，这种批判应当着重揭露资本主义极端非正义的特点，以及因此而造成缺乏民主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的结构里，这种缺乏民主的情况永远也不能满足劳动者和公民要求自由和参与的愿望。

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张走民主的道路，主张选举，普选制，政党多元化和轮流执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十分坚持的，并且是有道理的，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在承认民主的价值观念时，我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固有的反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西班牙的缺点，这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严重错误之一，包括意大利在内。

还需要补充的是，如果我们集中于，或只局限于以民主为目标(尽管在一定时期它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我们对维护民主所做的贡献将越来越少。因为这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特殊任务，谁也不会为了维护西班牙今天存在的这种民主才当共产党人。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建设由各种力量组成的历史性集团，这些力量由于它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客观地位，也由于它们的主观愿望，主张克服资本主义，创造更高级的文明。

这个集团面对法西斯和独裁的危险必须保卫民主，甚至要维护我们今天少得可怜的民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共产党人的作用是懂得这个道理，并且用这个道理去说服这个集团。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对维护民主做出一些认真的贡献。同样，随着我们进一步说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要加强和发展现存的民主，我们才能对维护民主做出一些认真的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变成了（或给人以这种印象）“纯粹的民主派”，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政治思考只局限在维护民主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似乎在掩盖它的弊病，夸张它的好处，如果我们变得比任何人都“更拥护宪法”“更拥护君主制”，那么在各方面都会带来消极的结果，以至我们会失去赋予“维护民主”以生机的能力，使“维护民主”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口头上的宣传。我们这样就使那些向往革命，向往不同社会和不同生活方式（甚至不同的日常生活方式）的社会阶层，特别是首先使那些有叛逆和反抗精神的青年人自然难以向共产党靠拢。

有一种情况在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可以接受的策略，但是到后来却使我们真的失去了共产党的特征，就是我们“慢慢地，慢慢地”几乎抛弃了从原则上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教会的反动特性（如保持教会对私立学校的影响，对政治和民事问题的干预），以及反对一切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立场。作为共产党政策所必不可少的远见和道义上的坚定性也越来越少，而这种远见和坚定性并不是同考虑策略上的需要和局限性水火不相容的。与理想相比，愚蠢的实用主义完全占了上风。

西方共产主义危机最深刻的根源之一可能在于大部分青

年人把我们看成是现行制度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也许有点批判性，比其他部分干净些，而且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并不把我们看成是变革和改造的催化剂，更不用说是动力了。而这又恰恰发生在越来越明显地需要变革的历史时期，而且变革的途径越来越多种多样，甚至不是人们事先所能预计得到的。

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将日常政治中的活动同在策略上不可避免的束缚结合起来，同保持着眼于未来的紧张的革命工作结合起来，同乌托邦的内容又同日常政治本身的要求结合起来。

过去在长时期内(例如人民阵线时期，当时争取民主的斗争也同样是我们日常政治的轴心)，我们是以双重身分进行活动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国内可以是非常稳健的民主派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但同时我们又是苏联的党，当时苏联(尽管仅在我们的幻想中)是我们革命信仰的活生生的偶像。

今天这种双重身分已经不存在了。今天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政策，在各方面树立和突出我们自己的存在，确立并突出我们在较短时期内和较长时期内的目标的实际内容。这只能靠反复宣传革命目标是实现不了的(这是议会外团体的假解决办法)，也不是只靠在理论上努力阐明今天社会主义变革的性质所能实现的，虽然理论上的努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涉及到如何搞政治活动的问题，涉及到发现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一系列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问题；还涉及到创造搞政治的新方式，使共产党人参加这些对立面。这包括生产和研究方面，包括女权主义，青年人的叛逆，文化生活，生态学，城市生活的新形式以及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变化等方面。欧洲共产主

义要么懂得至少象选举和议会这样一些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广阔的新领域是如此重要，并从而对自己大部分机构及对其各种价值观念进行改造。要么我认为就会不管以这样还是那样的方式，注定要变成社会民主党主张的附庸。

我现在在这里大胆地对 1981 年夏天十大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发生的分裂首先加以简要的说明：党的领导承认在过渡时期里犯了“只在上层”制定政策的错误。它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让我们到基层组织中去，更加关心它们，但是一成不变的保持原来党的样子，不加以触动。革新派们说，为了摆脱“在上层制定政策”的错误，需要有一个有关党的新概念，需要一个新型的、使人们能够更多参与的、上下之间垂直关系不那么紧密的、能够在内部自由讨论并允许有思潮存在的新型的政党，这样做恰恰不仅可以参加选举和民主机构，而且还可以置身于当前社会上反对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这样做还能使党有能力以新的方式来制定政策，并在今天的政治实践中使保卫和发展民主的斗争同时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准备。

## 第三章

###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全会

如前所述，1980年10月27日卡里略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他的报告。会议是在康普马内斯大街上的马德里省委总部举行的。房间很大，布置得象教室一样，我们这些“学生”坐得相当分散，圣地亚哥·卡里略象“老师”似的，由洛佩斯·雷蒙多陪着坐在主席台上。

报告除了肯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政策，特别是有关蒙克洛阿协议的政策之外，还涉及到以下几点：

**自治问题：**这是十大要讨论的基本议题。报告坚持必须要保卫西班牙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在使党的结构适应自治地区的问题上，需要反对离心倾向和分散主义的倾向，具体地说就是要反对“模仿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倾向。报告在这里提出一个建议，即：可以在新党章内规定1/3的中央委员代表民族地区和大区地方党，其余2/3代表全党。

**党的问题：**报告提出了有关党的领导机构的具体建议，即：由住在马德里并专门从事党的工作的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这就是说搞掉原来使常务委员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和有效率的组织的人，如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巴斯克共产党的总书记以及工人委员会领导人等。把执行委员会的人数减少到

31人，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减少到99人。建议设一名副书记，来负责协调中央委员会下属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和改善集体领导工作。关于党的工作，报告对尚未就退党问题进行调查表示遗憾，建议“党证”3年换一次，这样做就无法知道每年党员的数字。报告强调克服过去秘密工作时期《支部》的那种狭隘的工作残余影响，使基层委员会更具有吸引力。关于对党的专职机关的批评，报告的回答是十分带争议性的，说如果专职机关还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太小了，需要有更大的专职机关，有更多的脱产干部，以便使党内的思想得到更好的交流。报告坚持领导班子要清一色，说这并非要减掉党内的“灵敏性”，但要大多数人说了算。革新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保持延续性的前提下革新。

另一部分谈了文化问题，把文化界党员人数的减少同今天文化的堕落连在一起，同我们未能为知识分子提供更多的活动余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国际问题，报告简单地重复众所周知的立场：党的独立性；为和平而斗争，反对参加北约；欧洲政策和与第三世界合作；为克服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分裂作出贡献。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建议：代表大会日期可以定在六月或七月；可以成立若干个小委员会，一个经济小组委员会，另一个政治小组委员会，以便起草决议；除了决议草案之外，还要准备一系列关于议会、市政、国际等方面活动的材料。

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报告在执行委员会上就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对意见和批评；首先是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对意见和批评。古铁雷斯·迪亚斯建议只把有关准备十大方法的建

议拿到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不必把圣地亚哥的报告拿到中央委员会去，因为报告太一般，漏洞很多。莱尔特松迪说，如果要大家对报告的内容发表意见，那就要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先把书面报告发下来，在大家研究之后再开一次会讨论。会上还有很多批评性的评论和个别的反对意见，例如反对设副总书记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有可能把代表大会变成一个讨论接班人的大会。但是最后，还是以 23 票赞成，3 票反对和 6 票弃权决定圣地亚哥在中央委员会做报告。在表决前，卡里略说，每一个执委完全可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自由发表自己意见。这也就是说，表决通过的不是报告的内容，而是决定在开始准备十大的时候将这个报告的内容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说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是什么原因。

11 月 1 日，在康文沁旅馆的大厅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一开始就由卡里略宣读报告，基本上同他在执行委员会给我们做的报告没有差别。

接着发生了某些完全异乎寻常的情况：总书记的报告开始受到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的严肃批评，有的很激烈，直接了当。有的语气缓和，其中包括一些在社会上和党内很有影响的人。第一天发言的人中有索莱·图拉，塔马梅斯，莱尔特松迪，古铁雷斯·迪亚斯，阿尔弗雷多·特赫罗，哈维尔·佩雷斯·罗约，科尼尔，洛佩兹·布亚，卡洛斯·巴罗，皮拉尔·布拉沃和胡利奥·塞古拉。这些批评引起了那些比较顺从的中央委员的大量反应，有些人甚至到讲台上说他们从来没发过言，这显然不是一种自发的反应。结果所有的计划都搅乱了。

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只得延长了三天。会开得很紧张，很疲劳，但是无疑讨论得激动人心，非常有意思，我还从来没有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里看到过这种情况，过去开会常常是一片单调的赞同声。我认为那三天的会议倒是活跃在党的肌体内的各种忧虑和思想的近乎真实的写照，当然有点走了样。

会上一共有 71 个人发言，由于时间不够，有的人甚至写了书面发言。在所有的发言中，对党的各方面生活持批评态度的有 25 个，也就是说占总数的 1/3 强。但是最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站在教条主义或“亲苏”的立场批评领导。弗朗西斯科·加西亚·萨尔维是个例外，他原是耶稣会教徒，他在工人中以“帕科神父”闻名，是工人委员会的一个领导人。他在会上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认为负责国际事务的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不如说是反对苏联的……我觉得他的很多分析对国际团结是很不利的。”

几乎所有持批评态度的中央委员都是从欧洲共产主义的原则出发提出批评的，这些人几乎占了总发言人数的 1/3。他们尤其主张发展欧洲共产主义，并且从两种考虑出发来看待党的问题：一是认为党的工作没有搞好，应该揭露和改正错误；二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包含着党的变革，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并取得进度。

第二部分人是总书记立场的谨慎的维护者；他们对于批评更多持辩解和维护的态度。我把从象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这样对变革持开放态度、比较灵活的人起直到海梅·巴



列斯特罗斯这样持更加关闭态度的人都包括在这一部分之中。

第三部分是教条主义地维护卡里略立场的人，我甚至认为可以用“狂热”这个词来形容。这部分人不到与会者的1/3，主要在辩论的后期表现得比较明显。

彻底的欧洲共产主义者所作的批评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认为报告完全不提在西班牙和欧洲发展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本质问题。胡利奥·塞古拉说，这个报告是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最不协调和最不完整的”报告。塞维利亚省的教授和议员费尔南多·佩雷斯·罗约指出报告在一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都没有讲清楚。民主联合政策是对的，但是应如何贯彻到工会工作方面呢？以及如何贯彻到意识形态斗争中去呢？

这些发言中的多数把报告中忘了提的社会运动问题、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及必须寻找“开展政治活动新形式”以克服只在上层搞政治的有害做法的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塔马梅斯提醒人们注意青年问题以及他们不愿参加选举活动的态度，他说只要政策正确，这是党可以争取选票的领域……皮拉尔·布拉沃、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和其他人除了谈到群众运动问题之外还坚持把左翼的团结作为党的基本战略。

报告中有一个空白点，就是只字未提市政工作政策，这使人完全无法理解。而这是我们党在执政方面所积累的、唯一的初步经验，我们和工人社会党管理地方政府的协议已经有了一年的实践，市政工作是联系群众、扩大党在他们当中影响

的最根本的途径。

当时塞维利亚省议会的副议长安帕罗·鲁比阿列斯指出女权主义的重要意义和党的弱点，尽管党在这方面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但一涉及到这方面的实践，就暴露出弱点。克里斯蒂娜·阿尔梅达以她直言不讳的方式说：“党对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善于从事秘密斗争，但是我们没有表现出也善于在合法条件下进行斗争……现在新运动相当多，而我们在党内却感觉不到它们的作用。这真是可悲……。应当在党内搞一场革命。”

报告中关于自由职业者之所以退党乃由于我们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活动余地”的论点遭到相当普遍的反响。特别是索莱·图拉坚持反对这种说法。

就我自己而言，我当时就选择这个文化问题来提出我深感忧虑的一些实质问题。我说：

“党在这个领域（指文化力量方面）的倒退是十分、十分严重的。所做的一些解释是不够的。例如由于民主中间派联盟政府的关系，现在国内文化状况非常糟糕，这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向党靠拢，而不是使他们同党疏远的因素。

“工人阶级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动力，这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清楚的，不久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还探讨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在现阶段共产党不能在知识分子中间和在文化生活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并深入到知识分子和文化生活中去，那么我们通过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能力和主导作用都将面临危险。对于一个称之为多数人的革命来说，以及为了争取领导权和将我们的思想渗透到社

会中去，知识分子都起着带根本性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政治上甚至理论上阐明知识分子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方面，从而阐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方面，都存在弱点，在这方面显然应作自我批评。

“我想应把上述问题同资本主义的新的对立面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的出现联系起来。这些对立面，这些思潮既不是通过政党体现出来的，也不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工会体现出来的。它们形成了新的社会运动。这些就是女权主义运动，青年运动和生态学运动，它们都是文化领域内广泛存在的现象。这些运动使西班牙和欧洲在当前历史阶段有可能发生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了。

“因此，我认为这向我们提出有必要朝着建设一种我想可以称之为社会政治集团的方向努力，这个集团能使这些新的现象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想才能保障工人阶级在当前历史时期起领导作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很重要的。知识分子问题也有组织方面的问题；因为不管在执行方面还是就其本身的概念而言，按地区建立基层委员会实际上削弱了我们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在文化界还存在着受欧洲共产主义影响的阶层，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又并不在我们党内，但都是接受我们思想影响的文化阶层。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同这些阶层建立联系，加强这种联系，同他们一起研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基本方面的设想，同他们一起，

并通过他们去影响民主的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帮助我们，并且必然会从当代现实的感受出发来帮助我们阻止西班牙的衰败，欧亨尼奥·特里亚纳以前提到过这一点，这正是寡头和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前途。

“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研究具体的措施，以便建立知识分子在党内活动的新的形式。这些新的形式会使我们象圣地亚哥曾经说过的那样同时有知识分子的党和工人的党，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必须找到办法，使党和组织能够在那些表现出反抗资本主义的地方产生影响，为此我认为提出了采取新形式的必要性。”

我们上述想法被中央委员会中很大一部分人接受了。卡里略本人在他的总结发言中也说，这是“很有意义的贡献。”与此相反，在那些“虔诚的教条主义者”当中真正地掀起了反对知识分子的狂热。突出的有安塞尔莫·奥约斯，他说这是把“资产阶级的习惯”引到党内，秘密斗争时期的干部过去必须到工人委员会去工作。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趁机攻击《我们的旗帜》，说在它的编辑委员会中连一个工人也没有。维克托·迪埃斯·卡迪尔说，他感到有一种“教授和教师的并发症”。何塞·奥尔特加作为一个有声誉的画家，但同时又野心勃勃地想当上“党的艺术家”，也即当上“党的领导”，又火上加油，说有人低估了那些愿意将自己“溶入”工人阶级之中的艺术家。对于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加利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胡利奥·德拉富恩特做了一个使人发笑的回答，有助于体会当时的气氛。胡利奥·德拉富恩特说：“我认为，那些对教授们，对出众才华的审判有可能会使我们扮演起克劳迪

奥<sup>①</sup>的角色，……但是我认为，总不应强迫任何一个同志为了不让人怀疑为对党的政策不忠或不赞成，就到这里来结结巴巴地发表一些语无伦次的讲话。”

自治问题和党适应新形势的问题是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报告中关于从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代表中产生 1/3 的中央委员的具体建议得到了很少人的支持。相反，在许多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发言中，反对两者必择其一的提法，即不是“联邦党”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指导的党”。尤其是加泰多尼亚人、巴斯克人和加利西亚人坚持有必要非常明确地扩大民族地区和大区共产党的权力，以便制定自己的政策。有一些同志说报告给他们的印象是要想在这个问题上倒退，而不是再往前走。莱尔特松迪回顾九大曾决定召开一次专门研究民族问题的会议，这本来是必要的，但却没有兑现。我在会上建议采取联邦制的解决办法，我还要提出另一点，一旦有可能时，应当允许重复1936年加泰多尼亚统一社会党的经历，即同其他一个或几个政党合并，如果出现这种可能性，西班牙共产党应当给予支持。

在党的职权和领导机构问题上发言的人最多，引起的冲突也最激烈。古铁雷斯·迪亚斯说，问题在于党的民主化，领导机构人数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群策群力的作风，而这种作风不能建立在“信任”还是“不信任”的基础上。塔

---

① 克劳迪奥是公元前 451 年罗马一个执政官。他要罗马一个百人队长比希尼奥的女儿比希尼娅当他的奴隶。比希尼娅被其父杀害。事后人民起义，引起其他执政官辞职，结果克劳迪奥被投入监狱，于公元前 440 年自绝于囹圄。——译者

马梅斯建议搞一个集体书记处的班子，并且由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共产党的书记组成一个理事会，此外每年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会议。皮拉尔·布拉沃说，有必要对民主集中制重新进行考虑：靠“命令或指挥”来领导同讲道理和使人心服是很不一样的，应当将革新主要理解为对行使职能的方法和党的领导方法的革新，有必要承认少数派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这并不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胡利奥·塞古拉在发言中谈到这样的矛盾，即口头上讲要建立“新型的党”，要实行欧洲共产主义的方针，但党的组织形式却不符合新的需要，很多的人还谈到基层委员会缺乏政治生活，以及寻找同市民社会建立联系的新形式的必要性。萨尔迪瓦强调说，他深感学会运用民主的必要性，但这是指所有的人都需要学，党需要这样做。

这一类的主张在那些教条主义最厉害的中央委员中引起了一种似乎堡垒遭到周围的反应：“他们是想把我们党给毁了！我们必须起来保卫党！”首先采取这一种态度的是阿斯图利亚斯党的总书记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他说：“这会改变党的性质，我追求的不是这样的党。”

紧接着，按下列公式如法炮制的阴谋真是接踵而来：在批评的背后，在建议采取更民主的新方法的背后，是对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攻击。达米安·普勒特尔对这一点讲得最清楚：

“我们应当提出保卫圣地亚哥·卡里略作为我们党总书记的政治人格的必要性，因为我们这样做，恰恰就是保卫西班牙共产党。

“在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不在场的情况下，我想提醒

大家注意，当那些支持利斯特尔一伙所作所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对圣地亚哥·卡里略群起而攻之的时候，多洛雷斯曾说过，‘党在哪里，哪里就有卡里略！卡里略在哪里，哪里就有党。’我认为，谁也不会指责多洛雷斯是在搞个人崇拜。

“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同样的攻击，但是此外还掀起了猛烈的反共运动，矛头是对准卡里略的，因为他们想毁掉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特性。

“我认为，党员确实是我们党拥有的最重要的财富。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公正地本着维护真理的信念说，西班牙共产党最宝贝的财富之一是圣地亚哥·卡里略。”

这样做的人绝不只是普勒特尔一个人；路易斯·卢西奥·路瓦托说，这场运动的“真正目标”“十分具体地有名有姓，这就是圣地亚哥·卡里略。”……安塞尔莫·奥约斯说，有人想使党“群龙无首”，说他追求的是“一贯的党，革命的党。”伊格纳西奥·加列戈、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费利佩·阿尔卡拉斯、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和其他很多人都喋喋不休地说，要保卫卡里略；甚至有些人还说，这是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实质性问题。

这种态度中，有些完全是人为的东西，谁也没有对卡里略在十大担任总书记提出什么疑问。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在讲台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面对这种气氛，我们所有的人下面的交谈中也都是这样讲的。这是一种奇怪的机械想法，一切批评等同于“攻击卡里略”，从而引起了在老党员思想上根深蒂固的近乎宗教色彩的反映，过去叫做“个人崇拜”，而这种思想又连同一整套传统的“观念”，影响到了最年轻的

干部。

应当承认很久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已经见不到这种态度了，而现在突然出现这种阿谀奉承者们的大合唱是一种自发的反应吗？难道只是一种在实践中阻止和窒息在党的问题上进行的一场冷静和有效讨论的策略吗？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企图呢？甚至还有卡里略对自己地位的过分多疑呢？究竟是谁在鼓动他们这么做？在一旦了解到了一些旁证的事实之后，也许过些时候可以得出答案。

在三天热烈的讨论之后，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又将如何结束呢？“关于方法的讨论”象一条红线贯穿了整个会议的进程。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将卡里略的报告交付中央委员会通过。

在这方面提出了三个建议；首先，莱尔特松迪说，他认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将报告和所有的发言一并提交给委任的决议起草委员会。对此，我在发言中说：

“我认为，莱尔特松迪昨天提出的建议是一个能反映大家想法的建议。我看大家并不想现在就在这里表决圣地亚哥为开始讨论而提出的建议。我相信中央委员会能够而且一定会就决议草案的文本中的实质性问题采取立场。因此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之后应当做的事是确定代表大会的日期和举行代表大会的通告以及选举各小组委员会。”

萨尔迪瓦、费尔南多·佩雷斯·罗约和其他很多人在发言中强调的方面不同，但都支持首先由莱尔特松迪提出的建议。

其次，在象海梅·巴列斯特罗斯那样的一些发言中，把报



告和发言分成不同的等级，认为报告应当成为各小组委员会的“基础”，而其他发言则也应当“予以考虑”。

第三种观点是那些诸如伊格纳西奥·拉迪埃罗之类的狂热分子的观点，要求靠多数票通过报告，从而事先排除那些不利的意见，使各小组委员会按特定想法进行工作。

讨论到最后已很明显不但最后的那种建议会遭到反对，即使是巴列斯特罗斯温和得多的解决办法也有可能遭到相当多人的反对，反对票也许可能超过1/3，因为报告由于本身的内容杂乱无章和空空洞洞而没有什么值得维护的。卡里略决定退一步，从而使他的辩护士十分难堪：他在总结讲话中说，小组委员会将同时把他的报告和所有人的发言作为进行工作的基础。就这样进行了表决。作为报答，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个成果，因为他要求对采取这样的办法是好是坏也进行表决。在这个问题上，古铁雷斯·迪亚斯投了反对票，但几乎完全孤立。大家很难说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这样十分广泛的能让人表达各自主见的讨论方法，是不好的。后来向报界提供的消息歪曲了事实真相，11月4日好几家报纸报道说，卡里略的报告获得了中央委员会的“通过”。在内部的通报中（我有1980年11月18日我所属的查马丁区的通报），同样伪造事实说，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有关正式展开十大讨论的报告”。

总书记总结中的另一点值得在此提一下：即关于党内“人物的作用”的问题。总结中的提法是“政党是围绕由一些人物组成的核心形成的，是围绕由党内著名领袖人物组成的核心形成的”；党的人物是“这个党得以在社会上定形的因素。”……文中在人物一词上用复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发出的信

息实际上是指一个人。可以佐证的是在同一篇讲话中摒弃了党的机关应当是“优秀人物集合体”的思想，而认为应当是“一个工作的集合体。”

另一方面，为什么要在总结发言中提到这个问题呢？在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中唯一谈论过的人物就是圣地亚哥·卡里略本人，具体地说，在达米安·普勒特尔等人的颂词中出现过。总结发言的提法使这类发言的含义更容易使人明白。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而有力地提出了党的领导工作需要建立集体和民主的制度的严肃论据，对此卡里略的答复是为维持现行制度而斗争。这种现行制度是建立在总书记几乎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基础上的，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但是，在一个欧洲共产主义党内公开维护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此首先是把我所称之为“狂热派”的那一套抛出来。后来在总结讲话中再提出对此保持距离的主张。在这种气氛下，关于任命一名副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在讨论中遭到批评，反映并不热烈）本身失去了我原来以为是有益的和有意思的含义，即把它作为改变卡里略在党内所处的特殊权力地位的步骤。

在中央会议结束以前，选举出两个小组委员会，以便起草大会的决议和新党章草案。当在会议厅宣读人选时，使人感到有些意外，在讨论中多数提意见最厉害的人都列进了决议起草委员会的名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后来被指责为想搞另外一个党，即“贵族和教授”党，和想搞掉卡里略等等）。相反，党章起草委员会则完全控制在可靠的人手里。

## 第四章

### 害怕发表会议纪录

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卡里略率领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去中国访问，以郑重地正式重建两党之间的关系。

11月10日，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开会。这是党在卡斯特略街的旧址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这幢房子象“地堡”一样，没有窗户。开起会来要么大家都淹没在呛人的烟雾中，要么抽风机的响声扰得听不清楚发言，两者必择其一。但是对卡里略和皮拉尔·布拉沃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可能让他们别抽烟的。在抽烟这个问题上，流派起不了作用。

莱尔特松迪对巴斯克的情况作了广泛的介绍，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愈来愈多的巴斯克人对恐怖活动作出了反应，开始出现了谴责恐怖主义的新气氛，甚至在民族主义者几乎有百分之百影响的象格塔里亚这样的地区也举行了反对恐怖暗杀活动的示威。为了开辟渠道使人民群众日益摒弃恐怖主义，巴斯克的政治力量之间开始了互相接近的进程。当时还没有建立“和平阵线”，但确实准备进行持久的群众运动。这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中期和长期任务。

另一个议题是讨论关于《工人世界报》刊登中央委员会讨

论的综合报道问题。报道中对有些情况的歪曲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具体以我的发言来说，删掉了某些最重要的内容，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且还不同意我有自己选几段发表的权利。借口是如果所有中央委员都这么做，那就永远没个完。我个人对此十分恼火。

另一方面，《我们的旗帜》编辑部曾经对中央委员会会议进行过初步讨论。鉴于这次会议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会上提出了最好能发表会议全部纪录的想法。但是我们没有具体说该怎么办。不管怎样，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职权，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问题提给党的领导考虑。

因此，当常务委员会在讨论《工人世界报》问题时，我建议编一本会议全部纪录。我说我们在《我们的旗帜》编辑部谈论过这件事，可以找一家愿意出版这些材料的出版社，如果找不到，那么可以由《我们的旗帜》出一期特刊，需要多少页就出多少页。

这个建议受到了欢迎，海梅·巴列斯特罗斯说这样做在政治上会起很好的作用，但也许太厚。尼科拉斯·萨托里乌斯坚持出版有好处，是件十分积极的事。西蒙·桑切斯·蒙特罗说首先应把会议纪录交给起草决议的小组委员会看一看，但他并没有反对出版。会上没有正式表决，但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作了发表会议纪录的决定，并对《我们的旗帜》编辑部的几个人说，要我们为此找一家出版社。我再重复一遍，这是1980年11月10日。

我们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包括马德里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巴塞罗那的《批评家》出版社还把纪录拿走了一个多星

期，但由于销售量的原因都不同意出版。于是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我们的旗帜》的特刊来编辑出版。我们重新审核了一遍，交给了印刷厂。

过了几天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从中国回来，我听到风声说卡里略不同意出版。

我们这时正搬到新址去办公，这是一幢座落在三圣一体街上的五层大楼。我在顶层有一间很漂亮的办公室，窗户大大的，家俱也很舒服。这一切都鼓励我热情和乐观地工作。

12月4日星期四，常务委员会开会，卡里略参加了这次会。在讨论了政治形势之后，他提出不同意出版中央全会纪录，认为这样做会把代表大会前的讨论引到次要问题上去，现在最需要的是集中起草决议，另一方面也没有征求中央委员对发表他们发言的意见。因此，他要求常务委员会撤回上次会议的决定，并通过不发表中央全会纪录的决定。

我猜他事先一定已经找人个别谈过话和作过布置。但当时的场面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地难过。在沉闷的气氛中，党员们一个个地收回了两个星期之前讲过的话。萨托里乌斯说，撤销原来的决定会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巴列斯特罗斯说《工人世界报》已经向全党报道得够多了。他还提到党内有人对《我们的旗帜》有意见……

关于没有事先征求中央委员对发表他们发言的意見的说法遭到了断然的驳斥，因为《工人世界报》上别有用心地发表编写的摘要时，也没有征得发言者本人的同意。两种做法那一种更好呢？

后来有人又提出了一些简直是违反常识的说法。伊格纳

西奥·加列戈说，全文发表是反民主的，甚至可能“假造”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因为反映不了那些在会上没有发言的人的意见。

最后表决时投反对票的只有皮拉尔·布拉沃和我，会上决定撤销上次会议的决定，不公布中央全会纪录。应该补充一点，加泰罗尼亚人没有来参加会，莱尔特松迪和加利西亚共产党总书记安赫尔·格雷罗也没有参加会。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可以看出它是十分严重的。我深信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尽管当时我并没有马上觉察到这一点。

首先这清楚地肯定了卡里略独断专行的工作方法在领导机构中占有绝对优势。在一个机构中，如果运用的是这样的方式，即一个人可以用上述办法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让别人围着他转，那么这个机构就不可能向前发展。这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改变和革新工作方法，真正采取集体的工作方法以及为此建立一个不再让这种叫人害臊的事重演的班子的必要性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同时这件事也反映出卡里略有些孤立。他不在场时，即使在比较重要的问题上也没有人跟着他的调子转，但他一回来，就迫使大家对他言听计从。然而这样做本身也会引起他的不信任和多疑，甚至对那些无条件配合他的人也如此。

我想在这里坦率地向读者交代我在写这几页时感到的疑虑。我是不是对卡里略讲得太多了，是不是过分看重他的作用？是不是我自己在思想上着了魔？但是我相信关于撤销发表中央全会纪录一事可以为我起点辩护作用。卡里略在我要

说明的那些事情上的个人影响十分大，这是千真万确的。这种情况本身对我的叙述起着制约作用。

但是另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是，为什么对公布纪录一事如此害怕和惊慌，以致为阻止它而孤注一掷呢？这表明对党内提出的党应民主地进行活动以及让基层党员参与政治生活的要求完全不理解。如果不让大家知道中央全会的讨论情况和会上的不同意见，那又怎么让基层参与政治生活呢？那不成了让基层只能限于了解多数人的官方立场，然后议论议论和“贯彻执行”吗？

在开始筹备一次使党能建立民主生活的代表大会的时刻，这种旧习惯的重新萌芽是十分令人忧虑不安的。

## 第五章

### 行不通的两分法

负责起草十大决议的小组委员会在卡里略去中国访问前开了第一次会议。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是卡里略。参加小组委员会还有萨托里乌斯,皮拉尔·布拉沃,拉蒙·塔马梅斯,卡马乔,阿里萨,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胡利奥·塞古拉,桑切斯·蒙特罗,索莱·图拉,恩里克·库列尔,何塞·桑多瓦尔,安塞尔莫·奥约斯和我。为了各人可以着手工作起见,对决议草案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工。胡利奥·塞古拉和我负责世界性危机和国际政策,塔马梅斯负责经济问题,桑切斯·蒙特罗负责过渡时期的政策,皮拉尔·布拉沃负责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总路线,萨托里乌斯负责争取建立进步政府的左翼战略,奥约斯负责农业政策,卡马乔和阿里萨负责工会政策,索莱·图拉负责地方自治政府问题,桑多瓦尔负责文化问题。萨尔迪瓦负责社会运动,包括传统的和新的社会运动,库列尔负责国家的改革,恐怖主义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但是决议小组委员会开始工作时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党的问题由谁来起草呢?卡里略马上回答说应该由负责起草党章的小组委员会管,它是负责起草党章的,“因此”也应负责解决党的问题。



皮拉尔·布拉沃、萨尔迪瓦、胡利奥·塞古拉和我本人都坚持应该由我们这个小组委员会来负责。我争辩说，为了真正贯彻我们这样的独立的国际政策，需要改变党的职能的一系列概念和它所涉及的方面，否则，所有问题都只能浮在表面，深入不下去。从九大以来就存在这个问题，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对党的职能作出结论。如果说在对外政策上显然需要这样做的话，那么对党的战略和社会运动等等来说，这一点更加明显。不可能把政策内容和生活方面的问题同党的职能问题分开。

这些话起不了多少作用。最后大家同意在把草案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前，举行一次党章起草小组委员会和决议起草小组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来讨论有关党的问题的决议草案。但这个决定从未付诸实施。这并不偶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把这两件事分开的做法是符合既定的一些计划的。

从实质上说，在这个问题上勾划出对十大应该怎么开的两种思想：一种是从现实出发，从共产党遭到的危机出发，要想用发展欧洲共产主义、克服陈旧的习惯和思想、革新党本身的职能、使之变得灵活、使权力不那么集中、有更多群众性参与的办法来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

另一种思想的出发点是尽可能地轻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顶多重复九大的提法，甚至在教条主义者的压力面前作出一些让步，主要是使大会集中力量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纪律和意志统一，甚至企图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念，而现在对大多数的党员来说，传统的价值观念，象“领袖的魅力”一样，已经失效了。根据这种思想，因此，在起

草决议方面给那些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留些位子，而在党的问题上则不让他们插手。

这就有点象让我们擦窗户，装饰外表，而让那些“无条件跟着走的人”占领房间。

但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我相当热情地投入决议的起草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准备我所负责的那个部分。也许我当时幻想太多，深信如果能引起全党对有关欧洲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的意义进行深刻的讨论，如果我们能把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贵性放在应有的地位，把它不仅当作“道路”，而是也当作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可以通过政治讨论本身大力推动在党民主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变化，并使这种讨论难以阻挡，和难以使之瘫痪。

1月初，传来欧洲共产主义在加泰罗尼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的消息。那是1月4日星期天，我早晨从电台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到党在三圣一体街的总部去。卡里略，马林，海梅·巴列斯特罗斯，赫雷斯已经在那里了，也许还有其他几个人。尽管从11月中央全会关于发表会议纪录一事，我同这些人的关系已相当冷淡，但我们还是在一起过了好几个小时，一边等消息，一边对收到的消息进行议论。

卡里略的第一个反应是认为事实证明他一直为加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西班牙共产党在政策上的联系而操心是对的。他说如果执行委员会对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给予更坚定的支持，那么也许事情还不至于糟到这种地步。这一批评直接是针对我说的。

但是1月12日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

会党发生的形势时，几乎谁都没有提到夏天以来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关系上发生的波折。

我发言的中心是讲应该把党所遭到的失败，尤其是在国际问题上遭到的失败放到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考虑。苏联人想搞掉欧洲共产主义，我深信它还有攻击西班牙共产党的秘密行动。恰恰是由于这样，因此古铁雷斯·迪亚斯和加泰罗尼亚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第一个主要错误是在对苏政策上，在对“现实社会主义”问题上产生动摇和后退以及作出无用的让步。古铁雷斯·迪亚斯的诚恳和勇气给我很深的印象。在他总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中，具体地讲到 he 接受我发言的中心内容。

许多人发言强调这一经验对西班牙共产党十大的斗争很有教益。例如萨托里乌斯说，应该在使欧洲共产主义深化同向后倒退之间作出选择。为了避免再受到第二次秘密行动的攻击，党有必要检查和克服自己的缺点。

欧亨尼奥·特里亚纳说在维护欧洲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已经有所倒退。他举了马德里的例子，并且补充说他感到有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维护欧洲共产主义的人在党内最不讨人喜欢。

皮拉尔·布拉沃强调我们所犯的错误。她说，党不能靠领导人的魅力感来起作用，而要在提出论据、理性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起作用。要靠魅力的话，那么最后占便宜的总是苏联。她要求我们对合法化以来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性的检查，提出我们不应只限于在议会中做工作，应该对意识形态斗争、对群众运动予以更大的重视。应该贯彻欧洲共产主义的方针。她表示党员大量退党很令人担忧，退党的人中多

数是欧洲共产主义者。

萨尔迪瓦和其他几个发言讲的也是这方面的内容，强调在发生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事件之后，欧洲共产主义更应成为十大前讨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在索莱·图拉、加利西亚共产党总书记安赫尔·格雷罗、萨尔迪瓦、皮拉尔·布拉沃等人的发言中，都批评了加列戈作为西班牙共产党派去参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大的代表所采取的立场，他在会上的发言不提欧洲共产主义，这是对教条主义者的鼓励。

卡里略在总结中强调的基本思想是，从面对未来来说，建立欧洲共产主义集团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提出八点有关欧洲共产主义的定义，以包括在会后发表的执行委员会声明中。

这八点主要涉及：争取和平和反对集团的斗争；声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权利；为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团结而斗争，摒弃领导党和领导国；争取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团结；争取自由的、多元的、替代性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哲学和科学探讨的完全自由；使党成为工人和人民党性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这八点是以一般的方式讲的，并没有摆脱显然含糊不清的框框，只是重复西班牙共产党好多年来所采取的立场。因此，难以把它当成是对欧洲共产主义立场的推动，发展和深化。这八点如果不是后退，那也是采取守势，目的在于使欧洲共产主义可以较为容易为教条主义者所接受。但是在政治上，守势是难以停滞不变的。因为周围的环境在变化，不是前进就是后退。

“欧洲共产主义集团”的思想无可争议是有诱惑力的，反

映了现实的需要。但是目的何在？为什么这样提？是为了对付攻击、加强欧洲共产主义？还是仅仅为了把这种两重性的思想冻结起来，而以这种两重性来设想十大前的工作？

1月26日，决议起草小组委员会开会讨论已经写出来并在我们当中散发了的草稿。会上有些情况对了解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是很必要的。

例如，西蒙·桑切斯·蒙特罗所准备的关于过渡时期的决议中有些内容比三年前九大通过的同一问题的决议更加为自己辩护而不是作自我批评。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皮拉尔·布拉沃和胡利奥·塞古拉都指出我们必须以1978年说的话为基础，根据两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切身经验来检查我们犯了那些错误。

具体来说，对蒙克洛阿协议的提法是乐观得可笑。例如蒙特罗在起草的草案中说，“这就是民主联合的政策。民主中间派联盟和工人社会党都拒绝了。然而现实很快就使人信服了。由于缺乏民主联合政策，民主中间派联盟和工人社会党不得不接受这一政策的替代方式”，即蒙克洛阿协议。

原来蒙克洛阿协议不折不扣成了民主联合政策的“替代方式”。而“现实”以其奇怪的力量把它强加给了民主中间派联盟和工人社会党。

此外，它还坚持认为（这是过去已经提出过的一种思想）蒙克洛阿协议是要“消除那些阻止为实现政治和社会民主而进行进步变革的最重要的障碍”。这种政治和社会民主，用我们的话来说，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再起主导作用的时期。但是“障碍”存在于资本主义

力量之中，蒙克洛阿协议又如何能消除阻止这种进程的障碍呢？

这个论点表明抵制并且几乎是拒绝对过去的错误采取真正的自我批评的手段。问题的严重在于如果没有自我批评，维护欧洲共产主义也就十分困难，因为欧洲共产主义表面上看去是同右倾态度搅混在一起的，是一致的。而这种态度又是党的一系列态度的特点。

会上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讨论皮拉尔·布拉沃提出的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一般道路”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成为起草小组委员会上有些人大力批评甚至攻击的目标，安塞尔莫·奥约斯说里面包括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容，表示其中提到东方国家政府老化问题只会使“我们的同志”感到思想紧张，他建议删去关于同性恋的提法和删去关于左翼团结的提法。

皮拉尔·布拉沃关于同性恋那一段的提法是这样的：

“妇女解放的任务是从今日社会最顽固的伪善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方面之一，是同在性问题上采取思想解放的新看法联系在一起的。使性问题从伪善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导致对同性恋的情况从社会角度采取新看法。”

决议草案中关于左翼团结的提法是这样的：

“左翼团结是走向多元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中心内容之一。”

“也许在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了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接近存在新的基础。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向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立

场靠拢,而是因为由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不仅是我们,社会党人也同样具备条件放弃从左的方面束缚我们和从右的方面束缚他们的教条主义。

“一方面由于我国人民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大国的政策,在欧洲出现了新的形势,形成了对话的新气氛。

“在我们国内,从1977年起到现在,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使最初的竞争逐渐代之以在市政方面的共同实践,并且除个别情况外,在议会采取平行的行动以及减少公开的论战,这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双方都会有紧张和极度不安的时候,但在这个进程中应该以一切代价避免出现倒退。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转向完全适应和管理现行社会秩序的立场的社会党的最好的解毒剂,就是有一个十分团结的共产党,这个党懂得没有左翼的团结,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不可能的。”

卡里略则对皮拉尔·布拉沃的决议草案进行了无情的攻击。鉴于小组委员会工作中的宁静气氛,卡里略的尖刻令人吃惊。他在“现实社会主义”问题上坚持有必要说明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工业化不得不着手进行“原始积累”的任务,从而出现了种种的歪曲。桑多瓦会说应该讲清“现实社会主义”的模式对我们是不适用的,但是也不能加以诋毁,应该对历史条件作解释。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皮拉尔·布拉沃关于“现实社会主义”问题的决议草案中的有些段落是很有用的。

“但是尽管如此,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可以理解的全面替代方案的,不是这个,而是那里仍然

残存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不平等，而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的体制使这种不平等世世代代重复下去，还有是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同全体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在这些社会里还出现了男女之间，老年和青年之间的严格的等级，这种等级制度决定了国家和党的领导班子都由年迈的人组成，并且几乎全部由男性组成。

“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是同这些国家中群众很少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指出了政治民主的不足，国家对基本自由权利的限制。我们希望开辟让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的渠道，但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政治民主，不承认民主权利，不执行普选制，这些参与制的新渠道是不可想象的。在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既不存在自由权利和有足够选择余地的普选制，而且也不存在人民群众参与的任何渠道。

“这些国家的男男女女的文化水平和智力的素质要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他们只限于在私生活的范围里活动。对他们来说，政治似乎是异己之物，是从上面强加给他们的，他们干预政治的可能性等于零。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党政混为一谈，彼此等同，从而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高居于社会之上，不受社会的任何监督，甚至连资本主义国家议会选举的这种起码监督都没有。公民没有自由权利的社会，是不可能完成进行批评性变革的任何任务的。”

这些思想在决议起草小组委员会中遇到这么多的反对，表明近几个月来，尤其是11月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分歧仍然是



十分现实的。党内存在强大的压力，要使欧洲共产主义只成为受到大家认可的一般性支持民主的态度。要阻止对苏联的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这就必然要不顾一切保持传统型式的共产党。

## 第六章

### “二·二三”政变和国家危机

在2月23日政变之后采访我的大多数外国记者，特别是意大利记者都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民没有立即作出反应？这么提问的多数原因是把情况搬到了1936年的马德里，当时人民起来粉碎了由佛朗哥率领的武装叛乱的头几个发源地。

我认为用这种方式来推理是荒谬的。今天西班牙的形势同1936年的形势大不相同。此外，1936年西班牙人民的所作所为是极为特殊的。其他国家在法西斯主义迫近时都没有这么做。简单地进行历史对比，其结果如果不是消极的，那也是很坏的。

绝大多数的西班牙人摒弃特赫罗的政变。2月27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示威给人以深刻印象，表明人民群众拥护民主的广泛程度。

但是，对议会的袭击突出地说明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无疑影响了人民的态度，但不止如此），它还表明西班牙在苏亚雷斯领导下进行改良的基础上诞生的民主制度是缺乏根基的。苏亚雷斯没有能力用毫不含糊的、稳妥和坚定的方式奠定文官政权的绝对权威，从而建立人民的至高无上权力。这种

情况不仅表现在政变分子的态度上，而且也表现在军队的各种十分微妙的反应上，也包括那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决定性的时刻服从了国王从而对拯救宪法和合法制度作出了贡献的人的反应上。

显然除了特赫罗、米兰斯、阿尔马达的所作所为之外，还有其他的阴谋和其他的分散活动。阿道夫·苏亚雷斯没有作任何解释就自动辞职，而且他在电视上讲了一句神秘莫测的话，他说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不愿使西班牙历史上民主阶段再次夭折。背后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把这个问题贬低到象猜谜一样地猜测到底会不会发生政变乃是荒唐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存在着军事权力机构对政治生活各个领域或多或少间接的威胁。“军事权力机构”这个概念运用得那么自然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不会也不应该存在“军事权力机构”，只应存在由公民投票产生的政权和司法方面的权力机构。

然而，也许最严重的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某种闭关自守的、享有特权的禁区里活动，在这个禁区里仍然保留着长达40年独裁时期在西班牙占统治地位的最反动、最反民主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正式承认文官政权有合法的最高权力的同时，并没有随之产生使这些价值观念，使西班牙的这种虚假的神话消失和摧毁的进程。也就是说，宪法中体现的民主价值观念并没有真正渗透到军队中去。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使这种危险的威胁消失呢？

令人担心的不只是这些历史残余的影响，而是新一代军人所受到的教育和所接受的精神。

我们这些曾经为推翻40年独裁统治进行这么多斗争的左翼力量，也许过于轻易地接受了在很小范围内并且几乎是“悄悄地”对佛朗哥主义、对佛朗哥反西班牙的罪行所进行的历史性谴责。

在我看来，另一个有决定性影响的，并且十分迫切的任务就是象在其他国家一样用某种方式把军事教育同大学教育混合起来。

然而，西班牙武装部队非但没有这样做，并且还以“继承”佛朗哥军队的胜利为基础进行思想教育。民主军人联盟的军人仍然被排除在军队之外的事实说明这种严重性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另一件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是，共和国军队<sup>①</sup>的军人，不只在颁发退休金问题上，而且在公开的看法上至今仍然受到歧视。尽管根据今天行之有效的宪法的价值观念，忠于军人的荣誉的是共和国军人而不是佛朗哥的军人。

这一切都突出地表明武装部队接受宪法给他们规定义务的态度是多么脆弱。

军事问题无疑是民主制度从前政权接受下来的最危险的遗产。它的严重性还在于这并不是—种孤立的事情，它是同西班牙社会中仍然有强大影响的其他一系列反动残余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反动残余是西班牙带历史性的落后的因素。这些因素使我们国家同其他欧洲国家拉开了距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和部分经

---

<sup>①</sup> 指1936—1939年建立的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译者

济进程都与我们十分不同。除了军事问题外，我还要指出四点落后因素(当然还不止这四点)：一、缺乏达到需要水平的公办教育，反过来，民办教育，主要是教会办的教育过多。二、教会在政治生活中有很大影响，表现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保持具有时代性错误的教育制度方面。如果为未来着想，那么这种带有阶级特权和宗教特权的畸形教育也许是最严重的问题。三、国家机构效率不高，具有强大的反民主和中央集权倾向。这种国家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使政治上作出的决定在实践中毫无结果。特别是司法队伍中极端反动的人占很高比例。四、公有经济只起次要作用，其目的并不在技术上使资本主义合理化，而是佛朗哥为了保障寡头集团享有肥缺而设计出来的。

与此同时，西班牙今天又拥有自由民主制的传统手段，有议会，宪法，组织政党和工会的自由，出版和集会的自由等等。

我们有理由要问，从第一次民主选举近五年之后，共产党人最严重的错误是否在于过多地为塑造温和形象而操心，以“安抚”西班牙“权势集团”中那些最野蛮的阶层。影响这种态度的是否有一种幻想，即认为有可能把“纯民主”阶段、传统的民主阶段同后来有更大变革雄心的阶段几乎完全分开。我们是不是陷入了“粗略地”可以归纳如下的框框里，即：在进入当代问题之前，在严肃地着手八十年代西班牙的现代化之前，暂且让我们用已经争取到的传统民主手段来解决西班牙的落后问题吧！

在政策上最基本的准则就是不能混淆阶段。如果当前还没有基础，那就不应冲向前去搞未来的设想。但我认为西班牙

牙左翼又过分相信可以用传统的手段去战胜过去。

换一个方式来问：西班牙如果不同时对现代生活的迫切问题（在西欧国家这些迫切问题正引起了国家、政党和政治民主的危机）作出反应，是否能够克服它在军队、国家、教育、民政、社会等等方面由于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呢？

我的看法或许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我认为我们倾向于相信我们所擅长的事情是结束旧的残余，而我们的危机正是来自这些残余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拯救我们已拥有的民主制度，那么尽管还不够，但已经不错了；再过些时候，如果我们保持住这种民主制度，那么到时候我们也将陷入同其他国家相似的困难境地。

这个问题不能靠歌颂宪法、组织各种爱国仪式、口头上高唱民主自由来予以解决。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人以传统形式的政治民主制度已不起作用的印象。我认为恰恰相反，它是人类不可否认的一大成就。一切进展都要以此为出发点，都要接受它和结合它。

问题在于对今日世界来说，这样的民主制度已经不够了，要求有新的手段。为了继续下去，必需要有其他的手段。

有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过于简单，认为民主制度已使人失望，因为遗憾的是这恰恰是同经济危机、失业等等一起到来。但同时人们又承认这个危机并不只是西班牙的现象，也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现象。这是一个全面的总危机。

因此有必要弄清楚西欧政治民主制度所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危机。这并不是自由主义国家的危机，而是所谓“福利”国

家的危机,是“社会国家”的危机。这种国家是1928年危机后建立的,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上建立的,由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民主党在一些主要国家中管理的。

在这里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诞生的历史环境是并不多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胜利地建立了各种各样联盟,使许多西欧国家出现了抵抗运动。在自由主义的模式遇到危机时,出现了人民群众起主导作用的新形式。在击败了希特勒主义之后建立的民主制已不是战前所存在的民主制度的简单的延续,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在大的群众性政党和强大的工会的相当大的压力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其目的为改变收入的分配和在某些方面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包括社会保险,教育制度,住房条件等等。汽车和家用电器的消费,度假和旅游已不是少数人的现象。分配的改变首先是通过财政制度(是在全面意义上来说),通过为扩大市场而扩大国家投资,通过经济中的公营部分来实现的,公营经济的规模在各国很不相同,但它从来没有摆脱从属于垄断资本的性质,垄断资本从来没有丧失它的霸权地位。

战后由于重建遭受破坏的城市和企业以及科技方面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争时期为军事目的所作的研究的结果)而引起的经济增长,引起和促进了分配中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政治稳定的因素,说明为什么在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内改良主义在整个西欧的政治生活中能占统治地位,其政治体制的基础是各种政党、工会和在关系不过分紧张的情况下运行的议会。

六十年代末西欧以爆炸的形式出现了当代的危机，接近于一场革命。1968年5月的巴黎是有广大群众(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大量参加的运动，但政党在其中几乎不起主要作用。这次运动突出了两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特点：出现了新的社会要求，已不只是要求更多的消费，而且也要求生活质量；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与工会和政党在一起，共同体现了资本主义成熟时期的新矛盾。

当前的危机同过去的危机完全不同，今天要解决的并不只是更公平地分配财富的问题，而是对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财富进行生产的方式实行深刻变革的必要性。新的社会要求关系到人同劳动和生产方式的关系。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微电子和信息方面的大跃进，提出了在不远的将来大大改变劳动性质、劳动时间和空闲时间的前景，人类生活中必需用于生产的时间将会减少。

这次危机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般男男女女的文化水平都比二、三十年前要高得多，他们从各种途径收到的信息量十分之多，因此他们主观上感到对政治生活中每日发生的事情无所不知。这一切决定了每隔四、五年投票选举这个或那个政党的传统制度已不足以适应人们对决定其生活的环境的各种决策进行干预、发表意见和参与的愿望和必要性。从而出现了政治民主制度的危机，这个危机并不是要求少一点民主，而是要求多一点民主，特别是要求有进行政治活动的新方式，有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新渠道和新手段。

在这一危机面前，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含义并不是回到对经济不加干预的自由主义的国



家，这在今天已是不可能的梦想，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干预，即让大资本集团有最大的自由来把它那套增加私人利润的经济规律置于任何其他的道义或政治考虑之上。

这条“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倾向于通过镇压政策削减甚至取消社会所提出的新要求，限制和破坏工会，从各个方面减少实行民主的水平，助长行会主义和社会机体的解体。在这个范围里，会出现行业性利益的真正“小天地”，出现比政党还要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寻求同当局达成“协议”以保护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议会的权力会逐渐缩小，议会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会减少。议会将倾向于搞某种“政治表演”，而在后院则由行政机构在进行活动和决定问题，这些机构受到一系列次政治手段的压力和制约，也即黑手党人、秘密组织、舞弊甚至恐怖活动都企图从中捞到最大的好处。

现代国家存在某种程度的两重性的倾向，一方面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议会，这些机构讨论和颁布一般性的法律，但其中大部分并不能兑现；另一方面则是由行政机构，在许多情况下只是由一小撮核心人物在行使真正有效的权力，他们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操纵着决定权。

政治民主制度的这种蜕化从代表西欧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党本身的性质上反映出来。

这些中间的、右翼的政党会大大失去它们当时建立时所确定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们变成了管理政权的机器。它们愈来愈不是由于它的价值观念、它的思想的说服力、它的人员的美德和威望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它们愈来愈更直接地从行使政权获得力量。他们是执政党或国家党，它们的活动，甚至在

选举时期也日益缺乏思想性。在这方面我们受到选举方法中“美国化”魅力之害，日益倾向于象推销肥皂似地“销售”候选人和政治纲领。这些国家党不是把竞选运动委托给它们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且委托给商品推销专家。现在的做法已不是把代议制民主局限于使公民有可能每四年投一次票，而是日益开动操纵选举的机制以使这种投票不是取决于批评意义上的政治意愿，也不是取决于理性，而是使之取决于一些偶然的、煽动狂热性的、运用形象和广告的现象。

与此同时，“国家党”和政府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政府倾向于放弃，甚至公然放弃原来的设想，即以整个人民的名义和为人民的利益而掌握政权，并且厚颜无耻地把自己当作政党的工具，政党直接利用行政当局和国家机器作为工具来延长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代社会无疑存在制止回到法西斯主义方法的政治阻力。但同时又存在垄断资本避开民主制的真正作用而利用专制方式的客观倾向。也因此我们看到新的“国家外”的权力新形式如何产生和发展，它们就象盲肠一样附加在正常的肌体上，资本主义或“国家党”通过它们得以推行某些最黑暗、最肮脏的职能。对一个需要削减和拒绝绝大多数居民要求的政权来说，这是它行使权力时所固有的本能。

在西班牙我们从民主中间派联盟、人民联盟、“自由俱乐部”和其他偶然性的政治联合体的演变中看到了这种现象。这一切又由于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过去一些因素的影响，如军队的威胁和教会的干预而变得更加严重。

因此，保卫民主不能脱离我们从中生活的历史环境。西班牙

牙属于西欧。我们被迫在两条战线前进。一方面要克服继承下来的落后状态。同时，我们又无可奈何地必须认识和对待欧洲政治民主制度发生危机的新现象。

## 第七章

### 欧洲共产主义的回答

在开始使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新名词(这是在意大利报刊上撰稿的一位南斯拉夫记者佛朗哥·巴尔比埃里起的名字)时,许多人都把它理解成是指接受选举和民主自由权利的共产党人。基本上说来也确实是这样,然而今天的情况乃是欧洲共产主义即使想这样做,也不能局限于采取只是接受议会、选举、轮流执政等典型的民主机制的态度。这样做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我们已陷入危机之中,我们要对危机作出新的答复,因为在西班牙和在欧洲,左翼力量需要对右派和中间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解决办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要作出欧洲共产主义的回答,就要掌握住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在酝酿着的一系列客观变化。当前的危机已经把它们摆在面前,要求人们对它们进行研究。

首先是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在发生变化。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没有公共资金为之输液,即我们全体公民贡献出来的资金为之输液,就无法运行。

到现在为止,这种干预基本上只是在分配领域里,但是当前从失业和社会对生活质量的新要求开始提出的问题,要求

公营经济对积累进程、投资、劳动方式、工时、空间时间和培训进行干预。改变生活质量就是改变人对生产劳动的关系。

生产力发展本身，新技术强大的威力，在经济领域里引起了在规模上崭新的现象，即在现代社会中公营经济的范围扩大了，私人经济的各种决策互相有着极大的作用。

有许多事情在二、三十年以前曾被认为通过私有制可以以最好的方式进行管理，而现在则已经不行了，因为这样做会对居民中非常广泛的阶层和对子孙后代带来消极的影响。空气和自来水在不久前还是无偿的财产，然而污染使它们成了公营经济不得不进行调节的领域。过去矿产资源和能源可以自由开发，但是它们是不可能更新的，因此在绝大部分先进国家都属于集体管理的领域。

这种对生活质量更高的要求以及集体管理领域的扩大，要求公营经济对经济生活进行新型的干预。它既不是行会主义的管制体制，也不是带有新佛朗哥主义烙印的干涉主义，而是社会对集体所有的资源(今后会越来越多)以及对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基本决策进行更加灵活的干预和监督。

这一类型的干预要求改变公营经济的性质。从这里产生了国有化的问题。国有化并不是灵丹妙药，而只是国家拥有的干预经济的许多手段之一。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手段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拿西班牙的银行为例。七大银行都有信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信贷和劳动都是最重要的商品。此外，这七大银行，每家都有各自支持的产业集团，这是在别的欧洲国家中所没有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危机中获得日益增长的巨额利润的银行业务并不会冒任何风险。信贷是真正的

公共财产。它由私人经营是荒诞的。就以西班牙为例，如果不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民主制度的实效就是相对的，因为国家的未来更多地取决于可以塑造经济发展模式的私人经济的决策，而不是议会制订的法律或通过的决议。

现代民主制度需要的是能推动经济进程的国营经济，而不是象今天这样服从私人集团的利益的国营经济。

这就会产生提出方案、制订新型计划的可能性。在这种方案中，一方面公民的意志应该起作用，与此同时，科学的可能性应该起作用，这种科学的可能性是指今天存在的对未来的预测和对各种偶然性的估计。

这种方案总的目标是指向建立一种新型的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积累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增长而增长），它的目的应是增加集体消费，使满足人们多种需求的方式社会化（今天是以私营和个体的形式，以不合理的、反经济的方式对待这些需求的）。这种精心制订的方案是为子孙万代管好那些不能更新的资源，满足各种集体的文化需要，以行之有效的形式使我在前几章中提到的带有根本性的决策民主化。

让我们举核能这个具体问题为例。公众舆论广泛认为，为了避免能源枯竭，使用核能是必要的，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关于这类问题的民主决策要求把各种选择方案（包括或者用减少能源消耗，或者使用其他可能替代的能源）用科学水平最高的，因而也是截然相反的提法摆到公民面前（使他们能够看到持各种见解的专家所提供的资料）。

现代青年最典型的社会要求并不是增加消费，而是要求另一种方式的生活。如果一种民主制度把这些利害关系最大

的人的意见排除在外，并且收集意见的渠道多数受到未来一代人的蔑视，那么这种民主制度还有什么价值呢？

为了解决一些次要问题可以经过繁琐复杂的程序，而且得到多方认真的民主保障；但是能够改变一国人民命运的决策却是由私人企业的中心或者政府的核心作出的。这就是直接向我们提出了议会制度的危机问题。由于政治与经济的新关系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议会就不能继续成为表达市民意志的唯一机构。这不只是技术上的改革问题，尽管这种改革可能是需要的；现在涉及的问题是现代民主制度在经济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应该作出的决策的性质。

瑞典、奥地利等一些国家都将核能问题交付公民投票来解决，这绝非偶然。

在西班牙和西欧其他各国出现的对选举“失望”的现象不只有倒退的一面，也有人们觉悟到代议制、代表制民主已经到顶的一面。由于现在的文化水平和信息水平，越来越多的公民，正象我们说过的那样，感到有权用比每隔四、五年投一次票支持某一个政党要更为直接和更为积极的办法参与各种决策。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公私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关系。允许不允许在某地建造一个工厂，意味着我呼吸的空气会不会受到污染。一项有关电视的政治决定意味着我家庭生活 的变化，或许在道德上或思想上还会使我子女发生变化。投票支持某一个政党就能意味着授权它对一切作出决定吗？我们需要建立更加丰富，更加多样，更加分散的民主形式。这些民主形式应能把公民与足以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更加直接地

联系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选举和议会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

面对轻视议会，使议会淹没在一大堆次要问题的决定之中，而把主要的抉择交到政府手中的反动倾向，进步的解决办法首先应该使议会变成对主要政治抉择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的场所，并且尽最大可能做到开诚布公和一贯光明磊落。既要反对做样子给人看的政治活动，也要反对走廊政治或幕后政治。

但是左翼需要承认（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者本应对此作出榜样），议会民主今天只能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各种形式的一个部分（无疑是带根本性的一个部分）。就我个人来说，并不十分热衷于象社会经济委员会这种政治体制的形式。在法国，它的效用几乎等于零。我倒是倾向于从以下两个方面寻找解决办法：一方面是在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加强公民投票，不过要保证有完全不同于至今存在的（包括宪法规定的）条件，这就是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以便允许从截然相反的可能性中去进行选择。另一方面，以权力尽可能分散的形式，建立和加强参与制的形式，直接民主和基层民主的形式，在工作场所、居民区、学校和研究中心、文化中心的基础上促进自治。

从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决定性的方面是要在企业中不仅提高工会的权力，还要提高由全体劳动者选举产生的机构的权力。

不应忽视上述民主形式会不会煽起行会主义的、分化社会机体的倾向问题。这些倾向在当前危机的情况下是一个现



实的危险。用由渺小的利益为指导的民主来替代由伟大思想为指导的民主的做法是消极的，但是其后果并不是致命的。通过真正的参与渠道发扬负责精神，这可能是反对行会主义倾向、反对维护局部的狭隘利益的一种解毒剂。但是那种危险是存在的，并且表明有必要通过各个政党和普选把全面的、综合的民主置于应有的地位。

今天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方面，但它的作用更难以衡量，这就是国家范围与超国家范围之间正在发生的变化。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尽管在各国议会里通过投票作出一些决议，但是真正的决定却超出一个国家机构的能力。我们就拿当今欧洲存在的实行35小时工作周的客观必要性为例。如果不是在欧洲范围内作出决定，就很难充分实行这样的措施。

我们以最先进的工艺问题为例：这可能是使欧洲目前程度不同地在同美国的关系上以新的依附形式居于从属地位的一个新的领域。唯一可能的答复将在欧洲范围内找到。

从民主的观点来看，为难的是如果不加强欧洲超国家的民主形式，决策权就会日益操纵在各国行政权力机构和多国公司的手里。左翼有必要为提高欧洲议会的权力面斗争。但同时还必须鼓励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社会运动的活动互相结合起来。对和平运动来说，这一点尤为必要。

另一方面，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人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尽管还非常落后，但有了提高。这就提出了对文化事业相当高的要求。

由于各个政党的政策越来越专业化（对此共产党也不能

避免,这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讲到),今天具有叛逆精神的,非唯唯诺诺的青年一代的普遍倾向,是要求多一点文化,少一点政治。我认为这基本是一种健康的态度,尽管它有可能导致消极的态度,如不参加选举。

如果把政治当作目的本身,那么它的终极点是权力之争。如果忘却了目的,理想就会变得淡薄起来,狭义的政治就可能成为革命政党堕落的因素,和成为人们生活贫困的因素。

相反,人民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新需求要求有一种能够把与生活质量相联系的一系列问题都结合起来的政策;要求同大自然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建立新的关系;要求男女之间不仅在工作上,而且也在两性关系上建立真正的平等,为此需要建立共同生活的新方式,而这种新方式又对家庭结构本身和传统的等级制提出了疑问;要求建立把集体生活同促进个人创造性结合起来的文化活动制度。人口大量集中的都市化引起了市民的孤独感,产生一种矛盾的需求,即既有个人的生活同时又能集居。每个人都想按自己的性格来生活,而与此同时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又同其他男人和女人有联系。艺术、绘画、音乐,尽管在我们国家还落后,但成了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面对这些文化要求,保守的、中间的和右的反应就是文化部那套欺骗性的做法,国家资助一定的活动,从足球运动、斗牛到画展,但统统又同保持权贵思想混杂在一起,文化象是国家恩赐给公民的,是一切文化方面的家长统治。

在艺术商品化以及金融权力中心(特别是美国)日益控制文化和艺术活动的这种十分现实的威胁面前,我并不认为

解决的办法在于实行国有化。除了国家资助（在西班牙它至今还少得可怜）和一些起码的立法措施外，需要做到由社会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文化要求，减少国家的作用；做到整个社会生活文化化的倾向占优势。在这方面的活动要实行最高水平的自治，当然，市政府、自治组织和根据市民自己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各种协会要发挥日益巨大的、必不可少的作用。

政党与政治的关系发生意义重大的变化。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显然也同样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在肩负实行社会改革使命的政党内部，有一种观念处在没落阶段，根据这一观念，政党的目标及其存在的理由就是夺取国家政权，一俟达到这一目标，就自上而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正象我们在前面一点指出的那样，这一观念同列宁主义的武装起义战略是一致的，同社会民主主义的竞选战略也是一致的。两者都把国家政权视为革命的轴心，都把政治理解为几乎仅仅是国家政权或围绕国家政权的事物。

但是，面对我们今天经历的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危机，革命和变革都不能局限于国家政权，不能只是通过国家政权来实现。

这就意味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考虑政党本身。它的目标不能是赢得选举和组阁，至少这不能是它唯一的目标。需要把这一目标放到实行社会变革、建立和巩固历史性新集团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起领导作用这样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去。这个历史性新集团应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力量组成。

在当前阶段，党的作用将越来越体现人类的绝大多数在愈来愈多地参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政党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指导和加强劳动人民和公民在巩固和发展民主和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日益突出的主角作用。

这就要求克服那种把民主制度视为在国家和政党本身内部生活中指派领导人的手段的思想。民主制度过去是起这样的作用，它比起以强权、继承和宫廷政变为基础的封官手段来说，曾是一大进步，但是今天，民主制度越来越需要成为没有领导人的，加强集体领导的制度，可以更大程度地同人民商议，公民通过选举和其他渠道实行更多的参与。

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目的不是领导国家，改变政府，而是更有长远意义的目的，即总的加强公民自治。社会主义将向前发展，成为现实，并不是因为将有许多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当部长，而主要是因为劳动人民、公民将有更大的能力对带根本性的政治抉择进行干预，参与并作出决定。

我们讲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能只是指尊重现存的政治自由和权利，无疑这是重要的。它的含义要深刻得多，即有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用新的形式使人民参与决策中心的工作（这在今天甚至还难以想象）。就是这样去建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新关系。

这些关于社会变革和民主制度的思想要求各个政党彻底改变对待新的社会运动的态度。今天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那种把这些社会运动当作加强自己

的影响和争取选票的工具的倾向。拿西班牙共产党这个具体例子来说，它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对推动居民区和专业人员等等的运动，发挥了真正革新的政策。它在取得合法地位以来却产生了真正的倒退，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对这些运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女权、生态、青年和文化运动，争取性解放的运动，反核运动，和平运动等等，尽管没有达到组织起来的程度，但却是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出来的一种抗议和叛逆。不能把它们纳入左翼政党的活动范围之内，左翼政党必须承认和尊重这些运动在社会斗争的决定性方面所起的主角作用。

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如性解放和同性恋，我们共产党人最好不要搞错时代。今天我们影响之所以减弱，就在于我们身上残存着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道德观（这是在某些时期从苏联输入的）。如果我们恢复我们共产党人的根子，把我们同自由传统的思想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在社会上有朝气的青年人中间扩大我们的影响。

有没有一种“共同的名称”能把我所说的那种政治民主危机的各种表现都联系起来呢？对这么一般性的问题最好不要作绝对化的回答。但是我倾向于作肯定的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都爆发了广大群众争取解放的进程，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当时那里还受到殖民统治。从此以后，世界的政治格局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着，诞生了十几个新的国家。

另一方面，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新兴的女权运动给政治和社会生活带来了直到当时还是为人们陌生的内容。不管其

形式如何，它意味着占人类一半的人口逐步摒弃她们几千年来所遭受的歧视。这部分群众，昨天还是简单的客体，今天正在逐步成为塑造未来进程的主体。

这种其规模难以估计的现象已经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爱德华·卡德尔尖锐地觉察到了。他逝世前不久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党刊《再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一种特殊的群众运动在崛起，群众要求成为社会中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主体。他们日益强大的压力一方面表现在要求各政党和议会施加更大的影响，同样要求议会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限制资本在议会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在要求采取工人、其他劳动人民和农民的自治和直接参与形式来解决关系到他们基本生活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关系领域里，在地方自治领域里，希望实行更多的自治和权力下放……这是对当代最典型的剥夺人们管理社会的一切形式的进程的一种无组织的反叛。”

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群众已经有条件直接创造（就这么说吧）历史，而无需任何形式的调节，那是错误的。

政党和其他组织，如国家和各种机构……都还是需要的。但是群众的这种新的主角作用确实提出了很特殊的问题，或者无论怎么说，把旧问题置于与以前不同的等级上了。我个人认为对左翼力量来说，这就是当代全部问题的核心。

## 第八章

### 党内危机的加剧

2月23日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在共产党内引起了相互矛盾的反应。

一方面，党的总方针，即坚持将维护民主放在首位的必要性，显然得到了肯定。2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卡里略报告了议会主要政党领导人同国王会晤的情况。他分析了军队的形势，分析了为什么国家必须建立一个不同于卡尔沃·索特洛当时正在组成的政府，为什么必须建立一个在议会和舆论界强有力的政府，因而必然是一个联合政府，他的分析获得了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

3月5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的气氛与11月中央会议时大不相同，11月的那次中央会议将1982年7月召开党的十大这个球掷到了场内。而这次中央会议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并没有引起严重的分歧。会议主要反对卡尔沃·索特洛政府向右转。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因素是工人社会党接受了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此之前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主张的。

在国际方面，卡里略坚持必须继续执行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此外，苏联人对西班牙民主的前途所表现出的完全漠不

关心的态度给人以深刻印象。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苏共二十六大，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党和解放运动都有代表参加。当西班牙议会发生劫持事件以后，他们连消息都没有报道。我们的代表罗梅罗·马林和莱昂诺尔·博尔娜奥通过一些西班牙朋友知道了这个消息，表示必须立即返回马德里。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回程，并为他们送行，但对西班牙的民主和工人力量没有任何一点声援的表示。相反，意大利共产党却将他们的一位领导人佩基奥利派到马德里来，表示他们全力声援西班牙民主力量。

卡尔沃·索特洛组阁以后提出的某些建议有可能给人以他将开始执行同左翼政党对话政策的印象。他宣布召开“经济”会议和“政治”会议。前者最后导致“全国就业协议”的制订。

“政治”会议的目的是就调整自治政策进行谈判，后来西班牙共产党和民主联盟<sup>①</sup>被排除在谈判之外。那个会议事实上使民主中间派联盟和工人社会党在自治、自治进程协调组织法，大学自治法和其他一些问题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政策。

在未遂政变造成的气氛中，政府很难拒绝旨在通过谈判解决国家最重大问题的开放性态度。但是我认为左翼在接受参与这种政策时态度过于软弱，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与此同时，右翼却通过卡尔沃·索特洛政府推行了自佛朗哥死亡以来对西班牙和民主来说可能是最消极的政治行动，即决

---

<sup>①</sup> 西班牙最右的政党。——译者



西班牙参加北约。

西班牙共产党展开了一场无疑是有力的反对参加北约的运动，工人社会党也这样做了，但不管是在国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它都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手段来阻止西班牙参加北约，而且参加的手续是在令人震惊的匆忙情况下办理的。

左翼态度的另一个非常严重的方面是默认了政府对2月23日政变责任问题所定的调子。除了关于占领议会、绑架议员和大臣、以及武装叛乱反对合法体制的行为是否应当由军事当局审理这样一个宪法和司法范围内的问题之外，对象我这样一个知情不多的旁观者来说，最叫人吃惊的是：竟然没有立即采取任何措施将罪犯从所属部队中清除出去；在议会大厅开枪扫射的民防军成员竟在几天之后继续手持冲锋枪执行其他勤务。我认为当巴塞罗那中央银行遭到袭击时，阿兰布鲁·托佩特中将讲的话很重要，他说：“银行里根本没有什么民防军；因为即使有人在进入银行之前曾经是民防军成员，但由于他本身的行为已经表明他一进入银行就不再是民防军的成员了。”

我从来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这句话只能用在中央银行事件上，而不能用在议会事件上。无论如何，事件的罪行要明显地严重得多。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使人忧虑的事实是，左翼没能也没有条件对完全让军方处置特赫罗、米兰斯和阿马达<sup>①</sup>政变案一

---

<sup>①</sup> 均为2月23日政变的首犯。——译者

事，在维护最基本的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替代方案。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主权属于人民，文官政府和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由军方追究政变责任造成了军事司法当局对新闻报道横加干预的危险，记者的许可证被收回了；甚至威胁要对一位议员起诉，因为他对军事法庭可能做出的判决表示怀疑；总之，这是向宪法颁布的基本自由权利进行威胁。

无论如何，局势中最消极的方面是无法形成一种能够变为实际政治因素的真正人民的群众性运动来支持民主。

各政党曾经为了组织示威游行进行过商谈；但都是在上层打交道。

在这方面，由于党员人数下降和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根本不能使党成为促使人民做出反应的催化剂，共产党人之间的真诚讨论本来是可以有助于扩大我们的影响的。但为此需要克服狭隘和独断专行的倾向。不幸的是，事态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议会的领袖人物中，无疑卡里略受到的威胁最大，当特赫罗指挥的民防军成员冲进议会大厅开枪扫射时，所有的议员都钻到了椅子下面，只有卡里略仍然坐在他的座位上，表现出极大的英勇气概。谁也不能企图贬低他的勇敢行为，况且几百万人看过的电视片录下了这个镜头。但是他自己甚至在讲演中都炫耀起自己行动所表现出的勇气，这确实开始引起人们反感（至少我就有这种感觉）。

与此同时，他企图诋毁我们这些不是议员的党的领导人，说我们还没有经受过这种局面。就我来说，在议会遭到绑架

的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和相当多的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守在三圣一体街总部。当知道士兵撤出勃拉多德雷依街<sup>①</sup>之后，我完全相信政变一定会失败，因此我不赞成转移党的总部。在那天晚上许多人访问了共产党总部表示了感人的声援，我记得其中有海梅·米拉耶斯，在过去反对派召开的一些会议上我同他建立了友好的联系。

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党的总书记的意见却如此片面，显得气派很小，甚至可悲。卡里略谈到了库列尔在议会的一间大厅里向电台发表的勇敢的演说，这是有道理的。可是反过来，对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整个晚上所开展的工作却只字未提，那天晚上他同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一道作为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首先同工人社会党，后来又同民主中间派联盟和人民联盟进行接触；并同“由副国务秘书主持的政府”<sup>②</sup>也进行了接触；他对当夜起草由四党签署的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进行上述工作时始终通过电话和我们守在三圣一体街总部的人保持联系。卡里略气量小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连其他报都报道了的事竟在共产党的报刊上提都不提，这就是当政变分子允许女议员离开议会时，皮拉尔·布拉沃同工人社会党女议员马丽娅·伊斯基耶多一样拒绝离开议会。

政变几天后召开了一次干部和党员大会，目的是让卡里

---

① 议会所在地的街名。——译者

② 指当时各部部长都设扣在议会，各部均由副国务秘书主持工作。——译者

略解释共产党的立场。我没能参加，因为那天下午《我们的旗帜》杂志在阿普塔奥大街的基层委员会活动地点组织一次同斯丹达尔特工厂党员交谈的会议。在我们的会议结束前，有几个同志从三圣一体街来；他们说卡里略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认为现在所有人都应该起来保卫民主，因此必须结束党的分歧和所有内部问题。他要强制行使他的权威和执行纪律。

乍看起来，这种论据似乎顺于情理。但纯粹是一种诡辩。如果一个党在社会上有影响和有吸引力，它是能够对维护民主做出贡献的，这并不是靠纪律来实现的。事实是我们正在失去影响，党内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党内所表现出来的危机的原因看法不一。在这种情况下，在代表大会之前尽可能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是不可避免的。

我在这里要提这些材料是因为我从那时开始感到卡里略在态度上从来没有那么明显地表现出由于过分自信而滋长着傲慢情绪和盛气凌人的态度。

3月9日，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再次开会，会上已经有人提出旨在扼杀党内刚刚开始讨论的明确建议。

卡里略一上来就说，特赫罗未遂政变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要考虑起草一份压缩到二十几页的决议草案，集中反映基本的政治思想；至于到目前为止准备好的文字材料可以印成小册子，作为补充材料发表，但不能要求全党都对这么长的文件进行讨论和发表意见。这个建议遭到普遍反对。当时，萨托里乌斯的态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说，把以前搞的文字材料压缩为二十几页是不可能的，可以想办法删掉一些，但

是，应该保留按照以前的设想写出来的决议草案的特点。

但是，不久当中央委员们开始就3月23日发给他们的决议草案发表书面意见的时候，再次有人提出要压缩的意见，尽管还没有提出要全部废弃这些文件，但其意图是尽可能压缩文件中对战略问题的深刻分析，要使代表大会成为一次不研究策略和组织问题的大会。

在罗梅罗·马林领导的组织部门工作的好几个人提出的建议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实际上是要求取消决议草案。这些人有些时候讲话的语气反映出一部分党的领导人对决议起草委员会有一种明显的敌对情绪。例如，安东尼奥·蒙托亚就说决议草案“太长，技术性太强”；他还说：“从这种思想出发，我建议大家考虑一下，是否宜于用更切合当前形势的标准来研究决议草案，也就是说，我们建议搞简单、明确和扼要的决议草案，使全党都了解和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现实形势和要完成那些最急迫的任务，以便应付政局，巩固自由权利和拯救民主。”

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在1981年4月12日写道：

“在这样条件下准备和召开的代表大会，既不为大多数党员所理解，也不可能在劳动者和公共舆论中产生起码的影响……为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理由，考虑到中间隔着暑假，教皇十月访问西班牙等情况，我主张应该将十大推迟到十一月中旬或十一月底。

“最后我要说明我对决议起草委员会很少甚至不向中央委员会提供有关的工作情况表示不满。”

梅尔克西德尔·罗德里格斯的意见是这样的：“尽管我承

认这些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我认为现在不是时候,并且有些做法也不适宜,因为:(一)关于代表大会应当举行的形式和日期,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很特殊的和十分激动人心的。全党同志和西班牙人民首先盼望党提出有关阻止新政变危险可能性的方针。(二)我认为对党内同志们的条件考虑不够,如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修养和他们有可能支配的时间等等。(三)决议草案篇幅之长和所用的语言都同现实情况不相符合。”

马利亚诺·费尔南德斯·桑切斯(人们一般叫他福斯蒂)提出了如下的意见:“准备一个供全党讨论的决议草案或报告。内容:拯救民主。政治方面的替代方案(在恐怖主义和自治问题上)。经济方面的替代方案。失业问题上的替代方案。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象我们现在这样规模的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对已经起草出来的这些决议草案进行讨论的。它们篇幅太长,技术性太强,多数党员看不懂。”

卢西亚·加西亚表示了如下的意见:“我记得当初讲的是要搞一个短小精干和具体的草案,但我看结果恰恰完全相反。”

人们可以看出,尽管签署的名字不同,但意见都如出一辙:都是由卡里略和马林领导的党的机关的意见。我认为在这里重提这些意见是有益的,因为事实上这些同志目前在共产党内还继续担负着重要的职务:卢西亚·加西亚和福斯蒂在198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受书记处的委托充当了清洗萨拉曼卡省委的“直接负责人”;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进入了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的最高层;梅尔克西德尔·罗德里格斯

现在是纪律监察委员会的书记，也正是他负责把 委员会的意见书寄给我。

不管怎样，根据这些人所采取的立场，我开始相当清楚地看到，十大有可能成为同我的想法截然相反的大会。我以为必不可少的是：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进攻予以坚决反击；为进一步深化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本身所包含的变革思想而进行认真努力，尽管欧洲共产主义这类名词往往含意不清；革新和克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过时的方面。这是不能用“整肃队伍”的办法来实现的。而这恰恰就是那些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建议“压缩决议草案”的中央委员们要想达到的。

我不可能在这么几页书中对我提到的那几个月里西班牙共产党内发生的事情做完整的“历史记载”。我只是谈我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它们在我思想上引起的反应。然而，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谈一谈在马德里之外发生的一些事，对这些事情我只是耳闻，但对我的观点有不小的影响。

在《我们的旗帜》编辑部，我认识一位巴伦西亚的青年哲学教师，叫埃纳斯特·加西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理论修养的基础很扎实，具有无可争辩的阐述和讲解能力，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有关列宁主义、自治和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性质等方面的讨论中，他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在党的力量上升时期，当时党从巴伦西亚左翼中吸收了新的力量，在巴伦西亚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扎下了根子。而当时帕洛马雷斯（曾以忘我的工作 and 藐视佛朗哥警察酷刑的勇敢精神在一个时期里成为共产主义的化身）的传统工作方法同上述新发展提出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埃纳斯特·加西亚以

一票领先当选为巴伦西亚大区共产党的总书记。马德里领导中的强硬派便立即和他对着干，他们依靠巴伦西亚省委的支持使他越来越无法完成大区总书记的工作。卡里略甚至利用权威把加西亚排斥出他理应参加的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而帕洛马雷斯虽然已经不是巴伦西亚大区共产党的总书记，但仍被卡里略留在常务委员会内。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逐渐形成1980年和1981年的危机事件。结果埃纳斯特·加西亚被迫辞职。何塞·加兰被选中接替他的位置。我认识加兰是在巴黎侨居的后期。他在比利时洛瓦依纳天主教大学学经济，在巴黎参加过一些会议。我过去一直认为他做事一贯很慎重，我甚至觉得他有些过分。他是个沉默和平庸的人，善于迎合人意，左右逢源对谁也不得罪。我认为让加兰替代埃纳斯特是不正常的，在一个共产党有较大影响、拥有较多党员和选票的地区里，最高领导职务竟落到一个唯命是从的庸人手里。看到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忧虑。

对于我来说，从安达卢西亚传来的消息更为严重。在开始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在那里原来多少处于潜伏状态的一系列个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一下子激化了。具体来讲，在塞维利亚就是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以有“列宁主义者”名声的波斯哥为首的省委，这个省委同人民和农村群众有较多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支持费尔南多·索托的市委。我认识索托已久，他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坐过牢。他作为中央委员和执行委员，经常参加我们在巴黎召开的会议。他在分析事物时思想敏捷，政治上考虑问题很细致，颇使我钦佩。后来我又认识了安达卢西亚的一些共产党知识分子，如



安帕罗·鲁比阿列斯，佩雷斯·罗约兄弟等，他们都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不管怎么说，波斯哥和索托之间发生的冲突使索托十分消沉，乃至辞去安达卢西亚大区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结果费利佩·阿尔卡拉斯当选接替了索托，当时阿尔卡拉斯是哈恩省委书记。我听了这个消息后，象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一样。怎么能想象象阿尔卡拉斯这样的人能领导得了安达卢西亚共产党呢？我同他在哈恩的一些集会上打过一点交道，给我的印象是这个人没有个性，他原来是一个学院的教师，但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却毫无成就，显然是个无所作为的人。但是足以弥补他的短处的则是他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最主要的是，他的思想同欧洲共产主义相处甚远，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在苏联问题上，他总是跟着人跑，受党内最正统的教条主义者的影响。他曾经给书记处写信指控我“反苏”，这与下面一事相比当然是小事一桩。他比较严重的是1980年12月18日在《工人世界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超欧洲共产主义：几点半开玩笑的解释》。这事恰恰发生在欧洲共产主义受到大量攻击的时候，并导致两个星期之后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定。除了谈到其他的一些事情之外，他在文章中说，“关于反苏主义是小题大做，把稻草当成了大梁。”这样的人既在具有决定性的岗位上，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党执行的路线越来越自相矛盾：筹备夏天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基础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政策；却又把根本不倾向于这种思想的人提拔到关键的岗位上来。

## 第九章

### 知识分子为什么退党

党内危机对我打击最直接的是知识分子的离散。那些退党的大学教师、律师和医生都是我在秘密工作时期认识的，当时他们热情地工作，并给我们这些侨居巴黎的人带来国内的“空气”。

我从1965年起负责过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那时情况十分困难，要整顿因开除克劳丁和森普龙而造成的局面。但换而言之，当时总的形势是处于一个人心沸腾的时期，大学和知识界的革命情绪高涨，后来特别是在巴黎导致1968年的运动。

我觉得当时尽管处在秘密工作时期，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同党的领导之间还是建立了相当直接的关系。巴黎的咖啡馆数不胜数，我们在其中的某一家进行个人之间的谈话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之久，这样的情况很多。根据我的经验，这种会晤不仅对解释“政治路线”而且对说明什么是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党都有极大的好处。有时，卡里略或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参加这种会晤。此外，也组织某种专业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小组进行一些集体性的会议。这种会晤要复杂得多，我们往往是利用共产党执政的地区，尤其是在

巴黎北部的文化之家和老年人居住区举行。

在这方面最有积极意义的大概是每年至少在夏天组织一次为期一、两个星期的学生党员会议或学习班。十分放手地讨论总的政治路线，同时也讨论党在各大学的工作经验。最后几天，大学生们起草出一个决议，交付大家一起讨论，以此作为下一个学期的指导方针。当时我们大学生的组织很有力量，有好几百人。当我开始搞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些大学生组织的活动不归各地党委管。这些组织同各个城市党组织结合的过程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不仅增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数量，而且使党组织更加广泛地深入到社会里面去。

在党的领导干部、国外侨民和国内知识分子之间共同进行工作的另一个非常丰富的经验是起草文件和写书。1965年塔马梅斯建议写一本书，作为对佛朗哥政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回答，并为西班牙的发展提出一项具有社会主义前景的民主替代方案。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塔马梅斯在经济界的一些朋友也参加了。卡里略，托马斯·加西亚和其他一些领导成员都参加了为这项工作召开的紧张会议。在巴黎我们建立了一个“埃布罗”出版社，以便出版这类西班牙文书，同时也出版其他一些文学书籍。那本书在1967年的头几个月就问世了，在巴黎用西班牙文出版，由卡里略写序言。当然作者们都没有署名，然而也不难猜到他们是哪些人：书里有几段的文字同塔马梅斯署名在西班牙出版的书中的提法几乎完全相同。出版的这本书比原来的计划还要庞大，有300多页，最后一部分直接涉及政治问题，提出建立国家民主组织的建议。书的标题是：《西班牙的未来：政治和经济民

主》。

在那个时期，还通过我领导的《现实》杂志开始打破西班牙国内知识分子党员的活动不为人知的情况。《现实》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西班牙国内知识分子和侨居国外的著名共产党领导人的署名。这还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开始时还有些害怕，但是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了。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进展，因为这有助于建立“自由论坛”以传播革命新思想。

我这里讲的只是我直接参加的工作的一些方面。但显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在国内的工作，特别是在几个城市中进行的工作，例如，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建立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在这些阶层中开展广泛的民主运动，依靠职业学校打乱了长枪党的官方组织体系（在大学里，先成立“学生会”，后来又成立了“大学生专业协会”）。

显然，我们反独裁、为自由而斗争本身的内容十分有利于使广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出于政治、思想甚至道德原因涌入党内。

这个过程对于制订有关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动力的新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这种理论是同列宁主义论点的一次决裂，尽管我们并不这样说。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本书的序言里，圣地亚哥·卡里略写了下面几段话：

“西班牙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劳动力量同文化力量的联盟，尽管还是非正式的而且只具有雏型。

“对于正在发生的变革来说，这个联盟已经是一个起鼓舞作用的因素。

“这个联盟在反对佛朗哥主义的行动中是一个最积极的

因素。它对争取自由权利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的前景远不止此。如果这个联盟的成员意识到自己的作用，那么这个联盟可以成为唯一的政治社会形式，在民主地取得政权以后就将有条件通过民主的办法实现经济和政治的民主，并经过漫长的进程之后，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劳动与科学今天已是变革社会的两大力量，并势必日益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的观念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班牙现实要求的基础之上的。

“从这个今天业已开始建立的联盟出发，有可能产生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实现西班牙需要的深刻革命。”

也就是说，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来取代列宁关于以“**工农联盟**”为社会主义革命基础的理论（后来所有的共产党都把它写进纲领），并把它作为在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里应当着重指出，这是卡里略在1968年5月巴黎风暴发生的一年半之前写的。这一提法并不是把农民撇除在外，但确实是把重点放在一个新的现象上。

西班牙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理解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能发挥的新的革命作用方面要比其他欧洲共产党先进得多，我认为这样说并不言过其实。

我们应该记得当时法国共产党对这些新现象如此迷惑不解，以致马歇在《人道报》的一篇文章中竟把1968年同“戴高乐的”国家镇压机器对峙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称之

为“小帮派”。唯一持不同态度的共产党领导人是罗·加罗迪，他不久就被开除出党了。继巴黎5月风暴之后出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的浪潮甚至使意大利共产党也感到十分惊讶。相反，1968年6月卡里略在一次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对青年和知识界的这种新态度进行了分析，他的讲话后来用《今天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作为标题公开发表了，无疑这是他写过的最有意思的文章之一。

“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这个提法本身是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即使在我们自己内部这种提法也受到猛烈的批评，尤其是几年以后在讨论《纲领宣言》时更显如此，《纲领宣言》应是共产党对有关的历史重大抉择阐明自己思想的基本文件。具体地说，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提出了一个论据很充分的修正案。当时我的意见是赞成保留这个有争议的提法，尽管承认它在理论上有不足之处。但是我认为这种提法对说明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是有好处的（比会上建议的其他许多提法更好），即由于客观原因，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正在变成一支同资本主义制度对抗的力量，并且同工人阶级一样地关心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今天还认为保留这种提法是对的。而反过来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知识界的发展进程看得过于简单了。我在有些文章中曾经把科技革命的结果理想化，低估了资本主义利用科技革命成果为自己谋利的能力……我的有些思想受到了其他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党员的批评。为此曾使我在某些阶层中有“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声，这对我这个人来说是颇不愉快的，因为我自认为我对自己的看法截然不同。但不管怎么说，那场辩论同其他争论一样，

尤其是同在《现实》杂志上，后来又在由知识分子党员在马德里出版的《科技与革命》杂志上的讨论一样，还是相当健康的，很有积极意义。

早在我 1976 年 1 月返回西班牙以前，我就全力以赴搞国际工作，不再负责知识界工作，只继续负责《现实》杂志的领导工作，当时要在西班牙发行这本杂志困难很大。

但是我之所以重提六十年代的这些事情是为了解释过渡时期开始时为什么西班牙共产党在各个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中，以及在自由职业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会有十分强大的组织，尤其是有相当大的威望和影响。一些有威望的非党知识分子出席 1976 年 7 月在罗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象征性的。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还是公开出席一个非法政党的会议，以表明对党的同情。我恰巧是在去罗马的路上侥幸与卡洛斯·帕里斯同机，座位还紧挨着，当时我们并不认识，而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次旅途中开始的。

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后，它理应巩固和发展这种影响，那么为什么在很短一个时期之后却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呢？以致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退党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人数会这么多。我发现几乎所有我在六十年代结识的学生党员或干部和自由职业者都自行退党（或者是由于受到这样或那样方式的处分）。也就是说，那些在反独裁斗争困难时期曾创建和领导很大一部分党组织的人都离党而去。只有几个人是例外：一个是帕拉，我是 1965 年开始认识他的，现在他在西班牙共产党内身居要职；另一个是恩里克·库列尔，我是很晚才认识他的，他今天也进入了最高领导层，他过去对我近乎谄媚，

如今却急转为合乎其身分的冷淡，手腕如此高明实在使我佩服

大批退党的还有那个时期街道上和工人运动中的党员干部。当然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关系，对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够清楚。但是在文化力量中，退党面之广给人印象十分深刻，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解释。但是书记处恰恰不愿意这样做，直至今日仍然如此。由新的领导班子（在我离开之后）出版的那期《我们的旗帜》就这个问题刊登的那些文章说明了这一点。

有人企图把知识分子退党说成是因为党在议会里没有取得足够的席位让他们当议员，这种解释简直在污辱人。也有人将今天的问题同第二共和国发生的情况虚伪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但关键的是今天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作用同三十年代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方面没引起人们很好的注意。至于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想利用这本书来纠正这个将被遗忘和不公正的方面。无疑，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退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延续的时间很长。但是，特别是在1980年和1981年，知识分子党员为了让人们了解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想法，对使人无法忍受的局面提出解决办法，他们在党内进行了斗争。我们不应当去臆造或想象这部分人退党的原因。只要我们听听他们讲什么，问题就一目了然，十分清楚了。

我们还记得，从1976年起，党内由律师、教师、医生、记者、建筑师、工程师等人组织起来的基层委员会就解散了。党



的组织改为“按地区建立”，每个党员必须在他居住的街道基层委员会参加活动。然而，由于我们党在那部分人中工作受挫这件事造成的压力，使省委不得不同意召开知识分子党员的特别会议，这样的事至少有两次。

1980年11月，在塞维利亚召开了这样一次会议。在会上供讨论用的文件中谈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在某些对全体人民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思想性质的问题上，党不善于发动政治攻势，对面临的挑战作出回答。

“而另一方面在组织方面，则由于对政党同群众运动的关系不理解或者缺乏深入理解，使许多按地区建立的基层委员会毫无生气，从而致使象居民协会、学生家长协会、文化协会等群众运动本身也变得没有生气了。

“我们不应忘记西班牙民主进程的领导权和节奏还带有那曾经支撑过佛朗哥政权的寡头势力的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纠正以前对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性质以及它同上述寡头关系的性质的分析。如果那时我们认为民主中间派联盟是一个与寡头有着明显区别的党的话，那么今天显然就会抛弃这种提法。

“我们对共产党人替代方案的思想内容问题看法不一致。从这方面最感到我们缺乏开展政治活动的动力。我们不去坚持或没有讲明什么是我们的依据，因为这样有可能出现表面上使我们变成政治经纪人，而又不很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市政府？我们为西班牙人提出了什么样的人道的、社会的、文化的和道德的替代方案呢？我们为什么说要改变经济结构呢？总而言之，**西班牙共产党存在的**

理由是什么？这种意识形态的、道德的、乃至人道的因素在独裁时期使许多男男女女参加到党内来，在当前这个充满了混乱、机会主义和思想毒化的时刻，我们应该加强象我们这样的政党的实质性作用。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为了反对佛朗哥主义而存在的党。我们是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党，那么要解决为什么原因，为什么目的，和同谁一起干的问题。

“政治先于文化一直是反对佛朗哥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悲剧。过渡时期的政策，寻求协商一致和制度化的做法，也即由各政党的机构、政策“专家”和这些政党领导的执行机构去搞政治活动的做法，使得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过渡时期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受到操纵或利用，总之同政治脱节并最终同群众脱离。

“这种政治与文化、政治与伦理相互脱节的现象，使许多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被搁置在一边，意味着左翼的政党有时变成进行政治活动和管理事务的行政机器。

“最后，还要指出在许多党员甚至共产党组织的态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问题，这就是某种为自己辩解的态度，尽管表面上表现得象是先锋队一样，这也是一种行会主义的态度。这是一种倾向于保存某些工团主义和小圈子主义的价值观念的态度，加强了不利于团结的宗派主义的倾向。

“我们在最近几年中搞的政治活动，使我们党变成了一个‘消防队性质’的党，关心的是眼前的前景而没有长远的展望。今天必须克服由于策略主义而产生的毛病，从而使我们对革命过程有一个全面的、经过理论加工的观点，赋予欧洲共产主义以内容。我们可以说，欧洲共产主义只具有一个框架，白布

上还有待于描绘出图画来。

“我们在九大形式上抛弃了‘列宁主义’的提法，但是我们应当自问，我们是否继续受到列宁主义理论某些方面的束缚，这些东西恰恰使某些共产党变得官僚化，搞新斯大林主义。

“无疑，在党内进行政治和组织革新的工作会遭到抵制和碰到逆境，使党的灵活性和自我批评的能力遇到考验。但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连我们之间的争论都容纳不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成为劳动者、被歧视和被压迫者的希望，我们将很快变成一种受人尊重的古董，或者更糟糕的是变成开展阶级斗争的障碍，而阶级斗争却仍将存在下去。”

时间已经证实那些塞维利亚的共产党人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政策的某些决定性方面的批评是正确的。

不久，1981年1月，马德里省委和中央文化委员会（分别由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和何塞·桑多瓦尔署名）决定召开第一届“马德里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党员大会”。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丹尼尔·拉卡列和桑多瓦尔手下其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会议的召开是突然的。供讨论用的文件十分糟糕。安东尼奥·埃洛尔萨教授为此很生气地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些段落有必要提一下：

“除了形式问题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隐含着非好即坏的二者必择其一的观点，使我们无法对现实作起码的分析。我们不久会悔恨的，因为党的‘基层’表现出亲苏倾向，有可能这是一种密谋的结果。党的领导人是否注意到，在这么多革出教门的案件中在文件里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不作起码的批评，党的领导是否注意到在第16页灵机

一动提出‘轻轻松松’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议时，把对它的障碍说成是‘从西方体制向马克思主义渗透的唯生产率论’？这种‘西方体制’当然不会向波诺马廖夫渗透，他应该是十分‘轻松’的了。

“这个文件标志着不可容忍地从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论点后退。有人可能考虑这种泛泛的提法和组织性质的建议最后至多是无害地重申党的文化政策的旧提法。但是不然，作为革新而提出来的恰恰是取消西班牙共产党政策中迄今为止带有定义性的关键提法，即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的提法（尽管在执行中，它还有种种模糊的方面），既然不知道如何予以充分的发展，那么最好是将它作为小圈子主义的东西取消掉算了。这就是由于不知道怎样挤奶就把奶牛杀掉的故事。

“这是干脆利索地回到传统的工团主义，并随之回到把党在提出全国和解之前的旧文献中所讲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当成工具来利用。于是提出什么知识分子（对不起，应该是劳动知识分子）、体力劳动者、我国人民中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正走向社会解放的道路……以及走向加强国际主义的、合作的和团结的精神的道路，它将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完成打败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伟大任务。我认为从第24页上最后一段抄过来的这个美好目标，使进一步加深对建议的思想内容的探讨变得没有必要了。这样做同欧洲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回答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尽管会议是在很匆促的情况下召开的，但还是有很多党员来参加。我也参加了1月23日星期五在三圣一体街总部最底层的白色大厅里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气氛有些

紧张。我和胡利奥·塞古拉一起坐在后面。在主席台上坐着桑多瓦尔和西蒙，他们都很严肃和紧张，当然还有省委的其他人，但我已记不得了。

欧洲共产主义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大上遭到的失败还余波未消。第一次会议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一方面某些教条主义分子用间接方式表示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大同情的企图，完全遭到了失败。但是更主要的是海梅·萨托里乌斯的发言。他并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刚刚重建的律师基层委员会的名义发的言，他念了一份有重大意义的发言稿。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全文附在这本书里。<sup>①</sup>

我听了以后，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它帮助我进一步看清我凭直觉了解的东西。海梅·萨托里乌斯讲话坚定、沉着，博得了极其热烈的掌声。会议结束时，我走近他，向他祝贺。我要了他的讲话稿。我以前就认识他，但可能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同他在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

第一天开过全体会议之后，星期六分成两个重要的小组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研究“党内知识分子在组织上扎根问题”，小组会上讨论了律师们提出的主张。参加的人数超过250人。讨论非常活跃。最后以132票赞成，16票反对，16票弃权通过了海梅·萨托里乌斯的建议，只是形式上做了些变动。提反对票的16个人主要是三圣一体街行政机构的人员。

---

<sup>①</sup> 见附件一。

另外一个重要的小组委员会有 40 人左右参加，主要讨论理论问题。在这个小组里，集中讨论“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问题。丹尼尔·拉卡列在何塞·马丽亚·拉索的支持下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中含有取消欧洲共产主义的意思，当然不是公开退到苏联的理论上去，但是却明显地退到法国共产党的提法。何塞·马丽亚·拉索是应党的领导之邀特地从阿斯图里亚斯赶来参加马德里的这次会议的。

胡利奥·塞古拉、米盖尔·比勒瓦杜阿和我本人以及相当多的与会者，同上述立场展开了斗争。拉卡列和拉索受到孤立。比勒瓦杜阿被推举在星期日上午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代表该小组委员会发言。他在发言中很好地讲清了问题的实质。他指出：

“从讨论一开始，我们可以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极端：有人认为应当取消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的概念；有的人则认为有必要加深这个概念，把现时正在发展的新的社会运动也包括进去。”

他还补充说：“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的提法在六十年代意味着丰富我们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克服了工农联盟传统观念的局限性，把那时在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间出现的现象也结合进去。

“当前，在八十年代开始的时候，还应该把新的社会运动结合进去，包括女权运动、生态学运动、城市运动、青年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等等。这也就是说，要同社会变革进程没有直接经济关系的运动结合起来。

“同这些社会运动要求变革的性质同时存在的，是它们属

于一定阶层的局限性。他们分开来单独搞活动是不可能对制度发生什么影响的，这就必须同进步的社会集团结合在一起。作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进步社会集团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由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决定的辩证统一体，一切关心社会变革设想的阶层都会有代表参加。”

星期天上午闭幕会在听取了各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之后，圣地亚哥·卡里略讲了话。有关总的政治形势的第一部分是有点意思的，但是接着完全是谈党内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问题，事实上同首先由律师提出来的、后来又得到多数通过的立场发生了论争。他重弹老调，说不能搞一个“工人的党”，再搞一个“知识分子的党”，以此来驳斥其实谁也未曾建议过的东西，然而却可以用来对下面这样一个必要的建议进行臆造和诋毁，这个建议认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党员必须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组织，否则党要想在市民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中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当我走出三圣一体街的会议厅时，周围的气氛使我察觉到有一些人感到失望；另一些人则感到愤怒；普遍的议论是“他不了解情况，也不想了解情况”，事实上，那次大会会有一个很具体的结果，即表明西班牙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根本不准备就文化界的党员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进行讨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次大会加速了业已出现的退党趋势。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提出了为维护他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而寻求其他道路的急迫性。

几天之后，我同卡里略进行了一次私下交谈。我对他说，我认为他在大会演说的后一部分是消极的。我当时大概是这样讲的：“你干嘛要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呢？这些还属于我们

应该思考和心平气和地讨论的问题，以便摆脱显然是很糟糕的局面。”他的回答非常生硬和干脆，他说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需要制止大会上反映出来的一种“反党”情绪，说他确信在他演说中讲到的是最好的道路。

我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说，在理论问题小组委员会上，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教条主义攻击的恰恰是那些书记处委托筹备会议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旗帜》编辑部的一部分成员的努力才击败了他们的进攻。对此他说，他认为我们做的是对的，但是他原来没有注意这些问题。总之，那次谈话是在我们关系已经相当冷淡之后进行的。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仍在说要对知识分子退党和脱党的原因进行调查。这明显地表明是虚伪的。在塞维利亚文件和马德里的会议之后，原因已经很清楚了。

我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理论杂志《马克思主义批判》最近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对进一步思考我们这里发生的进程是非常切中要害的①：

“政治活动面临着以言辞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同以现象表现出来的文化调和在一起的艰巨任务，如果以言辞表现出来的文化同以现象表现出来的文化之间的距离拉长，那么现行的政策有可能只具有毫无用处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些形式并不决定对现实进行预想的变革，虽然政策本身并不就此不成为政策。这样就出现了文化领域的阶层化，政治的活动被

---

① 卡洛·贝尔纳迪尼：《知识分子和政策》，载《马克思主义批判》1982年1月号第31页。



分解了：一方面它接受纲领，以取得‘空头’的意见一致，即只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意见一致；而另一方面，则会由于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日益冒同自己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危险。”

对一个将自己禁锢在“以言辞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中的党来说，政治上一出现不同意见，就会使那些没有组织机构来进行有效讨论的知识分子党员的问题尖锐化。因为这种不同意见是与他们的专业活动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二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求按职业重新建立基层委员会，这种形式的组织曾经发挥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就这样到达第三个阶段，实践证明在党内不可能开展一场民主的讨论。各级委员会都企图躲避或操纵事物，采取排斥知识分子的态度，而鼓励工团主义和反知识分子的尚古主义。

所有这些逐渐地使在参加党组织时所想象的党同实际上存在的党之间出现了天壤之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观念上也如此。

我深信还有必要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各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是任何一种撇开我在上面提到的“政治根源”及其后果的解释，则都将是站不住脚的。

在应当考虑的其他因素中，还包括西班牙共产党理论工作方面的弱点。一是有弱点；二是轻视理论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将这一弱点归于历史原因，是因为西班牙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文化水平相当低，工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种情况。确实，“盖德主义”（法国社会主义理论中最贫穷的思

潮)对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和工人社会党的奠基人起着带根本性的影响。在西班牙既没有出过象拉布里奥拉这样的人物,也没有出过象葛兰西这样的人物。

但是根基的落后还不足以解释全部问题。另一方面,侨居国外也为我们创造有利条件来开始克服我们在理论上的不足。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侨居国外迫使人们必须多方面看问题,同眼前的现象保持距离,促使人们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不断进行比较。

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开始出现了理论上开放的征兆,反映在例如进步的天主教徒向西班牙共产党靠拢的进程中;研究工会运动新特点的问题;克服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意识形态残余的问题上;以及“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的理论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辩论中。这种理论上的开放尽管还微不足道,但它有助于知识分子在佛朗哥死前的这个阶段和过渡阶段的初期加入我们的党。

我们应当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后来的一个时期里,人们把理论工作置之脑后,几乎完全不予重视呢?这里我们暂且不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旗帜》所做的微薄的努力。

我们不应对发展理论工作的困难,包括客观的障碍视而不见,这是以工人为大多数的共产党本身的社会组成造成的。文化水平的差别和劳动的社会分工是不能抹煞的现实。如果有适合的气氛,这种差别可以发挥丰富思想的作用;但是也可以成为疑虑与沮丧的根源。如果领导没有明确的方针,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动摇。

我认为西班牙共产党在1977年大选受挫以后,很多领导

人多少都有以下的反应：下一次我们争取的选票应来自投了工人社会党票的几百万工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工人委员会<sup>①</sup>的成员）。因此，为了这个目的，应当把我们在工人中的形象放在第一位，至于其他人，至于知识分子，情况更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

这一方针没有在任何领导机关中进行过讨论，至少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讨论。更确切的说，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是由从党的最高层开始起很多领导人之间酝酿的一种气氛。

从实质上说，这意味着同时陷于工团主义和竞选第一主义。但选民总是要报复的，1979年大选在候选名单中把工人委员会中的党员放在第一位，但争取到的选票很有限。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使党内工团主义思潮通行无阻，甚至受到鼓励，关于这种思潮我们已在本书中多次例举了。

除此之外，竞选主义失算的原因还在于工人本身并没有工团主义和反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人们已经意识到而且越来越意识到，若没有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那么就不可能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包括进行一场有成效的阶级斗争。现代的革命工人运动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态度。我是指例如象西班牙的卡马乔，意大利的拉马和特伦丁以及法国的莫瓦诺这样的人。

工团主义的根源是官僚政治和党的官僚作风，当没有能力克服“用盲辞表现出来的文化”的局限性以及不能对别人提出的论据和批评做出回答时，就求助虚假的阶级手段和感情

---

<sup>①</sup> 工人委员会系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译者

用事的手段来说服或诋毁对方。

这种官僚作风需要和推崇的是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在专业上成就辉煌，而在涉及政治时，凡是领导说的都能接受，甚至认为他们应当“服从”。这就象佩佩·奥尔特加那幅关于“二·二三”政变的画那样产生使人反感的后果。但是，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今天正趋于消失，因为政治无孔不入，甚至已渗透到私生活中去了。在文化科学界更是如此，知识分子党员或自由职业者党员越来越希望和需要在制定党的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

## 第十章

### 《我们的旗帜》和所谓的 革新派“小集团”

1980年11月8日，《我们的旗帜》编辑部开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关于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研究党刊应为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做出什么贡献。我们这些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们解释了会上发生的事情。普遍的看法是一方面认为为使党员的所有批评意见得到讨论，必须进行一场光明正大的，没有忌讳的公开讨论。另一方面认为为制定欧洲共产主义的方针，以及使这一方针对西班牙社会发生影响，就要求对党在过渡时期做过的事进行批评性的分析。经济大学教授何塞·路易斯·马洛说，必须提出中期的主张；克服只顾眼前的做法；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联系起来。阿尔维托·因方特是医生，马德里省委委员，负责培养党员的工作，他强调必须关心党同市政委员，党同社会运动的关系。总之要关心党在社会上的必要影响，避免一般化和“说大话”，要提出方案和能动员群众解决问题。丹尼尔·伊里瓦尔讲到必须反对“先由上层讨论”，然后“全党执行”的思想。在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方面，必须加强党内对工作方法和思想进行革新的斗争。

这次讨论是广泛的，有时气氛还有些紧张，主要是在以下问题上：批评轻点还是严重点；我们的注意力应集中在什么问题，当我们显然面临着一场由“组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同罗梅罗·马林一起工作的福斯蒂、阿图罗和梅尔克西德尔·罗德里格斯等同志组成的）鼓动，从而贬低党刊的信誉和降低销售量的有计划的运动时，我们应该怎样扩大我们的宣传和影响。但是，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当前马上要做的是发表一篇社论，反映要求进行最开放的讨论的愿望；并指出在我们看来这次代表大会准备工作应该集中围绕哪些观点进行。我们委托胡利奥·塞古拉起草了社论的第一稿，然后复印出来，再开会讨论。大家在意见根本一致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意见。胡利奥进行了修改。这篇社论也许是《我们的旗帜》编辑部集体劳动最明显的结果。

文章发表在1980年12月号上，但由于节日，理所当然推迟到1月份才发行；标题为《走向第十次代表大会》。

有必要节录几段，以后我们再谈这种必要性。

“正如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在很多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十大的目标之一应该是再次肯定和进一步发展欧洲共产主义，尽管这次采取的方式同九大不同。就我们的意见而言，既不是要给西班牙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重新下定义，不是强调纯意识形态的方面，也不是要把我们的战果当成当前社会经济危机的替代方案，绘制出我们对市民社会的设想，以及分析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同那些往往不恰当地被称之为“附属性”的社会运动的关系。总的来说，是要提出近期和长期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方案，提出西班牙共产党人对日

前危机的回答,要讲明不存在对基本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法,我们的替代方案要置于长时期的远景中,在这一前景中最根本的是将解决日常问题的具体行动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步战略结合起来。只有谨慎地确定我们的战略,才能避免过去发生的日常政治实践和各种情况下所执行的联盟政策同我们对市民社会设想之间的矛盾。

“光有最好的战略,最好的解决危机的进步的替代方案,最好的关于市民社会的设想,而不拥有使之付诸实践的方法和手段,那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有能力在各个时期正确贯彻最适合的政治路线,有能力制定替代方案,让所有党员都参加集体讨论并感觉到自己是政治行动的主角的党,那是不够的。我们认为这个方面表明第十次代表大会第二个最大的注意中心应该是:争取使党完全具有能力在我们的社会里沿着进步的变革路线前进。在一个象我们这样复杂的、庞大的、组织很严谨的党里,涉及到的方面很多,问题也不少。在决定召开十大的中央全会上,强调了其中三个问题:党员的普遍性问题,西班牙共产党适应西班牙的地方自治问题和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

关于党员问题,社论概要地说:

“我们认为,尽管了解领导路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基层组织的政治工作也不是把这个路线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而是要使党的路线适合形势和党员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包括劳动地点,街道和居民协会等)提出的具体问题。总之,党缺少在政治方面有创见性的内部讨论,缺乏由上至下的联系渠道,而由上而下的联系方法也严重不足。”

关于同实行地方自治的西班牙相适应的问题，我们是这样写的：

“一个极端是把党建成各个地方的联邦组织，我们认为这是消极的，另一个极端是建成中央集权和统得过死的党，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幅度很大的可能性。”

我们在社论的最后一部分说：

“第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从中央委员会到总书记都存在问题。从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所有的机构都暴露出不足和明显的缺陷。中央委员会很少开会讨论，并且几乎总是在情况通报不足或开会方法不太有效的情况下进行讨论的（先做报告，然后只有一个人讲话，最后做总结）。在很多情况下，执行委员会只不过是准备召开次数有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不得不承担越来越超出党章规定的职能。由于党章对总书记的职权做了不适当的具体规定，因此，总书记除真正政治上的职权外，还要承担会议和组织方面的职权，甚至日常的管理工作。

“这里既不是要提出解决办法，也不是要指出所有这些组织问题实质上都是政治问题，中央领导机构职能的任何修改都应是政治讨论的结果。不仅要讨论已经察觉的缺点，而且主要讨论最适合于发展九大所确定的党的机构的类型，那种认为组织问题是技术性的官僚机构性质问题的看法是很危险的。因为鉴于前面已经列举的理由，我们认为，组织问题是处于关于我们今后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政治讨论的中心。



“同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讨论中还涉及到革新还是延续的问题。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不明确的，通常是以不恰当的方式提出来的。首先，必须弄清不应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出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而是相反，应该提出什么样同志最合适执行十大政治路线和巩固九大确定的党的性质。这不纯粹是一个机械的年龄问题，尽管西班牙共产党的年龄构成从40岁到55岁之间存在一个缺口，在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之间平均年龄相差很大。这也是‘老一代’领导人与‘新一代’领导人之间的问题，实质上，这是一个八十年代所需要的党的领导班子的问题。”

“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认为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如果对自治问题的危机和社会面临的危机提出具体的战略性替代方案，有能力在党内生活中建立开展批评的方式，使党的政治路线适应日常活动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调整中央领导机构，并且使西班牙共产党同经济现实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能选出最合适的领导班子来建设一个九大所确定的那种类型的党，那么我们就能够克服危机，就能够沿着一条进步的路线前进，总之，能够成为一个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必要变革的党。”

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三圣一体街我的办公室里工作，电话铃响了，传来圣地亚哥暴怒的声音：“你看过《我们的旗帜》最近一期社论吗？”

我回答说：“当然，这是我们整个编辑部讨论通过的。”

“真是胡闹！你们是怎么想的？简直是卑鄙！”

我记得不很确切他当时对我的辱骂，但我记得他在那里吼叫，我当时想，这声音到底是从电话线里听到的，还是从楼梯上传来的，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下面一层附近同一个位置。

我下楼继续同他进行当面交谈。他怒气冲冲，开始向我尖叫，态度十分粗暴。当然这是我同他进行过的最激烈的一次谈话。我不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因为我还记得他同利斯特尔之间的几次争吵，这是利里斯特尔被开除出党之前，在巴黎召开的执行委员会上他毫无顾忌的大吵。

但他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当然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我对他说（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这篇社论只不过是总结了大家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过的东西，包括卡里略本人说过的东西时，他火气更大了。他回答我说，我讲这些是厚颜无耻。

我们谈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我一再坚持，但无法使卡里略确切地讲出社论中那些具体句子引起他发怒。结果事态朝着另外一个方面发展，他从这件具体事情出发，扩大对我的指责：说我把《我们的旗帜》编辑部变成了反对党的政策和反对党的领导的“中心”。他说他知道在编辑部开会讲了什么，社论反映出了这种系统攻击和批判党的领导的气氛。

编辑部每星期在六层楼召开一次会议，我的办公室也在这一层。由于抽烟的人很多，所以门总是开着。如果人们知道我们谈论的内容，那我并不感到奇怪，也不为此担心。会上提出过批评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禁止批评吗？把这说成是有系统的攻击党的政策，那是不对的，在全党可能还没有一个更坚强、更有能力的集体在捍卫和发展欧洲共产主义。

我讲的理由一点用处也没有。卡里略一次对我说，他失去了对我的信任。我说，既然如此，还是有办法来解除我的职务的。但这样做不仅影响了党刊，而且影响到我负责的国际政策工作。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撤我的职，不管怎样，这样的措施有着非常清楚的政治含意。

他回答说，问题并不是这样，以前当有人在国际问题上攻击我时，他曾经维护过我，他提到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但在党的问题上他已经不能信任我。《我们的旗帜》编辑部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他还一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说在我共产党人的生涯中，曾经有过几次动摇。于是轮到我愤怒了。我请他举出具体事情，否则，就收回他讲的话。我记得在我的一生中曾经遇到过一系列的事情，我总是把共产党人的责任放在首位，我认为没有必要提醒他这些事。他没有答复。

关于《我们的旗帜》，我说，作为社长我不打算撤掉编委会中任何人。这是一个工作得不错的集体。卡里略过去责备我说，我们过于把自己关在文化界的圈子里，我当时承认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在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正是为了克服这种狭隘性而采取了步骤，我们吸收阿道夫·皮涅多参加编辑部，尽管他不常出席编辑部的会议。他那时是工人委员会五金工会联合会书记。我们并且用更多的篇幅来讨论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说若撤销我社长的职务，应该由中央委员会作决定。

在谈话中圣地亚哥谈到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对领导的这种批评态度（实际上说的是对他的批评态度）只会获得帮助亲苏派的结果。苏联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过攻击。在党的基

层亲苏的感情还是很强烈的。不管我们的意图如何，结果还是配合苏联人。我对他说，我并没有低估苏联的攻击，与此相反，我是少数毫不隐讳地谈这个问题的人。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在党内开辟合情合理批评的机会，甚至为了使欧洲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也应该这么做。不管怎样，我向来反对苏联干涉党的独立和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的任何企图。

谈到后来，气氛和缓了一些。卡里略说，他认为编辑部至少有必要吸收两、三个新的同志去工作。我对他说，关于这个问题随时听候他的安排，原则上讲是这样，因为还要看向我推荐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补充说，我将把他的意见和关于编辑部增加新成员的建议，向编辑委员会报告，因为我们的集体性是很强的，社论是共同起草的，我肯定大家对另外派同志参加编辑部的工作不会有意见。同时我建议卡里略同编委会的委员在一起开个会，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阐明我们关于社论和其他问题的态度。但他没有采纳这个想法。

我们的谈话最后达成一项非常具体的协议。卡里略将考虑《我们的旗帜》编辑部新成员的人选问题。我等着他通知，以便由我出面把这些建议提出来。至于其他问题我们以后再继续谈。

我请读者记住我们关于《我们的旗帜》编辑部的问题所作出的结论，因为于7月份召开的十大前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我同卡里略之间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冲突。关于这个问题等谈到此事时我再做解释。

卡里略对我粗暴的态度很快就产生了连锁反应，在三圣一体街我更明显地感到周围人们对我的冷淡。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表示他不同意这篇社论，在这之前他曾同我谈过。首先，他不同意这篇社论的内容。但他没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论战，而只是说：“我不赞成这篇有争议的文章的总的指导思想。”其次，他不赞成这样做。这篇社论对十大应该怎么开法发表的意见，只代表极少数同志（尽管这些同志可能是编委会全体或部分成员），这是一种使几个同志凌驾于全党、乃至中央委员会多数人之上的特权做法。”我们在下一期的《我们的旗帜》上刊登了这封信，并不加任何评论。但这使我感到不愉快和感到难过。

在从国内到巴黎去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党领导人中，我和海梅·巴列斯特罗斯交往比同其他任何人都深，我钦佩他判断事物的稳重和政治修养。我们俩在文化方面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兴趣，他经常到我家来。我也赞赏他的谦逊。奇怪的是，自从我回到西班牙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不管怎样，自从他被选为议员，参加了议会外事委员会的工作以来他很关心国际问题。他在很多问题上同我商量。

我后来越来越发现他倾向“领导机关派”的政策，而且卡里略说什么他也说什么，不再自己考虑问题，这使我产生了反感。他写这封信则表明他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为什么他对这篇社论不谈谈自己的想法呢？这样对讨论会有好处而不是简单地下结论。至于说编辑部利用“特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非要用这种方式来说的话，那么我们是有“特权”的。不过同样也有“义务”。编辑部就是为此面存在的。就是促进思想交流，提出看法，从而丰富党的政治和理

论生活。把这说成是“特权”乃是蛊惑人心的。因为任何党员都在委员会、报界、或其他地方担负一定的责任，都有“特权”。

但从实质上讲，卡里略和巴列斯特罗斯在对待理论刊物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一种完全传统的、陈旧的观念。当党刊取名为《我们的旗帜，西班牙共产党政治理论刊物》时，他们把这解释成为这个刊物是“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刊物”，其任务是重复、充其量是解释党的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的官方立场，或至少不发表一些使领导机构可能感到不安的文章。从一种宝塔尖的观念来讲，这样做有它的道理，在这种观念中，真理来自上面，而后逐级向下传达，领导动脑筋作决定，而由党来执行。

与此相反，在一个要使全体党员最大程度地进行参与的党内，在一个党的政策尽可能是所有人的思想和经验、至少是多数党员的思想和经验的结晶的党内，它的理论刊物必然起着十分不同的作用。党刊编辑部必须有它自己的地位和特殊性，必须提出自己的看法。当然这种看法是以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为基础的。但并不是采取机械的形式，而是要保持距离，体现出理论的特点，要涉及更加深远的理想、原则和更加长期的目标。如果理论刊物有效地实现了这种做法，则必然在特定的时候会引起党的这部分或那部分领导人的不满。但这种不满是有益的，从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它的效果是迫使人们去探索除正式文件中考虑到的之外的其他领域，使人们从其他角度去考虑问题和使问题进一步深入下去。理论刊物可以象一个开垦处女地的先锋队员那样去行动。有

时也会搞错,但是他有权力搞错。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巩固和加强革命战略的指导路线,并有助于预见和准备前进道路上的转折。

现巴黎大学教授曼努埃尔·巴列斯特罗针对对《我们的旗帜》日益加剧的攻击,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旗帜》。他从1956年起是马德里大学的党员积极分子,为了不落入警察的手里,他后来被迫移居法国。他在信中写道:

“首先使我想到的是在党刊同党的关系上,党刊居于什么位置。不应该闭口不谈在很多地方都能听到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意见的主要依据是:党刊超过了大多数党员的水平;党刊没有起到对党员的政治指导作用。我认为人们所提出的第一个理由不够扎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不过是普遍政治水平的一种反映,如果只考虑现在的政治水平,那么在思想领域中任何事业也干不成。至于人们似乎要求的那种政治指导,我认为人们把指导同说服混为一谈,把企图制定行动纲领同宣传行动纲领混为一谈。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情况下,党刊应该起到**特殊的作用**:去探索新的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开拓尚无人涉足的领域。要想实现这一点,靠四平八稳地宣传一些可以让人吞食下去而不起任何反应的、现成的、熟悉的观念是不行的。两者之间是根本不相容的。今天我们能够要求于党刊所做的指导,恰恰是这样一种必要的、根本性的指导,而对我们已经继承下来的一切纲领和思想进行审议和思考。这是在革新进程中进行的指导。这是在开拓未曾探索过的领域、问题和解决办法的过程中进行的指导。党刊应当和能够进行的指导,是**富有风险的,富有政治**

创造性的指导。在党摆脱束缚开始起航试探新的、非常新的航道时，这样做是对党员最好的教育”。

为什么对《我们的旗帜》社论反应如此过份？

1980年12月号的那篇社论并没有对后来在十大的准备工作中变得十分重要的问题表明立场。这些问题包括：承认少数派的权利，承认流派；联邦制结构的合宜性；大批党员退党造成的严重局面；以及在这个范畴内出现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个人有看法，编委会的其他人也有看法，我们决定在十大前的讨论中提出这些问题。

我得出的结论是，那篇社论之所以引起愤怒，其原因恰恰在于它使用的那种公平的、毫无顾忌的方式来提出十大上要讨论的问题，以及谈到了要看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的失误的必要性这一事实。这是一种打破传统“禁忌”的做法，而从本质上来讲这是最令人不能容忍的。

尽管根据总书记的意见对我们进行了攻击，但在1981年代表大会前的那几个月里，《我们的旗帜》确实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工作。

对我们的主要指责之一是说我们没有同工人阶级联系。在前一个阶段，也许这个批评是有些道理的。因此，指出下面这一点有重要意义，即在最近五期杂志上（在我被撤销社长职务之前），我们发表了下列文章：

报导了西班牙共产党在塔尔波特、斯坦达尔特、马尔克尼和贝加索四大工厂党组织的政治书记圆桌会议的情况。

刊登了胡利安·阿里萨写的关于工会选举的两篇文章；和恩迪纳·阿尔瓦雷斯和阿道夫·帕斯托合写的有关同一问



题的一篇文章。还刊登了阿道夫·皮涅多和胡安·莫雷诺写的一篇题为《关于企业委员会两年活动的总结》的文章。

在我们所发表的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文章中（对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要讲到），我们刊登了阿里萨的一篇题为《欧洲共产主义和工会主义》的文章。同时我们还专门搞了一本小册子《关于工会政策》作为党刊的附件，也是胡里安·阿里萨写的。

我们从来不打算让《我们的旗帜》单纯成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发表文章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了弥补我们财力的不足，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在斯坦达尔特工厂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来反映工人对各种各样问题的意见。我们已在1980年12月的《我们的旗帜》上刊登了这次测验的某些抽样测验的答复是很有代表性的，尽管其中共产党的选民占多数，这是合乎情理的，在投票人的当中，共产党的选民占36%，工人社会党的选民占30%。

有一些回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有助于打破“工人阶级”一成不变的形象，而我们共产党人却很习惯于以这种形象进行思索，特别是在我们的内部讨论中更是这样。例如，从下面这张图表中就可以反映出对政党的意见：

	很同意或相当同意		不太同意或不同意	
	工人社会党	西共	工人社会党	西共
1.基本上是一个工人的政党	47.8%	81.1%	40.2%	14%
2.只维护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而不维护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利益	24.2%	36.5%	60.1%	52.2%

(续上表)

	很同意或相当同意		不太同意或不同意	
	工人社会党	西共	工人社会党	西共
3. 对争取民主作出很大贡献	53.5%	70.8%	32.2%	18.9%
4. 真心愿意左派联合	24.3%	51.1%	61.2%	34.9%
5. 已经不是革命的政党	58.1%	46.8%	25.9%	41.5%

专门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问题，

	行政领导人员		行政技术人员		车间下级领导和工人	
	很同意或相当同意	不太同意或不同意	很同意或相当同意	不太同意或不同意	很同意或相当同意	不太同意或不同意
1. 西共继续依附于苏联	32.4%	63%	15.9%	75%	21.2%	68.2%
2. 西共由参加过内战的人领导对西共是有害的	53.5%	43%	56.8%	34.1%	43.2%	46%
3. 如果西共执政将宣布其他党非法	20.2%	76.3%	13.6%	72.8%	13.7%	75.8%
4. 欧洲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历史的深刻变化	31.3%	52.7%	40.9%	47.8%	46.2%	39.4%

如将西班牙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选民的意见分列开来，我会得到如下结果：

	工人社会党		西 共	
	很同意或相当同意	不太同意或不同意	很同意或相当同意	不太同意或不同意
1. 西共继续依附于苏联	25.0%	66.3%	11.1%	82.3%
2. 西共由参加过内战的人领导对西共是有害的	57.6%	33.7%	33.6%	60.1%
3. 如果西共执政将宣布其他党非法	16.3%	75%	7.9%	85.8%
4. 欧洲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历史的深刻变化	31.3%	43.5%	45.2%	46.9%

在斯坦达尔特工厂对西班牙、共产党员年龄的变化做了一次调查,尽管材料很不全面,但不幸是它却反映了一个很严重和很广泛的事实:党员中青年人减少,党员平均年龄增加。

这次有斯坦达尔特工厂党组织参加的有关工人阶级的考察,在党的领导中引起了反感和抗议。卡里略本人对我说,我们帮助别人歪曲党的形象;我们不应就西共是否依附苏联提出问题;不应该就参加过内战的领导人的作用是否会产生消极影响提出问题。

在十大之前出版的几期《我们的旗帜》上刊登的文章还涉及了一些其他问题,如,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大(古铁雷斯·迪亚斯,霍尔迪·博尔哈和华金·森佩雷写的几篇文章),巴斯克共产党代表大会(罗伯托·莱尔特松迪的一篇文章),关于二·二三未遂政变(费尔南德·萨瓦,迭戈·洛佩斯·卡里多和帕洛马·波尔特拉撰写的几篇文章),市政政策(关

于共产党市长圆桌会议的一篇报道，帕克利大学教授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的文章和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的文章)。在国际方面还发表了有关北约、波兰和萨尔瓦多的几篇“资料”，亚当·沙夫教授撰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特别是关于各国共产党官僚机构及其后果的一篇文章和作为附件的小册子，以及我写的一篇关于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意味着什么的文章。我们还刊登了采访两位较有名望的当代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和胡利奥·科塔萨尔的报道和采访研究葛兰西思想最优秀的专家之一、法国作家克里斯蒂娜·比西-格吕克斯曼的报道，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乔治·纳波利塔诺撰写的关于欧洲共产主义政策所提出的党内生活问题的文章。我们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我们是想克服只在名称上进行的辩论（如欧洲共产主义的叫法对还是不对），并且以尽可能深入浅出的语言来介绍欧洲共产主义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刊登了哈维尔·佩雷斯·罗约的文章(关于多数人的革命)，胡利奥·塞古拉的文章(关于欧洲共产主义与经济政策)，何塞·路易斯·马洛·德莫利诺的文章(关于国际政策)，埃内斯特·加西亚的文章(关于共产党纲领中的自主原则)，皮拉尔·布拉沃的文章(关于欧洲共产主义与党)，胡利安·阿里萨的文章(关于欧洲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米格尔·比尔巴图亚的文章(关于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皮拉尔·佩雷斯·富恩特的文章(关于反资本主义与反家长制)J. A. 塞拉诺和阿尔维托·因方特的文章(关于欧洲共产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和我写的一篇关于欧洲共产主义历史根源的文章。安东尼奥·埃洛尔萨和里卡多·洛维拉塞

写的几篇稿件由于我们收到太晚，未能同这一系列文章一起发表。

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在进行深刻讨论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但每个作者又都有完全的独立性，自己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写，这反映了大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高度一致性。而且他们在介绍欧洲共产主义时，不是把它作为政治实践辩解的借口，而且作为要求并推动在政治、理论甚至组织上进行认真革新的具有长远意义的一种现象。

我们之所以把《我们的旗帜》在那几个月里发表的文章列了这么一张对读者来说无疑感到有点冗长的清单，是为了使人们能更好地了解下面这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即《我们的旗帜》编辑委员会是不是党内的一个派别？对我这样一个具有很长党龄的人来说，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件可以毫不介意的小事。在共产党的词汇中，“派别”一词包含着某种意义，我看甚至包含某种犯罪的道德含义。派别总是坏的，党总是好的。

这种对派别（甚至，推而广之对分歧）的谴责，在共产党内是很典型的，值得进行一些考虑。

我想首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它的根源何在，是什么时候开始采取这种态度的？我认为根源就在斯大林。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提到列宁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曾倾向于建立一个领导拥有巨大的集中制的党。但斯大林则多次以列宁的名义夸大和篡改列宁的思想。列宁在自己绝大部分政治生活中领导的党是一个派别存在已是惯常现象的党。那时，党内一出现分歧，就会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形成各种派别。这

些派别都各自准备和提出自己的文件。然后在代表大会上由大多数人作出决定。或许 1918 年的情况是最有意义的。那时，还没有实际自卫力量的革命的俄国，正在抗击侵犯俄国领土的德国军队。列宁认为即使要蒙受非常严重的损失，也必须立即缔结和约，以争取时间和避免受到侵犯。但是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支持别的选择：如继续进行革命战争（布哈林的主张），拒绝缔结和约，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托洛茨基的主张）。结果党内对各种观点进行了讨论，1918 年 3 月在七大上通过了列宁的观点，同意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相反，1923 年在苏联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禁止派别并获得了成功。不过，那是考虑到国家处于异常严重的局势，以及独自掌握整个政权的党在其内部处于同样严重的局势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措施。1923 年，列宁在他的论据中强调局势的特殊性和所采取的措施的特殊性。而当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梁赞诺夫建议禁止因政见不同而召开会议时，列宁回答他说：

“我认为梁赞诺夫同志的愿望可惜是不能实现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本届代表大会对下届代表大会的召开，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否则，一旦发生了象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的问题怎么办呢？……那时又得因为政见不同而召开大会了。”<sup>①</sup>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47 页。

斯大林在 20 年代中和 30 年代初所做的事情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以开除、审讯和处决那些不同意他的人的方式来解决内部斗争；

——写了一些教育和宣传效果很大的肤浅的文章（我这一代所有共产党人都通过这些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把团结和纪律作为党的最高品德来论述；

——使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背离列宁思想的）观点带上一种神秘的，半宗教的语言和气氛。

斯大林不仅是“个人崇拜”的创造者（这是苏联用以掩盖现实的官方说法），而且也是对党崇拜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崇拜党的团结和崇拜党的领袖的创始人。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政治意识，并且以异常大的力量在各国共产党内树立起这种政治意识。1956 年苏联人在揭露斯大林主义时，他们很巧妙地回避触及斯大林主义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把这些方面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目前苏联的官方思想，即那种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斯大林歪曲和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各国共产党所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没有在党的问题上集中应有的注意力去揭露和谴责在我们中间仍然起作用的斯大林的观点。

揭露斯大林的镇压罪行是一件十分好的事。但是还需要更多地考虑斯大林在理论方面，更确切些说，在教育和宣传方面的种种做法，因为这些做法在我们中间还经常有所表现。

西班牙共产党得以发展的历史环境(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佛朗哥的残酷镇压,面对这种镇压,要保持党组织的活力是一场每时每刻都在冒险进行的战斗),很容易在围绕党和党的团结以及鄙弃分歧的问题上保存这些神秘主义的特点。我认为(我甚至是根据我个人的经历这么说的)斯大斯主义的这些残余同欧洲共产主义客观需要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在党接近公开活动伊始以及后来获得合法地位时,就开始爆发了。

不过,在转入另一个问题之前,我想把我刚才论述的那一点更加具体地加以说明: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说过我认为搞派别对党和革命事业是件好事。我只是力图表明作为西班牙共产党以及总的来说各国共产党特点的那种摒弃派别的根源乃在于斯大林。我觉得共产党人认识到这点是有好处的。

那么派别的存在到底好不好?一般地抽象地说,当然是不好的。但问题不在这里。党内一旦出现不同观点和分歧,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打算把常常搅在一起,互相混淆的三种概念加以区别,我想这样做是有益的,这三种概念是思潮、流派和派别。

根据我的看法,思潮这个词首先指一种客观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即面对西班牙和全世界舞台上出现的各种进程和现象(当然不只是政治现象,还有文化和理论方面的现象,例如出现一本书),在广大党员群众中就会产生各种意见和不同的态度。

流派这个词的含义在程度上要比思潮更带主观性,是指



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相似的或共同观点的数量不少的一组党员，他们不仅在自己内部讨论这些问题而且还推动全体党员也来讨论这些问题。流派的存在是一种积极因素，它促进真正地讨论问题，使更多的党员参与这种讨论，而且如果能为这种讨论广开各种渠道，那么它应导致党的领导机构更能代表整个党。

派别，就这个词的含义来说，就是党内有一些小党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领导，有其发表意见的机关，有其纪律和组织，党的生活是通过派别活动开展的。

我个人的意见是，就我刚才确定的含义来讲，派别对一个党的民主生活是消极的，因为它使讨论成为人身攻击，降低思想讨论的水平，在党代表大会上煽动竞选第一主义和拉选票。

在那些派别合法化的党内，如在意大利社会党或天主教民主党内就发生这种情况。

然而，我却相信，允许和同意把流派的存在当作积极的民主现象，却是当前使党能够民主运行的一种需要，是使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各种意见的存在，参与讨论和作出决定的一种需要。

象西班牙共产党那样禁止流派的做法，乃意味着领导核心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力。如果总书记同领导机构里一定数量和他意见一致的成员坐在一起开会，那么这个会议就是正常的。圣地亚哥·卡里略当然在他的实践中要加倍地召开这种会议和进行这种会议和进行这种谈话。但如果相反，几个领导成员想互相交换一下意见，想对已经证明意见一致的观点

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坐在一起或者同别人一起开会，那么这就会成为罪恶深重的派别会议。

我这是在试图阐述我对一个复杂问题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我最近的一次经验，使我改变了我多年来根深蒂固的想法。对这个问题我不想也不可能开出什么妙方来。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还在动荡，从我思想的演变来说，或许还没有克服某些矛盾。

可以设想有些读者会想对我说：那么好吧！就请你给我们举一个你称之为流派的例子吧！我将试着这样来回答。我想各种流派可以通过，例如，各种研究中心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法国社会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心就构成法国社会党的左翼流派，是人所熟知的。

在意大利共产党内，流派是不合法的。该党在章程中还重复那些把民主集中制奉若神明的词句。但实际上通过某些主要领导人在党的报刊上发表的各种观点和通过党刊和研究中心促进的辩论和各种意见的对立，表明党内有流派的存在。意大利共产党在1981年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会议上讨论了更灵活地开展党内民主，使全体党员，从而使舆论界了解领导机构里讨论和争论的必要性。这样使基层党员能够真正地、也就是说在了解所有论据的情况下参与制订和发展党的政策。

那么好吧，在我至少部分地说明了我对流派的理解之后，我要说，《我们的旗帜》编辑部是十大前8至10个月内，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形成的一种流派的一个部分。我们既是这一流派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是帮助这个流派一致起来的那个部

分,我们不只是通过在《我们的旗帜》上刊登文章,而且也通过  
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章,通过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作的发言,  
通过我们的交谈,通过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发表的意见,  
达到这个目的。

我这里提到的《我们的旗帜》编辑部并不包括阿道弗·皮  
涅多在内,他几乎从来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也从来没有发表  
过有关政治或理论方面的意见。我指的主要是我前面提到过  
的撰写了关于欧洲共产主义一系列文章的那些人。还要加上  
负责市政政策的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加上曼努埃尔·  
巴列斯特罗,尽管他住在巴黎,但经常同我们交换意见;加上  
当时党校负责人丹尼尔·伊里瓦尔;和负责党的教育工作的  
领导人之一,帕洛马·波特拉;如果把欧亨尼奥·特里亚纳也  
包括进来,那就有些过分,因为他很少同我们合作,而且在特  
定时刻,他就走上了一条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道路,1981年5  
月他决定辞去自己的工作,离开了党。相反,我倒是把霍尔  
迪·博尔哈包括进来,他碰巧是欧洲共产主义在加泰罗尼亚  
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遭到挫败时加入编辑部的。

在编辑部成员中,有4人同时又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  
是:塞古拉,皮拉尔·布拉沃,萨尔迪瓦和我。最后3人是执  
行委员会成员。皮拉尔和我还是常委会成员,皮拉尔和萨尔  
迪瓦是书记处的成员。

阿尔维托·因方特是马德里省委委员。何塞·路易斯·  
马洛同首都党组织的生活也有紧密的联系,他就是因为采取  
了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而没有被选进马德里省委。哈维尔·  
佩雷斯·罗约是安达卢西亚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成员。埃洛尔

萨是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我现在得赶紧消除我提供的这些细节可能会引起的误解，在我思想上绝不是要把《我们的旗帜》编辑部同后来报刊称为“欧洲共产主义革新派”（我认为这一名称相当正确）的流派等同起来。这个流派是几乎在党的一切组织中，特别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地下状态时在许多地方组织和领导过党的年青干部中很大程度上自发形成的，而且实际上这个流派要比已成型的流派还要广泛得多。这个流派或者是在党的基层委员会和各级党委员会内逐步形成的，或者是一群群党员凑在一起议论他们想到的问题而形成的，它的形成过程分三步：第一，大家都赞同欧洲共产主义，但希望它不仅体现在政治词句中，而且也要体现在党和党的工作方法的革新中，甚至在党的领导人不适应新的需要时体现在对领导人进行的更新中。第二，大家对党的一系列政治立场持批评态度，认为考虑策略过多，过于实用主义，批评党放弃群众工作，只关心政权机构和议会工作的政策，特别是批评党只起“自上而下”的作用，党内没有开展真正讨论的渠道。第三，大家都摒弃教条主义的“亲苏”立场，这种立场也批评党的领导，不过其目的是使党重新成为传统的党，使党重新采取支持“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我认为把这种流派说成就是派别，那是歪曲事实。撇开任何道义上的看法，我只想讲真实情况，那时，这种流派并没有什么领导，也没有起码的组织联系。每一个地方都是各行其是，同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没有什么联系。更确切些说，那是占很高比例的一部分党组织里流行的一种精神状态。

当何塞·路易斯·马洛和马德里其他共产党人对我说起他们计划起草一份争取革新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文件并开展群众性的签名时，我就对他们说我不同意他们这样做，我认为应该想尽办法利用别的形式。《我们的旗帜》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想的。但是马德里的同志们却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没有听我们的意见。或许他们是对的。总之，所谓的派别并没有任何“机构”来决定这样做还是那样做。

在地方一级，具体地说，在马德里，革新流派是省代表大会前形成的。在别的省或地方，党委本身就代表了并表达了革新的态度。

在这样一个广泛的流派中，《我们的旗帜》编辑部显然起着某种特殊的作用，尤其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决议的起草委员会中，在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以及推而广之，在党的领导工作中起着作用。但是或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通过共同工作，讨论和经验交流，我们彼此十分情投意合，达到深刻了解，对带根本性的问题完全一致。

在会议上，我们可以争论得甚至面红耳赤。在具体问题上，在政治策略和方法等问题上，我们可以各持己见。但是，我认为我们有一种共同的理论基础。我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明。我怎么能擅自用我个人的理解来表达对这些问题的集体意见呢？

不过对葛兰西著作的阅读和评价为达到这种深刻的一致性起了重要作用，我想我这么讲不致十分脱离实际情况。

在这方面，《我们的旗帜》于1979年秋邀请彼得罗·英格拉奥访问西班牙是很有意义的。那是他第一次来访。尽管西

班牙共产党别的机构对他冷落，他还是在为我们为他组织的会上作了一次报告。

我早就认识他并研究过他的著作。但是，在马德里直接聆听他的报告，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对西欧革命的全面理论观点。

我以为，不难理解我们是如何努力从葛兰西的观点出发，把欧洲共产主义放到这样一个框框中来认识的，即把革命看作在市民社会中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次长征，把选举和议会看成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但必须不可避免加强和开辟一切能够创造并加强社会结构，使之成为参与和直接民主源泉的条件和渠道，使新的历史性集团能够取得社会的领导权并能变革社会。

我多次听到人们批评“多数人的革命”的思想，认为这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特点，因为任何人，包括苏联人在内，都接受这一点。如果以“列宁主义”的含义去理解，即由大多数人夺取政权并自上而下进行变革，那么确实不会有人主张进行只有少数人支持的革命，否则，就是回到“布朗基主义”那里去了。但是也可以从另一种含义，就象《我们的旗帜》杂志上解释的那种含义去理解，根据这种解释，大多数人进行的革命是指通过许许多多的小变革来达到大变革。在这一变革的进程中，选举、立法、政府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工作场所、教育体系、街道生活、两性关系、家庭关系、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的许许多多变革，从全局观点来看，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

这种革命观念当然同苏联的观念有冲突，也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有冲突。而且，我认为，这就是欧洲共产主

义存在的理由之一。这一切特别使它具有历史意义，尽管它的具体化使各国欧洲共产主义党都引起动荡。

这是十分概要地说明我们的思想的源起，从而派生出我们对后来变得最紧迫的那些问题的主张，如党的革新，左翼的团结，女权运动，社会运动的作用，市政政策的作用，以及在另外一个方面，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彻底批判。

在《我们的旗帜》工作的这一班人，理所当然在编辑部会议上比较经常地讨论筹备十大工作中所采取的主要步骤。我们热忱地盼望代表大会能尽可能地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而是通过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建议，采纳我们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想法。我们相信，要摆脱党的危机，给共产党人以新的推动力、希望和热情，要摆脱消极被动和精神不振，除此没有其他道路。

有一个时候（我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日期），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可以期望在决议草案的内容上即使不是取得最好的结果，也会取得积极的结果。因此，我们所要起的作用理所当然就是促使决议草案在尽可能地加以改善和修改之后得到通过。

但是有一个例外，即关于党的那部分决议草案和新的党章是由海梅·巴列斯特罗斯为首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起草的。这个委员会交给我们的这两个草案糟透了，是从1978年九大往后倒退了一步。他们要向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建议真是妙不可言：竟然要人们在一个关闭性的、收缩性的、回到老一套做法的党内，沿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开放性道路前进。

这是把螃蟹说成是最宜于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车辆。

面对如此明显的局面，尽管我们之间有不同想法，但我们多少都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支持通过这些草案的同时，我们应努力争取代表大会在党的问题上通过一个与领导机构的提案不同的替代草案，并努力对党章进行认真的修改。这就是我们对十大的战略。还要补充一点，在党的问题上，我们表明了赞成圣地亚哥·卡里略继续担任总书记的意见，我曾多次重申，并且也这样认为，我们并不想把卡里略从他最高领导职务上换下来。

写到这里，我感到不得不向读者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我在有些时候曾经对我自己的态度是否正确感到怀疑。我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也有过反复。我把我现在考虑到的写出来，也有可能以后我又不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种危险性是存在。

我觉得在筹备 1981 年 7 月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工作中，我们革新派（姑且就用这个已经被人接受叫法吧）犯了几个错误。当然从我自己开始，我承担一部分应由我承担的责任。

我们主要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们没有在代表大会前和大会进行期间组织自己的力量，散播我们的纲领，建立组织上的联系。不然我想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和更能协调一致。当然，这是党章所不容许的，但是，显然在代表大会前最有权威的应是党员的意志，会后，代表大会才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例如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前 6 个月，就终止了党章中有关禁止建立派别的条款。这是合乎常理的措施。不管怎样，在使党避免遭受灾难时要懂得违背党章。



第二个错误是我们把反对意见仅仅集中在党的问题上。这就使人难于弄清这个丧失了几万名党员的党所处的危机真正严重到什么程度。由于我们自己的这种态度，或许使我们自己划定了批评的范围，而为了使我们能从陷入的泥潭中找到积极的出路，恰恰应该扩大批评的范围。

第三个错误是没有提出更换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总书记职务是必要的或合宜的。我想，要是1981年初我就抛弃了过去陈腐思想的障碍，进行客观的考虑，那么就会有足够的根据使我理解到，卡里略凭借他自己在党的领导机构里拥有的那种集权的、专制的、在某种程度上反复无常的权力体制，成了在党内实行民主化、进行集体领导的一个根本障碍。另一个理由就是他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政治上的才智，已经不再是具备为保持和扩大党在西班牙政治领域里的活动余地而进行必要总结能力的领导人了。可是要采取这种态度，却碰到了一个困难：建议让谁来替换呢？我们许多共产党人无疑都考虑到的候选人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在当时并没有卷入这一浪潮中，相反地由于十大在即，他是持相反态度的。我们或许想在十一大把他提出来。不过，我们既没有坚持这一点，也没有坚持别的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简单地支持了卡里略。

我们所以犯这些错误，有一系列可以解释的理由，尽管不是为自己辩解。首先，尤其对我来说，受到（为了节省笔墨）我简称之为传统影响的作用。经过这么多年我所经历和熟悉的共产党的战斗生活，我很难觉悟到，我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恰恰是应该采取支持更换总书记的立场。但也还有

别的更为客观的原因。我们当时担心如果扩大对领导机构的批评范围并提出更换卡里略，那么我们会同教条主义者，“亲苏”分子合流。这样做是同我们的目的背道而驰的。而且那时我们也不了解在代表大会上那部分人有多大的力量。

此外，在革新派所犯错误的根源上，我们还在两个问题上作了过高的估计。我们以为，党内对真正欧洲共产主义的决议草案的讨论，会理所当然地导致改变在党的问题上的顽固立场。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一个患分裂症的代表大会。但是党的领导机构成功地缩小了决议草案的影响，分裂症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卡里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个核心的才能。我们以为他们能够理解由于西班牙、欧洲和国际形势，都更加需要 1981 年夏季召开的代表大会能够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全面确立欧洲共产主义，就是说，开成一个综合各种意见的、开放性的、因而也使党灵活起来的代表大会。而最后作出的抉择却象是关在屋子里对外界发生的事不闻不问的情况下作出的。



## **第四部分**

### **处在危机中的大会**



# 第一章

## 密特朗和欧洲左翼

戴高乐将军着手制定的并为多数法国人接受的宪法所确立的总统制给予国家元首(实际上同时也是政府首脑)相当大的权力,尤其是总统有七年之久的任期,并且还有连选连任的权利。由于历史奇怪的转折,我认为这些特点有助于使已经执政了20多年的右翼遭到失败。有1550万以上的法国男男女女,出于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厌倦而投了密特朗的票,使他获胜。这个数字本身给人以深刻印象。

这次投票是各种现象结合起来的結果:左翼的选票,特别是社会党的选票大大增加,因为6月立法选举已经证明共产党的选票大大下降,仅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高票数相等。与此同时,还有百分比不小的无定向浮动票,由于对吉斯卡尔·德斯坦及其一伙的腐败无能感到厌倦而转向了密特朗以示抗议。

密特朗委任莫鲁瓦<sup>①</sup>建立一个把社会党内各种倾向(特别是更为中间倾向的罗卡尔和领导社会党左翼社会主义教育

---

<sup>①</sup> 莫鲁瓦已于1984年7月宣布辞职,由洛朗·法比尤斯继任。——译者

与研究中心的舍韦内芒)包括在内的政府,并且让共产党的四个部长参加了政府。从议会的角度来看,莫鲁瓦政府并不需要共产党参政,因为社会党本身已在法国国民议会内拥有多数。不少评论家把这一决定归之于密特朗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法国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法共在主要的工会组织总工会中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党在任何全国性工会中都并不直接占有优势,这是法国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稀罕”情况之一。密特朗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则远不止此:他许多年来一直维护左翼团结是实现进步政策所必不可少的主张,从而同欧洲其他社会党发生对抗,为维护这一主张,他甚至反对法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极力通过反对社会党的蛊惑人心的劳工第一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竞选宣传来赢得选票。

也就在这个阶段,密特朗努力保持同欧洲共产主义党的关系,主要是同意大利人的关系,也同时保持同我们的关系。为了避免同法国共产党人发生正面冲突,也提出“礼节”性的问题。密特朗很容易同贝林格在斯德拉斯堡欧洲议会内找到会谈的机会,但是同我们会谈则复杂得多,为此密特朗1980年5月专程到马德里访问几天,拜会了费利佩·冈萨雷斯和圣地亚哥·卡里略。克劳德·埃斯蒂埃尔(现任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谈。我对密特朗在谈问题时的亲切坦率印象很深。在诸如阿富汗问题、对中东和平的威胁问题和欧洲宜于采取自主政策等问题上,我们立即取得重要的一致意见。密特朗的态度是明确的,同我们也是相合的,即尽可能地推动欧洲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的对话和合作。当然是在尊重各党既定的立场的基础上。最后商定由克

劳德·埃斯蒂埃尔同我经常保持联系。会谈公报中提到：

“会谈是在十分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双方讨论了大家最关心的欧洲和国际问题，以及威胁和平的各种危险。会谈证明欧洲工人运动中**所属各党**之间开展对话和接触是有用的和重要的。”（重点号是我加的）

我请读者们注意加重点号的地方。这是长时期以来第一次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公报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毫无疑问这个概念将来会愈来愈重要。即存在一个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归属在内的**欧洲工人运动**。

公报是由埃斯蒂埃尔和我起草的，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句话首先是密特朗说的。

当然，“运动”这个�的概念伸缩性很大。但是请记住，我们共产党人习惯于讲我们自己是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而这里指的却是另一回事。

密特朗在1981年6月让共产党参加政府，是想肯定和实现他过去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而这种原则立场并不只局限于法国的边界之内。

因此新总统的来到爱丽舍宫以及七年之久的任期（法国左翼还从来没有过这么长的任期）至少意味着欧洲战后历史上的两件新事物，两种决裂。

第一，推行了非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蓝图，而通过改变阶级间的权力关系来解决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削弱和控制垄断资本主义，提高劳动人民权力。

第二，冲破了美国阻止共产党人参加西欧政府的禁令。美国副总统布什到巴黎作了一次闪电式的旅行，进行了直接的



力量较量。但是里根既然阻止不了,也就不得不接受。

我认为西班牙左翼(这里特别指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没有注意充分评价密特朗的实验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法国同西班牙的关系上显然存在消极方面,法国新政府并没有加以必要的改变。民中联政府在国际问题上眼光浅薄,不知有多少次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党的小算盘之下,没有为真正改善西法关系作过认真的努力。有时甚至还通过新闻媒介鼓动旧时对法国的反感情绪,这是右翼的一贯立场,从而大大损害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应有地位。

然而我认为左翼并不懂得如何对卡尔沃·索特洛的对外政策路线作出应有的反应。这不是说我们不去批评法国那些我们认为错误的政策。但是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我们曾经宣布我们在国际方面的根本目标是在集团政策之外为争取和平、裁军而斗争,其中包括克服世界两极分化为军事集团的问题。

在国际方面,我们所处阶段的特点是美国里根政府政策的侵略性愈来愈突出,尤其是在中美洲地区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左翼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不可能来自另一个集团,即来自苏联政策,苏联政策追求的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目标。它应该出自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反对两个集团主宰的立场,主张有效地维护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决定自己命运、过人的生活、摆脱不发达和饥饿状态的立场。也就是说,出自这样一些力量的立场,它们主张把南北关系置于军事集团之上,主张更多地集中世界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减少地球上花在军事开支上的巨大浪费。

在现在这个时机，欧洲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想谁也不会对此有任何怀疑。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大西洋集团从属于美国的西欧，今天在同美国的关系上至少存在两个带根本性的客观矛盾：

第一是经济方面的。里根的政策意味着某种反对西欧的“经济战”。法国谢松部长和西方别的一些领导人都讲过类似的话。

第二是政治军事方面的。如果为了对抗苏联在欧洲部署的 SS—20 导弹而在欧洲部署美国的潘兴和巡航导弹，欧洲将完全变为两大强国的人质，因为在欧洲进行一次核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里根已经讲得很明白），也就是说，可以在两个超级大国不致互相摧毁的情况下使欧洲大陆全部覆灭。欧洲必须不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不幸的是欧洲导弹问题的协商至今完全只控制在美苏两国手中。

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因素，欧洲日益明显地出现了执行自主政策的倾向。

在这一演变中，密特朗的实验无疑可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策没有矛盾的地方或消极面，例如他支持大西洋主义的声明以及对以色列侵略的某些态度。但是密特朗的政策中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肯定欧洲的自主政策；一是把欧洲同第三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同第三世界进步力量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

这些政策还伴随着一个带根本性的倡议，即在欧洲共同体内引入以反对失业为中心的“社会阵地”，这为对付共同体的危机指出了共同体改革的道路（包括要求修改罗马条约），

提高欧洲议会的权力,在经济方面,提高工会和劳动者代表的权力。

同时密特朗的做法意味着在南北对话问题上的一种新倾向,表现在同阿尔及利亚关系的改善上,这在非洲以及在撒哈拉民主阿拉伯共和国问题上可能会引起各种反映。最令人惊奇的是墨西哥和法国在中美洲问题上发表的联合声明,支持协商解决问题,承认各种革命力量和游击力量,主张通过谈判在尊重各国人民和尊重民主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因此,这是在美国认为是它的“私人后院”的地区直接了当地反对里根的政策。

莫鲁瓦政府的某些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措施和方针对欧洲整个左翼都有很大影响,这些措施和方针无疑要远远超过其他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密特朗的经济顾问雅克·阿达利说过,“法国在二十一世纪初,要么变成美国的一个分支,要么变成一种进步的新形态的调节器”。这句话无疑是野心勃勃的,但也很好地反映出法国目前政策所处的迫切形势。

在最有重要意义的措施中,应该着重指出那些将仍属私有的银行收归国有的法律,这些法律也授权国家控制大部分的保险事业,这就是说,加在一起几乎控制了整个金融体系。

同时政府将五个大工业集团收归国有,在财政上采取了十分激进的措施,提高低工资和养老金,特别是加强工人在企业中的参与管理以及为实行35小时工作周采取初步措施。

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上,实行严格的地方分权措施,解散了特殊法庭和军事法庭。

上述措施和其他许多措施都引起了资方的强烈抵制，这种对峙的形势是很严峻的，未来的前途不是受挫后退，就是向前进，使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就是进步集团有可能在我们的邻邦取得领导权。

如果事物向前发展，它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应会愈来愈大。因此我们欧洲共产党人对发展欧洲左翼力量之间的对话和合作有着直接的兴趣。在我的印象中，法国社会党人对这一点相当清楚，法国社会党国民议会党团主席皮尔·若克斯的话是一个征兆，他宣称“意大利是使我们最感到惊奇的国家，因为我们发现那里的共产党人比社会党人同我们更加接近……密特朗的希望开始实现（他的希望也是我的希望）。他希望欧洲范围内的左翼联盟变得至少同法国的左翼联盟一样重要”。（《再生》杂志 1982 年 3 月 19 日）

在乌云密布，甚至存在冲突和战争威胁的国际形势下，在西班牙明显向右转的进程中，我认为密特朗在法国的实验有可能代表着走向深刻变化从而驱散天际乌云的手段之一，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手段，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以及在总的进步力量之间新的对话和合作方式的诞生有可能起参考作用，我相信我这样想不致过分奢望。

相当时间以来，西班牙共产党人一直为开创这样的前景而工作。当时民意测验表明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的可能性极小极小，法共还在加强对密特朗的攻击，而西共的国际政策却把同法国社会党的关系放在特殊的优先地位，认为这也许是开辟和扩展欧洲左翼力量之间对话和某种合作的纽带，以走向报上开始命名的“欧洲左翼”。实际上，如果组不成某种形

式的“欧洲左翼”，那么欧洲共产主义又有什么前途呢？

从欧洲共产主义本身的性质来说，它并不只是共产党人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条道路，提出这条道路是为了使我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以及具有进步方针的其他各种标志的力量，如基督教的、民族主义的、自由传统的、激进传统的和世俗传统的力量（根据国家而异）能在西欧范围内取得一致。在这些力量中居首位的是那些在西欧范围内取得重要进展、虽然存在很大困难但仍具有本身活力的工会和各种各样的新的社会运动，如女权、生态、和平与裁军等运动以及各种文化革新和青年叛逆的进程。

根据1980年5月卡里略和密特朗会谈时所商定的，我于1981年2月初去巴黎。为避免同共产党人纠缠起见，我尽量保守秘密，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在回国途中，我在飞机上同西班牙驻巴黎的电视记者胡安·卡洛斯·阿斯奎相遇，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对我去法国首都编了个什么借口。

当我抵达座落在豪华的索尔费林诺大街上别墅中的法国社会党新设立的办公总部时，正好在报上看到民意测验的结果，它首次表明密特朗有取胜的可能。我从克劳迪·埃斯蒂埃尔和其他领导人的表情上发现他们都很克制，不敢让乐观情绪流露出来。当天下午，我会见了密特朗，当时在场的还有雅克斯·阿达利和克劳德·埃斯蒂埃尔。我此行的目的事先已经同卡里略谈过，主要有以下几点：介绍西班牙的基本形势和民主受到的威胁，并且坚持法国和欧洲左翼在共同市场及其他问题上的态度应该考虑到欧洲对巩固西班牙民主的必要性。我记得密特朗的态度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但同时又有些

若即若离和冷淡(我听说这种冷淡乃出于他的胆怯)。他很有兴趣地听取了我的介绍,提了几个问题。后来我谈到他若能当选对改善法西两国关系和对西班牙的民主都具有积极意义。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还要公布这种看法,不管法国共产党是怎么对待的。密特朗对此表示十分感谢。我同他交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提出推动欧洲左翼对话的新倡议的可能性以及克服这一进程中出现的障碍的必要性。他对我们已经采取的某些倡议很感兴趣,这我在后面还要提及。就在我去巴黎几天之后,特赫罗发动了政变,用另一种方式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忧虑,也即我们曾经要密特朗了解的有关我国仍然潜伏着对民主威胁的情况。

就在同一个月,从2月13到15日,在马德里举行了“欧洲安全合作和人权会晤”。这主要是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sup>①</sup>会长费尔南多·克劳丁同我一起搞起来的,得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何塞·桑多瓦尔的支持。用同上述机构类似的各国研究中心的名义乃是为了避免外交上的麻烦(这是讲得好听些),实际上我们在马德里召开的是社会党和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联席会议来讨论欧洲问题。我记得与会者中有:意大利共产党人吉安·卡洛·巴叶塔,皮耶罗·皮耶拉利和罗马诺·莱达;意大利社会党人克劳迪奥,西尼奥里列(副书记),乔治·鲁福洛,米凯莱·阿基利和朱塞佩·圣托罗。法国社会党有好几位代表出席,其中有书记处书记、社会党研究学会会长让·普隆社。英国与会

---

<sup>①</sup> 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的研究机构。——译者

的有工党议员斯图尔特·霍兰德和罗素基金会会长肯·科茨。南斯拉夫与会的有南共联盟主席团成员格拉赫茨。西德社会民主党也许是第一次同共产党人一起开会，该党与会的有议员卡斯滕·福格特和西德社会民主党国际关系副书记薇罗妮卡·伊森贝格。葡萄牙与会的有革命委员会的梅洛·安杜内斯上校。此外，荷兰、比利时、瑞典、希腊、挪威和芬兰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参加了。无庸赘言，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也都派出由领导人组成的有份量的代表团参加。

我个人认为这是多年以来，也许是四十年代末冷战开始以来，欧洲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上的讨论是十分有意思的，大家在裁军、为反对失业而斗争以及经济合作方面的立场是十分相吻合的。关于这次会议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至少在我看来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次会议简直可以说无人知晓，报纸上几乎提都没有提。为开成这次会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反应之小可说是一次失败。从一开始起我就看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不愿意宣传“欧洲左翼”的这次会晤。它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一是由于它对西班牙政治的策略考虑，同时也由于它在欧洲问题上目光十分狭窄。然而这次会议也未能得到西班牙共产党内一部分人，至少是领导层内一部分人的真诚支持。

我在十大之前完成的最后一次国际性任务是筹备西班牙共产党同意大利共产党的会谈。正是在密特朗取得有可能打开欧洲局面的胜利之后，为了欧洲共产主义能够在新发展的形势下提高自己的声音，我认为有必要举行这次会谈。我同

圣地亚哥·卡里略交谈过这种想法，他表示同意。我到罗马作了一次快速旅行，领导意共国际部的巴叶塔和布法利尼也都同意这个意见。在我同贝林格的会见中，贝林格也肯定了这种想法。我们约定6月底举行两党会晤，我要比卡里略先去一天，同他们在一起起草会谈公报，这样在两党会谈时公报就可以准备就绪。

我后来于6月27日下午去罗马。我应该说，多年来我在那离罗马市政庭只两步远的黑店街上的意共总部作客，总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样说也许有点自吹自擂，但我找不到另一种确切的表达方式。一开始是因为有好些经常在门口警卫的同志跟我是老朋友。举例来说，雷莫的名字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他曾经是我陪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960年或1961年去意大利访问时的司机。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用小名称呼我为曼诺洛。在一层楼意共国际部的许多办公室里工作的同志对我也是这样……我到达的当天下午，就立即同布法利尼、鲁比和梅基尼开始工作。意大利共产党负责国际问题的组织系统比较复杂：国际部总的负责人是巴叶塔和布法利尼。国际部内部还分好几个处，有欧洲处，第三世界处，有一个处专管同共产党联系，负责人是鲁比，副负责人是梅基尼。他们没有准备好公报草稿，只写了几点提纲，我也是一样。他们要我写第一稿。我在菲比同志的帮助下写出了第一稿，菲比同志法语讲得很标准，她还把草稿译成意大利文。

布法利尼又在这个草稿的基础上修改了一晚上。通过这次工作机会，我再次证明他的思想是十分敏锐和细致的。

起草公报这项工作很有点奇怪。它是一种相当引人入胜



的练习,尤其是在双方意见冲突的时候,一方总是设法迫使对方接受某一种提法,这种提法尽管看来不怎么重要却足以肯定自己维护的论点。这是一种双方之间的斗智,很有点象下棋。但这次同意大利人发表公报则又完全是另一码事,这里的问题是如何不再刻板地重复两党报刊上每天都在讲的那些话,找出些新的点子。这样做可真不容易。

我所认识的有一些人,对撰写公报有一种癖好,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连续干,而内心里其乐融融。事实也确实如此,一旦参加了这种游戏,很容易迷上。由于所写的是很严肃的问题,什么和平、战争、民主等等,因此在特定的时候似乎世界的命运就在于用的这个或那个提法是否确切。而在此之后,起草出来的公报十分冗长,无人问津,也起不了多少作用。从我个人来说,在多年参加起草公报之后,一旦不让我搞这个工作,倒使我轻松不少。

报刊上对西班牙共产党同意大利共产党的会谈作了重要反映。两党通过的声明重复了众所周知的立场,如支持西班牙参加共同市场,保卫和平,反对西班牙参加北约,声援波里萨里奥阵线,谴责恐怖主义……并且确切地阐明了密特朗胜利的意义。公报说:

“西欧保守势力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某些进展之后,今天表现出一种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表达了西欧人民要求通过社会革新用民主和进步的办法解决当代问题的变革愿望。密特朗的当选、左翼在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中的胜利,以及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人的新政府的组成,表明法国人民在它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重要的一页,其影响所及将在整个欧洲引

起反响。”

声明又提到欧洲出现的这种新趋势，证实了欧洲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正确性以及其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公报最后一段说：

“为担负起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任务，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为取得相互谅解而进行的对话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谅解有助于在欧洲危机的情况下建立一种进步的替代办法和提出首先是有利于裁军与和平的新倡议。左翼力量团结的进展将使意西两国和欧洲的民主具有更为先进的内容，使人民群众感到苦恼的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并且用新的开放精神来响应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和妇女要求改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改善生活条件、文化条件、摆脱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异化、保障社会正义和每个人个性发展的愿望。”

这最后一段是在两党发表的公报中第一次把欧洲共产主义放在更多关心女权主义、青年和生活质量的当代总问题的框框中提出来。

我对我所参与的这些国际活动有很高的评价。我认为这些活动给欧洲共产主义以更多的内容，对欧洲左翼的方向产生了影响，这一切必将有助于欧洲共产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当然我的过错是过于天真。当时有些蛛丝马迹已经表明事态发展的方向，而要我对这些事加以重视是很费劲的，而事后证明这些小事是很重要的。当我已安排好去罗马的旅行之后，卡里略决定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将由他、海梅·巴列斯特罗斯和我组成，把巴列斯特罗斯放在第二位。同过去几次代表团的组成相比，显然这是排斥我的一个步骤，但并不是指工作

而言,而是指代表资格而言。

就在同一个时候,《工人世界报》开始不再报道我出席党的活动的消息,而我在这些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在反对西班牙参加北约的运动中,这种排斥到了无耻的地步,我曾经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这项工作。要是我眼睛亮一些,那么我当时就会看出在党的领导层中有把我排斥出去的计算。

## 第二章

# 有可能建立一个 欧洲共产主义的党吗？

要了解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只看到全体代表会聚在一间大厅里的两三天时间是不行的。代表大会之所以存在乃是要使全体党员有可能对有关自己党的政策和组织方面的基本观点发表意见，可以这样说，党的存在掌握在全体党员的手中。当然在实践中，则有很大的相对性。但不管怎样，一次党代表大会总得要求党内逐级进行讨论，首先是在基层委员会内，然后在省、市、自治区一级进行讨论，以便吸收尽可能多的党员参加。

然而，这些讨论的基础是什么呢？首先由中央委员会经过讨论并通过政治文件草案和党章草案，提交全党讨论，全体党员在讨论中提出对这些草案的意见，同时选举出席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这些代表把党员的意见带到代表大会上去。

因此，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阶段需要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阶段，基层可以对中央委员会发下来的草案进行讨论和表态。

1981年5月5日，西班牙共产党在位于三圣一体街的总

部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心目的是讨论和通过应尽早发给全党各级组织的文件和党章草案。会议开始时气氛相当紧张。有些人明显地避免同我打招呼，而其他人则相反，十分热情。我们几个参加了起草文件的人坐在主席台左边的第三张桌子旁，有皮拉尔·布拉沃，萨尔迪瓦，胡里奥·塞古拉和我。后来在这间屋子里发生过几次使我们历尽风险的事情，而这张桌子变成了我们的专座。

会议是从讨论政治形势开始的。

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卡尔沃·索特洛政府在军事政变后急剧向右转的进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卷入政府活动，接受了所谓通力协作，实际上是为政府打掩护。议会中四党（民主中间派联盟，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联盟）关于联合开展保卫宪法运动的谈判已经在走向破产，如果考虑到四党本质上的矛盾，那么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此谈判没有任何结果。

当时如果不愿接受危险的消极态度，那么就有必要寻找一条道路，使全体公民群众能以愈来愈多地参加政治生活来表现出他们的力量，并把保卫民主的任务更加直接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卡里略的报告开始，中央委员会的讨论朝着对民中联政府采取强硬批评（也许过去还没有这么强硬过）的方向发展，并且更加明确地集中在动员公众舆论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确实是团结一致的。会上委托加那利群岛共产党总书记何塞·卡洛斯·毛里西奥和我准备一个决议。我们起草了一个很强硬的决议，象通常一样经过严格的修改后就通过了。然而在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天，暴发了新的恐怖

活动，皇家警卫队队长巴伦苏埃拉少将遭暗害，会议被迫把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提到首位，组织了两分钟全国性罢工以示公民对此的强烈回答。

这件事突出地表明客观上存在的困难，在西班牙经历过的并继续经历的那种政治过渡的条件下，左翼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同这些客观困难发生冲突。这种困难绝不是我们只讲几句正确的话或提出一个明智的见解就能解决的。在政治上真理并不会自行实现。我们的见解甚至可能是很英明的，但如果只是通过报刊和麦克风表达表达而已，那它也成不了大事。它必须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这是居首位的问题。我们明智的共产主义思想并没有在我们固有的基层群众中产生多大影响，我们没有把它同人民的感情深深地挂上钩。

在这种情况下，对党代表大会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尽早处理完我们自己的内部事情以便使我们能全力以赴地致力于“争取民主的斗争”，卡里略的讲话多多少少是这个意思。毛里西奥则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但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即把筹备党代会的工作变成动员起来保卫民主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提出的态度，就是使党并从而使党代会面对党内危机的事实，面对变革的必要性和革新工具和工作方法的必要性，如果不这么做，那么我们的见解再正确也没有效力。最重要的事无疑是搞政治活动，也恰恰为此我们必须改造党，使党现代化。

在进入第二项议程讨论和通过大会文件时，上述两种态度并没有发生冲突，争论不多，相对容易地取得了一致意见。

最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是讨论达米安·普勒特尔对国际部分的修正,他建议文件中加上这么一句:

**“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不应只成为两个集团之间的对崎。”**

这在实质上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敌人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得逞的思想之一,它意味着回到苏联关于军事集团之间冲突是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论点。用这么短短几个字就可以把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全部推翻,而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支柱。我上讲坛讲了这个意思。萨托里乌斯支持我的看法,普勒特尔撤销了他的提案。我感到很遗憾没有将这个问题提付表决。

达米安·普勒特尔现在是西班牙共产党干部培训学校校长,因此是对党内干部进行教育的负责人。

在讨论中有时使我很不高兴,因为我不得不以起草小组的名义要大家不要接受某些修改意见,而这些修改意见是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的,但是起草小组中多数人接受不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位巴斯克同志西克弗雷多·多明戈的某些提案,他十分准确地谈到苏联社会的某些方面,同我以个人署名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情况十分吻合。但是国际部分的决议尽管有它不足之处,还是往前走了一步,中央委员会通过是合宜的。

事实上我上面讲的两态度之间的对崎是发生在讨论党章草案和关于党的那一部分决议草案上的。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作了修改党章草案的报告。党章的

前言部分充满夸张的颂词，有相当多的人建议把它删掉，其中有：皮拉尔·布拉沃，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胡里奥·塞古拉，索莱·图拉，莱尔特松迪，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迪亚斯……只有 10 票赞成保留，3 票弃权，因此前言就此删掉了。

在讨论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参加大会文件起草小组的好几个人所坐的左边第 3 张桌子几乎成了反对派的桌子。实际上对党章的某些主要修改意见都是由皮拉尔·布拉沃和胡里奥·塞古拉提出来的。

讨论中最激烈的是同少数派的权利和党内流派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有关党员有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党章草案同九大党章相比有了明显的后退。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员的义务是这么提的：“遵守党的纪律。每个同志有权在党内保留自己的意见，即使同多数人不一致，但是应该根据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民主原则，按党的指示和通过的决议行事……”

也就是说，纪律是同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放在一起提的，并且把保留个人意见权利同有义务根据多数人的准则行事明确区分开来。而这次草案却相反，只提“纪律”而没有提连在一起的另一面，把“有权保留自己意见”放到关于党员“权利”的一款中。

然而，最根本的是如何保障少数派有权继续保留自己意见的问题。皮拉尔·布拉沃对此作了以下修改建议：

“每个党员有权在党内保留自己的意见，即使他的意见同大多数人不一致，但是应该根据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



上级组织的原则按已往通过的指示和决议行事。在多数派作出决定和决议之后，少数派有权在自己所属的组织以及相应级别的组织中发表并保留自己的意见。少数派可以按照一般规定的条件在党报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她解释了修改原因说：

“草案中的这一段，也就是我提出修改的这一段顶有趣，因为就缺党员不能在会上保留自己意见这一条，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会议进程中谁都还不知道哪种意见会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我建议改成两段，第一段实际上就是九大党章中的第十款，因为大家可以看出原来的提法比现在的草案要明确和先进得多。

党内各个方面的人都广泛地感到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改动一下。可资证明的是连胡安·弗朗西斯科·普拉这样的人（他现在是马德里共产党副市长，接任被开除的爱德华多·曼加）都提出了以下修正案：

“鉴此，在党代会开会前讨论纲领性文件的替代方案期间，公开地辩护或公开地赞成某种观点不应被认为是搞派别活动或者建立有组织的流派。”

我在发言中支持皮拉尔·布拉沃上述的修改意见。我谈到对一个追求多数人革命的政党来说，党内存在不同意见是有力量的一个因素，可以使党发挥更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使党内持异议的少数派的存在成为正常现象，使它在党内有合法地位。

这样做并不是破坏由多数人作决定的民主原则。我举了

利用核能为例。党必须对这个问题表态，党的立场是由多数人作出的决定。举例来说，所有的议员都必须根据党的这一立场去投票。但同时会有一些共产党人公开在党报上维护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并且将来党的立场还可能改变。这样做并没有取消党在行动上的一致。只会使讨论更加灵活，有利于使它深入到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去。

圣地亚哥·卡里略回答说，我举的例子是极个别的特殊现象，说提这个修正案的目的是在谋求使党内派别合法化，否定党的基本原则，甚至说这是另一种党的提法。

皮拉尔·布拉沃的修正案付诸表决时，26票赞成，5票弃权，64票反对。修正案遭到否决，但这是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票没有支持卡里略提到“大原则”高度的立场。这种情况发生在讨论有关党内自由、少数派和流派等问题上，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另一个重要的辩论是围绕莱尔克松迪提出的关于应赋予西班牙共产党联邦制结构的建议。表决时26票赞成，74票反对和5票弃权。

当时大家对第38款还没有十分注意，这一款是关于一旦出现同“民族地区的或大区的党”发生冲突时可以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来进行调解，“特别会议对该问题作出决定”。想不到就这么半句话在几个月后造成几乎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巴列斯特罗斯对这句话进行了辩护，把它作为承认自治区党可以有更多个性的一个步骤。莱尔特松迪要求删去这句话，但最后还是保留了下来。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把这句话解释成为似乎书记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运用中央委员会的表决为

所欲为的通行证，甚至可以违反党章的规定。

引起争论的另一个领域是关于党的领导机构问题，首先涉及选举的程序问题。现行的做法是由各代表团，主要是由领导机构的代表组成一个“候选人提名委员会”，根据事先决定要选出的候选人人数，协商并拟定一个正式名单。没有进入名单的候选人就放在候补地位，但只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有少数几个人当选，因为这就要求多数代表不仅要一致投票赞成不列在正式名单中的候选人，而且还要一致赞同从正式名单中抹去同一个人。这也就是说，正式名单有占绝对优势的有利地位。

党的民主化，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要求改变这种做法。有一种可能性，也许是更为正常的做法，就是允许提出各种候选人，然后根据比例原则进行选举。莱尔特松迪在接受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修正案。

“每个代表和代表团可以向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将对所有提出的标准和提名进行审议，起草出各种组织机构的候选人名单，名单中应把凡已经提出以及提出后来被提名人撤回的全部名字包括在内，并且标明提名委员会赞同的程度。这份名单将提交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大家都可以根据已经确立的规定形式对每一个候选人进行辩护或反对。”

这个建议无疑是使选举民主化的一个形式，取消正式候选人名单，而且把所有的候选人都包括在内，只是标明委员会内对每个候选人的赞同情况。

这个修正案 19 票赞同，6 票弃权。

党章草案增加了书记处的权力，并且由于写入总书记“代表党”的字样而增加了总书记的权力，这是九大党章所没有的。塔马梅斯对此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建议成立集体书记处并包含有卡里略不可能重新当选为“第一书记”的意思。他的建议全文如下：“集体书记处从成员中选出第一书记作为书记处的协调人和推动者。第一书记在当选时不得超过65岁，任何情况下第一书记不得连任两次以上。”

这个修正案只有塔马梅斯自己一个人投赞成票，有3票弃权，其中当然有圣地亚哥·卡里略。

还有一些人努力想把专业工作者基层组织作为一种正常的组织形式写进党章，胡利奥·塞古拉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赞成的有15票，皮拉尔·布拉沃也提了一个修正案，赞成的有18票，都没有得到通过。党章只提出“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允许存在，那也只是极少有的例外。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实际上是否定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

后来我们进入关于党的那一部分决议草案的讨论。草案写得很糟糕，是一种防守性的、辩解性的口气，承认有些事情没搞好，但既不分析原因也不提出建议或将来的解决办法。草案提到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的流派”，这种流派对“党的本身性质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党的特征”提出了疑问。但是草案没有说明是哪些特征。草案在另一处提到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执政的、民主的、群众性的政党，党内存在各种思潮”，看来似乎承认思潮的存在。草案明显地需要作彻底修改。皮拉尔·布拉沃在提出的书面修正案中写道：“我认为完全有必要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的一个小组来重新改写这

部分，以提出一个明确的稿子，至少把我们所涉及的问题深入一步，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些自我批评——不要自我辩护——并制定党在未来三年内令人鼓舞的前景。”

莱尔特松迪也提了一个修正案，提请大家注意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修正案说：

“当前的社会运动要求党加倍努力以扩大分析问题的视野，注意新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运用并没有看到这些社会运动的全部重要性。同时也有必要使党的活动和组织变得灵活起来，突出各级集体组织的自主性，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现象的极大复杂性和巨大潜力。……最后我认为有必要对党员脱党的原因进行分析，现在的文件草案没有这么做。我们不只是失去了许多一般党员，还失去了许多积极分子，许多共产主义的战士。我认为除了关系到总的政策的因素之外，原因还在于党本身的运行，在于党变得官僚化，限制党内民主，不鼓励大家参与，也不去开辟参与的渠道，我们对待群众运动的政策有不足之处，没有贯彻不兼职的原则，这意味着包办代替和独揽大权，党缺乏革新。”

在讨论过程中，主席团内有某些成员如萨托里乌斯以及根据有的说法卡里略自己都觉察到任命一个小组委员会来重新起草文件的建议是一项普遍要求。会议曾一度休会，书记处成员之间交换了多时意见，但就是这一朝着寻找明智的解决办法走出的小小一步也没有成功，会上强行通过不妥协的做法。在重新开会时，起草小组重申拒绝任命小组委员会，并把修正案付诸表决，赞成的有 20 票，就这样否决了原来有可能引向不同意见之间认真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关于党的部

分的决议草案以 16 票反对、7 票弃权获得通过。这是三个月后西共十大上主要斗争的前奏。

最后还有一项议程，就是书记处建议把弗朗西斯科·加西亚·萨尔维(即工人委员会中那位有名的帕科神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如果与同年 11 月发生在我们头上的事相比，那么从处理程序的角度来看，他是多么运气呀！每个中央委员都收到他的一些讲演的全文，他在这些讲演中对党的政策进行了甚至粗暴的攻击。

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发表了一篇指控萨尔维的讲话。我现在想起来还替他害臊，这正是因为我还拉不开情面。我在内战时同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相识，我记得是在特鲁埃尔战役中，当时他任 11 师政委。他对萨尔维的指控倒象是他已经把过去的 25 年忘得净光。他把一些定罪性的形容词扣到萨尔维头上，什么民众主义者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在这之后，我真想要求恢复萨尔维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的权利。后来由于许多中央委员已经离开，不够“法定人数”，因此提请下一次会议投票表决。

《工人世界报》第 123 期发表了卡里略在中央委员会为展开政治讨论而作的发言全文。编者按说：“到本刊截稿时止，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仍在进行，《工人世界报》将在下一期上介绍会议讨论情况”。

但做的同说的相反。下一期《工人世界报》对会议的讨论情况只字不提，也没有刊登会上提出的修正案和投票情况。只是登了会上通过的决议草案和党章草案。这就是说，全党不可能知道中央委员会用什么方式通过文件，也不可能知道讨

论的过程和内容。这反映了把基层党员当成智力低一等的小孩子，给他们喂的只能是些嚼烂了的现成东西。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批评了流派的存在。他说，在党内就某一个问题的选择方案是“将共产党人引入歧途”。

怀着这样的想法，又怎么能使党员真正参加政治生活呢？

《工人世界报》在党章草案问题上的态度就更加荒唐。幸亏皮拉尔·布拉沃提出的修正案，会上通过了党章的第18款，该款说，“公布决定。除由多数人决定的个别情况外，领导机构将公布其讨论情况和决定”。当然，中央委员会并没有作出不公布讨论情况的决定。

《工人世界报》确实发表了消息，那是关于塔马梅斯脱党的消息，并刊登一篇长文对塔马梅斯进行指控，这篇文章无人署名，但特别注明是书记处决定发表的。

塔马梅斯对党章提出了50条左右的修改意见，他是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但是从他参加小组的情况来看，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他几乎难得参加的情况来看，我得出的印象是他已作出了结论，认为在党内不可能推行他所认为不可缺少的改革。自从他公开作了某些批评之后，卡里略就用不公正和庸俗的方式攻击他，甚至否认他在秘密工作时期的党龄，我认为塔马梅斯对政治的观点同我的很不一样。但是《工人世界报》对他的立场的介绍使人害臊。那篇文章歪曲塔马梅斯在一次会上讲话的一系列思想，以此得出结论，把他几乎说成是民主的敌人。由于他离开了党，就采取使他声誉扫地、并且近乎造谣中

伤的做法，这是最恶劣的教条主义时期做法的典型残余。当即将召开代表大会而出现意见分歧时，这种现象再次出现是一个很不好的征兆。这一切只有使气氛更加紧张，使党内广泛的阶层更加感到气愤。

当基层委员会开会开始讨论党代会决议草案和党章草案时，在马德里开始散发一篇题为《争取欧洲共产主义的革新》的文章（我在前一章已经提到过）。它的内容并不是爆炸性的。<sup>①</sup>它批评党的政策考虑策略过多，尤其是批评马德里党组织内部缺乏讨论和民主方法。但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那么多人签名支持这篇文章，其中有马德里各联邦党委会和各区党委会的成员，市议员，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工会干部等等共有 253 人签名。这件事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事件。这样做符不符合党章无关紧要，反正两个月以后就要开党代会，而党代会是决定党应该怎么做最高权力机构。这事实上是有关党代会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得到大量支持的政治态度。

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着对欧洲共产主义意义的十分精采的解释，全力支持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和思想，包括其理论思想在内，同时对西共在一些方面所采取的政策进行论证性的严厉的批评。它把问题摊到桌面上，指出如果真想开成一个肯定欧洲共产主义的代表大会，那就必须接受某些方面的批评、同那些方面对话并把这些批评置于党的正常活动范围之内。

文件纠正了两种错误的说法，这两种错误说法几乎成了

---

<sup>①</sup> 见本书附件二。



信条广为流传。它们是：一、谁要是批评领导就是站到苏联人一边；二、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对党所做的一切都要赞同。

对这个文件作出答复清楚地表明这是西共一次往后倒退。

原来曾经决定在《工人世界报》和《我们的旗帜》上开辟“论坛”，以便党员们可以随意发表自己对代表大会文件和党章草案的意见。并指定由4个人组成小组来负责论坛的工作。这4个人是巴列斯特罗斯，萨托里乌斯，赫雷斯（《工人世界报》社长）和我。我们第一次开会时，赫雷斯就带来了这个由253个人签署的文件。有人把这份文件送到了《工人世界报》编辑部。小组什么协议也没有达成。萨托里乌斯和我主张发表，萨托里乌斯说，不管怎么样，可以加上一个注说明采取集体签名的方式是不正常的，但只是指方式而言。巴列斯特罗斯和赫雷斯反对发表，巴列斯特罗斯说，无论如何应该对内容作出答复，他认为内容是不能接受的。

问题提到了书记处，讨论得十分激烈。皮拉尔·布拉沃和萨尔迪瓦赞成发表。他们投票反对会上通过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要主要签名者自动撤回签名。这是卡里略亲自找署名的一部分人谈的，其中有爱德华多·曼加达，路易斯·拉罗克，何塞·路易斯·马洛，德·莫利纳，克里斯蒂娜·阿尔梅达。不言而喻，他们拒绝这么做。这些人已不是孩子，他们在签名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于是首先由马德里省委，然后由书记处发表通告，指出这是分裂行为，要执行“党纪”。

《工人世界报》开辟的“论坛”变为标明革新派思潮力量的园地。给论坛投稿的人中，反映革新派思想的有 30 人左右，反映“官方”派思想的有 25 人左右，还有 10 人左右发表了教条主义的立场，个别人还采取“亲苏”立场。绝大多数稿件集中在党的问题上，讲到党所遭到的危机和如何克服危机的想法。

自从关于党内讨论的第一批消息传出来之后，有一件事情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欧洲共产主义作为政治纲领已取得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胜利。

于是党的最高领导层开始作出了一个关系极为重大的政治决定：把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置于第二位。并把清除和击溃革新派作为十大的第一位目标，卡里略发出了反对革新立场的攻击信号，既没有提出什么论据来，又不讲道理，而相反地采用影射和诽谤的做法。在《工人世界报》（7月10日—16日第133期）发表的对他的采访中，卡里略说在代表大会的争论中有三种立场：一种是宗派和教条的立场，一种是由他所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立场，还有一种“我不知道是把它算在欧洲共产主义之内还是之外，今天人们称之为激进的革新思想。”

这就已经开始要把我们开除出欧洲共产主义了，卡里略自认为货真价实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标签只是操在他的手里！

领导机构派往各省和自治区去参加这几天举行的各种会议的人也都采取同样的态度。而几乎在所有各地都同广泛的阶层发生冲突。这些阶层相反地坚持要把代表大会开成一个革新的、改变工作方法的、开放性的大会，真正有党员参与和自由辩论的大会。

在马德里举行的会议上，阿道夫·皮涅多代替桑切斯·蒙特罗当政治书记。党员人数下降了一半，从1978年5月的32,000人下降到1981年6月的16,000人。维护领导路线的人是少数。会上通过了要求承认流派存在的修正案。省委是由少数代表选出来的，在总共450张选票中，皮涅多只得到196票，埃克托尔·马拉拉尔127票，何塞·韦托斯81票。这是一种不承认流派的奇怪结果：省委只代表属于少数的流派，但这个流派却确实是得到党的最高领导支持的。会议的发展使领导核心十分惊讶，他们认为自己有把握会得到多数。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在报告中对革新派进行了全面攻击，对革新派攻击用的篇幅要大大多于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攻击，却不料棍棒会反过来打人。

《工人世界报》在这个时期公布的有关全国各地会议情况的报道对讨论进行了歪曲和指控，突出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什么手段都用了，就是不作客观的报道。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最后一期《工人世界报》发表社论，又再次采取摩尼教善恶二元论式的报导。它说，一方面有人攻击党的独立性和攻击欧洲共产主义。接着又说，“另一方面有的提法把共产党引向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破坏党的统一行动，使它陷入没有成效的争论之中。”

竟然指控我们为“社会民主党人”了，并且都罪恶滔天！

7月20日发生了一件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事情发生在我们宴请即将离任回家的波兰驻马德里大使诺伏利塔及其一家的便宴上，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一直很友好。当时卡里略和我出席了宴会。大使告诉我们波兰

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认为大会是开放和革新倾向的胜利。他还具体谈到以下情况：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并不接受党的“平行组织”（就是说各地的共产党人可以在本组织之外开会）作为**采取决定**的地方，但是认为它对各地共产党人之间在党内开展更为自由更为丰富的讨论是有益的。他指的这种“平行组织”实际上等于我们在西共党内所要求的少数派权利或者流派的权利。我表示对此很感兴趣，大使也热情而详细地作了介绍。

圣地亚哥·卡里略则用尖锐的语气说，接受流派等于是鼓励成立派别集团，这样会导致共产党人之间进行甚至可能是剧烈的冲突，并举了加泰罗尼亚一些偏激的人攻击索莱·图拉为例。他还说如果十大承认党内的思潮和流派那么他将拒绝当总书记。即使选上他也不当。他将建立自己的派别集团，六个月后再重新当党的领导人。

他解释马德里会议的情况说，会上多数人接受流派的存在，那是因为投票时时间已经很晚，有相当多的工人已经离开了会场。

话题转到其他方面。大使十分热情地表示希望西共力量能增加，能取得部长席位。他对卡里略说，将来卡里略无疑会当上部长。

这时发生了那件使我目瞪口呆的小事。卡里略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我对当部长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部长走在大街上，没人认识，而我不管上哪里，连小孩子都认识我，都同我打招呼。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

7月21日由于受到周围气氛的影响，我的磁带上“即兴”

录下我对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想法，我认为在这里抄录出来是有用的，也是有意义的：

“中心问题是在党内确立欧洲共产主义，击败‘亲苏分子。’这一点基本上已经做到。圣地亚哥在一次谈话中认为决议中有关国际问题的第一部分已经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了。这同他几个月前对我讲的恰恰相反。当时《我们的旗帜》发表了一篇引起许多抗议的社论。圣地亚哥对我讲的论点是持批评态度会导致亲苏分子的胜利。几天之后巴列斯特罗斯同我讲的话当然同卡里略的意思一模一样。现在倒好，一切都反了过去。对击败欧洲共产主义的企图作出回答的正是革新派的立场。革新派在《我们的旗帜》和《街道》杂志上对这些攻击的答复可以拿来作证。此外几乎没有作过别的认真的答复。

“从这时开始，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已经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一旦亲苏分子减到极少数，那么我们这些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必须对我们所不能取得一致的问题展开争论，即：要建立什么样的党，如何使党内生活变得灵活起来，民主化和革新化起来，多少允许流派的存在，保障自由辩论……这是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应该采取共产党人所用的讨论式的气氛来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圣地亚哥的意图现在似乎是要把革新派当成主要敌人，发起对他们的攻击。

“这是对欧洲共产主义攻击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在有些地方，如巴伦西亚，如在法国的移民中，对领导层无条件服从的那些人的主要特点是某种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气氛，垂直地、自上而下地对领导无条件服从，某种‘三圣一体街上大楼里捉

巫婆<sup>①</sup>的气氛。通过人们对我个人的态度，我对此直接有所感受。

“因此，欧洲共产主义的前进和发展要求把争取实行某些积极的变革作为中心问题，以便允许党内展开讨论，允许党内存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思想；争取把这些分歧、这些不同意见和这种政治斗争放到正常的位置上；把它变成党的正常情况，党必须用新的方式，寻求新的答复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显示今天持革新派立场的人所拥有的相当可观的力量，显示这种力量对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也要看看我们能否一起在采取最起码的步骤上达成谅解，能否认识到有必要在关于党的问题上确定一种能够替代决议草案第七部分的立场，并以此为基础，使我们能够从现在起维护我们关于能够运用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党的概念。我不知道这些想法在代表大会上是否将是少数，但是这种思想是存在的，有一部分人是主张这种思想的，并将继续维护它。

“让我们看看近期内会发生什么吧。”

4天之后，我们又回到中央委员会的那间白色的大厅里，讨论和通过卡里略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代表大会第一天会上的报告。我们这些革新派坐在我上面讲到过的那几张桌子旁。我看到了人们投来的怀疑的眼光。我们坐了同样的座位也被解释成为我们在进行派别活动的证据。

卡里略宣称他不发书面报告给我们，不愿冒让报界在代表大会前把报告弄到手的危险，这可真是树立信任气氛的好

---

<sup>①</sup> 指中世纪捉巫婆，有一网打尽之意。——译者

形式。他说他选几段他认为是基本的内容念一念。于是我们就得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和表决。好多人在发言中提出抗议,但是他照样这么做。

这份报告无疑是我所听到的卡里略的报告中最糟糕的一份。政治问题上没有一点新内容,都是重复已经讲腻了的话,比他一贯的态度还要居于守势。要说有些新提法的话,那么也只是随心所欲、别出心裁的,并不是根据分析来做的。

例如第一部分涉及国际问题,战争危险,我们反对西班牙参加北约的理由,密特朗的胜利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反应。但是一点都没有涉及波兰问题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质问题,也没有提到欧洲正在兴起的和平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往往并不属于任何政党。也没有涉及西共为开辟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对话而进行的如此重要的倡议和工作。报告没有提到1980年10月召开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会议,也没有提到1981年2月关于安全问题的会晤,上述两次在马德里举行的会议无疑标志着走向欧洲左翼的开端。关于欧洲左翼问题,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解释过了。报告相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一项奇怪的要求,要它们对解散集团提出具体建议,而这个建议是没头没脑的,我们怎么能设想这样一种建议会有用呢?总而言之,国际部分提出来的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冲淡了的欧洲共产主义,这是在对革新派进行攻击的时候把同苏联人和亲苏分子的矛盾置于最低点。

报告第二部分在关于西班牙国内政策方面老是纠缠在一个问题上,要表明我们在过渡时期提出的关于民主联合的政策,正是继续了我们在反佛朗哥斗争时期的战略。这是一种

“自己总有道理”但是“环境同我们过不去”的做法。

报告内容事实上同代表大会前交给全党讨论的文件草案是矛盾的，应该说卡里略一段时间以来在向报界发表的声明中，不断诋毁决议草案，他在这次的报告中又这么做，而且由于他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做的报告，因此情况更加严重。

实质的政治问题是我们需要不需要从民主的角度制订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战略。卡里略说不需要，但是为此他歪曲了我们在秘密斗争时期的战略。当时的战略确实是以“争取自由协议”为基础的，但是我们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班牙资本主义的本身同民主是不相容的。西班牙在历史上只有很短的几段时期是民主的。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同欧洲其他国家相反）不是一种能容纳民主的资本主义。所以，通过团结国内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广泛阶级，我们就将创造取得民主成果的条件，但同时从战略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孤立资本主义，并从而以自由民主的名义、依靠最广泛的基础开辟走向民主的通道，这种民主不只是政治的、也是经济和社会的民主，或者说已经开始转向取得领导权和走向社会主义。

与此相适应的一种斗争形式是和平的总罢工，这是我们从1968年的切身经历出发提出的，我们甚至在理论上作过阐述，认为有可能产生国际性的影响。这种和平总罢工几乎有全民参加，大家团结起来反对一小撮寡头资本主义的核心和反对为它们服务的国家，从而它能为进行更为深刻的变革，甚至为走向社会主义起决定性的、民主的和群众性的杠杆作用。

我们这一战略思想明显地已经失败了。过渡时期是在寡



头势力的领导下实现的。西班牙的资本主义通过它们的政党在国内某些领域内得到支持和赞同。若象卡里略报告中所说的继续同样的战略，只会有利于使已经发锈的唯策略论合法化，而使国内最有活力的阶层丧失士气和脱离我们。那些阶层要求民主，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个共产党缺乏检查和承认自己错误的的能力，也不能从现实出发，制订把今天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前景联系起来的新战略。

这种情况使卡里略拿出历史来作对比，而这种对比正好证明他是错的。他说1931年同共和国决裂之后也出现过失望情绪。这是事实，但恰恰是这种失望情绪造成共产党力量的加强。我在1934年由于对我周围和我家庭周围的那些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力量感到失望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当时人民阵线新战略的出现反映了广大群众反法西斯的情绪。这才造成共产党的力量取得某些增长。这同我们当前的经历又有什么关系呢？由于民主制度的受挫和削弱而造成的失望情绪今天影响和袭击了共产党。人们对共产党纯粹是合法主义的见解愈来愈不感兴趣，更不用说青年了。

报告中关于党的部分完全是针对革新派的，报告中关于反对亲苏派的一段提法是很奇怪的，指责他们在革新派要求承认派别时可能同革新派在批判领导的问题上合流，而搞派别是亲苏分子所赞颂的国家中所禁止的。这是高明地提醒大家亲苏的教条主义分子同卡里略的领导之间应该存在共同点，即：禁止派别和流派，而这就是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

对不可否认的党的危机作出解释是很容易的，把它说成不是概念上的错误，而是“实践中产生的错误”。问题出在抛

开了基层委员会由上面来制定政策。解决办法就是让干部回到基层委员会去。

党的部分与政治部分实质上是有联系的。如果不需要新的战略，那么为什么要提出变革党的问题呢？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主张建立新型党的人并不打算回答现实中产生的新问题，他们要的是权。因此，根本不需要讲什么道理，只要对他们进行谴责，诋毁他们的荣誉，对他们提出指控。然后，把他们开除出去就够了。

报告特别推崇共产党的政治中和一般的政治中最陈旧的工作方法，即：要有有魅力的领袖；进一步加强党的专职机构；用最为集中的领导来对付“过分离心的倾向”。报告批评了滥用“自上而下”的政策，但同时坚持“在特定情况下采取必要的政治决定时党员大会永远代替不了通过选举所产生的负责的政治领导的作用”和“关起门来协商”的必要性。

卡里略在报告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关于用新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推行参与制、承认社会运动的作用和促进直接民主形式这整个问题，也没有提到关于组成进步集团的思想本身。要是没有这一切，还成什么欧洲共产主义呢？

报告在派别和流派问题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论据。但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确凿的威胁。报告说，“清除派别活动后，党就有可能解决内部的争执”。选用“清除”一词完全表明目的何在。根据我的看法可以作这样的结论：堵死向真正的欧洲共产主义演变的道路。

这份准备在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或至少念给我们听的那几段）在中央委员会的辩论中成了索莱·图拉，胡利奥·塞

古拉,卡马乔,费尔南多·佩雷斯·罗约批评的靶子。而安达鲁西亚总书记费利佩·阿尔卡拉斯却相反把报告说成是强硬的、不妥协的、“货真价实的欧洲共产主义”。

我作了一篇相当长的发言。我当时已意识到我处在政治生活的十字路口,更简单地说处在我生活的十字路口。我的意图是向中央委员会报告我感受最深的忧虑,在这个中央委员会内,不少人多少年来同我并肩战斗过,因此我认为现在发表这篇讲话是有用的,我是根据手头拥有的大量摘记做的。<sup>①</sup>

我尽了一切努力来缩小分歧。我甚至说除了关于党的那部分外,报告其他部分我都准备接受。我讲到十大能够并且应该首先是欧洲共产主义的胜利,为此应该不伤感情地讨论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在党的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应该确保党内有自由的、光明磊落的公开讨论,使可能出现的分歧变成正常情况,不要使它戏剧化,并树立不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看成犯人的气氛。我最后说,如果对报告一部分一部分地表决,那么我对政治部分投赞成票,对党的部分投反对票。如果把报告作为整体付诸表决,那么我投弃权票。

卡里略作了个总结,目的是使已经表明投弃权票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他说他准备删去“奇闻轶事性的东西”,对市政管理作更多的评价,对经济问题加强批评。他说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他用这样的提法来寻求我们投赞成票。但他接着回过头来集中攻击我们这些要求真正自由辩论的人。他的论据是,如果少数派能够维护自己的意见,

---

<sup>①</sup> 见本书附件三。

那就等于在搞“另一套政治”，而这是不能容忍的。他坚持保留他所讲的关于反对派别、思潮和流派的想法。然后他就1980年12月《我们的旗帜》的社论，开始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他说他曾就这篇社论同我个别交谈过。他指控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在报刊上公布。他最后对我个人说了话，回忆了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许多岁月，并说如果我认为主要是使欧洲共产主义取得胜利，那么他要求我投赞成票，放弃原来弃权的打算。

我在中央委员会的大厅里站了起来。一般在总书记作完总结后是不再发言的。我向主席团提出由于我被点了名因此要求发言，主席团同意了。

我在发言中指出卡里略并不是回答我的论据，而是企图诽谤我。这不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我说关于那次私下交谈，由于谈话内容本身要求我们都必须向相当多的人通报，因此我向《我们的旗帜》编辑部通报了，以使他们了解总书记的批评和关于编辑部增加新成员的建议。我指着卡里略说，你当时也有义务向书记处通报以便准备向我提出的关于增加新编辑成员的建议。我等了好几个月但再也没有下文。由于我们的谈话必然要让相当多的人知道，因此透露到报界去并不足为怪。不管怎样，我完全拒绝接受这里说我把同圣地亚哥私下谈话捅到报上发表的指责。至于这种指责的实质，卡里略用来形容我的那种方式本身就证明党的职能中有许多应该改变的东西，为此我决定对报告投弃权票。但我并不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我的弃权绝不减弱我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

卡里略又回到讲坛说只想讲一件事：他在同我个别谈话后考虑最好不要派新编辑参加《我们的旗帜》而是等代表大会决定，因此没有同书记处谈这件事。也因此，一定是《我们的旗帜》把情况透露给报界的。

这时我没作声。事后我查阅了我作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经常收到的书记处会议记录，我在1981年4月3日的记录中看到“预定一个时间在书记处讨论《我们的旗帜》问题，并讨论那些同志可能派去加强编辑委员会。”

那么卡里略在中央委员会讲的就不是真话。

在表决报告时，94票赞成，17票弃权。表决用的是举手的方式。

## 第三章

### 革新

党的革新问题是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所有的人口头上都赞成革新，但在卡里略的报告中有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有助于弄清根本的分歧点。报告求助于具有世界声誉的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亚当·沙夫对这一问题的权威论述说：“象亚当·沙夫那样一个灵敏的观察家最近强调的那样，党的官僚主义化是从消灭老的近卫军开始的。”

在这个报告中引用沙夫的话显示出某种挖苦的味道。沙夫也许能算得上是一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和尼科斯·普兰查斯一起曾经明确和坚定地提出承认共产党党内流派的必要性，这种提法也明确地包括西方共产党在内。沙夫写道：“内部民主要求采取确切的措施：内部民主是指要有发表和讨论不同意见的可能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观点一致的人在党内形成小组……”；“根本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能在组织上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将党内民主准则付诸实施是不可能的。确实，如果少数派，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派，没有权力举行会议来提出自己的意见，那么他们还如何实现保卫自己意见的权利呢？另外，目前在各国共产党中难道就没有

不同的集团和流派吗？当然有，只要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处于危机的时刻，走过去听听他们是如何发表意见的，这点就清楚了。对党来说，正大光明地讲出意见来不是比搞私下活动或是象秘密的集团那样活动更好吗？”<sup>①</sup>

我个人十分厌恶借助语录和权威人物的力量来讨论问题，这是由于过去一些时候这样搞得太多的缘故。但即便是引用沙夫的话，也不能断章取义，而不顾他的整体思想。

至于“老近卫军”，我认为这不是研究革新问题的角度。我的意见更多地是取自陶里亚蒂关于“领导班子”的想法。西班牙共产党从内战时期起基本上有两个“领导班子”：第一个班子主要还是由内战时期党的领导人和几个比较年轻的领导人组成的，如卡里略和克劳丁。这个班子直到1960年为止。在1960年党的六大上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其成员主要是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该组织是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36年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卡里略在1960年正好当选为总书记，克劳丁、加列戈、托马斯·加西亚、梅尔乔以及前领导班子中的几个人，主要是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米赫、德利卡多。

我在1981年1月的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阐述过自己的意见，认为已经到了推动、着手并且帮助组织“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时候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罢免卡里略总书记的职务，也不是要砍掉前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但确实要求改变轴

---

<sup>①</sup> 见《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一书第292和295页上的附件《党的官僚和社会主义民主》，1981年马德里阿尤索出版社出版。

心和打破旧的平衡，赋予新领导班子以新的基础和新的面貌，尤其是要从那些在佛朗哥统治最后几年已经在国内领导过党的工作的年轻干部开始（当时他们和象桑切斯·蒙特罗和罗梅罗·马林这样的人并肩一起工作过）。但这一立场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无论在比较老的干部中还是在年轻干部中都没有人支持。即使是在《我们的旗帜》编辑部本身也有一种倾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年老或年轻，而更在于领导方法。这是对的。但是这也不能因此而把保证和促进领导班子必要的更新换代问题撇在一边。

就人来说，就所有的知名人物来说，都有一种攫取权力，哪怕是他所拥有的那一点点权力的倾向，这已经表现得那么显而易见，那么屡见不鲜，使人简直羞于提到这个问题。我很多年来，就同党的领导人私下谈论中多次表示我赞成南斯拉夫已实行多年的轮换制度。一个领导人的任期不应超过两届，譬如说六年。在有些情况下，轮换要更快些。这种方法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把这种替换变为一种客观事物，不致伤害人，并保证近乎自动的更新和年轻化。

卡里略在十大的报告中用了我曾经在多次谈话中听到他说过的论据来反对轮换制，他认为这样把干部从这一个岗位调到那个岗位，但调来调去还是同一批人。我认为即使仅仅做到干部的经常调换岗位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丰富工作经验。此外，南斯拉夫的经验已经使得政权非个人化（是指在铁托死后），这无疑是高度民主的标志。对具有这样一种历史过程和目前还面临严重客观问题的国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纯历史问题意外地出现在中央委员会有关代表大会



的报告中。我先叙述一下事实经过，然后我想解释一下问题的实质所在。卡里略在报告中论证必须禁止党内流派和帮派时，讲了这样的话：“人们经常借助于列宁来使这些活动形式合法化，但恰恰是列宁本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十大上曾建议予以禁止。我们不要忘记他必须从现实出发。自1917年起，布尔什维克党是由几个根源和历史都不同的政党的派别形成的集合体（有托洛斯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派等等），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夜或在十月革命的发展中联合起来的，但各自内部仍保持自己的连系和一致性，致使它们彼此之间仍然是不同的。”（见《工人世界报》1981年7月20日，第136期，第34页，重点号是我加的）

首先，这段话反映出他念念不忘继续凭借列宁的庇护来确定我们所需要的党的类型。

但在这段话中有严重得多的问题：企图通过在准备表决的政治报告里指出的一些论点来结束对一个历史问题的争论。这是要把一个历史问题（这同科学问题或美学问题是一样的）同一个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文体混同起来。

怎么可能要求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多数票来确定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是一个“几个党的集合体”或是一个单一的党呢？

这是倒退到过去一些年代习以为常的做法上去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曾发生过这一类的倒退做法了。

我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中，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现象。我当然认为卡里略的论点十分荒谬，没

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论点。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我认为卡里略在有关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方面维护这种或那种观点都是可以的。但我认为不能容忍的是他把这种思想放到了将以中央名义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去。我在发言中甚至说过这是我对报告投弃权票的又一个理由。

卡里略在他的总结中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我曾相信他会删除这个内容,但是不然,他还是照旧保留。究竟为什么呢?我至今还在考虑。

唯一的解释就是卡里略想把保持和加强这种使党变为“历史原因”和革命“真理”的化身的传统摩尼教作为反对革新者的冲击的决定性王牌。特别是面对受这种摩尼教影响最大的阶层,以忠实于列宁遗产的面目出现是很合适的,尽管需要用编造一种独出心裁的、失去理智的历史理论作为代价。

实际上,关于党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旗帜》编辑部已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思想战,皮拉尔·布拉沃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伊格纳西奥·拉铁罗的反驳,在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三圣一体街在巴斯克的代表,我们在《我们的旗帜》上发表了他的反驳和皮拉尔·布拉沃的第二篇评论。我本人也在《街道》周刊上写过一篇关于有必要建立新型党的文章。后来一个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道弗·桑切斯·巴斯克斯在墨西哥写了《关于新型党》的文章,发表在《街道》上,他在文章中写道:

“真正的民主是与思潮或流派的存在分不开的,是与这些思潮或流派的思想、建议或替代方案在党内的传播分不开的,这种传播不但要垂直地在上下级之间进行,而且应平行地在

同级组织中进行。”他在结论中补充道：“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巩固民主的战略所要求的‘新型’党以及为了能够把这种战略推向明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应该在这方面跨出更快更大的步伐：这个进程的基石应该是充分的、实质性的内部民主，不是受到中央集权主义和垂直领导原则限制和约束的内部民主。”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就是它不但被用来摒弃这一思想，而且还准备把我们这些具有这种思想并愿意捍卫这种思想的人当作帮派分子来加以迫害。

## 第四章

### 克维多影院发生的意外事件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于7月28日星期二上午十时在克维多电影院开幕。天气异常炎热，增加了人们疲惫和焦躁的感觉。场地情况很糟，影院的大厅塞得满满的，没有能写字的地方，门厅总是拥挤不堪。我一回想起这些天的情况来，脑子里就象过电影一样，出现一个接一个的镜头，时而各种镜头混杂在一起，有的十分激动人心，有时造成惊慌，大家睡眠的时间极少，到最后都精疲力竭。

首先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证实了代表大会上被人冠以革新派称号的人具有广泛的力量。这从讨论代表大会规则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可以看出来：原定的规则建议各种提案和修正案只有在小组委员会上得到30%以上的人支持时，才能提到全体大会上讨论。巴斯克共产党总书记莱尔特松迪要求发言，并提议将30%改为25%，这样使提案更容易提到全体大会上，使代表大会进一步民主化。大会投票的办法是，每个代表有三块大纸板，一块上写着“赞成”，一块上写着“反对”，第三块上写着“弃权”，表决时他挑出一块纸板举起来。计票人就在影院的过道上数票，然后把结果送到主席团。这次投票数了两次，最后主席团宣布结果：483票赞成莱尔特松迪的建

议,447 票反对,27 票弃权。

不过革新派的这一力量我一到电影院就感觉到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热情地走过来,祝贺我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对处于这种“受人拥戴的领导人”的地位,总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这大概是由于我胆怯,我认为我的天性不适宜作一名“政治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对那些向我表示支持的人更加充满感激之情,而且我也试图向他们表示感谢。

大会第一天发生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前一个星期天,我陪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萨拉曼卡。他们是在开会前几天到的,我们为他们安排了一些游览活动。理所当然,那天我同省委的成员谈了话,告诉他们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中发生的事情。看来我访问萨拉曼卡的消息不胫而走,并传到监察委员会一位委员的耳朵里,他想询问萨拉曼卡的代表,以了解我是否搞了“分裂活动”。于是在大会前就开始“捉巫婆”,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做法,因此我在过道上同很多人评论过这件事,报纸上拿去大加渲染。

在继续叙述大会情况之前,我想有必要对大会的开法作些解释:所有的与会者都按照民族、大区或者省组成代表团,只有受代表团的委托方能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这样,真正的争论都是在各个代表团内部进行的,也就是说完全是分散的,这一地区人与另一地区人之间没有什么交流。例如,卡里略的报告在全体大会上宣读之后,各代表团在各自的场所集中起来进行讨论,然后每个代表团再指定一人(如果少数派立场得到 25% 以上人的支持,也可以是两人)到全体大会上发言。然后,各代表团派代表参加讨论大会文件和党章的小组委员会。

再由小组委员会推举一个(或数个)发言人把小组委员会上通过的文件提交全体大会。按我的意见来看,这种制度环节太多,不是好办法,是一种超级代表式民主的形式。我在写这几行字时,是在刚刚参加了巴斯克左翼成立大会之后。在会上,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代表都可以在全体大会讨论时发言,时间虽然是限制得很严格的,但总还可以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专家,我认为代表大会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有党员更直接活动的形式。

至于我自己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只有在有具体任务时才能讲话,比如说,我就无法在大会一般性讨论时发言。我受委任参加国际问题小组委员会,而小组委员会又推荐我作为唯一的发言人在全体大会上汇报工作。我不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前一章里已经谈过了。

第二件使我感到意外的事情是,在几乎关闭在克维多影院的这几天里,代表们对卡里略的报告,尤其是关于党的部分的批评意见竟是这样明白无误。

这次代表大会明显地反映了共产党员的不快和不满,倾听着这些争论我思想上一直担心自己是否做得对的疑虑消除了。

还有两件更重要的事:党内持有这种批评意见的人占的比例相当大。此外,他们是在对欧洲共产主义绝对肯定地支持的前提下表示这种意见的。如费尔南多·佩雷斯·罗约曾代表安达卢西亚的少数派说过:

“某些发言认为,在革新派提出的主张中充满了诽谤,劝人脱党,摩尼教善恶二元论和丑化……少数派的发言人实质

上是强调报告中的这一部分比九大指明的路线退后了一步，甚至可以说是从已经确定下来的方针（可以举个重要的例子，比如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的方针）的基本内容上退后了一步。报告的这个部分表明党陷在一个拳头的控制之中，成为一个有可能把我们引向在选举中受到挫败的党……甚至使我们变成一个小集团，不仅教条主义的主张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党的组织不适应欧洲共产主义的方针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们强调，这里正是问题的所在。”

帕斯库亚尔·弗尔南德斯·苏亚雷斯代表卡斯蒂利亚——莱昂的少数派说：

“报告用的语言是不能容忍的，这种不断的诋毁以及关于党的作用所提出的方针，使不同的感受和意见都难以存在和得到表达。

“现在存在着对党内各种不同立场进行诋毁的做法，蛊惑人心地驳斥一些从来没有被那些立场采用过的论据，把思潮同流派和帮派混为一谈，把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同其他一些与欧洲共产主义无关的立场和观点混淆在一起。报告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种倒退。”

何塞·路易斯·马洛代表马德里的少数派说：

“报告的矛头所向就是攻击思潮的存在，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以允许合理地进行政治争论保证党的团结和巩固，允许个人和集体自由发表意见。相反，报告强调集中，垂直领导，纪律，整齐划一，对领导的忠心和对党的爱戴。

“另一方面，革新的问题被荒谬地贬为只是个年龄问题，并且谁要是把革新作为对党的领导方式和内容的变革来提，

就会毫无道理地被说成有野心和争权。”

克维多影院的代表大会上也有团结的时刻，罗伯托·莱尔托松迪讲话时就做到了这一点：

“至少我在这里所代表的人们都遵守十大作出的决定，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有效率、更加团结和更加坚强的西班牙共产党。不过，我们是带着两条信念来这样做的：第一，谁都不离开这里，谁都不离开党，我们都留在自己的位置上，留在代表大会和同志们给我们安排的位置上工作。第二，不要因为有意愿（不论是同级之间还是上下级之间彼此存在的意见），就把人开除出党。”

当时的掌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十分明显，这是我们绝大多数共产党人所希望的。

卡里略对讨论所做的总结是对这一立场的否定。他运用一种奇怪的论据。一开始，他说大会本身的进展表明党是民主的，因为有过争论。但接着他的结论却是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消除流派，给少数派以发言的权利就是破坏党。

关于卡里略报告的表决结果是这样的：在 1,019 票中，689 票赞成，266 票弃权，66 票反对。投反对票的是亲苏派，阿尔弗雷多·克莱门特就是持反对立场的，他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少数派。

投弃权票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这样的：安达卢西亚 61 票，马德里 48 票，巴斯克 40 票，坎塔布连 12 票，巴伦西亚大区 11 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阿斯图利亚斯 5 票，穆尔西亚 4 票，还有阿拉贡，卡斯蒂利亚——莱昂，加纳利群岛和加利西亚的少数派以及一些中央委员。



这一结果表明，从现代政治合理化的角度来看（我不是指变异的共产主义观点），如果对流派和内部争论问题不找到新的渠道、新的解决办法，那么就不可能在西班牙保持和扩大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域。

卡里略信誓旦旦地在他的总结中喊道他不在党内搞“协议”，这是遁辞，问题在于他是否有能力——和诚意——来实行必要的综合。当然他没有这种诚意，而且我认为他也没有这种能力，正因为如此，这种历史才不幸地继续着。

综合上述表决结果，看来，有两大消极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巴伦西亚大区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前者的代表是由党的机关选出的，这是令人不能容忍地践踏了民主。但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卡里略老讲反对协议，但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他和加泰罗尼亚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某些类似协议的东西，以帮助后者恢复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不久就获得自己活力的进程。那些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曾教我持批评态度的人，现在自己开始采取另一种立场。粗略地看，他们所采用的战术使他们达到了期望的结果，但还有未知数。

## 第五章

### 朝着旧式党发展

各个小组委员会关于政治决议草案的讨论是十分有意思的。数百名代表非常踊跃地参加讨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能取得一致意见和达成最广泛的协议。

国际问题的决议草案有 561 票赞成，21 票反对，24 票弃权。关于过渡问题的决议草案是争议最大的决议草案之一，结果以 526 票赞成、7 票反对、18 票弃权通过。

皮拉尔·布拉沃提出的关于左翼战略的决议草案以 704 票赞成、8 票反对和 24 票弃权获得通过，这一草案中包括一些关键性的论点，如工人阶级的作用、女权主义、社会运动、进步力量集团等。

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草案主要由胡利奥·塞古拉起草，由安塞尔莫·奥约斯宣读，有 674 票赞成，5 票反对，39 票弃权。

工会问题的决议草案有 672 票赞成，6 票反对，25 票弃权。

关于国家民主变革、自治和市政问题的决议草案由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和霍尔迪·索莱·图拉提出，有 603 票赞成，6 票反对，12 票弃权。

代表大会就这样以团结的精神阐明了它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但是在表决关于党的问题的决议草案时，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不仅是因为已经产生十分明显的意见分歧，而且也由于多数派所造成的那种紧张的、寸步不让的气氛。

为了弄清争论所在，有几个组织的革新派，主要是巴斯克、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的革新派，针对由海梅·巴列斯特罗斯主持起草的决议草案而准备了一个替代性的决议草案。

这个替代性决议草案由巴斯克共产党中最杰出的、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西格弗雷多·多明戈在全体大会上宣读。当他发言时，我走进拥挤不堪的影院大厅，费了很大劲才在前几排找到一个座位，这儿离外国代表们的座席不远。西希（朋友们都这样称呼他）严肃而准确地宣读替代方案，没有一点装腔作势的语气。这个决议草案几乎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之一，因为它所谈到的问题正是很多革命者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反复考虑的问题：一个共产党要生存，要在民主社会中起进步作用，要准备和推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步伐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和进行的变化。因此，我把这篇在大会上读过的文本作为附件在本书中发表，西班牙共产党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个草案，而且代表大会后，在共产党的许多组织中甚至把阅读这个草案文本当成是大逆不道和犯罪。

在这之后是官方决议草案的捍卫者维森特·卡斯卡拉发言，对这个人我一直到今天依然有好感，他是经常参加我们在巴黎召开的会议的青年干部中的一个，我和他相处很好。因此他粗暴激烈的发言使我感到吃惊，他最后把我们那些为争取少数派权利而斗争的人们叫作“社会民主主义者”。大厅作

出了强烈抗议的反应。我敢肯定，在紧张到极点的环境中，卡斯卡拉是异乎寻常地与现实脱离了，尤其是受到了海梅·巴列斯特罗斯，也许还有卡里略本人的巨大压力。

最重要的是投票；手中举起来的纸片得出这样的结果：由西希提出的替代方案有 225 票赞成，677 票反对，109 票弃权。官方的关于党的问题的决议草案有 651 票赞成，273 票反对，133 票弃权。

这时，一个西欧共产党的老领导人（我同他很熟，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参加国际会议），走过来对我说：“马诺洛，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如果是个西班牙人，我相信自己也会象你这样做的。”

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在那里是代表一个党，而这却纯属与他使命无关的个人姿态，也许会有人指责他是“干涉别人事务”。但我非常受感动，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一次表决表明在关于党的这一点上的批评态度（不论从哪一个角度讲，这在代表大会上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得了 400 多票，确切地讲是 406 票。持赞成态度的有 651 票，也就是说，接近 4 比 6。

对此，卡里略和无条件追随他的人是否曾思索过呢？因为我认为就在这个时候，领导核心又犯了另一个极大的错误。

他们是想在代表大会上恫吓和准备清除“革新派”的。无疑，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曾经想通过他的讲话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但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讲话时大厅有一半人都走掉了，外国代表团正在参加市政府举行的招待会，难道

这只是礼宾上的花招吗？

卡里略为了一上来就制造出一种宗教法庭式的气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动。7月26日星期日，也就是大会的前两天，《国家报》用通栏标题发表了一篇对他的采访：《卡里略说：“所有不尊重大会决议的人都将被开除出党”》。

27日星期一，我在三圣一体街碰到了圣地亚哥·卡里略，我表示对此十分不满，我对他说，我不记得有哪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是在总书记以开除相威胁的前提下召开的。这只能使业已恶化的气氛变得更糟。他回答我说，访问记歪曲了原话，说他正在找华金娜·普拉德斯来更正。说星期二的《国家报》一定会登出更正。我太天真了，第二天果然到报上去找，我直到现在还希望能见到这条更正。

最初的打算当然是明朗的。但在这些投票数字面前，在这种百分比面前，在已经造成的气氛面前，在这次反映党的复杂现实情况的代表大会面前，不管怎样是在支持欧洲共产主义的同时出现的一些非常广泛的思潮的面前，难道为了展开对所需要的新型党的讨论，还抱着那种打算想再次强制推行那种用纪律、垂直领导和团结一致来约束党的传统形式是明智的吗？进一步讲，回到旧式党的做法意味着会冒使欧洲共产主义最有活力的阶层分崩离析的巨大危险，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于是，卡里略对大会的回答象是维托尼克出产的壁毯上的警句：“好好爱护，不得修改。”

这是为什么呢？我只能斗胆做一些揣测性的解释，这是因为从大会前几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同领导核心的成员推心

置腹地谈过话，人们已经把我看作“不太可靠”的人，其中有些人若说他们都把我当成“敌人”则未免有点夸张，但确实有的人把我当成“敌人”，这一点也不夸张。之所以这样，出于我现在想解释的同样原因：

那些在思想上停留在第二国际的政治范畴里，仍然受到第三国际的先例和过去历史的禁锢，以及受到传统共产主义“文化”禁锢的人，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解释成是一次诡秘的阴谋活动的结果。他们并不去理解这种历史性的现象，这是在欧洲产生的现象，尽管在西班牙反映得尤其尖锐，即所有政党普遍遇到的危机，更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危机和向新型党发展的必要性，他们不但不这样做，不去进行研究……反而把一切问题都解释成为搞阴谋和搞帮派。

卡里略对萨尔迪瓦尔说的话大概是这样的：你们组织得真不错，比我想象得要好多……

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解释成搞阴谋，反映出思想水平的严重下降。这已经不仅仅是充耳不闻，比这要糟得多，竟变成了瞎子。

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的态度是公开的、自然的、毫不掩饰的，这更助长了把我们看成是老练的阴谋家的倾向。因为显然我们这些持革新派观点的人经常聚在克维多广场附近的咖啡馆里，经常在一起吃饭和讨论发生的事情以及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这些人以前彼此都认识：皮拉尔·布拉沃，阿隆索·萨尔迪瓦，胡利奥·塞古拉，海梅·萨托里乌斯，阿尔贝托·因方特，何塞·路易斯·马洛，以及安达卢西亚省的安帕

罗·鲁比阿列斯,佩雷斯·罗约兄弟俩,巴斯克省的皮拉尔·佩雷斯·富恩特斯,胡安·因方特,莱尔特松迪,西希,切米·坎特拉,以及许多接近我们并和我们在一起碰头的人,有来自萨拉曼卡,巴利亚多利,巴伦西亚大区,加利西亚,有时是一小组人,有时人更多……所有这些都采取公开的、尽人皆知的形式,尽管有那么几个“效忠者”会把这些当成他们为了事业而发现的秘密告到最高领导人那里去,说他们看到我们某某或某某在一起喝葡萄酒或是啤酒。

而我们这些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举动是顺乎事情本身发展的结果的。

我们是一种流派吗?显然是的。我们当时就是一种流派。流派的存在,对某些有特色的共同提案进行讨论,它不单对于我们,对于代表大会本身的作用都已经是一种客观的需要,而且也是党的客观需要。

其实他们那些人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是在三圣一体街的办公室里。当一个党存在分歧和有不同意见时,如果宣布禁止流派的存在,这就等于宣布只有一种流派(也就是总书记的流派)可以指挥一切,而其他的流派都必须服从。同时还要闭上嘴,还不能聚集在一起。但在现实世界里是做不到的,在八十年代的西班牙是行不通的。

我的看法是,革新派这个流派是在代表大会上形成的。确实是大会把它联结在一起的,这也许反映出我们在大会之前的弱点,如果我们在这之前就全力以赴地准备这种流派,战胜偏见和荒谬的“禁忌”,我们的力量一定会更大,也许大会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但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我最讨厌白

费力气在事后让历史重演。

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名单是按照我所评论过的程序，在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会议上准备了极长时间才拿出来的，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人员中代表中央委员会的有萨托里乌斯、巴列斯特罗斯、福斯蒂、罗梅罗·马林、阿里萨和何塞·路易斯·努涅斯。7月31日上午我们开始听到一些零星的消息；消息说，我们这些革新派没有都被除名，尽管开始时有这种打算。但遗憾的是这份名单是各地紧跟派（有新的，也有老的）较量的结果，只有几个人是例外，以掩饰其全部含义，这份名单显然面很宽，拒绝把各种力量综合在一起，无视在大会上至少占三分之一的力量。

在安达卢西亚和巴伦西亚大区，革新派给搞光了，只剩费尔南多·佩雷斯·罗约这个例外，在马拉加，为了不把最有能力的人马乔·特里约提上去，就提了另一个同志，这个人很正直，他在大会上谴责过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宣布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担当，要大家别投他的票。在马德里的情况也一样。所有在市政工作方面有影响的人，包括科尔多瓦市市长都被清除在外，有一点代表女权主义倾向的妇女也被排斥在外，更不要说知识界了。但这种删砍的态度也反映到工人干部头上；巴斯克工会领导人特谢米·坎特拉就被清除了。

宣布这样的候选人名单是会引起骚动的。当我们获悉这一名单的情况后，一些朋友，如皮拉尔·布拉沃，胡利奥·塞古拉，安帕罗·鲁比阿列斯，佩雷斯·罗约兄弟，当然也有其他的人，作出的初步反应是我们拒绝接受提名。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一方面我们不愿参与同我们意见相背离的事，这种做



法同大会的深刻意义相去甚远，会使党蒙受极大损害。但立即就出现另一种论点：我们若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们无论如何应该继续在党内进行斗争。大会本身说明还存在可能性。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之外还能干什么呢？

直到这时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还在卡斯特利亚纳街三号政府副首相那里参加关于自治问题的谈判。皮拉尔·布拉沃和我一起去找他，把他从会场中叫出来和他交换了意见。后来我们约好在富恩卡拉尔街的咖啡馆里和其他一些地区的代表一起吃饭。

在吃饭之前皮拉尔·布拉沃、胡利奥·塞古拉和我与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进行了交谈，向他表示我们对已经搞出来的候选人名单提出抗议。他坚持说我们必须留在中央委员会以便今后能够产生有代表性的领导班子。他竭力使我们相信在现在的情况下，能提出这个名单已是“最好的”了。马德里有两个“革新派”上了名单，如海梅·萨托里乌斯和卡洛斯·帕里斯，他还坚持说有很多老的中央委员也都离开了。

这是实际情况，这件事做得很不合理，没有丝毫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一些为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人只是在大厅里才得知自己不再是候选人。甚至事先对他们连解释工作都没做。

萨托里乌斯没有能说服我们，但他显然是要维护这份候选人名单，而不愿接受任何改动。

当我们来到咖啡馆时，看到一大桌子人，至少有三十，讨论相当激烈，我们首先说好我们要得出一个共同的想法，然后我们讨论两种选择方案：是留下还是退出。我赞成留下，但要有一个我认为十分关键的条件，就是在选举前向大会讲明，我

们将继续为建立一个就象我们这几天所解释的那种新型的党而斗争。我们遵守大会的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会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继续自由地、公开地发表我们的看法。

除了费尔南多·佩雷斯·罗约（他认为安达卢西亚的提名情况十分荒唐，使他不可能继续成为候选人），我们其他人都决定继续当候选人，并在选举之前解释清楚我们暂时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意味着什么。

我们回到了克维多影院。要在大会上发言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大会的规则不允许这样做。皮拉尔·布拉沃、胡利奥·塞古拉和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我们对萨托里乌斯，对阿里萨以及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说，要么让我们在大会上讲话，要么我们退出候选人名单；我们还向大会主席、阿斯图利亚斯共产党总书记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说了这样的话。

伊格莱西亚斯是一个干事麻利和十分自信的人，但如果掩饰我对他的好感那将是虚伪的。有人把他同主持过九大的阿道夫·皮涅多相提并论，但他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对皮涅多来说，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他轻视政治上的说理，是他对一心从事领导党的工作的、有事业心的执委会成员的蔑视态度。赫拉尔多从小就是共产党人，那时他帮助过阿斯图利亚斯山区的游击队，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大家叫他“葫芦”，他那时经常作为阿斯图利亚斯共产党的干部，具体说是矿区的干部到巴黎参加会议。

赫拉尔多懂得问题的所在，决定给每一个愿意在选举前讲话的前中央委员一分钟的发言时间。皮拉尔和我把我们的

时间“让给”了胡利奥·塞古拉，以便让他能多说上“几句”，胡利奥这样就能够以我们的名义读上几行。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尔另外作了声明，对把参加市政工作的干部清除出去的做法表示抗议。

我当时深信我们的发言会使我们丢失选票，但这样做至少会使今后的任务更加明确。

选举结果<sup>①</sup>使我十分惊讶：首先是因为有三个原来不在名单中的人当选了，他们是三个革新派人物：切米·坎特拉、皮拉尔·佩雷斯·富恩特斯、霍尔迪·博尔哈。正象我说过的那样，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

第二，是因为《我们的旗帜》编辑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我们这些曾在几个月前受到猛烈批判甚至污蔑的“革新派”居然得到那么高的选票：如萨尔迪瓦和塞古拉的选票比巴列斯特罗斯和桑切斯·蒙特罗的选票还要多。

皮拉尔·布拉沃得票比伊格纳西奥·加列戈多 30 张。

至于我个人，本来就背着“反苏”的名声，后来又背上“革新派”的名声，本想不会当选，然而却得了 612 票，比一些很知名的领导人，如伊格纳西奥·加列戈和罗梅罗·马林都高出很多。

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是圣地亚哥·卡里略的得票情况使他担心，他比卡马乔少 224 票，比萨托里乌斯少 150 票。

皮拉尔·阿罗约比圣地亚哥·卡里略多 10 票。

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我们这些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匆匆忙

---

<sup>①</sup> 见附件五。

忙站在电影院的旁厅里开会，很多人都站着，根据规程，我们应该选举主席和总书记。主席毫无异议是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总书记是举手选举的；有人提议无记名投票，但既没有桌子放票箱，也没有票箱，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人举手表示反对：他就是巴斯克领导人西希。我六个月以来一直说要投卡里略的票，我投了，但当时我就发现我做错了。

可以用各种测温计来测一测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全面结果所反映的复旧和倒退的程度。但我在此只谈其中一点：依我看，妇女解放是衡量一个革命政党适应新问题的能力的标准，这些新问题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首要问题。

西班牙共产党过去就有这样的特点，尤其是在1972年八大时通过了赞成女权主义的十分先进的文件，甚至在1975年宣布自己是“女权主义的党，妇女解放的党”。

1973年在罗马举行过一次西方各国共产党会议，我和罗莎·帕尔多，杜尔西内阿·贝利多，多洛雷斯·卡尔维特组成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的讲话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还记得一位意大利的领导人和我说话时的眼神，他说：是的，你们刚才所讲的正是我女儿对我说过的话。然而我们，作为一个党却不能讲这样的话。……

自从合法化以后，两种倾向就在党内开始了一场激烈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一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的倾向，另一种倾向是由党的机关支持的。的确，它也保卫妇女这样或那样的权益要求，包括堕胎在内，但是要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不要损害党的竞选形象，不至丢票；第二，党在一部分妇女运动中是领

导力量。

有一个时期好象西班牙共产党对女权主义采取了新的行动，事实上，除了在讲演和在声明中口头上立场鲜明外，传统的观念仍然取得了胜利，仍然是大男子主义只是为了看起来时髦而加以装饰罢了。在这一方面十大是最典型的了，几乎党的所有主张女权主义的干部或是被罢免，或是自己离开。

最说明问题的是皮拉尔·佩雷斯·富恩特斯的情况，好几个月来她一直负责妇女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她具有毫不妥协的女权主义的立场，在候选人提名委员会上领导机构的那些代表本人就反对把她列入中央委员名单上，尽管如此，她最后在大会上还是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不久之后她又同其他几个巴斯克的同志一起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但是这件事同时意味着抛弃了女权主义。

西班牙共产党又回到了十年或十五年前的形势，书记处里没有一名妇女，在执行委员会里没有一名妇女，在中央委员会里除了1981年11月开除的三个人外，只剩下五名妇女，所占的百分比还不到八大以来的一半。

我知道，这些数据不过涉及一些表面现象，但忽视它们则是荒谬的，不仅表明了大男子主义的统治，而且是一种心安理得的统治，甚至无所顾忌，不加掩饰。

女权主义当代的意义是代表着一种在人类朝着新的文明，朝着共产主义进行的复杂进程中正在起步的、正在解冻的历史新天地。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妇女和男人生活（无论是社会的公共生活，还是私生活）的根本变革，现在还不可能预测

这一变革将具有的规模和结果。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指出战胜歧视妇女、解决两性范畴内矛盾的道路，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一些非常可贵的主张。另一方面，仅仅认为女权主义是一般性的“群众运动”，是其他运动的补充，只要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进程业已固定的框框里给它找个合适的位置就成了，那都是荒谬的。事物本身要复杂得多。

无论如何，一个党若想“领导”女权主义，那是荒唐可笑的。因为今天党派本身就体现了性统治的形式，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可能改变这一点。因此，需要在其内部进行一场十分深刻的文化革命，使其至少与当今历史上的女权主义所代表的东西相联系。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存在着把女权主义分散成为少数人的运动、社会名流的运动和文学上反映内心世界的运动的现实危险，从面数目庞大的妇女所感到的越来越明确的争取解放的意愿（这是一支巨大的历史和革命的力量），无法找到各种方式来表现其在政治、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存在和力量。

我认为把妇女看作是一个受剥削的“新阶级”，是把问题局限在根据另一种现实而划定的范围里。我认为这是同另一种正好相反的态度一样的不合情理，那种态度把女权主义当作阶级斗争的补充和附加因素。

我认为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的领域需要一种新的理论研究（它还是十分初步的），和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无论如何，作为一个立志把人类从一切压迫和异化中解放出来的党，基本的一条是必须认识它本身的结构在两性方面的反动和保守

性,并为减少这种现象做不懈的努力。

西班牙共产党在他最近的演变中,具体的说,在十大和围绕十大所进行的活动中,所做的正好与此相反。

# 第五部分

## 开除





# 第一章

## 权力重新集中在书记处

8月8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由中央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根据新的党竞规定，程序如下：由多洛雷斯和卡里略（已分别当选为主席和总书记）提出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名单，再由这个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

皮拉尔·布拉沃、萨尔迪瓦、塞古拉和我又回到我们的老座位上。除这几个人外，这次我们还同海梅·萨托里乌斯坐在一起。在多洛雷斯缺席的情况下，会议只有卡里略一个人主持，他提出由以下几个人组成“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卡里略本人、海梅·巴列斯特罗、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西蒙·桑切斯·蒙特罗、阿道夫·皮涅多、米克尔·努涅斯、何塞·卡洛斯·毛里西奥。

会上有两个新的提名：莱尔特松迪和何塞·加兰。卡里略说他不同意这两个提名，后来投票表决，结果是五十票赞成卡里略的建议，十六票反对和七票弃权。

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开了几个小时的会才提出自己的建议。为了想象委员会内部开会的情况，有必要回忆在这之前发生过的一次重要经历，即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在三圣一体街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和皮

拉尔·布拉沃进行了有意义的交谈。在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我们向代表大会发表过一个声明，曾经表明十分怀疑我们是否参加党的执行机构。当时甚至新闻界也说我们将拒绝参加。萨托里乌斯8月1日在同皮拉尔·布拉沃的谈话中竭力向皮拉尔表明皮拉尔、萨尔迪瓦和我参加执行委员会是必不可少的。

8月8日，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开会时，卡里略拿出的名单上把我们三人排除在外。讨论当然是激烈的。卡里略甚至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那份“清一色”的提名，那么他就辞职。他最后在一次摸底投票失败后，在我们的问题上作了让步。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让步。何塞·卡洛斯·毛里西奥和米克尔·努涅斯特别强烈地坚持说，如果把我撇开会产生消极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在一次欧洲共产主义获得胜利的代表大会上尤其不能这样做。

在中央委员会继续开会时，卡里略宣布了一种新鲜事，打破了至少二十五年来党内一直遵循的惯例。实际上是这一伙人对党章的修改。这种新鲜事是规定书记处全体成员同时也是执行委员会成员。首先选出书记处，然后选出非书记处成员的其他执行委员会委员。

这可能看来是一件小事。我自己当时就没有意识到背后的份量。谁也没有对此进行有力的斗争。

但是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过去在党的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的主要批评是他把全部权力集中在无条件追随他的书记处手中。从那时候起，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加强政治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政治局和主席团）的集体作用

和削减书记处权力，并为此，把这两种机构的组成成员分开，使在这两种机构中重叠的人数尽可能减少，其实际效果在各党程度不同，但至少在形式上都这样做了。据我所知，西班牙共产党从50年代末起就是这样工作的。

现在却采取了恰恰相反的做法，一方面，新党章明确地赋予书记处以政治权力。另一方面，现在卡里略又在表面上通过单纯程度性的手续，重建了金字塔式的组织机构，因为首先选举书记处，然后选举执行委员会其余成员。这个事实本身证明了这个金字塔式的阶梯，即最上面是总书记，下面是书记处，然后才是执行委员会。

会上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本身完全证明了这样一个计划，就是把两个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前书记处成员皮拉尔·布拉沃和萨尔迪瓦清除出去，也把书记处中另一个妇女莱昂诺尔·博尔纳奥清除出去，也许是由于她和我在国际政策方面曾有过密切的合作。同时也把这三个人清除出执行委员会。

我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发了言。我特别提出了关于皮拉尔·布拉沃和萨尔迪瓦的问题。我说实质上这样做使代表大会的权力成了问题。代表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恰恰由这两个领导人提出的我们政策的一些关键性部分。实际上也就是批准了他们在最高负责岗位上进行的工作。从萨尔迪瓦的具体情况来说，他在市政政策方面的成绩是显著的。为什么要把他从名单上删掉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于他在筹备代表大会的讨论中和在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立场。这是对他所采取的态度的一种惩罚，一种报复。如果这种做法得到承认，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怎么能够有自由辩论呢？

会上的辩论是激烈的和很不愉快的。有些论点使人听了感到吃惊,例如,说任何一个没有被提名到书记处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可以同样说他受到了惩罚……遗憾的是卡里略用不同的说法附和了这种观点。他的中心思想是各种思想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书记处必须思想一致,执行委员会可以要求低一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贯彻十大精神。

无记名投票的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其结果如下:

选举书记处成员时,满票是 84 票,选举结果: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	78 票
圣地亚哥·卡里略·····	73 票
恩里克·库列尔·····	73 票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	72 票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	70 票
阿道夫·皮涅多·····	66 票
罗梅罗·马林·····	57 票
安塞尔莫·奥约斯·····	56 票
胡安·弗朗西斯科·普拉·····	52 票
伊格纳西奥·拉第埃罗·····	50 票
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	50 票

以上是提名委员会名单上当选者的票数,除此之外,还有人投下面几个人的票:

萨尔迪瓦·····	34 票
皮拉尔·布拉沃·····	27 票
曼·阿斯卡拉特·····	24 票
索莱·图拉·····	24 票

欧拉利亚·平特罗	20 票
马塞利诺·卡马乔	12 票
海梅·萨托里乌斯	9 票
胡安·阿里萨	6 票
莱昂诺尔·博尔纳奥	3 票
阿·帕洛马雷斯	3 票

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的选举结果是：

马塞利诺·卡马乔	66 票
胡安·阿里萨	65 票
弗朗西斯科·弗鲁托斯	65 票
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	64 票
霍尔迪·索莱·图拉	62 票
古铁雷斯·迪亚斯	58 票
何塞·加兰	58 票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57 票
费利佩·阿尔卡拉斯	56 票
罗伯托·莱尔特松迪	55 票
格雷罗	52 票

何塞·马丽亚·冈萨雷斯·

赫雷斯 51 票

伊格纳西奥·加列戈 47 票

这是提名委员会提出的名单上当选者的票数。除此之外，还有人投下面几个人的票：萨尔迪瓦 34 票，皮拉尔·布拉沃 26 票，维森特·卡斯卡拉 23 票，欧拉利亚·平特罗 21 票，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 9 票，霍尔迪·博尔哈 8 票，莱昂诺

尔·博尔纳奥 7 票，皮拉尔·阿罗约 4 票。

在这次选举中，还应该指出两件少有的事。一是卡里略亲自统计各次选举的票数。二是他不让休会也不同意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去做。

卡里略是在已当选为总书记时提出自己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在举手表决总书记人选时，只有一票反对他当选。在这次无记名投票中，中央委员会有 11 人没有投他票。前后不过相隔一个星期。

从我个人来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当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我当时认为，如果让我做理论工作还可能会做点有用的事，在许多我所不赞成的事情上可以少发生些冲突。如果我继续留在执行委员会，我怕越来越受到排挤，为一些对我怀疑和不信任的人所包围，此外，还卷入一项与我共产主义信仰相违背的复旧的政治计划。但是，同我比较亲密的朋友的意见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我很可能在欧洲左翼、和平主义运动、波里萨里奥阵线、阿尔及利亚、中美洲等问题上，继续在欧洲和国际上开展党的活动。此外，他们对我说在十大的理解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总之，我同意留在执行委员会里，其理由同我决定留在中央委员会中的理由差不多。

《工人世界报》对 8 月 7 日至 8 日的选举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的那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再次违反了党章规定，对会议情况报道不够，有片面性，没有报道我前面所说的投票情况。但是党内开始对此作出了反应。具体来说巴利阿多里德省委通过一项决议，由于这个决议很好地说明了我自己所想说的话，因此我把它抄录在下面：

“第一，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正式报道是非常不够的，我们认为《工人世界报》并没有象它所应该的那样向全体党员报道关于在代表大会之后而开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一次会议情况。

“西班牙共产党现行的章程第 18 条说：‘除了由多数确认的特殊情况外，各个领导机构将公布它的讨论情况和决定’”。

“我们所要求澄清的疑问是：是不是多数人由于认为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因而同意不公布讨论情况。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本省委为此感到遗憾，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竟然只作了如此简单的报道。”

实际情况是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对报道问题作任何决定。因此应该执行党章第 18 条的规定。

巴利阿多里德省委还说：

“第二，本省委获悉新的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情况，但不了解在选举这两个机构时所确定的政治原则，本省委愿表示不同意这两个机构的组成情况。

“我们认为，除了把工作能力和政治效力、同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计划保持一致和过去工作总的表现等作为选举标准外，还有另一种标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对已经发生的、把一些如此重要的人排斥在外一事表示不能理解。

“如果作出这些决定的意图是，通过把这次代表大会上持不同立场的人排除在领导机构之外的办法，来阻止今天在西班牙共产党内所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想法得以继续存在，阻止将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再次出现批评的立场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无助于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如果把政治上的一致性，理解成为把一些已经表现有政治才能、同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但是在某些方面的立场同代表大会上多数人后来采取的立场不同的同志，排除出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话，那么本省省委表示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第三，尽管考虑到不止把一个重要的人排除在外，但我们想指出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一个例子。我们想知道根据什么准则把卡洛斯·萨尔迪瓦排挤出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

“我们认为，把这样一个已经表现出政治才能和开展了积极工作的同志排除掉，只不过是前面指出的情况的一个例子。我们要指出的是这是把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持批评立场的所有同志都从政治上排挤掉，对此我们完全不能同意。

1981年9月7日

于巴利阿多里德”

## 第二章

### 我离开了《我们的旗帜》

9月14日，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工作和任命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卡里略提出如下的建议：

他任命了两个副总书记：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和海梅·巴列斯特罗斯。前者在卡里略缺席期间代理总书记，这两个新任命的人已定了等级。前者主管中央委员会的各个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后者主管党的组织工作。

书记处的分工如下：西蒙·桑切斯·蒙特罗主管教育。罗梅罗·马林主管财务工作。恩列克·库列尔主管议会党团工作，以及有关国家和地方自治问题。胡安·弗朗西斯科·普拉主管市政工作。拉第埃罗主管新闻宣传。皮涅多是马德里大区书记。安塞尔莫·奥约斯主管小组委员会和渔业问题。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主管侨民。

文化小组委员会和妇女解放小组委员会还没有候选人，这是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我已经离开了书记处，但建议我负责国际联络工作。

他任命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赫鲁斯当《工人世界报》社长。

任命何塞·桑多瓦尔当《我们的旗帜》社长。

对我来说，新情况是他把我从《我们的旗帜》除名。使人惊讶的是桑多瓦尔成了取代我的候选人。五天前，我同桑多瓦尔交谈过。我对他说我看有把我调离党刊的企图。他向我告别时说：“马诺洛，我希望你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以便继续担任《我们的旗帜》社长”。我相信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建议他当社长，我也相信他只有在经受非常大的压力之后才让步的。

卡里略把我排除出《我们的旗帜》的领导班子所采取的方式实在可耻，我简直找不出别的字来形容。

我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坚持以下几点：要在良好的条件下罢免我，就应该讨论我在领导党刊的工作情况，指出犯了哪些错误。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办杂志的好处是它不是抽象的工作，合订本都放在那里，可以具体地进行讨论，我要求进行具体讨论。

对我的许多指责是不真实的。有人说什么党刊成了党内“少数派”的刊物。我拒绝接受这种指责。已发表的文章的目录全在那里。要进行这种指责就得拿出证明来。

在没有对党刊进行严肃认真讨论的情况下，我不接受对我的罢免。我认为不提出严重的原因就解除一个人职务的做法对党不会起积极作用。

在中央委员会，胡利奥·塞古拉在萨尔迪瓦、皮拉尔·布拉沃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支持下为《我们的旗帜》所做的工作辩护，提名我作为同桑多瓦尔竞选的候选人，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对我进行了明白无误攻击，这些人很久以来，特别是由于我在苏联问题上的立场，早就想把我从所有岗位上排除出去。我

想这是合乎逻辑的。

卡里略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想搞掉我，但是又不承认他想这样做。为此，他想出一些奇怪的理由：一方面，他说根本不存在“罢免”的问题。这只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一切都从零开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应该把党刊办成另一种类型的刊物，即旨在培训共产党的干部的刊物，桑多瓦尔对此比较合适。此外，卡里略拒绝重新回到代表大会前的争论上去（他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如果讨论《我们的旗帜》问题，就又会回到这些争论上去。他又补充说有必要具体地表现出党会贯彻十大决议的形象。

另一个引起激烈对抗的议题是：许多人在发言中反对任命普拉为市政工作负责人，坚持认为近几年的经验表明萨迪瓦尔是胜任这项工作的最好候选人。

最后，对领导机构分工的建议用举手的方式进行表决，57票赞成，17票弃权，会上也用同样的办法任命赫雷斯为《工人世界报》社长，70票赞成，2票反对，9票弃权。

选举《我们的旗帜》社长是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进行的，结果是何塞·桑多瓦尔得66票，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得18票，7票弃权。

《工人世界报》按照惯例作了简略的片面的报道，只发表了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报告和通过的文件。对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情况只字未提。

### 第三章

## 巴斯克问题： 对新事物视而不见

西班牙巴斯克共产党的问题并不是在1981年秋天突然发生的，而是有其相当长的复杂历史，在谈这个问题时，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七十年代已经表现出来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战略观点同后来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上和组织上的具体措施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一系列措施企图抛弃战略观念中最本质的东西。

我同为数相当多的一群共产党人一起犯的所谓“罪行”，就是多少年来一直忠于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这种基本思想，忠于应该是我们在巴斯克的方针的思想。这一“罪行”竟使我在这段“创记录”的时间里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这方面作某些历史性的说明是必不可少的。在轰动全西班牙和世界民主舆论的布尔哥斯审讯期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中的气氛是认为如果在布尔哥斯被审讯和判刑的民族主义革命者所代表的历史潮流同当时的巴斯克共产党合并，才会在巴斯克出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一个能完成欧洲共产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的党。马里奥·奥纳因迪亚<sup>①</sup>作为

巴斯克的领导人在我们的交谈中得到大家的尊敬，他在佛朗哥主义的假公正的面前出色地体现了理想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形象，我们同他是心心相印的。

虽然我不可能熟悉巴斯克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只有从这个观念出发，才能解释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年轻的新力量所采取的支持态度，当这些力量开始抵制拉蒙·奥马萨瓦尔所代表的狭隘的传统立场时，他们在巴斯克共产主义者当中是相当出众的。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奥马萨瓦尔的境遇常常是一种悲剧。无疑，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这样，尽管拉蒙·奥马萨瓦尔是有伟大历史功绩的人，但是在政治方面，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新旧之争。在这场斗争中，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和卡里略本人在激烈的冲突中帮助罗伯托·莱尔特松迪取代奥马萨瓦尔的总书记职务。这意味着打开了同那些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接近的力量合并的可能性和前景。

这种方针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在巴斯克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怀疑、不理解、抵制、甚至反对。虽然很早以前就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在1981年2月举行巴斯克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才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代表大会在赞同欧洲共产主义、反对一切集团的国际立场，和对苏联采取批评立场等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同不久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发生的情况截然相反。这表明由占比例很大的青年组成的领导班子的政治态度是明确的，有战斗性的。相反，最引起冲

---

① 马里奥·奥纳因迪亚为巴斯克革命党领导人。——译者

突的问题是要不要开辟巴斯克左派内部联合的进程。

在讨论制订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时曾多次达到几乎决裂的程度。卡洛斯·阿隆索·萨迪瓦尔在巴斯克共产党工作过多年，后来他被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处派去帮助筹备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对共同起草文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各人对文件同样的提法作不同的解释。第四次代表大会意味着欧洲共产主义和革新立场的一次伟大胜利，有利于促进同巴斯克左派，更具体地说同巴斯克革命党联合的工作。罗伯托·莱尔特松迪代表了这种立场，同时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见到的那样，他在西班牙共产党内总的的问题上，对传统保守立场，持批评态度。

巴斯克地区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巴斯克共产党不仅仅在1977年竞选成绩很差，只得百分之三的选票，而且在1979年的竞选中，也没有象西班牙其他地区共产党一样稍有进展。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选票也同样大幅度下降。

在巴斯克这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形成一种能够有效地发挥有利于欧洲共产主义理想的作用，这取决于两种历史传统势力的联合，即左翼民族主义势力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势力的联合。但是这要求首先克服民族主义，和巴斯克独立的幻想，其次要克服一切从马德里，从中央的角度看问题的残余思想。

这意味着每个分支要进行一场内部斗争，而战略目标将最终取决于这些内部斗争的结果。

事实上，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以巴斯克共产党主席奥马尔·瓦尔和工人委员会领导人托马斯·图埃罗斯和伊格纳西

奥·拉铁罗为首的巴斯克共产党少数派开始独自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的反对派活动，在党员中开展旨在反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系列方针的宣传运动，特别是反对莱尔特松迪本人。

巴斯克共产党人内部存在的不同流派、不同的立场之间的思想争论，本来会帮助党的发展。如果说这种争论起了消极作用的话，那是因为把这场斗争发展成个人性质的斗争。特别是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插手和卡里略的直接插手，很快引向帮助少数派把莱尔特松迪和由主张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和革新派组成的核心清洗出巴斯克共产党的领导机构。

按照这种态度，虽然没有明确声明反对同巴斯克革命党合并，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支持反对合并计划的那部分巴斯克共产党人。这就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却否定了自己已经宣布的战略。

在1981年的上半年，巴斯克共产党对立的两派在马德里举行了几次会议，目的是推动他们达成协议，但实际上是想对莱尔特松迪施加压力，要他接受少数派的要求。

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卡里略坚持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保持巴斯克共产党人的团结。莱尔特松迪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我同意这种团结的重要性，但是其条件是不阻碍历史性的战略计划的推进和不阻碍同具有革命的民族主义立场的那部分人的合并。

如果团结起来却仍然是一支几乎不存在的力量，那么人们对这样的“团结”是没有兴趣的，特别是在巴斯克革命党内部本身的演变有走向合并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当圣地亚哥·卡里略证实莱尔特松迪不肯屈服于他的压力，而且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期间支持革新潮流和支持党采取联邦制结构之后，他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毫不掩饰地说，他将在1981年底以前把莱尔特松迪从巴斯克共产党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这种态度已经不只在党的最高核心机构里为人所知，而且还广泛地传了出来。我想在巴斯克也是这样。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阶段，当讨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对巴斯克共产党人的无耻支持达到真正堪称挑衅的程度。在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中除了莱尔特松迪以外，只有一个支持莱尔特松迪的巴斯克共产党领导人，反过来，反对莱尔特松迪的少数派却有四名候选人。这样做是企图在实际上由马德里去改变巴斯克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对巴斯克共产党的另一个类似的挑衅行动是提名伊格纳西奥·拉铁罗到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处。起初我还以为这可能是使他脱离巴斯克政治舞台的一种形式。但是马上人们就看到情况完全相反，这样做是为了在马德里给他一个跳板，使他可以以西班牙共产党最高领导机构成员资格，在巴斯克组织一场旨在反对在巴斯克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领导机构的斗争。这些是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前奏。

在巴斯克革命党内部提出赞成同巴斯克共产党开始会谈的主张有所进展时，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81年9月7日采取主动，向巴斯克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一封信，建议开始谈判，并以“完全自由和自决的能力”参加谈判。

9月18日,在马德里举行了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和巴斯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莱尔特松迪非常清楚地解释说准备开始谈判,但这是一个很长的进程,不能着急,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要在巴斯克共产党所有的组织内对将采取的步骤进行一次广泛的讨论,在这个进程结束之前,将举行巴斯克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是否同意与巴斯克革命党合并。这种将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乃是西班牙共产党战略方针的一个成就,应热情地但同时又要坚定地促其发展。

会上得到的回答却是一系列的指责,特别是奥马萨瓦尔对莱尔特松迪进行的指责。他指控莱尔特松迪背着党的正规组织向巴斯克革命党许愿。奥马萨瓦尔宣布说巴斯克共产党内部正在发生一次分裂。其他的巴斯克同志也坚持这些指责。他们这种态度的背景是明显的,即:借助于马德里来反对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决定,不承认这个中央委员会是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唯一有资格代表巴斯克共产党人讲话的机构。拉铁罗在他的发言中暴露了其分裂的策略(奇特的是他是以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处成员和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双重身分发言的,但他在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属于少数派),他说巴斯克共产党内大多数党员反对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巴斯克共产党人中有一种反对他们的领导机构的“反抗”活动,要求西班牙共产党保证巴斯克共产党人的民主进程,换句话说,就是要举行一次由马德里组织和掌握的特别代表大会,清除莱尔特松迪的领导。

我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原则问题,即欧洲共产主义的选择

包含在特定的情况下改变党本身名称的可能性。在委内瑞拉<sup>1</sup>叫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墨西哥共产党在实现了同其他几个政党合并之后，采用了别的名称。所以，一个党开始的进程有可能导致这个党采用另一个名称，成了另一个党，这样做是正常的。

我对巴斯克革命党文件中的有些问题是不同意的。但是我没有看到不可克服的分歧。没有看到有比共产党内部在某些问题上更大的分歧。我们作为西班牙共产党人应起的作用是促进这个进程的发展，尊重巴斯克共产党有无可置疑的权利去领导旨在建立一个新党的道路。

然后，我谈到存在由于感情用事而出现的危险，如象巴斯克共产党少数派同志所做的那样。玩弄那种“将会取消党”，或“会断绝同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的字眼是容易的。从道理上说，显然是会成为另一个党，并且会取消现在同西班牙共产党的那种关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要使这些必要的变革不致被利用来把党内一部分人同合并和建立新党进程对立起来。

我最后说，我认为在争论中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很危险的。有人说要让“大多数党员”来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调。如何计算所谓大多数党员呢？如承认这种先例，那就应该考虑到它将会把我们引到那里去。

多亏加泰罗尼亚人的发言，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允许莱尔特松迪和他的同志们继续这样做下去，没有使奥马萨瓦尔和拉铁罗的“极端”立场满意，这个决议的最后一段说：

“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号召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团结政策在巴斯克应该经历的如此困难而又必要的途径

在党内进一步深入进行讨论和研究，要考虑到这里发表的意见，要收集巴斯克共产党全体党员的意见，要认识到只有一个团结的巴斯克共产党才能有必要的力量最后解决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这个决议仅仅是一个休止符号。10月2日，19名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个电报，表示“坚决支持”“巴斯克共产党各基层委员会所开展的、要求举行特别代表大会的广泛运动。”这是宣告党正在走向分裂。无须说明这个声明本身就完全是一种违犯党章的行动。

这时西班牙共产党的立场出现了转折。书记处甚至连执行委员会会议都没有召开就于10月7日发表了一个电报。一方面，这是对谈判进程的直接干涉。如果巴斯克共产党接受这种干涉，那就正好意味着放弃建立新党的战略性计划。

此外，书记处为了进行这种干涉所采用的借口是荒唐的，它提出要接受合并进程应完成五个条件。我们简要地研究一下这五个条件：

第一条是要接受欧洲共产主义。从用词上来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象巴斯克革命党这样一个党的渊源并不是传统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党，理所当然需要采用其他的观念。

第二条是要接受宪法和自治区章程，这个新党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非常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第三条是要谴责恐怖主义。提出这种“要求”简直使人感到害臊，因为如果有人对孤立和削弱恐怖主义作了努力的话，那就是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因

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不是说空话，而是采取真正的政治行动，使它失去社会的支持。

第四条是要讲明同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这是不能事先确定的。正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态度阻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态度。

第五条是工会问题。也许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书记处好象忘记西班牙共产党临终拒绝同工会保持一种机械的关系。解决办法不能停留在纸上。

同时，书记处的干涉破坏了9月26日执行委员会公开声明的态度，却变成对巴斯克共产党中反对团结的宗派集团的一种鼓舞，这些人采取了新的行动，10月10日，出现了号召在10月25日在塞阿斯陶召开一次“巴斯克党员大会”的号召书，其目的是在不受党章约束和反对巴斯克共产党代表大会选出的领导机构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分裂的共产党组织。

10月13日，在马德里再次举行执行委员会会议，也要巴斯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参加。但是，只有西格弗雷多·多明戈和埃斯特尔班·埃古伦到会，他们说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情况。他们事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面对塞阿斯陶大会的召开，他们想知道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是否准备谴责如此明显地违背党章的行动。

卡里略主持了会议。他说他不接受任何条件。西希和埃古伦就离开了会场。我并不认为他若采取非常灵活的策略就会使事态有所改变。骰子已经掷出去了；莱尔特松迪和巴斯克共产党的领导依然会推动合并的进程。由于马德里的干涉

(以前的干涉和现在的干涉), 会或多或少从党内分裂出来一部分人, 继续沿用巴斯克共产党的名称, 而这个党的真正的领导机构是三圣一体街。

且让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个事件的经过: 在10月13日的会议上, 奥马萨瓦尔从他的角度谈了事件经过说: 塞阿斯陶大会的召开也许是“不典型的”, 但是实际上他支持召开这次大会。皮涅多说, 巴斯克共产党的所有组织都应该解散, 他所担心的只是名称问题, 因为其他事都已经办妥了。安塞尔莫·奥约斯和罗梅罗·马林说自从莱尔特松迪在第十次代表会发表声明以后, 一切都早就设想到了……

卡里略提出一个决议的文本, 确认10月7日书记处的声明, 此外, 表示执行委员会支持巴斯克共产党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 要求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制裁分裂的人而召开的会议延期召开。决议说, “执行委员会也建议主张10月25日召开党员大会的组织暂时停止这一活动”。决议最后决定于10月22日召开有巴斯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参加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全会。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索莱·图拉、古铁雷斯·迪亚斯以及在争论中要求采取更加激烈措施的人都支持这项决议。

只有我一人投了反对票。我表示不同意书记处的公报。我支持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的想法, 但是首先提出这项建议的是莱尔特松迪, 并且只有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召开, 不能由马德里去召开……关于在塞阿斯陶召开的大会, 我们不能把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那些实际上已同意这次大会、从而使巴斯克党破裂的人相提并论。

在这种情况下，巴斯克共产党分裂的气氛达到了使人担心的程度。巴斯克共产党的领导决定撤销那些公开支持业已开始的分裂活动的人的职务，具体地说就是拉蒙·奥马萨瓦尔的主席职务。这些措施(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用处，尽管都是以党章为依据的)引起“受害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奥马萨瓦尔指责莱尔特松迪是“在巴斯克地区建立‘古拉格’群岛的鼓动者和大师”(1981年10月15日《国家报》消息)。奥马萨瓦尔本人在《工人世界报》上写到人们是向“最糟糕的斯大林主义实践”。图埃洛斯宣布“这就是巴斯克的‘古拉格群岛’”(1981年10月15日《艾金报》)。

为了挑起政治宣传，竟然忘记了“古拉格”和斯大林镇压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忘记，那么又是多么无知！

10月22日，我们又来到中央委员会大厅，海梅·巴列斯特罗斯代表书记处作了报告。报告开始时说，并没有人反对同巴斯克革命党合并。但是接着就是指控巴斯克共产党的起诉书，说它放弃了欧洲共产主义，同西班牙共产党断绝了联系，违反了党章，分裂党……把已成为事实的巴斯克共产党分裂的罪责全部推到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头上，首先推到莱尔特松迪头上。建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决定，召开巴斯克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委托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采取一切政治和组织措施来保证贯彻这些决定。”这最后一条是空头支票，这已超出党章规定，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讨论中，站在巴斯克共产党人一边的有胡利奥·塞古拉、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皮拉尔·布拉沃和我，我们

完全反对书记处的建议。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如马萨利诺·卡马乔和索莱·图拉坚持主张必须再寻找避免分裂的解决办法。索莱讲了调解的作用。

巴列斯特罗斯根据已经公布的那个反映巴斯克革命党和巴斯克共产党关于新党性质的初期谈判中取得的某些结果的“草案”，说这是放弃了欧洲共产主义，但是，从好几个人的发言来看，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所以要搞出一个“草案”来是因为可以让全党进行公开的讨论，草案中包括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如提出既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

关于新党同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正如莱尔特松迪所说的那样，绝不是用“预先确定名称提法”<sup>①</sup>就能解决的问题。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共产党的态度。萨尔迪瓦、塞古拉和皮拉尔·布拉沃坚持认为，如果我们目前阶段加强巴斯克共产党的特性，那么就会增加将来新党同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建立积极关系的可能性。

大家都表示支持巴斯克共产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但是不能象巴列斯特罗斯建议的那样，由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召开。否则这等于我们在马德里撤掉巴斯克共产党在其四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这将对党章最明目张胆的破坏。

---

① 这是指西班牙各地区党组织在自己名称前冠以PCE(西班牙共产党)的字样，西班牙共产党领导要求巴斯克成立的新党也要冠以PCE的字样，表示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一部分。——译者



我在发言中坚持这是我们第一次执行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38 条，如果用它来在实际上取消巴斯克共产党，那么它将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它不但没有成为解决冲突的条文，反而将变成用来取消各民族和地区党的特性和存在的条文。

卡里略对讨论作的总结，是对巴斯克共产党进行的一次最强硬的攻击。他说错误就在于过去没有对巴斯克进行干涉，他说他不可能信任巴斯克共产党的领导，并说“如果合并的进程继续下去，会使原来的希望流产……”他指责皮拉尔·布拉沃讨好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会议主席拒绝给皮拉尔答辩的基本权利。

到投票的时刻，有两个动议，书记处的动议是莱纳巴列斯特罗斯的发言，皮拉尔·布拉沃提出了另一个动议，动议的说明部分有这么一段：

“巴斯克共产党和巴斯克革命党旨在建立一个巴斯克工人阶级新党所开创的进程，不仅对巴斯克的左翼，而且对全西班牙的左翼都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对巴斯克来说，这种进程意味着左派的加强，到目前为止巴斯克的左翼分成两种，一种提出民族主义的主张，一种提出‘工人阶级’的主张，这个左翼受到两个敌对力量的左右夹攻：一方面是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右翼民族主义力量，另一方面是“巴斯克民族与自由”军事派的恐怖主义力量。对西班牙左翼总体来说，这个进程的告成和以后的发展为开辟左翼团结的前所未有的道路提供了新的有希望的因素，使人们感到将来巴斯克右派的领导权将面对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

“我们共产党人对这个业已开始的进程有兴趣，它也对我們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除了已经指出的一般性理由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理由，使巴斯克共产党成为这个新现象的主力之一。这种情况可以使人相信，今天在巴斯克影响十分有限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可以适应巴斯克的特点而得到发展。”

皮拉尔·布拉沃的动议最后提出：

“由于上述情况，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巴斯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在10月22日的联席会议上达成旨在指导今后对巴斯克共产党和巴斯克革命党之间联合进程的态度：

“一、中央委员会确认它对巴斯克共产党领导能力的信任，相信它将能够根据巴斯克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很好地完成同巴斯克革命党的联合。巴斯克共产党的现领导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认这个领导完全有能力对领导这个进程作出决定。”

“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呼吁已开始进行分裂活动的巴斯克共产党的同志们放弃他们的立场，放弃召开党员大会或特别会议的企图，并且围绕已经开始的联合进程参加党内正常讨论的进程。”

“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认为，应该由巴斯克共产党本身的领导机构来决定何时最适合于召开巴斯克共产党的特别代表大会，现在已经有在年底以前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的打算（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23日开会时提出，在10月13日召开特别代表会议）。”

“四、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许诺仍将给予巴斯克共产党和巴斯克革命党之间的联合进程以极大的关注和尊重。为

此，中央委员会将通过定期召开有巴斯克共产党领导参加的中央全体会议、执行委员会会议或书记处会议的方式，心平气和地就正在进行的谈判问题交换观点和意见。同样，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把这些讨论扩大到全党，在它认为合适的时候，将要求巴斯克共产党领导人参加。”

面对就两个动议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要求，卡里略生气地说：“在讨论候选人的时候，无记名投票是完全正当的，但讨论采取什么政治立场时，要求无记名投票就是把中央委员会看成是民主中间派联盟的议会党团。”

尽管卡里略这么说，但中央委员会中还有百分之十的委员要求无记名投票。结果是 15 票赞成皮拉尔·布拉沃的提议，8 票弃权，其余支持书记处决议。

第二天，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个决议，它只能这样做。10月26日，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处十分过分地行使了党章中任何一条都没有规定的权力，决定解散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一个临时的中央委员会来负责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如同早就预见的那样，任命那些几个月以来就着手准备分裂的人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在塞阿斯陶召开的分裂主义大会推迟了几天，于11月1日举行。但是这次却得到西班牙共产党全面和公开的支持。卡里略、巴列斯特罗斯、甚至萨托里乌斯都参加了大会。于是分裂已是既成事实。但是，这样做并没有阻止一个新党的诞生。在1982年3月举行了“巴斯克左翼、社会民主左翼”建党代表大会。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代表大会，看到了在关于欧洲和欧洲

左翼、“现实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新的社会运动、恐怖主义、国家结构等我认为是对革命的民主战略起轴心作用的问题上,都进行了活跃的讨论,有时辩论得很激烈。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我感到我同大多数人赞成的立场是接近的。

我相信这个新党的诞生并不是一种所谓的“流产”,它会改变巴斯克的政治形势,有利于向左翼打开大门。同时会成为西班牙全国左翼和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第四章

### 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 在马德里发表演说

我们能置身于这个进程之外吗？面临今天巴斯克政治形势的现实，西班牙共产党的作用难道就是谴责、非难和污骂新党的诞生吗？甚至再推广一点，马德里和西班牙其他城市的工人和左翼力量难道应该、甚至能够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回避、轻视或谴责这个巴斯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吗？难道为了实现根本理想，即寻求西班牙各民族的劳动者之间的谅解、理解和团结，他们关心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东西？

对我来说，这些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甚至比党章问题还要重要。当有人要我在罗伯托·莱尔特松迪和马里奥·奥纳因迪亚在马德里作关于“争取实现巴斯克新左翼”的专题报告会的海报上署名时，我向自己提出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签署这个海报的根本理由，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但西班牙共产党的正式文件对这个事件一直保持沉默。

这就是我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以及解除我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会副主席职务<sup>①</sup>的全部罪行。

大家可以从海报上看到，我既不是以共产党员身分也不

是以中央委员会委员身分，而是以一个公民的身分在海报上署了名。

我所以坚持说明这一点，是因为它可以表明我在下面要讲的论据。我认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对这个海报可以有两种做法。

但是在展开我的论据之前，先要描述一下这次报告取得的动人成绩。参加者竟有三、四千人之多，多数人是站在大厅外听讲的，因为大厅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其中许多人几年前已经离开了党，还没有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人士。报告会的成功表明人们对这两位报告人所代表的事业的同情，也是对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所作所为的明显批评，并且反映所有共产党人所感到需要了解情况。《工人世界报》的报道，即使不是说假话，也是残缺不全的。这一点在最近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已得到了证实。由于这种事是如此违反常情，因此《工人世界报》不得不在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的报告会后，于1981年11月6日至12日发表了一组“资料”，至少刊登几个有关巴斯克问题的文件，尽管字数卡得很少。

对我来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态度至今还是一个不解的谜。为什么它对海报采取这么不讲道理的野蛮态度？它还可以采取别的办法。它完全可以采取我称之为温和的反应，

---

①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说我已被开除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是在1982年3月这本书快写完时，得到这个消息的。看来是由于我被清除出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必须出现的后果。

尽量把事态缩小，只限于给予警告处分，或者进行公开的批评。

在我看来鉴于当时国内总的形势和党的处境，对党有利的是不要使事情戏剧化和寻求一条没有伤痕的出路。

展望未来，更加明显地可以看出当时对党更为有利和合宜的做法是让某些党员，甚至某些领导出面对巴斯克诞生的新党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承认这种意见分歧甚至批评它，但是只在党内批评，这才是合乎逻辑的态度，特别是谁都不知道将来什么因素会起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为这种温和的反应，这种不致伤人的解决办法提供一切方便。马德里的市政委员也是这样做的。下面，我还会拿出证据来。

我深信中央委员会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许大部分人都希望采取这种解决办法。采取那种强硬的不讲道理的反应，主要还是由于卡里略和书记处无条件追随卡里略的核心所施加的压力造成的，书记处决心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他们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谈到的“情况”。卡里略六天内在三个场合施加了这种压力，以辞去总书记职务相威胁。这是他权威的很大丧失，但是也表明他的不妥协是根深蒂固的。

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中，僵化和强硬的态度占上风。我不相信只是因为把党内对“搞帮派”和“搞阴谋”问题进行某种病态的解释的缘故。无疑对一部分领导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其他因素，否则有可能会取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加泰罗尼亚欧洲共产主义者所采取的策略，正如我们在谈到第十次

代表大会时已经讲到的，他们准备支持卡里略，以换取卡里略帮助他们恢复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控制。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对巴斯克新的左翼党的诞生会对西班牙欧洲共产主义整个战略所具有的意义不理解。事实上，在讨论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些革新派被纪律和党章束缚得死死的。但是，象西班牙这样的一个国家，欧洲共产主义的愿望只有当它在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加利西亚、安达鲁西亚、加那利斯和瓦伦西亚……等地区那么强烈的特殊的现实中体现出来时，才会变成现实。如果不拒绝这种一切都要听从马德里的强加于人的指挥的思想，如果不朝着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加强左翼的真正联邦制形式的方向发展，那么西班牙全国劳动者采取共同战略的思想将会落空或成为日益官僚化的结构。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把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附合共同战略的东西联合起来，协调起来和结合起来。

西班牙同意大利相比有非常大的差别，且不说同法国的差别。不把握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历史因素的这种差别，我相信左翼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面对社会主义传统的典型的集中制，这是欧洲共产主义应该使左翼懂得的特点之一。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是如何发展的，我从我的会议记录中提供甚至很具体的资料。我认为这样做特别是对共产党人了解实际情况是必不少的。因为不仅仅作出了荒唐的政治抉择，而且也采用了一些看来已经过时的方法和语言。这些方式方法，从来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这件事情上，有助



于表明西班牙共产党的历史性倒退。

11月4日，在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作专题报告会的前夕，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和恩里克·库列尔召集我们曾在报纸上发表的海报上签了名的六个中央委员开会。参加的有皮拉尔·阿罗约（我实际上不认识她），皮拉尔·布拉沃，阿隆索·萨尔迪瓦和我。塞古拉和海梅·萨托里乌斯未能及时通知到。

我们在三圣一体街的大厅里开会。西蒙讲话时情绪紧张。他必须以书记处的名义对我们讲几句话。他说党内民主情况非常严重。党不能给人以解体的感觉。在海报上署名是违反党章的行为。他们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开会，要我们撤销签名。他说：如果你们不撤销，书记处将在下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把你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马上回答说：你们用威胁提出要求的方式本身迫使我拒绝这种要求。我长期以来在共产党内生活，我不会在威胁下撤销我们的签名。我对西蒙说，我确信他可能失掉我对他的尊重。他说也许他把使命的第二部分告诉我们得太急了，但是他愿意完全真心相待。皮拉尔·阿罗约、皮拉尔·布拉沃、萨尔迪瓦说明了我们签名的理由，说明用来威胁我们的措施是不合适的和不公正的。桑切斯·蒙特罗和库列尔完全处于防守的处境。他们唯一的论据是：你们正在进行派别活动……我们回答说，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如果他们有真凭实据，可以说出来并对我们的派别活动作出处分，但是不能因为在党的范围之外，甚至是同非共产党人签名的一份海报就要处分我们。

在我写本书时，我深信委托桑切斯·蒙特罗和库列尔办理此事纯属是办一个手续。决定早已作了。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11月4日同一天，马德里省委会作出了一项决议，其中谈到“有人企图通过明目张胆的派别活动来摧毁西班牙共产党，其最完整的表现是某些党员在将有罗伯托·莱尔特松迪和马里奥·奥纳因迪亚参加、在11月5日上午举行的大会的公开海报上签了名……”

我不信省委会会在没有得到三圣一体街的同意的情况下，就发表这样一个文件。当还正在同我们谈话时，谴责我们的判决却已在街上公布于众了。

在这个决议中，省委决定“撤销在这个海报上签名者在省、市机构中的一切公共职务”，建议这些签名者所在的各个基层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按照党章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一点是有意思的，因为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省委很快就把自己作出的这项决议和党章放在一旁，决定由省委自己采取“纪律措施”。同时，停止他们在奥埃斯特区委会和赫塔法区委会的政治和组织职能（《工人世界报》第151期第8页）。

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要比省委会慢的原因无疑是由于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的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在书记处对要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种处理方式，表示“动摇”。无疑，正由于这个原因，书记处没有象桑切斯·蒙特罗对我们说的那样，直接提交中央委员会研究，而是先召开了执行委员会会议。

## 第五章

### 开除十个人，先四个后六个

围绕中央委员会开除我们六个人的问题所展开的政治斗争实际上是三派之间的斗争，一派是在书记处几乎占绝对优势的强硬派，这派对能有机会摘掉所谓的“派别”和进行“整顿”感到十分高兴，卡里略是这一派的头头。另一派，人数不多，它的最明确的发言人是工人委员会总书记马萨利诺·卡马乔，他仍持我们确实犯了某些错误的意见，但认为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会给党造成严重的危害。最后一派是犹移不定的“哈姆雷特”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他完全理解并且很好地说明了开除我们是错误的，会引起消极后果，但同时他又不敢提出和真正坚持他所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法，我弄不清楚原因何在。

11月6日，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卡里略作政治报告，报告反映了整个会议开法的特点，就是把开除我们六个人同对政治形势的一系列讨论混在一起。报告在政治形势方面讲到西班牙民主所面临的危险，右翼力量对各政党的攻击，西班牙加入北约，帝国主义和两大集团对西班牙的压力等问题，报告认为形势是十分严重的。

报告说西班牙共产党的危机是民主危机的一部分。报告

从这里开始对革新派进行指控，说他们进行帮派活动，在每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都要较量一下，已经采取公开反叛的立场。卡里略向会议通报了桑切斯·蒙特罗和库列尔同在海报上签名的六个中央委员谈话的情况，六人拒绝撤回签名，于是在这个时候通知他们，书记处建议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有人想一手撑天让党的领导屈服。现在开始做的是为贯彻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斗争。这些同志把事都做绝了。卡里略最后说，如果六人中有人能反省并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前检讨错误，那么他也并不把门关死。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在发言中首先明确指出，在11月4日的谈话中他是在我们回答之前，先对我们说过，已经有这样的决定，如果我们不改变态度，将建议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卡里略打断了他的讲话，说不必管那么多，怎么做都不会有改变，他们六个人已经铁了心，不管怎样都会坚持在海报上署名的……桑切斯·蒙特罗坚持说这六个人是进行有组织的帮派活动，在投票时有自己的纪律，甚至都宣誓要保守秘密。他说他作为马德里的书记所犯的 error 之一，就是对他们让步太多。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发言说，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就不能算共产党人。他在书记处已经提出过不少的疑虑和问题。后来，他参加了一次工人干部会议，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工人干部中立场很不同。他确信第十次代表大会并没有解决党内存在的实际矛盾。在巴斯克问题上，书记处这么做是对的，但是缺点是《工人世界报》报道得不好，从

而造成很多危害。现在必需在党内重新建立党的权威。但是做法上正确与否应关系到党的生存。他不相信最后的选择只能是要么建议处分，要么让人家脱裤子，当场出丑。这等于是让人在瘟疫和霍乱之间进行选择。他想找到另一种解决方法，政治性的解决方法，要同我们讲道理。这样做并不排除根据党章规定采取措施。他认为马德里省委的措施<sup>①</sup>太过分，在马德里的党组织中正在形成一种恐惧的气氛。在工人委员会领导机构的共产党员中存在严重的分裂。在发生冲突的地方如巴利阿多里德、萨拉曼卡和坎塔布连……需要进行对话和讨论。六名中央委员无疑有违反党章的行为，但用不着这么着急，过去在别的一些事情上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他建议审理一下，看这帮人是否已经同党决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党决裂。他最后说，不管作出什么决定，他都将接受。并且补充说如果他所阐明的立场同他副书记职务不相称，那他将听从中央委员会的处置。但是他还准备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不会辞职。

阿里萨发言说党内存在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有联系的帮派，这个问题两年多以前就存在。他对此事都厌烦了，过去不够坚定，应该当机立断。皮涅多发言说右派正在进行的基本活动是要缩小工人运动的活动余地，其中一点是要摧毁共产党。不存在两个有组织的派别，只有一个。这个派别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是竞选活动的地盘。它的目标是反对

---

<sup>①</sup> 指马德里省委把在莱尔特松迪报告会的海报上签名的市政委员开除出党。——译者

党的领导。皮涅多最后说，我发言的中心内容就是高举红旗、拥护共产党、拥护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坚持认为模棱两可是无济于事的。谈判就等于承认有组织的思潮的存在。而如果采取必要的措施，然后动员全党，那么事态将不致这样严重。萨托里乌斯讲话中提到的内容使他感到担心。伊格纳西奥·加列戈说在安达鲁西亚有十几个人与这件事有牵连。人们称他自己是“亲苏派”，有时候，他也愿意表示说“对，我就是亲苏派”，他同情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但把维护党的方针放在一切之上。

在这个时候，轮到我发言。我开始说正因为国内形势严重，才需要党克服各种问题。我认为处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在回答有人说我们的目标是取消党的指责时说：问题是要看党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需要作什么样的变革；如果不能正确地实现必要的改革，执行党章只用于进行处分，那也会取消党。我说并不存在什么帮派，只存在实际问题。我再次解释我在巴斯克共产党问题上的立场，即：最严重的是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书记处突然自己作出关于解散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党章里没有一条允许这样做。我认为全党普遍存在着反对作出处分的情绪。我说企图不让莱尔特松迪讲话和解释是荒唐的。如果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的报告会是一次积极的活动，也是一次重要的活动。这也并不是象有人向我所说的那样，“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报告会并没有打算也没有搞成一次党的组织的活动。关于说我们同亲苏派是一个帮派的论调，那是人所皆知的搅混水的做法。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在事实面前说谎。

我们这些现在正在受到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威胁的人正是同亲苏的教条主义斗争最得力的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党遭受损失。我最后提出一个形式问题，要求处分我们究竟是因为我们签署了一份海报，还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帮派？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把指控讲清楚。给我的印象是对我们作出最高处分的进程进行得特别匆忙。我对个人离开中央委员会倒并不十分担心。我在党内已经26年了，直到1960年，我才当上中央委员，也许我恰恰是在1960年之前的这个时期里做的工作最重要。但是，用现在建议的处分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甚至认为问题会更加严重。

古铁雷斯·迪亚斯说我所作的解释对他不起作用，没有解释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解释要么是对总书记的攻击，要么是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要么是给亲苏派提供活动条件，尽管主观上并不这么想。关于如何办的问题，他说同萨托里乌斯的担心联系起来，应该避免使局面螺旋式上升。最好是对六位同志的问题进行审理。但是他将接受执行委员会的规定。索莱·图拉说他很怀疑拟议中的措施能有助于解决问题。他针对皮涅多的话说，只有一个派别的说法是歪曲事实真相。采取处分的办法只会扩大党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革新派所采取的态度难以令人接受。他倾向于萨托里乌斯建议的方法。他将接受多数人的决定，但是不同意采取处分的办法。

有一些人的发言支持书记处关于处分的建议，其中有何塞·加兰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普拉。此外，库列尔认为六个人必须公开认错，撤回自己的签名。赫雷斯又回到亲苏集

团同革新派意见一致的论点。罗梅罗·马林认为我的发言是我们继续进行派别活动的明证，还说萨尔迪瓦负责的市政工作委员会已为建立平行的领导机构进行了两年的工作，罗梅罗·马林也确信六个人同亲苏集团有配合，但又说不清在什么地方互相配合。罗伯托说他只就我的发言同我进行争辩。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说这件事已有三年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太灵活，太容忍。萨托里乌斯所说的话使他很感到担心。他说人们会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卡里略，说因为坚决反击不够而显得有些软弱。从阿斯卡拉特的发言表明按照他的观点来看，不可能进行对话。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六名成员的问题，海梅·巴列斯特罗斯支持进行处分。费利佩·阿斯卡拉斯也支持处分，但后者认为对马德里市政委员的处分不能使人信服。

马萨利诺·卡马乔大部分会议没能参加，他在这次会上发言说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但是过去的办法已经不行了，靠“唯党章是问”的办法已起不了作用。他不同意书记处关于解散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书记处无权采取这种措施。应该十分注意方式问题。执行委员会应该研究采取何种措施。下面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即党在外表上是欧洲共产主义的，而内部却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党有可能失去全部专业人员的支持。皮拉尔·阿罗约的态度反映了职员中的气氛。他认为这个问题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影响。最好按照萨托里乌斯的建议办。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又起来讲了几句表示收回发言中关于他的副书记职务的问题上所说的话。在这之后，卡里



略作了使人惊讶的总结,采取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会上的讨论使他产生一种不想负责任的感觉。他不打算再在这样一个领导机构没有一致政策的党内当总书记。他随时准备把这付担子交出去。他说这个帮派是有领导的,有经费的(《国家报》上发表的海报证实了这一点),有内部纪律的。在巴斯克事件背后,存在一个意欲打击党的全国性阴谋。我们今天正处在应把友谊放在第二位,把政治理由放在第一位的时刻。应该回到下面这样一个经典理论上去,对这些反党态度的原因进行分析,即在困难的情况下,党内最不稳定的阶层会采取动摇、逃跑和后退的态度。但是首先我们领导不应该动摇。革新派是党同知识界接触的最大障碍。这同意大利“宣言派”<sup>①</sup>情况相似,所不同的是意大利的宣言派都是些高级知识分子。意大利共产党把这个很有影响的集团开除出了党,这样做并没有使意大利共产党受到削弱。

卡里略回答卡马乔说,把党说成外表上欧洲共产主义、内部斯大林主义的说法是一种污蔑。我们不管外表还是内部,都是欧洲共产主义者。他特别赞扬伊格纳西奥·加列戈说,在某些事情上他同加列戈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加列戈是一个有党性的人。他的思想是受人尊重的。那些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进行分裂活动的人就不值得尊敬。

接着,卡里略表示支持皮涅多说;他没怎么听清皮涅多的话;他没有说只有一个帮派。但是确实两个帮派彼此完全互相串通。马德里省委的决定都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要看一

<sup>①</sup> 由于不同意意大利共产党的方针而被开除出意共的激进派。——译者

看我们是否在马德里市政府建立起一个共产党的市政工作小组，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让自由主义发展下去。老说“要讲道理”，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够了。卡里略说他准备“整顿”。审理是“水手们讲的讽刺话，是装样子，只说不练”。

他最后再次以辞职相威胁，说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通过处分，他将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将向党提交一份解释情况的文件。他说在发言中提到他应负的责任一事并没有能吓唬住他，领导党不是什么舒服事。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说得有理，在受攻击和污蔑时他常感缺少支助。

在由于整个争论而引起的（特别是由于最后一个发言而引起的）紧张气氛中，通过了建议中央委员会开除在海报上签名的六个人出党的决定。卡马乔、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和我投了反对票。我想加泰罗尼亚人不得不在会议结束前走掉了。

四天后，于11月10日中央委员会开会。当大家刚要坐下时，有人通知我在执行委员会楼上的一个会议室里开预备会议。卡里略说他想建议中央委员会通过决定，如果罗伯托·莱尔特松迪、西格弗雷多·多明戈、皮拉尔·佩雷斯、富恩特斯和泽米·坎特拉到会，也不能让他们参加会议。书记处的理由是“既然已不在党内”就不能再当中央委员。实际上，唯一的根据是书记处关于解散巴斯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认为凭这一决定就是可以开除四名中央委员。这件事证明这种无视民主规定和党章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不管怎样，执行委员会就在我投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这项决议。

萨尔迪瓦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言反对这项建议。但是在64票赞成、15票反对和2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决定。根据这项决定，四个中央委员就这样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连让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都不给。当他们到三圣一体街时，就通过大门口的小窗户把决议文本交给了他们。

接着，就开始了在48小时的短时间内开除了另外六个中央委员的进程。或者换个说法，也就是共开除了十个中央委员，占四个月前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10%。

提到议事日程上的议题是“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卡里略所作的报告同在执行委员会上一样，先讲国内外政治问题，然后马上转到指控我们的起诉书，同在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差不多，只是内容还要多一些。

我不打算叙述两天一晚在三圣一体街的白色大厅里的那些发言，对我来说，这些发言是没完没了、调子阴沉和令人厌烦的。部分发言登在《工人世界报》上，有关这些发言的评论已经够多了。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执行委员会开会的情况，虽然没有把所有细节谈到，但也很详细了。我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这些情况，第二是因为我相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各种立场的概貌，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不过比执行委员会的发言面更广一些，自然立场上有细微的差别，少数人是温和的，但是相当多的人在发言中，有一种“围剿分裂主义者”的气氛。

我现在要做的是想解释一个迄今还未讲明白的奥妙，即为什么不通过合乎情理的正常程序，提出关于开除我们出中

央委员会的决议，让大家讨论和表决来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呢？为什么让我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泡在一种特殊的仪式中？说到底谁也弄不清楚我们正在做什么事，究竟是进行政治辩论呢？还是讨论开除我们出中央委员会呢？这种不正常的情况，达到了极点，竟然没有应有的决议来解释为什么必须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应采取的措施，就象把加西亚·萨尔维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那样做。这次会议只涉及六个中央委员，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四个中央委员没有让他们讲话就已经把他们开除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发言中要求专门列一项议程来讨论我们的问题和作出决议，在决议中明确说明对我们的指控，到底开除我们是因为我们搞帮派还是在海报上签了名……但就不这么做。会议拖到结束始终处在一种混乱而没有理性的闹剧中，但是具有一种“宗教”裁判的味道；对各种意见、思想、虔诚程度和意图进行审判。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荒诞可笑的程序是为了使卡里略和书记处的强硬派核心能够阻止人们把实际上在执行委员会上已经表明的两种选择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这两种选择就是：或者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或者进行审理。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失去了在这两种办法中进行选择的权利。

事实经过是这样的：11月10日卡里略讲话之后，第一个讲话的是马萨利诺·卡马乔，他讲得很明确，认为必须尊重进行处分的形式，否则就没有民主可言，应该采取灵活的方式，他反对进行处分。

然后是有关各种问题的一大批发言，各种议题都乱七八

糟混在一起，什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什么民主中间派联盟，不是这个省的情况就是那个省的情况，也有对革新派、对分裂主义者的攻击或评论……只有少数人赞成开除我们的意见。有相当多的人批评马德里省委撤销市政委员的职务。卡洛斯塔·帕里斯、霍尔迪·博尔哈、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贝尔加拉、索莱·图拉等则十分明确地赞成进行审理的办法。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在他的讲话中主要为一个基本思想争辩。他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和民主问题是党要重新争取在文化力量中产生影响的基础，而现在采用开除的办法，则是适得其反，是走上一条我们自己今后无法控制的道路。为此，他提出进行审理的解决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六个被告保持沉默，记下了对我们提出的那些罪责，等着看是否会提出一项可以发表意见的具体动议。

第二天早晨，11月11日，根据我的习惯在洗澡时听《西班牙八点钟的新闻》和《电话新闻》时听到海梅·巴列斯特罗斯在讲话，他讲了八遍“认错”这个词，说要么我们认错，否则就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查了查卡萨雷斯辞典上“认错”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明确地收回已经讲过的话，否定已讲过的话。”我在离家门之前对埃斯特尔开玩笑说，我现在去宗教裁判所，大法官已经通过电台八次要我认错……

会议开始时，卡里略走上讲台。他说人们要六个同志认错，他们如果仍然保持沉默是不可容忍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暂时休会，等我们讲话。我事先并没有准备好讲话。我把他的话记了下来。

但是，究竟要我们讲什么呢？是就一般的政治辩论发言？那就简直可笑。要我们认错？那又在什么问题上的认错？是指我们六天前在签名这件事？我们就象进入了卡夫卡小说里的古堡一样晕头转向。因为海报上讲的事已经有结果了，报告会开过了，已经是既成事实。对于这件事，中央委员会可以作出反应，但是要我们收回签名，这从道理上说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些签名已经起了签名应起的作用。

对这一切我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我们已经做过的事：那就是再次解释一下我们的政治立场，驳斥有些人在争辩中强加给我们的许多不实的罪名。我们六个人在各自的发言中都说我们接受代表大会和章程的规定，我们不是一个帮派，也不存在这么一个帮派。胡利奥·塞古拉坚持说需要对党章作出对大家公平的解，不能象现在这样有些人甚至可以违反党章任意解散地方党委，而其他一些人则相反，只能接受处分和开除。书记处的立场不能让人作出党所必须作出的解释。萨尔迪瓦强调党应该发展和革新。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奠定了基础。我们不是一个帮派，我们反映的是现实问题。他说他接受审理的办法，我们都能接受。

轮到我讲话时我驳斥了执行委员会上说我有意毁党纲领的指控，这种做法使我不得不解释为什么我一直要做并且今后还要继续做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说我们不是一个帮派，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就是党内存在各种思潮，我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应该寻找解决办法，使这些宝贵意见能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皮拉尔·阿罗约谈到了职员对撤销几位马德里市政委员职务的措施感到吃惊，他还讲到许多自由职业者离

开了党，但他们仍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者之间需要用协调和对话的办法，而不是用开除的办法。皮拉尔·布拉沃分析了党从1965年以后向前发展的重要经历。党在前进中还存在某种停滞现象，出现了某些新问题。她强调了革新派在击败亲苏立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她不承认有帮派。关于认错问题，她说这样做只会降低党的威信，使人们想起共产主义运动最糟糕时期所采取的办法。海梅·萨托里乌斯提供新的根据以证明不存在什么帮派。对他这一代人来说，当一个共产党人无疑是同当一个民主主义者不可分的。他回顾代表大会之后，在9月份选举领导机构时，对某些同志明显地表现出不信任感，他提到了把皮拉尔·布拉沃和萨尔迪瓦清洗出领导机构的问题，这证明领导上没有使大家能连结成一体的能力。

所有的讲话都相当长。我的讲话也有一个小时左右。

在中央委员中一方面我看到有人同情我们说：“你们做得挺对……”同时，除了最要好的朋友之外，我感到存在着顾虑，特别是害怕发表意见，因为他们应该估计到最终会把我们开除出去。

现在会怎样呢？我们已经发完言了。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会上照样没完没了的进行关于政策和派别问题的争论。这样一直到11月11日下午。皮涅多主持大会。原来怀疑公开摊牌会带来麻烦，现在看来已没有这种危险了。正在这时桑切斯·蒙特罗起来讲话，他贬斥我们的发言，说我竟还讲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经历，这是不知羞耻。我十分生气地站了起来，大声喊叫说有人已经指控我想毁灭党，我想我至少有权为自己辩护。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桑切斯·蒙特罗对“折衷

主义”发动进攻，这个词是挑选出来反对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的立场和他关于审理的建议的。折衷主义开始成了许多人发言中的靶子。

遗憾的是，他的攻击产生了效果。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当天下午，又作了一个发言，“明确表示在他前次发言中并没有坚持，现在也不坚持审理的建议，而只是解释一下他在执行委员会上提出的意见，他十分明确地表示服从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工人世界报》第152期，第38页）

下午时间已经不早了，卡里略走上讲台。他说六个人的发言毫无用处，他们没有作出人们所希望的认错。执行委员会不能替他们认错，应该由这些同志们自己认错才行，应该承认报告会和海报都是违反党章的活动，应该保证只在党组织内部来维护自己的意见。他说折衷主义是行不通的，没有“第三条道路”，也不能单方面承担义务。

后来，他们要我们六个人写一份共同的声明。我们六人进行了协商，我们感到显然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到三圣一体街六层楼我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同皮拉尔·阿罗约一起开会。我们交换了看法。一致认为可以庄严地发表我们的意见，尽量做到人们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中有几个人来说，最难做到的是要我们承认举行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的报告会是违反党章的行动。至少，我们的良好愿望是尽人皆知的。皮拉尔和我留下来写声明。其他人先回去，起草完后他们又进行了修改。皮拉尔·阿罗约在讲台上念了由我们六个人签署的声言：

“一、我们承认第十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



“二、我们承认党章，我们各人将根据党章来维护我们的思想。

“三、我们认为必须采用允许和鼓励进行公开的、自由的和坦率的争论形式来贯彻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种方式的争论不是妨碍而是促进群众性的斗争和动员，不是把分歧视为罪行，而应使所有的共产党人能感到在党内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四、关于我们在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在马德里举行报告会的海报上署名的问题，我们承认这是一种违反党章的行为。但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并不是举行反对党领导的大会。

“五、我们赞赏党内普遍存在的反对撤销公共职务，解散党委会等制裁的气氛。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别的办法来寻求解决党内危机的政治途径。

“这几条归纳了下面签名的六个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的讨论中表达的个人立场，表明了他们促进党的团结的愿望。”

1981年11月11日于马德里。

卡里略立即走上讲台，拿着我们的底稿要求休会一小时，让执行委员会研究一下这个声明稿。

这就是说，不经过表决，什么手续都没有，越过中央委员会把对我们的声明的辩论直接提到执行委员会去进行。我没有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果不是等了一个小时，而是等了四个小时。等到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在这四个小时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卡里略第二次提出了辞呈（第一次是在11月6日）。

最后，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使他可以在中央委员会上说执行委员会一致（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同意把下面的建议提交中央委员会。简而言之，卡里略的最后通牒是：要么把我们统统都开除掉（至少公开表示出这种愿望），或者卡里略辞职。

卡里略在中央委员会宣读的决议草稿如下：

“一、中央委员会认为，胡利奥·塞古拉、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皮拉尔·阿罗约、皮拉尔·布拉沃、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和海梅·萨托里乌斯所提出的声明并不是从实质上改变他们的态度，而正如声明最后所说的是归纳了他们在中央全会上发言中所持的个人立场。

“二、中央委员会认为改变态度必须包括下列内容：

（一）承认在马德里举行有莱奥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参加的活动的海报是一种违反党章的行为，客观上是采取了反对党的领导立场，并且也是一种政治错误。

（二）保证从现在起要尊重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大会通过的党章，以及尊重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决定。

（三）党章保证全体党员有权自由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并有权在党的正规组织内行使批评的权利，党从来不否认每一个党员都有这样的权利，而上述同志应该保证不通过新闻媒介发表反对代表大会决议和党的领导机构决议的立场”。

“在承认这三点的基础上，中央委员会只对六个犯错误的中央委员作严重警告处分。

“否则，就把执行委员会的另一个建议交付表决，那就是对不接受上述建议的六个同志撤销其中央委员的职务。

“1981年11月11日于马德里。”

这份草稿只念完一遍就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就这样让中央委员会承担执行委员会所制订的关于处理我们六人的极为离奇的做法。

在即将表决时，卡洛斯·帕里斯站起来提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一草案，将会发生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中央委员会通不过，将会怎样呢？我们有权要问清楚。

卡里略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走上讲台说，对此谁都没有疑问，如果中央委员会不通过这个提案，那么执行委员会立即全体辞职。

这是卡里略第三次以他的辞职相威胁来施加压力。他不同任何人商量。谁都没有吭声。从那时候起一直到中央委员会会议结束，会议就在以执行委员会辞职的直接威胁下进行的。

举手表决的结果是：81票赞成，11票反对，3票弃权。

这时，我们提出有没有抄件让我们看一看，是否会议能休会。结果既没有抄件也不休会。皮涅多从主席台上起身，走到我们的座位前，说我们必须马上表态，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表个态就完事了。最后，终于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拿到了仅有的一份由卡里略亲手起草的文本。我们六个人想走出大厅来研究一下。有人高声喊：不让小帮派开会！我们于是站起来走到大厅的一边去读这个文稿。由于文稿只有一份，而我们是六个人，那么这个“帮派”不得不挤到一起去看！

气氛是令人气恼的。要在这种条件下作出某种严肃的决定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他们不给我们时间来对这

份文稿进行分析，但是明显的是企图把某种屈辱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马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已经写了我们的声明，我们仍然坚持声明中的意见，他们可以根据我们所写的内容作出决定。

他们让我们一个、一个上讲台讲，我们不接受这个新的决议，我们的立场已经在皮拉尔·阿罗约在这之前念的声明稿上讲清楚了。

我还说如果报纸上第二天发表“西班牙共产党六个中央委员认错”的消息，那就是十分丢人的事。这已经是过去时期的老方法。我不想给党丢丑，也不想给自己丢丑。

后来，我又有机会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卡里略起草的强迫我们认错的决议稿。他的这份文稿同我们写的声明稿之间有哪些具体的差别呢？有以下三点：

一、关于卡里略文稿中的第一点，我们这方面没有承认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的大会在客观上是“采取反对党的领导立场”。我们过去说过我们主观上并不想反对党的领导。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去决定“客观的东西”呢？客观的东西的特点就是自身的存在。要求我们这么做理所当然是错的。

二、关于第二点我们承认代表大会和党章，但是“我们没有保证尊重党的领导机构的决议”。而且这种要求是荒唐的。党章里没有这一条。领导也有做对的，也有做错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如果认为领导做得不对，他们有权利提出抗议和反对。

三、关于第三点，我们过去没有保证“不通过新闻媒介发表反对代表大会决议和党的领导机关决议的立场”。但是这最

后一个要求是要求我们做到党章中所没有规定的东西。领导的决定应该是可以让党员公开批评的。

总起来说，我们所拒绝的是这种违背党章、限制我们党员权利的做法。

于是不管同意不同意，就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交付表决。时间已是清晨三、四点钟。这次是无记名投票。其结果同上次投票大不相同。

表决的结果是67票赞成，24票反对，2票弃权，2张白票。

另一个不正常的情况是通过“一揽子”表决的办法开除的决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一个人一个人选举出来的。理应一个人一个人开除。但是这次并不这么做。不管赞成还是不赞成，六个人统统都出去。

我确实记不起有那一个共产党是采取这样的过程开除中央委员的，对基本民主准则的违背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并且这样匆忙。我这是指近几年说的。但是我参加过法国共产党开除罗歇·加罗迪的会议。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一个很长的讲话。然后，把他开除。但是，我想不起要他收回这句或那句话的做法。

卡里略提到了意大利“宣言派”的情况。我回答了他的问题，我在中央委员会上解释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做法。它任命由纳塔主持一个特别委员会。同杂志的编辑部讨论了几个月，分析了他们同党的政策的分歧所在。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了两次讨论。讨论进行了九个月之久。海梅·萨托里乌斯在中央委员会上又提供了一个资料说：他在访问意大利

期间曾同吉安·卡洛·巴叶塔谈过话，吉·卡·巴叶塔对他说，开除“宣言派”是意大利共产党在其组织政策方面的最大错误。巴叶塔还补充说，我们以后绝不再重蹈复辙。

卡里略后来就没有再提“宣言派”的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开除我们六个人出中央委员会的方式中，有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丝毫没有一点起码的伦理观念。人在内心总潜藏着一种诱惑，要他们把个人利益置于共产党人的尊严之上。我们六个人当中如果有人愿意继续当中央委员，只需要稍稍说一句表示接受的话，那么就会万事顺利。若用这种办法就会在党内造成这么一种倾向，使党成为由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人组成的党，而不是有思想、有信念、并且能使人信服的人组成的党。

在表决了开除我们的决定之后，卡里略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了长篇讲话，在他的讲话中又奇怪地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不断绝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正如我们已经在前一章所指出的那样，二是强调总书记担子之重，他再次提到2月23日政变时他在议会里是站着的。

在离开会场之前，桑切斯·蒙特罗走近我，向我伸出手来。我说，我对他讲的话感到愤慨。他回答说，我对他不了解。不管怎样，我对他说他能伸出手来，使我感到很高兴。他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在那时，而且从那时起，他都是唯一这样做的人。

## 第六章

### 执行纪律和党的解体

正如我们刚看到的那样，交付中央委员会表决的唯一镇压措施就是把十个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先开除四个巴斯克人，后开除我们六个人。与此同时，书记处和马德里省委发动了旨在迫害和开除主张革新的共产党人的运动，具体地说反对那些在莱尔特松迪和奥纳因迪亚报告会的海报上签字的人以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示对这些签名者同情和声援的人。

把马德里的市政委员爱德华多·曼加达，克里斯蒂娜·阿尔梅达，何塞·路易斯·马丁·帕拉辛，伊萨贝尔·比利亚隆加和路易斯·拉罗克（路易斯·拉罗克同时也是马德里省议会副议长），开除出党的做法，无疑是用更有爆炸性和更令人生气的方式向全国公共舆论证明西班牙共产党又恢复到过去时期的传统。

开除出党是最重的处分，只有在一个人造成极严重的危害、真正成了敌人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这种措施。马德里省委的理由是担任公职的人应该执行党的政策。但是上述几个人恰恰是模范的共产党市政委员。没有任何人对他们在市政工作中的熟练和才干提出过疑问。他们中有的人则身处马

德里最孚众望的，为全市居民所熟悉和爱戴的共产党员之列。

但是省委说，在巴斯克新左翼问题上，他们同西班牙共产党发生了公开的分歧。所以这些人必须滚出市政府：如果他们不辞去市政委员职务，就把他们开除出党，从而也就开除出市政府，因为市政法明文规定在一个党的候选人名单上选出的市政委员，如果不再是这个党的成员，就失去其市政委员的职务。一旦进入这种传动系统，马德里省委会就会下意识地、执拗地、糊涂地扩大它的措施。法律规定根据向选民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顺序替换被开除的市政委员。

但是，由于大多数候选人不值得马德里省委的信任，那么马德里省委就会把他们全都开除出党，不让他们当市政委员，甚至一直开除到候选人名单中他们选中的候选人为止。这就要有十几个人被开除出党。

态度强硬是坏事。但是，反复无常和不公正为害更大。而且这种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又是受令人难以置信的、随心所欲的做法所支配的。马德里省有些市的一些市政委员虽然也在引起这么多处分的海报上签了名，但是竟没有被开除出党。

党的领导机构贯彻党章到这样随心所欲的程度，以致使在人所共知的海报上签名的共产党人当中受处分的情况十分不同，有些人被开除出党，有些人被开除中央委员会，还有些人没有受任何处分。胡利奥·塞古拉的情况最为极端，先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来又由于同样的罪名被开除出党。

马德里的情况同样是一种破坏党章的行动，开除市政委



员的问题竟没有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党章明确规定由中央委员会批准马德里市政委员人选。所以，当然应该由中央委员会来开除这些人，因此这是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党章的另一条规定是应该由每个市政委员所属的基层委员会去履行开除手续。但多数情况却是基层委员会支持这些市政委员。所以，就采取了应急解决办法，由省委决定开除。

这种开除风的哲学根据，是出于在党同党员，特别是同担任公职的党员的关系上存在一种机械的、传统主义观念。卡里略在一篇以《党证》为题的文章中维护了这种观念，这篇文章发表在1981年12月的《工人世界报》上。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选出来的代表是作为知名人士当选的，因此党应该听他们的，卡里略针对这种观点为另一种观点辩护，即：市政委员应该单纯是各级党委的工具。这是过去就存在的两者必择其一的论据。不是这一种，就是另一种，不去考虑民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新问题。为了朝着向多数人革命的方向发展，在广大群众表现出日益要求参与的愿望的时期，市政委员是党和群众之间基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协调者，但不是只有一种意义上的协调。市政委员应该向党反映市民的实际问题，有时站在党的对面反映。这样做有可能会出矛盾，但是如果党想有一项能联系实际的政策的话，这样做是健康的和必要的。

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历史留下一个根深蒂固的残余，那就是一说到党就想到党委会。认为不管在哪个问题上真理都来自党委会。共产党在前一阶段时间已经抛弃把工会看成是党的“传送带”的论点。如果继续把市政委员只看成是由党

委会开动的“机器人”，这更是时代的错误。

显然，共产党的市政委员应该贯彻共产党的政策，但是这并不等于一切都要听党委会的，甚至有些同市政委员工作无关的事也得听党委会的。

过去由政党取代显贵豪门体制来起决定性作用是一种进步，得以使工人直接出现在政治生活之中。但是今天，民主的进步有了其他的要求。居首位的是参与问题。那种把政策只看成是在选举中分割势力范围，以便在选举之后每个党的机构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想法是短视的、自杀性的。

如果说有些东西应该加强的话，那么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加强，这一点正是马德里省委高傲地轻视的东西。这种态度反而促使威信业已大大下降的代表制或代议制民主更加威信扫地。在这种政治气候下，由于一些市政委员表示对巴斯克新左翼的同情因而惩罚这些拥有很高威望的人，并且给他们以开除出党的处分，则是明显地轻视民主。

同样，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散那些表示支持莱尔特松迪着手建立新的巴斯克党的省委会，如巴利阿多里德和萨拉曼卡的省委会。解散省委会所采取的程序表面上是冷静地执行党章，实际上犹如大象踩跳蚤。大大超过了卡马乔在讨论中所说的“唯党章是问”的做法，书记处简直是横行霸道。书记处派了一些“钦差大臣”到了萨拉曼卡。他们说省委会已经解散。他们找几个人单独谈了谈，就叫他们“担负”党的工作了。在遭到拒绝时，他们就去找从前的党员，一些甚至连党证都没有的人，以便成立所谓“新的省委

会”。

在西班牙好几个地方和地区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虽然做法上略有差别，其结果并不是解散了多少党委会，而是在许多地方毁掉了党，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在党内感到窒息，使党没有了感觉神经，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内聚力和伦理道德。这就是书记处所做的事情。就这样使党进入了一个无疑可以称之为共产党解体的时期。

在这方面另一个遗憾的标志是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它严格按照书记处的命令作决定。由于它目前这样的组成，这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成员没有独立性，只是党的工作人员。我几乎不愿意回顾在开除我的问题上写的意见书，我真替它不好意思，意见书在最后说对我采取的措施是“宽大的”。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求作更严重的处分，那就只能是把开除出党。不管怎样，圣地亚哥·卡里略1982年1月10日在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说：“我们无法使分裂真正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塞拉德尔的共产主义统一社会党和自称的革新派，都处在同一个党内。这些革新派并不是真正在帮助我们革新党，而是在客观上给革新政策带来困难。我们不能把那些在一个时期以来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集团进行活动的人聚集到我们党内来。”<sup>①</sup>

这么巧妙地把我和塞拉德尔参混在一起，难道意味着我已经不在党内了吗？

卡里略采用的手法是过去在法国采用过的，这种手法就

---

<sup>①</sup> 见《工人世界报》第160期第30页。

是不经过事先应该办的手续就宣布某些人已经不在党内。

从加泰罗尼亚和其他一些地方传来的关于建立纯粹亲苏的消息，证明我关于共产党正处于解体进程的印象是对的。这种危险始终是存在的。苏联绝不会放弃鼓励，甚至策动新的活动，就象它过去策动过里斯特尔等人进行活动一样。

广大共产党人对苏联在感情上保持联系一事，大家普遍有责任，我也不回避自己的责任。我已经在这本书的其它章节谈到了这一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具体的带根本性的方面。不能忘记如果在十大上完全亲苏的人减少到只剩6%，那么，这首先要归功于革新派的活动。

而这些革新派却从十大以来一连受到处分和开除。这种做法是为教条主义旧观念的重新萌芽扩大地盘和鼓励亲苏派的活动。

另一方面，在谈到党的解体时，我想更确切地讲明一些问题：我不否认有一些或多或少拥有有效机构的组织可以使共产党在选举中保持一定的阵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成为西班牙目前民主政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还有助于改善这些或那些方面，对行不通的事情进行批评……但是党正在丢掉的是使党成为改造社会的战略的制定者和促进者；成为走向社会主义而建立新的历史性集团的缔造者。

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制订和通过了旨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战略。但是从此以后，书记处却损伤和清洗党内为使这个战略有可能实现而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我不是说只有这部分人起了作用。但是我确信如果没有这些人，那么在某

种意义上将会改变党的内容。

我们在这个悲惨的进程中看到两种观念的结合，乍一看去会使人感到吃惊，一种是老党员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认为真理掌握在党的最高领导手中，因此这个党是通过从上到下严格的垂直纪律来贯彻真理的工具；另一种是最近几个时期入党的人所具有的竞选主义观念，他们把党看成是在选举中占领这一片或那一片阵地和公职的工具。这两种情况，都把党当成是一个贯彻上面决定的工具党。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对世界性危机、核威胁、非人道的生活作出答复，这就日益要求采取有更多群众参与的方式来制订政策，可以让市民们更多地介入和更多地参与决定。因此，一个怀有变革愿望的党必须通过自由的、开诚布公的讨论来保证有越来越多的党和党委会民主地参与决定和讨论，保证进行两层含义上的思想交流：一是指必须听取来自基层委员会的意见，打破传统禁忌，使各种流派和分歧不那么戏剧化，使之合法化；一是指结束对最高领导人的可笑的崇拜。

党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一个工具。但并不是作为真理化身的领导的工具，也不是选举活动的工具。而是社会中革命的进步阶层的工具，有利于他们取得领导权的工具。而我认为西班牙共产党已不再是这样的工具了。

## **第六部分**

# **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



—

在探讨欧洲共产主义危机之前，我感到需要先讲一讲什么是欧洲共产主义，至少谈一谈我对这方面的看法。

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现象有好多种解释，但我只想涉及其中的两种。一是把它解释为西方共产党在苏联侵捷后作出的反应，这些党已不可能继续把苏联作为模式，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而仍然保持在西方政界中的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西方共产主义”倾向的出现，具体体现在一九七四年西欧共产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后来又进一步制订了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把自由确定为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组成部分。

另一种解释乃是我所同意的，即在并不否认前一种解释的前提下，寻找欧洲共产主义现象的更为深刻的根源，把它解释为久已存在的矛盾在当代的反应。这个矛盾就是从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伊始，在新的苏维埃国家的特殊利益同西欧革命战略的需要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

我们可以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工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带领下，在好几个国家内发生了一



系列起义、暴动等革命运动。这些团体反对第二国际正统社会党背叛国际主义、成为各国资产阶级尾巴的投降行径。

在这些革命斗争中，有两大革命对人类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在俄国取得胜利，另一个在德国遭到失败。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而进行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列宁深信俄国的革命胜利只是打开资本主义阵线的第一个缺口，真正重要的将是德国的革命。

革命果真在德国发生了。德国皇帝退位，共和国宣告成立，甚至建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三派：右派、中间派和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改建为德国共产党。然而斯巴达克同盟领导的工人革命恰恰是被社会民主党右翼在最反动的势力包括前法西斯别动队的支援下扑灭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遭到杀害。

卢森堡在她死前所著关于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中所阐述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她在小册子里写道：

“问题在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找到的药方，也即取消民主的药方，比他们要医治的疾病还要糟糕，因为它在事实上堵死了可用以纠正社会制度中先天性弱点生命之泉，即有最广大群众参加的生动活泼、自由热情的政治生活……当他们企图强作欢颜，企图在理论上巩固那种在很不幸的条件下迫使他们采取的策略，把它作为值得仿效的社会主义策略模式向国际无产阶级推荐时起就出现危险了。”

今天重读这一段话尤感其意义重大。这是左翼、民主的工人左翼第一次批评轻视民主和自由可能对苏联和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

罗莎·卢森堡一直维护“基层民主”和工人委员会，但她同时也意识到代议制民主的必要性。当列宁在1917年底以制宪议会已不能反映民意作为论据而予以解散时，卢森堡反驳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另行召开制宪会议，革命不能没有代表人民的民主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工人运动内部的重大历史抉择已被简单化地说成是以列宁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两大人物为分野。列宁代表了革命道路，考茨基代表了同资产阶级妥协和支持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

实际上就从那时起，共产主义者内部，确切地说在西方共产主义者内部已开始出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同列宁不一致的观点，那就是当时德国革命社会主义最崇高的化身，罗莎·卢森堡的道路。

从现在的角度来回顾当时的情况，基本问题在于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现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德国的革命被扑灭了，而俄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因此，工人运动中最革命的力量，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如当时的西班牙全国总工会内发生的情况），都集中在已经取胜的革命的周围，倾向于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因为这是实践证实了的击败资本主义的唯一道路。

这一情况决定了那种在完全特殊的条件下实现的、同马克思当初在理论上的预见并不相符合的革命榜样，不仅在政

治上,并且在理论上成了新成立的国际的基础。

然而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政治传统、体制和文化方面,当时俄国的条件同西欧有很大的不同。

面对俄国榜样在革命历史的那个阶段所起的决定性的影响,主要通过罗莎·卢森堡这样的人物和思想,就开始表现出西欧反资本主义战略同俄国革命后刚建立的新型国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的矛盾。

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这种矛盾。

葛兰西这个人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他是企图对西欧社会的革命战略提出一整套基本思想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阐明了对革命斗争来说,当时沙皇俄国同西欧国家的具体差别,提出了一些具有巨大影响的主张,尽管葛兰西的著作在前不久还很少为人所知。他写道:

“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十分原始,死水一潭。在西方则相反,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存在有效的相互联系,国家震动一下,立即就能看到市民社会的坚实结构。国家只是前沿的战壕,在战壕后面可以找到一连串坚实的大小堡垒。自然这种情况各国都并不相同。但这就更需要作详细的全国性的了解。”

同这种想法直接有关的论点是,葛兰西认为在东方,即指俄国,“运动战”的运用取得胜利。但在西方需要采用另一种战略,“西方唯一可能”的是采取“阵地战或战壕战”。

出于俄国国家利益而在共产国际内部强制推行的战略同西方革命斗争需要之间的矛盾(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如此,但不

是本文涉及的范围)有过一系列的表现,例如在人民阵线时期。第二次大战后1947年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加强俄国霸权主义的一种措施。南斯拉夫铁托的独立立场是团结开始破裂的第一个例子,所谓磐石般的团结不过是掩饰各党接受苏联领导的幌子罢了。

这是粗线条地概括了引向欧洲共产主义现象的道路。但是只看到用以阐明欧洲共产主义现象的共同特点那是错误的。我想这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到我在前面已经讲到的卢森堡和葛兰西的理论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克里斯蒂娜·比西——格吕克斯曼所称的“左翼”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即在革命问题上非唯政权主义的思想,加强社会运动、基层民主而不把议会活动放在优先地位的民主道路思想。在意大利欧洲共产主义的这种解释以彼得罗·英格拉奥、布鲁诺·特兰汀等人为代表,在西班牙则由《我们的旗帜》编委会为代表。但问题在于这种解释并没有越出反复思考和理论设想的范围。这也许是因为在某些方面离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过远,或者因为已超越了时代。

事实上在各党内(包括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共产党在内)占优势的是格吕克斯曼所称的“参政性”欧洲共产主义,也即在政策上把注意力集中对付体制方面的尤其是议会方面的、上层关系方面的欧洲共产主义。

根据上述情况,恕我大胆作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尽管这样做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基本上是这种“参政性”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这种欧洲共产主义事实上在这些党的政策上起过作用。然而,这种欧洲共产主义的

许多理论,具体来说,(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英格拉奥著作中提出来的许多理论对制订在欧洲走向社会主义的政策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理论能否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中结合进去呢?通过什么道路和方法结合进去呢?这是我所不敢回答的问题,并且极有可能根据各国的情况解决的办法是不同的。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欧洲共产主义目前所遇到的特定的危机,因为存在危机一事已无需争辩,列出事实就足够了。

在好几年前,姑且把 1976 至 1977 年作为标志吧,西欧的一系列共产党,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党,采取了民主新战略,同教条主义传统决裂,不怕对苏联政策的某些决定性方面进行批评。看来西方共产党的深刻革新已经起步,并将扩大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打开同社会党发展新关系的大门,使共产党在欧洲参加左翼政府的可能性变得不那么遥远了。

但目前的局面却很不同。在法国支持欧洲共产主义最坚决的那些人已经被开除出党或被排斥,这些人中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多,也有一些具有很高威望的工会领导人。法国共产党公开摒弃欧洲共产主义,重新站到苏联立场一边,它已经丢失了相当一部分党员和选民,力量比第二次大战前下降。

奇怪的是它同时又在莫鲁瓦政府中担任部长,参加了基本上由社会党掌权的政府。然而这种参与的性质很特别,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社会党人说:“他们都是称职的部长,管理得很好。”与此同时法共仍然维持自己同密特朗政策发生冲突的

立场。我个人认为当前法国经验的主要弱点是缺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是根本问题。这种情况十分危险。左翼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也是很危险的。面对这一问题，欧洲共产主义应该是在左翼政策的范围内寻找社会和政权之间关系的新形式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法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将来能否得到解决，但无论如何也将要通过其他的办法去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在希腊有特别大的影响。当时希腊是欧洲少数几个没有社会党的国家之一。近十年来共产党的影响受到削弱，分化成了各色各样的政党和团体。真正的欧洲共产主义党是由受镇压时期在国内领导党工作的人以及一些年轻有为的青年党员组成。这个党在选民中力量不大，在社会的某些阶层有威望，但政治影响不大。它的力量不如亲苏的共产党，当然，希腊的政治地理因素（土耳其的威胁）和历史因素（信仰东正教）造成了有利于亲苏主义的土壤。但这也并不就此抹杀基本的事实，即欧洲共产主义并没有在左翼舆论中真正深入人心，而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纲领则受到信任而赢得多数。

我不准备再在这里谈欧洲共产主义在西班牙的危机，因为前面的章节已经专门谈到危机产生的经过。从外表来看，尤其从西班牙共产党的某些对外政策的声明来看，它无疑是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党。然而它同时又在党内“清洗”欧洲共产主义者！并且日益重新变成旧式的教条主义党。

意大利是个例外。我认为意共尽管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但它通过在报刊杂志、研究中心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次讨论（即

1981年2月关于党的性质和组织的讨论,同年12月关于文化政策的讨论,1982年1月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讨论)已经将欧洲共产主义的大部分危机引向内部,请允许我用“内向化”这个词来加以表达。它就是这样通过讨论寻找出路,探索前进的道路,也许还不只是为了推动欧洲共产主义,而是要进一步促进欧洲左翼的作用和团结。

我们若静止地从纯组织的角度去观察哪些党是欧洲共产主义党和哪些党不是,我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今天欧洲共产主义已变为意大利的一个异常现象。但是这个答案会导致错误的判断。

欧洲共产主义的现象已经超越了过去曾以此命名或现在仍以此命名的所有政党的范围。

要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就要把它当作欧洲左翼危机的一部分,自然不能因此否认有一系列特别方面,无疑起了巨大影响。

贝林格在一篇很有意思的著作中,承认欧洲共产主义受到挫折,他是这样提的:

“如果考虑到某些欧洲共产党(不论是否自称为欧洲共产主义党)的现状,考虑到这些党的某些观点和处境,那么可以说,这种有关西欧整个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战略思想受到了打击,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后退了。”

在贝林格看来,“第三条道路的前景”仍然有效,这是指克服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也克服“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之不足的一条新道路。

因此在谈到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时,我们应该指出这是

欧洲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不只限于共产党的范围。

## 二

欧洲共产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我个人有强烈的愿望想作这样的答复，即危机的原因在于民主战略同一些不能打破垂直结构和教条主义习惯和传统的党不能相容。

西班牙原来存在向欧洲共产主义转化的某些有利的客观条件：西共在国内组织拥有不少青年干部，又进行了反佛朗哥独裁斗争，党很自然地把民主事业同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利的条件：四十年的秘密状态使中央集权的专制思想和工作方法在党内，尤其是在领导核心内部和党的机构内部，变得根深蒂固。我在本书中谈到的不少事件，其根源都在于这个矛盾。根据我在西共内的切身经历，我倾向于把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的解释集中归结为传统结构的抵制和僵化。

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我认为危机的根子在于从欧洲共产主义的开始提出到目前时期，西欧客观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这种急剧变化归纳为以下两点：

国际形势从缓和的气氛转为严重战争威胁的出现，帝国主义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侵略，苏联在加紧搞霸权主义以及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

经济从接近全部就业和消费增长的高涨阶段转为今天陷入的极端严重的危机，欧洲共同体国家有一千万人失业，美国



在经济上向欧洲进攻，通货膨胀率上升，广大阶层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我并不认为一开始对欧洲共产主义的提法在今天已成为错误，或者事实上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绝非如此。欧洲共产主义采取独立政策、走民主道路、赞成政党多元化和轮流执政、以及建设民主和多元的社会主义，这些主张还是正确的和重要的。

问题在于我们遇到的不只是经济上的危机，同时还是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上的危机，对危机的全面情况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但不管怎样，危机把性质上全新的要求摆到桌面上。欧洲共产主义党不得不对未曾预见的形势和问题作出答复，从这一点来说当初的欧洲共产主义论点已经不够用了。

一方面波兰事件要求欧洲共产主义党采取站在东方国家劳动群众一边的战斗立场，反对压迫劳动群众的专制政权。欧洲共产主义党在苏联侵捷时所采取的谴责方式已经不够了，还必须进一步采取政策，把东方国家争取民主的斗争纳入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进展和胜利的总政策内，成为其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今天和平与战争问题已以崭新的提法摆到欧洲和世界面前。今天不是天体间的物质现象会导致人类的毁灭，而是人类本身的行动使它成为可能。只有使某种能消除或逐步消除这种威胁的政治方案，某种在地球上生活的方式取得支配地位，才能使人类不至毁灭。尤其是青年现在已日益意识到上述现实，这是真正的新事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见了一种介乎政治领域和非政治

领域之间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内容和创见使欧洲共产主义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我指的是欧洲新兴的为争取和平与核裁军而斗争的和平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现在已扩散到美国。

哈佛大学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斯坦德利·霍夫曼在最近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霍夫曼无疑是美国大学界对欧洲情况最熟悉的人。他写道：

“正在发展的这个运动是件新事物，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平常的。它是一个大陆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所动员的人们已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即使在今天欧洲已经部分一体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是十分罕见的。过去在一些国家里妇女以及大多数宗教性运动和教会（特别是新教教徒，但不尽然是新教的教徒）很少参加大规模示威，现在都积极参加了。美国在欧洲大陆最可靠的盟友、一直是北约支柱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和平主义运动的势力尤为强大。在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主要集结了各种政党的成员，运动尽管由比较知名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牧师领导，但首先它是青年群众会集最高的运动，它是下代人的抗议，是1968年以来第一次大的运动。就象法国1968年5月运动一样，我们可以借用戴高乐将军当时的话来说‘难以理解’，因为它围绕着某一个集中代表着各种疑虑和愿望，主要表达出人们的情绪和激情，而不是理性的分析。”

象斯坦德利·霍夫曼这样在美国“权力机关”有影响的人物作如此评价是颇有重要意义的，因此请恕我引用了这么长一段话。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两大

军事集团的两极化体系使我们处于一种极限状态：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使全世界的军费开支每分钟达到一百万美元，全部国际生活已经军事化，日益倾向于使用实力政策，侵犯弱小国家，而把联合国撇在一边，无视它主张协商解决问题和尊重各国人民的决议。

进步力量在各个国家政策的范围内争取限制和监督军备、反对侵略、消除危险的斗争，一再遭受挫折。军备愈增多，冲突会愈加剧，威胁也就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主义运动代表了要求改变军备、冲突和威胁三级连锁反应的新动力。它侧身于各个国家政治之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侧身于政党之外。和平运动拒绝接受所谓“军事平衡”的诡辩。一方面军事平衡这种说法本身是荒谬的（因为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已拥有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军备），另一方面它只有利于使扩充军备更加合法化。和平主义运动今天集中于一个明确和响亮的目标：**不得在欧洲搞核军备。**

和平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大陆构成新的现实，就象意大利共产党人隆巴尔多·拉迪切所说的“欧洲人民在新生”。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眼光去判断，认为它们缺乏组织，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几乎是零零碎碎地进行的，活动变化多端，今天搞盛大示威，明天就无声无息、消极被动，那我们就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恰恰反应了今年青年做人和生活的方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摒弃过度的组织，以免导致官僚主义和受人操纵。

因此我在前面讲它们是欧洲生活中新动力的崛起，并已

能对政府的决定发生影响。

一些国家争取和平的运动从外部和内部对政党进行冲击，推动这些政党对本党提出新的定义。英国工党和西德社会民主党是十分明显的例子。意共在经过惊异和犹豫之后，已决定支持和平主义者的运动。

这些新的争取和平与裁军的运动前途如何尚难揣测。但我个人认为这里蕴含着一种搞政治的新办法。它们会在欧洲生活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这并不是说要低估国与国之间为防止无节制的核军备竞赛而进行必要的谈判以及最终可能采取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还得一步一步地走。

当然今天人类需要结束这样的战争，需要建立一种既没有战争又能开始有效裁军的文明。现在舆论界日益广泛地意识到这种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人们日益感到各国政策的军事化，面对这种情况，从青年中、从站起来的欧洲公民中开始出现了这种新动力，其目标十分简单，然而却十分重要。这种新动力不仅通过神圣的议会道路，而且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协会、市政府、文化中心、新闻媒介、各种直接民主的方式和示威游行等来表达，而这种新动力已成为影响事件发展的新因素。

反对者往往说，建立无核武器欧洲的目标和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以及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运动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都是乌托邦的，甚至是无理性的，它们所寻求的目的同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是不相称的。

我不想只是简单地答复说，所有动员广大群众的运动都需要掺有那么一点乌托邦的想法，甚至对现实主义的政策来

说,有一点点乌托邦的想法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涉及一个不仅是欧洲共产主义者,而且推而广之是全体工人力量和进步力量需要研究的根本问题。最近欧洲理论界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1981年12月由巴黎大学组织的纪念尼科斯·普兰查斯的座谈会上就进行过讨论。意共中央委员会在讨论文化工作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即如果说我们正处于深刻历史变革的阶段,那我们是否有必要修改我们所谓的理性或合乎理性两词的含义,以便更好懂得周围的事物并更好地对它们施加影响呢?

工人运动,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性的概念是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承袭而来的。它难道不是过分着重自然的、直线的、量的进化思想,即生产增多,就愈来愈发展,福利也会增多,而且会有更多的自由吗?而这种想法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今天已经脱离了当代的现实。难道我们没有必要开始创造另外一种不同的理性,以考虑进化有包括灾难在内的多种可能性,以考虑今天人类在技术上已能更多地影响自己的命运从而肩负更大的责任,和考虑主观因素在历史中作用的增大?如果允许我胡说八道的话,那么为了使世界上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也许我们有必要对理性的概念进行革新。

我这里只是用提问题的方式把题目提出来,不提供解答,让问题敞开着,也许这样做过于大胆了。这是个理论问题,有可能看起来同欧洲共产主义离得很远。但我愿指出,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已经超出各党内部问题的范围,它是由另一种危机引起的,而那一种危机的界线至今还看不清楚。但不管怎么样它向那些愿担当社会变革主角的力量提出进行深刻变

革,包括理论领域变革的必要性。

我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提到了新的和平主义运动。但这里潜伏着一个更广的问题,即引起危机的这类新问题正在要求对传统的搞政治的方式加以变革,采取了搞政治的新形式。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选举和议会的方式,但有必要使这种方式臻于完善,并且用其他方式予以加强。为此应大大改变把这种或那种方式分成等级的看法。

首先要从了解“政治”一词的含义着手。从革命的、进步的角度来看,不能只根据国家的观念来看政治,把它只看成是争取议会和政府的绝对多数。

今天若左翼力量只限于在传统的政治、政党、议会、甚至加上工会的框框里活动,那么,我认为很难真正开辟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在这个框框里,即使进了政府,也有可能只是重复社会民主党人的经验,特别是象法国那样有共产党人参政的经验。

因此我们要赋予政治这个概念以更为广泛、同时也更为深刻的含义。把政治看成是改变历史的一种能力,把政治看成是各种善于改变历史的人的力量、社会的和文化的力量根据某种设想而进行的创造。

走向社会主义并不单纯是去清除障碍,使已经同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自然地”取得胜利,而是要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制订社会主义变革的蓝图以及建立足以实现这一蓝图的社会力量的历史性集团。

以此为起点打开对左翼政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系列革新领域。

我将着重指出其中的某几个领域，尽管有可能是局部的，以及可能会重复我在本书其他部分所涉及的问题。第一，面对经济危机和失业，以及必须缩减工时和用新的方式来看待人同生产过程的关系等问题，工会运动已不可能沿着旧轨道前进<sup>①</sup>。不仅有必要抵制由于危机而引起的分裂劳动人民的各行业本位主义现象，而且有必要争取工人阶级对积累过程和总的经济政策进行干预的新形式。

有一些新的因素既改变了社会经济领域里传统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改变了斗争方式，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需求，而这些需求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是不可能使之商品化的，这里指的是文化、教育、男女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生活质量等等。从这些需求产生了新的斗争形式，尽管斗争集中在具体问题上，但含有反对资本主义和要求社会变革的活力。我们同时还看到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不属于生产领域，然而在反对由于资本主义和国家统治而引起的异化方面，已成为影响日益增长的因素。任何旨在采取进步办法解决危机的中期或长期计划，都不能不考虑这种因素的作用。

革命进程中新主题的纷纷出现，迫使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领导作用”这一概念的内容已过于狭隘和局限。这一概念曾用于为各种宗派主义辩护。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以下情

---

<sup>①</sup> 参见让·路易·莫瓦诺所著《小河中间》，1982年巴黎出版。在这本由法国总工会前书记写的书中，作者从自己在法国主要全国性工会自身的经历出发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解。

况，工人阶级本身的组成已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愈来愈多的脑力劳动者结合进来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承认工人阶级在革命进程的决定性方面无可争辩地起着主角作用的同时，并不因此就要分等级，似乎要把其他的阶层置于从属的地位。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同现实并不相符。

## 第二，关于扩大政治民主的范围。

经验表明群众性的新闻媒介，主要是电视，使选举成为重大宣传活动，形象的因素要比思想见解重要得多。这种情况对政府以及对代表占统治地位的寡头势力的政党有利。但左翼政党被迫要在这个领域内进行斗争。

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这种蜕化进程的回击主要是在青年中出现的贬低代议制民主的倾向。西班牙尽管四十年没有举行过选举，但这种倾向也很快地表现出来。我认为使代议制民主充分发挥效力，是一个带根本性的目标，为此除了改革议会制的内容外，似乎也需要使公民通过多种渠道，在居民区、生产和学习场所用直接民主形式和基层民主形式参与公共事务。

第三，欧洲工人运动有必要在斗争中采取更明确和更有战斗性的立场以结束世界上殖民主义的残余，和争取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南北关系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有这一切首先同和平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同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

维利·勃兰特所作的重要贡献是着重指出目前发达世界和第三世界悬殊日益扩大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这个问题已远远不只是要求作更多的研究或开展更多声援活动。还



有必要使绝大多数人认识到欧洲消费体系的改变同必不可少地将财力和技术向第三世界转让之间有必然的关联，使他们认识到接受联合国旨在缩小南北差距的超国家的经济决定的必要性，以及懂得不对国际劳动分工进行深刻的变化，就不可能解决这里的危机。这种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并不是由多国公司，而是由各国人民的民主代表应起更大作用的国际机构强制推行。

第四，有必要在各方面把科技研究计划置于优先地位。在历史的现阶段，科技领域的落后和匮乏有可能意味着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使我国在新形式下处于从属地位，受到排挤，成为别国的卫星国。右翼可能会接受这一前景，他们的兴趣在于维护特权，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维护的只是主权的象征，是虚有其表的东西。但作为代表人民、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左翼，有必要制订一种保证民族生存和主权实质的政策。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尤其是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科学的研究和创造能力要制订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提到一个新的方面，也许这个方面在当代的问题中最有典型意义，即我们要走出一国的范围，扩大到欧洲方面。面对美国和日本在新的科学革命和新的技术方面的竞争，一国的范围已过于狭小了，需要以欧洲作为整体来回答这种竞争。

这不是把国家范围的力量同欧洲范围的力量对立起来。如果一系列的国家本身连自己的力量都没有，那又怎么可能在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领域显示欧洲的力量呢？但反过来如果

只看到自己一个国家，那么在今天已经不够了。如果把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努力纳入整个大陆的范畴，那么就有能力有效地回答这种竞争。

另一方面，把研究计划放在优先地位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治抉择，它包含着在中期和长期政策中在各个方面改变等级，把愈来愈多的资源和力量集中到国内教育方面和提高文化水平方面。西班牙在这方面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要落后得多，我国真正的左翼政策应特别强调这种必要性。

我想再补充一点，在研究领域里，欧洲范围的这种必要性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具体体现在日内瓦欧洲核研究中心的工作中，在其他许多领域也提出同样问题，尽管各个领域有自己的特点。左翼要制定和发展对付危机和失业的经济政策，就必须象密特朗建议的那样加强欧洲社会的地位。在工会运动更新方面，欧洲大陆一级的相互关系日益显得重要。甚至有关扩大政治民主范围的要求，尽管是由各国宪法、各国历史等情况决定的，但在欧洲大陆这些和那些国家的制度和政党之间仍有某些共同的方面需要交换意见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

欧洲政治生活现在已经开始起步，事态的发展还会加以推动，我认为速度还会加快。

这种欧洲政治生活的特点将是什么呢？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欧洲议会的经验还太短，同时还受到右翼占优势的暂时情况所制约。有无可能只是各国情况的简单再版呢？也可能不会。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难以辨别的新特点。

### 三

在作上述考虑时，我是否把政党遗忘了呢？我是否想撇开政党来考虑政治问题呢？绝不是这样，否则就是荒唐无稽。

但是我想表明，首先，欧洲共产主义危机的根子在于近些年来欧洲局势的深刻变化，在于欧洲共产主义没有对这些变化作出足够的答复，以及在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党（也许意大利除外）表现出它们没有能力在内部开展讨论，对内部体制进行必要的变动来对待本世纪近二十年来出现的客观新形势。

同时，欧洲共产主义各政党的具体危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有不同的表现，但又有某些共同的特点。

一方面，这些党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效忠苏联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老一代人中特别根深蒂固，而且由于危机的加剧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思想在青年中某种程度上重新有所发展。他们想从一些社会主义理应成为现实的国家的幻影中找到一种简单的、摩尼教式的答复。苏联则因地制宜地、有计划地在利用这种肥沃的土壤。

除了历史留下这些方面之外，另一个特点是这些党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得胆小怕事，其原因是这些党的旧的组织结构同它们制订的战略相分离而造成的。

拿西共来说，这种立场通过 1981 年秋天开始流行的所谓“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要改变战略，那很好，但不要触动到党。结果是出现矛盾，在这种

情况下,后者取消了前者。

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具体说来,意共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同西共是不同的。意共已为改革和更新党的必要性打开了大门。我们可以举意共领导和书记处成员阿尔弗雷多·赖希林在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文化问题上的提法作为例子。他说:

“因此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党,这是从以下几点含义来说的,即它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开放,它提出社会主角的多样性,它对自己的理论重新进行研究,最直接地深入到现代社会结构的总体问题中去,也即深入到托尔托雷拉所谓的‘未经探测的森林’中去。这样一个党应在实质上克服不论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所主张的唯经济和唯政权的旧理论。”<sup>①</sup>

赖希林讲的话新颖大胆。当然正确的言论并不能就此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但问题已经提出。

意共内部的这一讨论过程,总是受到来自各方的严重抵制,最近并同带有明显亲苏标志的观点发生冲突。但除意共外,看不到西方其他共产党有向前迈进的迹象,看不到这些党有克服“参政性的欧洲共产主义”或者“上层”欧洲共产主义的迹象,看不到革新业已陈旧的党的结构以适应新情况的迹象。

由此我倾向于对欧洲共产主义在更广的范畴内兴起,走向现已开始称之为欧洲左翼的这一重要步骤的前途进行探讨。

---

<sup>①</sup> 见1981年12月4日《团结报》第6页。

这就迫使我提出以下问题：在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在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是否也遇到危机？

去年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欧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胜利。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减轻联邦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在欧洲最有力量 and 影响的社会民主党遇到的危机的严重性。此外，有趣的是虽然情况明显不同，但引起危机的因素却同欧洲共产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相差不远。这些因素是：同新兴的生态、青年、女权等社会运动发生冲突，对这些运动不能理解和发生矛盾；丧失了一部分基层传统工人中的影响；“凯恩斯主义”遭到失败而又缺乏或一时还没有找到新的解决办法；过分陷于议会政治和国家的政策，因此一方面加强了专家政治的倾向，另一方面加强了各个阶层尤其是青年和激进的阶层的反应，他们对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特点提出疑问，在不少国家争取和平的运动中他们还十分活跃。

我们看到，欧洲现阶段存在着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欧洲共产主义企图摒弃这两条已经有人走过的道路而走“第三条道路”，但没有走通。欧洲共产主义也陷入危机。“第三条道路”还有待于建设。

#### 四

我已经写到本书的末尾。我不想用失败和悲观的气氛来加以结束。因为我的精神状态也绝不是这样。我对我走过的道路并不感到遗憾。我在当今世界所观察到的情况使我深信

朝着共产主义未来进行变革和革命的必要性（我不愿放弃共产主义这个词，尽管不少党在用这个词时已经抽掉了它原来的含意）。我甚至认为现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有可能为新的革命前景创造条件，也许今天最年轻的一代可以看到这一前景。

使我更担心的是，今天的政治形势和欧洲左翼政党如何才能走出危机这样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现在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似乎会成为主观臆断，但我从来认为即使犯错误也比什么话都不说好。各种见解，包括错误的见解至少可以引起讨论，帮助别人得出正确的看法。

我因而胆敢在这里提出某些不成熟的见解，有些问题我还在继续进行思考。

当前欧洲左翼都面临政党这种形式的危机，尽管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内的这种危机的进程同共产党内的这种危机的进程有明显的差异，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是夸张的。现存的一些党都表明它们没有能力去解决某些日益变得重要的新问题，没有能力去推动和引导某些正在出现的动力，而这些动力对提出解决危机的进步答案以及为社会主义解决办法开辟道路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有人也许会引用密特朗的经验作为证据来反对这种不成熟的结论，但恰恰是从密特朗的经验已经看出它的弱点，在工人和人民群众参与这样一个决定性问题上存在弱点，所以反而证实了我的想法。

如何克服政党的这一危机呢？是内部进行改组还是建立新的政党，抑或在政党存在的同时加强社会运动的作用使政治体制更加多元化呢？我还不敢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改革和演变，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们也会是不同的。

历史形势本身迫使左翼必须采取有雄心壮志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在于保住多多少少稳定的竞选地盘，而是要扩展道路，同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同青年接触和结合，从而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性集团，以及集中力量去解决一些不容无限期拖延的严重问题。

恩里科·贝林格在下面的引文中讲到过这种前景：“鉴于西欧工人运动，尤其是我们党今天所肩负的责任和作用，那么现在来讨论这一必然进程的主角首先将由共产党、还是由社会党或者由其他进步政党来充当，就显得抽象，学究式和唯名论。……我们要意识到在寻求团结的前提下，各种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合乎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关于这点只提一连串组织的缩写名称毫无用处（由此也产生唯名论的空泛性）。我们要说，在欧洲的工人政党和人民政党中，那些表明在今天西欧和意大利的复杂形势下能提出最明确的和激进的替代方案的、那些最能动员力量争取上述目标的、那些更善于抵制和扭转当前事物发展方向的、那些更善于联系目前工人运动发展的要求而能更好地对自身进行革新的政党将会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取得更大的成就。”<sup>①</sup>

意共在欧洲范围内按照贝林格以上所说的方针开展政治活动，显然会对左翼力量的新结合产生重大影响。

---

<sup>①</sup> 贝林格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见1981年12月5日《团结报》第17页。

我并不否认政党的作用，并且相反地认为左翼政党的加强对任何进展都应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我倾向于把“第三条道路”的建设，包括“欧洲左翼”的建设从不只局限于政治党派而从更为广泛和更为复杂的意义上来理解。

我也看到，如果没有新的因素、新的动力（例如各工会和平和主义运动）的参与政治生活，那么贝林格正确地指出的革新进程也是难以实现的。

左翼力量在欧洲范围内的接近和团结，也很有可能不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即通过有关党的领导机构之间签署协议来形成（当然也绝不能轻视这种协议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倡议、联合行动、会晤和讨论，使各种态度取得协调一致，使由各政党直接领导的群众性动员能同以社会运动为主导的、不那么直接具有政治性的群众性动员汇合在一起。某些社会运动在实现全欧范围的活动方面阻力较少，推动力较大，更有号召力，例如工会、女权、青年和和平主义等运动。

左翼的这种革新进程并不是一种推测，而是已在开始迈步的事物，尽管有阻力，受到挫折和后退。它向我们提出必须把葛兰西所谓建立多元化领导权（而且不是简单的组织上的领导权）的思想放在理论研究的中心。这种领导权要在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内扎下根子，同扩展甚至是最新形式的政治自由联系在一起。这种领导权来自于使一切推动社会主义变革的阶层都能起主角作用的市民社会相互衔接的活动。

过渡性的国家政权对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必不可少的是对政治的认识。不应把政治只看成是国家政权的政策，而应把它看成是群众的活动、绝大多数人的



活动,看成是群众愈来愈多地参与决定未来。

如果不是从这一理论思想出发,那么对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解决方案的答复就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的改良主义了。

这里涉及到要同过去时期的思想作坚决的决裂。能否成功在不小程度上有赖于能否消除压在革命者头上的不幸遭遇,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这种不幸遭遇是这样说明的: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他还说,“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

即使改变了罗马数字,这个思想也不会失去价值。

# 附 录



## 附件一

### 西班牙共产党前律师基层委员会 致第一届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 和艺术家代表大会的通知

第一届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大会是在国内、国际各方面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召开的，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是：

由于第三世界人民进行的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斗争，由于工人阶级开展的斗争，以及由于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大国之间本身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体制已经衰竭；

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不断增长的失业、经济停滞、资源浪费、通货膨胀以及与此同时少数寡头阶层利润增加和中、小资产阶级无所适从的现象使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受到影响而分化，产生了行会主义、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

集团政治和冷战的加剧，政治形势的右转，现代化国家专制特点的加强，民主和进步的替代方案的受到封锁，这些都破坏了必要的缓和政策。

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上文化、社会 and 思想的价值观念遇到危机，右翼又准备东山再起，他们发动攻势，其目的是为危机

找到反动的出路，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使劳动者和各阶层的人民大众负担危机带来的代价，同时也损害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阶层的利益。

进步力量表现得不能团结一致，没有象当初诸如法国左翼联盟和意大利历史性妥协那样开辟唤起人们巨大希望的明确道路。在政党之外出现的主要运动对制度本身提出了疑问，但是这些运动迄今为止并没有得到左翼从进步的前景出发予以应有的接受，却产生了采取抵制和防范性立场的倾向。

所有这一切在我们国家都有反映，使情况更加严重的是西班牙在独裁统治之后并没有实现民主决裂以及我们左翼力量没有能力在由右派控制的进程中将民主内容进一步引向深入。其结果是各政党和工会力量薄弱，公民普遍地感到失望，不参加选举的人数的增多表明了民主制度有丧失民心的危险，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右派迫使民主制度（“劳动者章程”，“就业法”，用野蛮的方式对工业部门进行调整）缺乏社会和经济内容而引起的，同时也由于后几届民主中间派联盟政府逐渐右倾造成的，从而一方面加强了国家最专制的部门（我们不能忘记这些部门的某些要害机构并没有进行过改革）；另一方面在立法上使推动西班牙社会向进步和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建议难以通过。

在这种形势下，西班牙共产党则经常采取观望态度，没有提出足以动员全体劳动者和公民的创见和建议，也没有从对社会进行深刻变革的纲领的角度来开展我们日常的政治活动，从而看到中期的远景。

另一方面，口头上的民主和实践上的官僚主义之间的矛

盾,已经使我们的政治纲领在社会上丧失信誉,并同样使我们自己的队伍感到沮丧和混乱。

众所周知,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运动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些运动中无疑是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他们当时有坚强的组织,其特点是能开展广泛的政治活动,能渗透到社会本身的结构之中并且在党内生活上持有明确的民主思想。但是在过渡时期的进程中,这些运动在西班牙社会中的影响几乎消失殆尽,这些阶层在各个党组织里的党员也所剩无几。

与此同时,这些年来右翼在自由职业者团体中,在文化领域和在公众舆论中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诸如自由职业者同人工会等行会主义的组织,而带有阶级性质的工会运动的阵地,尤其是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的阵地却有了明显的后退。进步思想和共产党本身的立场在群众性的新闻媒介中变得无声无息,甚至受到粗暴的攻击。

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多年来在这些阶层中进行的工作完全前功尽弃了。

这种形势不但削弱了左翼力量在深化民主斗争中的作用,而且也使我们不可能推进我们称之为“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的战略主张。

除了由于过渡时期没有经过民主决裂的阶段以及全党缺乏政治争论和参与性质的党内生活等一般原因外,还因为党内通过组织渠道向党员通报情况不够,党的全部精力几乎都花在参加国家体制内的活动和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方面,大部分党员都产生了高度非政治化的倾向,以致出现了在

合法环境下政治生活反比在地下活动时期少这样一种荒谬的情况，出现了政治职业化的明显危险等情况。将我们所属的阶层按地区重新组织的时机和方式，都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加剧了党员感到压抑和受到排斥的进程。

在按地区划分基层组织三年之后，曾经在“康文沁饭店”举行过一次会议，打算纠正这种情况，但是尽管在提出建议时的目的是积极的，但是会议进展的方式却使大会遭到失败。尽管如此，由于那次大会开始展现的希望，在某些阶层中又重新开始了重建工作，但是到了夏初，由于党的整个机构缺乏进行彻底革新的推动力，这项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了。

这次提前一个星期发出的召开大会的通知，事先提出的议程，以及报告的内容（尽管对大会报告的起草作了很大努力）不单表现出缺乏对当前形势的必要了解，甚至也表现出缺乏对为摆脱当前情况而提出的任务有必要的了解。

我们认为与此相反，此次大会应该成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重新参加党内生活的一个开端，尤其在“十大”在望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应该成为使欧洲共产主义纲领深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里程碑，因此不应当只限于在是欧洲共产主义还是亲苏主义之间进行辩论，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内生活重新恢复起来。

在这方面，要恢复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运动的积极作用，以完成深化民主和建立进步社会集团的任务，就必须在党内恢复一项意味着发展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方针，（但却不必机械地同近几年的政治实践完全一致，前几年的政治实践只限于提出一些过分一般的主张）以及必须在对上述各

个阶层提出具体的替代性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广泛民主联盟的方针，主要是同工人社会党的联盟，从而使我们党从形象到实践都具有明显地民主的特色。

这就要求适时地在党的组织结构内建立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的专门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可以提出、讨论和实行一条能把我们党战略变为同这些阶层相适应的建议和行动的政策。

最后，我们除了建议大会讨论本文件所提出的问题外，我们同时号召全体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论他们现在的处境如何，都要积极参加这项使我们各个阶层政治活动重新活跃起来的进程，以及积极参加党的“十大”的筹备和召开。

为此，我们下列签名者，前西班牙共产党律师支部的党员建议大会把这个通知分为两个问题在第四工作委员会上讨论。这两个问题是：

1) 分析和讨论西班牙共产党近几年对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的政策和对“十大”的看法；

2) 作为讨论结果，大会应建议重新建立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艺术家的专业性基层委员会。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大会对我们的建议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想表明，不应把我们的立场简单地同党内有可能出现的任何思潮相提并论，我们并且认为这届大会不应成为任何思潮的资本，而应该成为全党的资本，为此应该对大会结果的公布予以特别的重视，以避免有可能把大会结果的公布作为工具来利用。



## 附件二

### 争取建立革新的欧洲共产主义

面对我们党内出现危机的局面，我们下列签名者都赞成在西班牙共产党党章中承认思潮的存在，以便在“十大”期间形成一种为使欧洲共产主义政策进一步深入和使党得以革新而开展活动的思潮。我们在这个文件中准备概括地提出这种思潮形成的理由和目标，我们认为这种思潮同马德里省的党组织内广大党员的担心是有联系的。

#### 一、西班牙共产党的危机

我们的党在反佛朗哥的斗争中以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重建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扎下了根子，它在整个民主变革的进程中是一支基本的力量。不仅在佛朗哥时代的最后几年，就是佛朗哥死后在粉碎继承派的计划的斗争中它都是这样一支力量。

它在民主斗争中起着启蒙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为此它应得到所有西班牙民主人士的承认。正因为如此，它在工人阶级、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的最有活力的阶层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正因为如此，党同样在政治改良时期取得了合法地位，

而且尽管在1977年6月的大选中我党只获得9%的人民的选票，但共产党人还是建设新的民主国家不可缺少的力量。

最初的几届工会选举使工人委员会的力量居于领导地位，在1979年的大选和市政选举中我们获得10%的选票，成为国内第三力量，打破了两党制，在西班牙最重要的地方政府中同工人社会党进行了良好的、真诚的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巩固了有利的地位，以此为立足点，我们能够在民主的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负责的反对派的实践的基础上，在地方政府中获得执政的重要经验的基础上，并通过在西班牙社会的进步阶层之间建立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广泛一致打下基础，形成进步的替代方案。

然而，在宪法的基础上取得的一致局面破裂之后，我们党的工作似乎出现了偏差。在民主时期以前进行政治活动和领导党的一些方式已经失去效力，西共没有适应新的形势。把市政工作的政策看成是无关紧要的，而没有把它当成整个党的领导班子共同关心和考虑的中心问题。党的领导对工会方面的工作更是很少过问。出于在关于工人委员会具有独立性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党的领导没有研究过工会的严重形势，直至工会工作的危机发展到了激烈的程度。党所提出的四方协议的失败，使大部分工人委员会的领导在进行部分集体契约的谈判中，在讨论和执行两大工会和企业家协会联合会之间的原则协议和劳动者章程的过程中，采取了激进和对立的方针，其矛头主要已不是对雇主和政府，而是针对劳动者总联盟。中央委员会和省委只有在预见到1980年工会选举将遭惨败时，才匆忙草率地进行干预，从而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

论,但由于没有普遍执行因而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由于放弃了知识文化阵线的工作,党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丧失了,甚至达到真正解体的局面,而党的领导只说“是我错了”,却不实行必要的彻底的改革。

同样,党在青年、妇女、生态和市民等运动方面的影响也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只限于发展一些关于社会运动遇到危机的理论,而不提党对社会的干预作用。党与社会的脱节也成了西共的议会活动以及它对待新闻媒介的政策的一大特点。

这种状况表明,党从“九大”(1978年)到现在,党的政治组织形式与它的内部现实越来越不适应,我们今天处在党的历史上特殊的十字路口。有一些批评意见试图用抛弃西共已经取得的大部分政治上的进展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又要回过头去转向过去的教条,激进的空谈和对外驯从的依赖。欧洲共产主义在我国遭到抵毁和封锁为这种见解提供了滋长的土壤。欧洲共产主义之所以遭到诋毁和封锁是由于党的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它惊人地倾向于暧昧的立场和唯策略主义,对西班牙今天思想、政治斗争的重要方面毫不敏感。这种形势把党本身的正规组织日益引向歧途,使其越来越内向化,全神贯注在党的官僚机构的任务上,而日益脱离市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因此,有必要在“十大”召开之前形成一股非常广泛而强大的思潮,要求在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具体任务方面以及在建立与政治建议相适应的工作作风方面推行革新的和协调一致的欧洲共产主义。

## 二、采取同欧洲共产主义思想 协调一致的行动

今年二月事件以来的政治局势表明有必要为巩固自由和自治的国家而采取民主联合的政策。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一政策的根本点在于建立保卫和深化民主制度的积极的社会多数。对当前任务的这种提法是同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进程的概念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容紧密相连的。对于欧洲共产主义者来说，大多数人民是结束社会阶级分化的社会革命中最积极的主力。只有在不同渊源和不同思想的各派政治力量能够把大多数的公民团结在新社会秩序建议的周围，才能在这一革命中提高觉悟和集体地参与这一事业。

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基本内容是大多数人民通过民主国家的代议制机构、政党、工会、联合性运动和各种形式的权益要求(这些机构的各自作用有明确的划分)来参加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这一方针的根源是认为自由和民主具有普遍革命价值的观念，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是不可分的。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共产主义是克服社会主义和自由之间各种形式的分离的根本途径。这种分离无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上，还是在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表现。

从这点出发，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党应当具有的特点是，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斗争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范围之内寻找足以发展用各种形式动员公民参与的政治工作方式。它与社会党的主要的区别在于社会党可能有正确的目标但不进行社

会动员，它也不同于传统的共产党，这种党只限于在表面上做文章，用激进的言辞来掩饰其反对团结的立场，不理解建设民主国家的工作。

由于欧洲共产主义方针同立宪后的阶段不相适应，就不可避免地随之产生西班牙共产党组织结构同其政治目标不相适应的情况。今天，党的基层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只是成了收收党费、搞些宣传、组织党节活动、开展竞选运动的管理机构，极少或偶尔讨论国内政策或者国际政策的一般方面，在居民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绝不能因为其他政党的情况也差不多，或者因为国内形势并不最宜于积极开展政治活动而感到心安理得。恰恰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特点（我们近20多年在组织西班牙民主人士中最先进力量方面取得了经验）应有利于使我们能适应代议制民主。

如果我们希望一般的人民大众，尤其是我们自己的选民参加日常的政治生活（有关经济、文化、卫生、教育等措施）并参加制定国内外政治活动的总路线，我们就必须使党的组织与西班牙社会的要求相适应。目前的组织形式显然对于开展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是不起作用的。更糟的是，如果共产党的基层委员会继续保持内向化的生活，如果党的领导分散成为几个书记处（组织、报刊和宣传、文化、政治培训等），而不是围绕深入市民社会的目标组成一个统一体，那么党的正规组织同社会不适应的情况还会加剧。西班牙共产党这种党内生活退化的情况进一步发展下去，就会使业已开始的党员退党的进程继续下去，很多六、七十年代把西班牙共产党看成是实行左翼民主政策的重要手段的男男女女将会离开我们的

队伍，而留在党的基层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中的将是一些把党看作是思想信念的俱乐部的人。最近有些人退党，一部分是在独裁统治时期参加建党的干部，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证实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性失败。

### 三、革新的内容

为了解决党的活动同其政治意图之间的不相适应，西班牙共产党必须勇敢地接受要求本身革新的挑战。从欧洲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首要任务。党的革新首先要求对党章进行深刻的修改，使其鼓励讨论自由和建立思潮，保障能民主地作出决定，突出集体的活动，而不是个人的作用，突出各级组织的责任，反对权力的集中。

各级领导机构的建立应该是为了使党在社会上起作用，而不是以官僚机构的效率作为标准。党员活动的形式应该同公民参加政治和社会斗争的形式相适应。必须克服按地区划分组织的生硬思想，以使工会干部、公职人员、知识分子、艺术家、自由职业者以及一切具有社会专长的阶层都能充分地参加党的实际生活。

但只是修改党章是不够的。必须改变领导党的方式和在西班牙的社会中推行欧洲共产主义方针的方法，因此，革新意味着要更换党的领导班子。西班牙共产党必须在代表大会上选出一个足以推动新的政治任务、克服欧洲共产主义僵化危险的新的领导班子。不应该歪曲“十大”的意义，象上届大会那样把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再次肯定同现在领导班子的连任搞在

一起。现在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班子有它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它已经领导了一个阶段，但不应该人为地把这一阶段延长下去。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其他领导机构是代表大会进程中的一项根本性活动，会上应该执行对工作报告进行讨论和对党的革新问题辩论后作出的结论。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提议批驳那种虚构的推论，即认为我们要么认可党当前的状况，要么把我们的批评与党内或党外企图取消欧洲共产主义的人联系起来。我们提出的是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是与我党不久前的历史协调一致的，将会在大会的讨论中为在西班牙加强欧洲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做出贡献。

1981年5月

## 附件三

###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在中央委员会1981年9月25日 会议上的讲话

总的来说我想表示我对报告的三个部分表示同意：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

对于第三部分，有很多方面我也是同意的，特别是关于基层委员会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在这方面有缺点，我们放弃了基层的工作，我们不善于建立同基层委员会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上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意味着我们有陷入竞选主义的严重危险。

但是我不同意报告的另一一些方面，特别是在探讨思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方式。为了阐明我的观点我需要作一些说明。

一、“十大”在政治方面的根本的、决定性内容是重新肯定、发展、深化欧洲共产主义，使之取胜。

几个月前，对这一胜利曾有过很多怀疑，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之后，西班牙国内外很多人都相信西班牙共产党会抛弃欧洲共产主义。

现在欧洲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共产党“十大”上的胜利不但



对西班牙而且对欧洲来说将是一件有影响的事件。

二、我的印象是，尽管有很多困难，但对大会决议草案的讨论已经把欧洲共产主义的一般性思想变成了对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具体回答。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我们开始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对当前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并且开辟了对未来的前景。群众所希望的是要我们告诉他们如何从目前的形势中找到出路，以及如何向进步的解放方案迈进。我们不能放弃对未来的展望，我们的理想是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同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有些明显的区别。

三、从1980年11月中央全会时起，我们有些同志感到有必要对党的工作进展和职能，对为实现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什么样的党问题上提出一些批评。党内出现了这样的担心：我们持这种批评态度，是不是在帮助“另一种东西”？帮助那种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取消欧洲共产主义的企图？

甚至有人当时对我这么讲：你们是在帮助别人攻击欧洲共产主义。

这迫使我们这几个月在《我们的旗帜》编辑工作中集中火力保卫和发展欧洲共产主义。

我们和那些与我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分歧的同志一起开展了这场斗争，使欧洲共产主义的主张成为西班牙共产党内不可逆转的趋势。我相信我们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取得战斗的胜利。

我认为，这是处理在这次大会中出现的其他问题的基础和界限。

四、我如何看待今天在西班牙共产党内欧洲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分歧。

这种分歧有两条深刻的历史根源：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矛盾，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和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都要求人们考虑什么样类型的党才最能实现这一战略。我指的当然是共产党。这不单是西班牙的问题，而且是欧洲的问题，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次代表大会。

我认为还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过明确的答复，但是我相信在“十大”上应该能表明西班牙共产党愿意并且鼓励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进行辩论。只有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同实践的对比，同时通过有几种不同意见参加的讨论，我们才能在解决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个关键问题是：为了具备真正深入到西班牙社会结构中去的条件，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变革。没有这一点，就谈不到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

(二)在我们方面，40年的地下斗争确实锻炼了我们极优秀的品质，但同时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文化在我们的工作方式甚至我们的行动和思维习惯中扎下了根子，会成为我们今天需要进行变革的障碍。

五、我所认为必要的这些变革，绝不能只归纳为对思潮的肯定或否定。无论是在《我们的旗帜》的那篇社论中（它曾经引起了对我们的许多批评），还是在皮拉尔·布拉沃提出的修正案中（我在上一次中央委员会上对此投了赞成票）都没有提到思潮问题。

为了避免引起紧张的分裂性的矛盾，甚至破裂，则需要促进“另一种”对立矛盾：就是在党的机构内部，甚至在外部分许

和鼓励某种我曾经称为开诚布公的公开争论。

党内的争论必然命定会导致分裂吗？我并不这么认为。相反，它可能是防止分裂最好的措施。

有必要在党章中保障少数派的同志们除特殊情况外都有在党的机构里为自己的意见争论和辩护的合法权利（当然，他们应该接受服从多数的规定，对这一点没有人有争议）。

对我来说，气氛是一个根本问题。必须克服那种把不同意见简直看作是犯罪的态度。应该结束某些压在我们身上的十分沉重的包袱，因为这是我们从共产党人全部传统中继承下来的，至少是我们已经传染上的毛病：就是把同领导有不同的意见看成是绝对的错误，几乎同犯罪一样。

急需结束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愿意，我想我们是能够办到的。不同意见可能是消极的，但也可能有积极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深信，一个党如果内部能自由发表意见，可以开诚布公地公开地辩论，不把不同意见看作犯罪，不把不同意见戏剧化，那么这个党便具备了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的更有利的条件。

六、在今天的世界上，制定政策本身正是因为需要考虑和接触一些十分具体和非常特殊的范畴和问题，所以不能仅从笼统的思想出发去达到对各种意见进行综合。为了使政治决议真正能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同，同时具有动员群众的能力，那么，制定政治决议的过程就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应该是一个更为具体的过程；

应该是一个更有参与性的过程。

如果在党内，例如在中央委员会内存在的各种不同立场能为全部党组织所了解，并且各级委员会和所有的党员能够真正对很多问题发表意见，那么这个党才能成为一个有更多人参与的、在各级展开最丰富的政治讨论的党。

如果我们不克服那种认为“党的立场”来自上面的立场，如果我们不能使更多同志感到并成为党的方针的创造者，那么我想要把我们的方针变成为某些具体的政策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开诚布公的辩论、不惧怕不同意见的态度会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在一些情况下，我不是说在所有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见会丰富党的政治生活，加强党在社会上的影响。

七、我想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党的“十大”是否能成为党内团结的大会。我不是说绝对的团结，我指的是围绕欧洲共产主义形成的团结。我相信会是团结的大会的。我知道有阻力，但也有深刻的政治因素在促成这一点。

如果我们走一条相反的道路，使已经十分沉重的气氛进一步激化和紧张起来，那么我认为结果必然是十分严重的。也许我说的不对，也许情况不致于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但我只能根据我自己脑袋里的想法来发表意见。

一个代表大会如果给人一种封闭感，我相信这会使我们的力量大大削弱。

党的力量的削弱，哪怕仅仅是在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方面（我不能肯定只会局限在这些阶层），那么它会有利于使

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上升，这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对此，我认为最根本的是：

（一）把为欧洲共产主义而斗争和使欧洲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取胜摆到中心位置；

（二）看一看还有哪些办法能有助于在党内开展开诚布公的讨论；

（三）不要使投票的情况戏剧化，在这些投票中的一些同志，例如我，有可能会成为少数派；

（四）创造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讨论气氛中寻求共同点、或是澄清分歧的气氛。

在卡里略的报告中有一个纯粹历史问题。他说布尔什维克党，从十月革命到1923年，是一种联邦制形式的党。我认为打破神话是必要的，但我不同意圣地亚哥所作的这种解释。我确实写过一篇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无论如何，我认为不可能在一个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作的报告中解决一个历史问题并把它提交投票表决。这类关于解释历史、科学或理论的问题应该展开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辩论。

根据我刚才讲到的不同意见，我作出以下结论：如果报告分为几部分表决，我将投票赞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

如果是总起来表决，我将投弃权票，我对此将心安理得，因为我在投票之前已经向你们说得很清楚，我的弃权并不意味着撤销我对欧洲共产主义、对报告中欧洲共产主义内容的支持。

## 附件四

# 对西共十大第七部分决议 全文的修正案

(在委员会表决时获少数票，计：42票赞成，66票反对，16票弃权。)

### (一)现时期的状况

我们党作为为争取巩固民主制度并使之朝进步方向发展而斗争的政治力量，在过渡时期曾经起过，并且正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党提出的关于在联合政策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国家的政治建议，已成为保卫新生的、脆弱的民主制度的基本因素。

我党对制定宪法和自治章程以及对巩固民主制度的重大问题所做的贡献已大大超过了它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它一直在议会中提出捍卫劳动者利益和使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倡议。

我党从尊重工人委员会的独立性出发对工人委员会的巩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班牙共产党在对共产主义思想提出批判性的革新方面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由于它采取了批评和独立的态度使它在西班牙和在整個国际工人运动中保持了推动欧洲共产主义

前进的突出作用,同时也加深了它本身的内部民主。

然而在总结这些积极因素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不但不允许我们对党作出任何常胜色彩的评价,而是要求我们相反对党的状况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性的分析。

最近一个时期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的抬头令人不安,这种倾向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五大上的突然出现尤其引人注目,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倾向在其他很多组织中也是存在的。

党深入社会的工作有所后退。党在工人运动中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也有必要看到在企业中基层委员会的力量有某种削弱,我们主张的观点在工会中的主导作用相对地削弱。

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预先形成“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以便把这一战略目标进一步转移到整个社会上去的计划实质上已在后退。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在组织上参加党的问题已经成为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以致于令人害怕,如果这种倾向没有根本的变化,有可能还会影响到选民对党的支持。

党在社会运动中的影响严重下降。参加地方政府并没有随之加强市民运动,而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总的说来,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青年和其他解放运动排斥所有的政党,尤其是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与群众性反对中央集权和民族主义的潮流之间的联系,在很多地方都远未成功,即使在一些曾经取得进展的地方(如巴伦西亚大区)也甚至中断了联系。

在党内，没有充分实现使党的组织概念适应欧洲共产主义方针的需要，也没有在党内创造完全民主的讨论的条件。

我们的九大是取得合法地位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整体来说，它在建议中表达出要建立一个阶级的、革命的和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的愿望，这个党有能力从建设群众性政党的角度把工人阶级、农民、文化力量、妇女解放运动和其他解放运动、青年、革命的基督徒以及西班牙为争取民族与地区特点和解放而斗争的各民族中各界广泛的最有战斗力的阶层团结到党内来。

我们提出这样的计划，并不是胜利冲昏头脑，而是从现实出发，作出这个扎根于社会和党内的计划。尽管在地下工作的困难条件差，我们在资本主义新矛盾纷杂交错的社会中团结了我国人民中积极于改革的相当重要的一批力量。

如果问我们党是否已经成为九大时所期望的党，我们的回答只能说不是，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我们离建设这个模式的党比三年前更远了。

我们应该以健康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去承认这一现实，并且应该接着指出，如果问我们党能否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种党，那么回答是绝对肯定的：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成为这样的党。

## (二) 党员人数的减少

但是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对我们已经指出的消极现象绝不能视而不见。总起来看，这种消极现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



这一时期出现党员的大量退党，反映出在组织上存在某种危机的现实情况。

要深刻地分析退党的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以主观上的情绪使困难加重，但同时也应当知道使一个共产党人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真诚地揭露自己错误，而是日复一日地发现党的言行不一。

为了分析党员退党的原因，我们要排除那种认为所有退党的人不是异己分子就是叛徒的旧的偏见，而是要承认大多数在这个时期退党的人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思想。

我们不能接受那种论点，认为党员退党是1977年人为地增加党员和大批人涌入党内之后的一种自然淘汰。除了其他种种原因（由于西班牙的过渡没有经过决裂阶段，以及由于存在同复旧主义者的紧张矛盾）外，大量涌进党内的人同退党的人在数量上无法进行比较，更明显的是，那些离开党的党员（我们指的是那些在报界有巨大影响的个别人）就其政治素质来讲在许多方面是不容怀疑的。

我们同样也不能用所谓“所有政党都遇到危机”的说法来自我原谅。这种大家都一样糟的说法不解决任何问题，并且我们不应忘记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在参加共产党的人数和当一个共产党员的质量都与其他政党有明显的不同，在那些政党中入党并不是保证选举胜利和执行其以议会为首要任务的战略面进行的政治行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 (三)组织上出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建立关于党的新概念

在分析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上有一种倾向是用过渡时期遇到的困难、经济危机、世界时局,总之用外部因素来加以解释。

没有能够进行民主决裂的事实无疑对西班牙社会上以实现国家根本的民主化为己任的阶层起了消极作用。由失业的幽灵和受排斥的情况而引起的社会分裂同危机一样,为保守主义的主张提供了活动的基础。在西欧,处于里根时代的帝国主义新侵略行动与“现实社会主义”僵化的官僚主义和霸权主义之间的欧洲共产主义,确实也缩小了它的活动余地,而且受到强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大家都在危机中,所以我们也危机中”,从而使我们心安理得。危机不是命运降来的灾难,而是资本积累矛盾的反映,是引起社会深刻变革的时刻。在危机中,保守主义的思想当然会增长,然而,不满的人也在增加,因此左翼表达改革愿望的可能性也在增长,有如法国最近的经验中所表明的。因此,危机存在的本身并不是我们党削弱的最终理由,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受到失业和饥饿打击的人以及西班牙为数甚多的渴望改革的人们结合起来。一个要想进行革命却没有力量为这种不满提供出路并似乎安心于在危机中经营的组织,就有冒着组织解体或变质的危险。

我们应该考虑到，如果客观形势对党的力量产生消极影响，那主要是由于党本身的内部局限性，是由于我们政治和组织工作的缺点造成的。

总之，我们不能闭眼不看事实：党员退党反映出我们党与社会和群众脱节，因为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党没有能力同那些准备加入组织的人保持大量联系，那么也就难以争取同那些离党更远的各界人士的联系了。

这种情况表明我们的政治行动有很大的缺点。我们的政治行动不能只局限于为干预国家的形成而提出一些正确的政治建议（人们称之为“上层政治”，以表示这些建议离自己有多远），而必须将一些同劳动者和市民面临的问题有十分直接和日常联系的活动作为基本的组成部分，应该对他们的感受和希望有高度的敏感性。

我们也许已经制定了很多用老百姓的话叫做“上面来的方针”，我们在这方而花的力量比为解决人们具体问题和具体要求所花的力量要大得多，如果把这些方针进一步同现实结合起来，那么肯定会使我们把劳动者与这种“上层政治”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懂得只有一条方针，并且懂得在下层和在议会都应同时推行这一方针。

如果要全面恢复与社会的深刻联系，使人民大众有可能同党有更多的一致性，那就需要克服党内政治上的局限性，而不克服组织上的局限性也就不可能克服政治上的局限性。

今天影响西共发展的主要内部政治上的局限性首先是由于存在放弃欧洲共产主义的倾向，其次是由于存在只是在口头上赞成而在实际上封锁欧洲共产主义并使其变质的倾向。

很多人同情我们但又没有下决心加入到党的行列中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党阐明了欧洲共产主义方针，相反是由于我们在实践上并不总是同我们所阐明的相一致。

从根本上来讲，欧洲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党员按传统的方式服从纪律而不断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那样只会把这些口号变成八股而逐步失去它们的内容。欧洲共产主义从根本上来讲是为了改变社会和生活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革新，为此，今天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克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

上述情况也影响到党内生活。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党不能采取这样的工作方式，即由极少数领导人革新马克思主义，接着就要求全党贯彻这些新思想，却又保持着传统的观念，认为在原则上党的领导总是有理的，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共产党员应该不作声，并且认为应该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当作危险的有害体而掩盖起来，不让他们讲话。

我们在向人民提出的方针中企图彻底实现欧洲共产主义，但我们还没有走出党的大门就止步不前，并且企图说明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不应该影响到党的观念。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取信于民。

要使欧洲共产主义取得进展，那么有关党的问题，有关建立一个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问题客观上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不仅在西班牙是如此。

西班牙共产党在旧的组织的框框内最大限度地发展了新的政策，因此在这个党内新旧两者之间的互不相容以内部的紧张形式表现得如此强烈并不是偶然的。

现在已经到了解决这个矛盾，明确地选择新的方针和新的组织概念的时候了。

#### (四)党内的争论

过去党内的争论是不够的，在解释政策方面也有缺点。这里向我们提出两个不同的，但又有联系的问题：一些同志不参加争论的问题以及一些同志想参加争论但找不到足够的渠道进行争论的问题。

**新型的党应该考虑到它自身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所有的党员都有条件参加讨论和政治活动，同时与我们的选民进行联系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我们多次呼吁那些不来参加会议但总是同党站在一起的同志们要拿出勇气和献身精神来，但我们很少帮助他们来参加会，去寻求他们的支持，呼吁他们对党尽忠（不少次利用这种忠诚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努力使他们进一步理解党的方针并得出自己的见解。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应该寻求一种以不断地在讨论和政治实践之间进行对比为基础的工作作风，用一种朴素的、易于被理解的语言把讨论与实际工作经验联系起来。

我们所需要的新型的党应当允许承认每个党员个人和集体不论在内部还是在公开的场合都有发表意见的绝对自由。但在行动上要受少数服从多数的限制，这就是说不能用政治行动来表示自己反对民主地作出的决议。

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革命

的马克思主义者想到党员的言论和集会权利只应限制在自己所属的组织范围内。

只在后来才推行这种内部民主的限制，其根源是同一党制的模式以及同斯大林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否认所有公民拥有政治权利的做法联系在一起。

在那种形势下，在否认公民政治权利的同时，否认党员的政治权利，当然是应该加以抵制的，但是还可以讲得通。然而，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为整个社会维护这种权利，却否认党员拥有这种权利，那就成为荒谬的了。

采取必要的办法保证党内的争论在完全自由和公开的条件下进行，无疑，将会产生对目前的组织形式进行重大的改革。然而，这一改革并不是绝对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格格不入的，而是可以使党更加开诚布公，更加同社会溶合在一起和有力量消除仍然存在的斯大林主义残余。

但人们往往用生硬的和蛊惑人心的理由来反对这种概念，他们说很多党员对这种“自由派的小动作”不感兴趣，他们所希望的是没有裂痕的有效行动。但这种说法无视并且歪曲了党内基层的真正要求，流露出轻视“形式上的或资产阶级的”自由的旧思想残余。

此外，没有裂痕的有效行动要比保持现状好得多，因为在现在的状况下不同意见没有发表的可能性，最终会表现为对工作的消极抵制，并且产生不利于行动的消极气氛。

在党内各种意见的公开发表不会有损于党在社会上的形象。相反，只要存在不同意见，总会扩散开去，问题只在于是选择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方式扩散开去，还是让它在底下悄悄

地乱糟糟地扩散开去。如果在实质上认为根本不存在不同意见，那么应该说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永远不会得到民主社会的信任。

### (五)党的发展

党员数量的增加无疑要求进行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组织工作，不断地致力于宣传工作和解释党的政策的工作。

但仅仅做到这一切还是不够的。近三年我们之所以失去很多党员，并且没有吸收大量的新党员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或是放下了组织工作；恰恰相反，在很多基层组织中，这项工作几乎是成了党的全部生活。

党的力量的增长将是克服目前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局限性，以及国家民主化和社会自行组织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应该争取那些尽管离开了党但依然是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人回到党内来。

只有我们冲破当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障碍，党才会发展壮大。一个更加欧洲共产主义化的党，一个在这方面并不给人以矛盾的形象的党，将会比现在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更为开放的和更为民主的党也将更有能力把来自各种不同方面的解放愿望结合起来。

党将会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巩固以及复旧势力制造的紧张气氛的消灭而不断发展，西班牙共产党的发展同西班牙民主的发展是一致的。

当党恢复了过去的的能力，能够推动和统一社会上最广泛

阶层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上根据互相声援和发挥集体力量的价值准则而自行组织起来的运动，并统一其步伐，那么党就会得到发展。

### (六)党的组织地区化问题

按地区建立党组织的看法应该与按工作中心和所属专业建立党组织的看法结合起来，至少在大城市应该做到这一点。

按地区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做可以使基层委员会成为对各种专业、社会成份和文化修养的党员进行政治工作的中心，这是一个合理的和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目标。

以此作为基层委员会建设基本方针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从社会结构引伸出来其他一些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要求把按地区建立的基层委员会同根据工作中心或专业活动建立的基层委员会结合起来。

人们一般习惯于把这个问题同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中的党员的问题联系起来。的确，这些阶层的党员退党是有深刻原因的。因此，不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其他带根本性的政治和组织问题，按专业组织基层委员会也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即使按专业建立的组织本身也无法阻止党员退党，但是可以减少这种退党的现象。

尤其是应当看到在今天的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形式并不总是以地区为基础的，在一些大的城市尤其是这样。在大城



市对于许多居民来说，居住区仅仅是宿舍所在地而已，而他们大部分的社会活动是在居住区之外进行的，多数情况是与同行业的其他人在一起。这种情况当然不仅限于自由职业者，而是对任何形式的工资领取者来说都是如此。因此这种社会结构同按地区划分的结构是一样的现实。

这样做的确存在着某种鼓励行会主义的危险，会使党内产生我们想要克服的那种按工作性质进行的社会分野。行会主义之容易在某个医生的基层委员会中产生，也如同在某个企业的基层委员会中产生一样，这是由于劳动的社会分工而自发产生的意识形态产物，只能用提高革命觉悟、文化和道德修养，和政治生活的办法去纠正。而按地区建立组织也不能就此阻止行会主义的产生。

党的整个组织在沟通各个战线的活动，把这些活动同它的纲领性建议与具体政治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应当创造条件阻止行会主义反应的出现，由于按地区建立的组织形式不能充分组织许多党员参加具体政治活动，从而容易产生行为主义的反应。

不管是否有可能按地区建立基层委员会，党都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各个阶层遇到的总问题上，放到抓这方面工作的各级委员会上去。

这对于妇女问题尤其重要。考虑到妇女的权益要求对我们革命方针的重要性，党员中妇女比例很小的情况，迫使我们把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对这个阶层重视的必要性当成一项紧急任务。

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各级妇女解放委员会的力量，其目

的在于：党在各个活动领域（国家体制中的、工会的、群众运动的……）提出对妇女工作采取特定政策的建议，使党更多地关心女权运动的各种权益要求和忧虑，保证女权运动，无论在反对阶级社会还是反对家长制社会的斗争中能够有互相配合、进行讨论和丰富思想的渠道。

另一方面，有必要建立比现在更加灵活的机构，沟通党的领导机构以及全党同妇女解放委员会之间的联系，避免使这些委员会成为高谈阔论的、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孤立的组织。为此，有必要增加持有女权主义主张的妇女在各级领导机构包括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并且在党的常规机构同这些委员会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 （七）基层委员会

从政治上加强基层委员会的力量，是使党同社会加强相应联系的手段，使它不仅成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调节者，而且也是社会自我组织的动力。

罗马中央委员会关于用基层委员会代替支部的决定，孕育着建立一个新型党的萌芽，特别是建立党同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萌芽。前面分析过的现象，以及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组织形式在开始工作时遇到的困难，对基层委员会的活动起了消极影响。

基层委员会应当为完成党的组织任务（财政、组织、新闻、宣传）做出贡献，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做的。我们需要有一个也许更加广泛、无论如何效率更高的机构，使这些任务不致耗

尽基层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的全部力量。

基层委员会首先应该成为政治和民间活动的中心，协调共产党员在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中的行动，并成为讨论以及起草建议和政治替代方案的场所，从而真正有效地参与制订党的决定。

在这一方面，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在政治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增加它同各级委员会和书记处等机构，即同党的机关的作用。党内存在的只限于在议会机构内的活动中搞“上层”政治，或者用机械的方式来推广一般性运动的做法，削弱了基层委员会的活力和积极性，使它失去了党同人民的直接联系。随着基层委员会活动的恢复，也将使上层政治搞得更好。

现在看来明智的做法是着手考虑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层次不那么多的、竭尽全力坚定地增加基层组织的政治份量的党。除了其他作用外，这样做可以同社会有更多的联系。

此外，基层委员会的政治活动不能只依靠从上至下的指导，也不应仅限于党内生活。党的基层组织不能仅成为领导班子或担负公职人员的扬声器。从根本上讲，它在政治上的主动性应该在于它的自主性，不仅在国家机构中党的工作方面有自主性，并且在同社会上产生的推动改革的力量关系方面也有自主性。总之，这曾是在比今天困难得多的时期，我们党具有组织活力的主要原因。

#### (八) 西班牙共产党是联邦性质的党

西班牙共产党把它的组织建立在与民主社会的条件相适

应和与自由的社会主义目标相符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除此之外，还建立在联邦制度和组成西班牙共产党的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自治的基础上。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民主集中制不可能与比我们历来接受的原则广泛得多的联邦制和自治原则相结合，相反，这有非常充足的政治理由建议我们这样做。

确实，出于对付和改造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必要性，迫使党在组织上成为西班牙的一个统一的党，不过是内部具有联邦制的特点的统一党。因为不能忘记，为了改造国家，欧洲共产主义只承认大多数人革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有在市民社会中取得领导权才可能实现。因此，党在组织上应该考虑到国家的因素，同样也应该考虑到市民社会的现实，选择能使它在现实的西班牙更好地发挥其影响的组织形式，西班牙是由为数众多的各各不同的民族社会和地区组成的，这些民族和地区有的已经拥有、有的即将拥有重要的自治权力。这些民族社会确定了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的具体范围，从他们争取民族或地区的自治权力的斗争中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是国家改革的基本环节。

拒绝把党组织成为一个联邦制的党，拒绝加强参加组成西班牙共产党的各民族和大区党的个性和自主权，就使我们不能在构成西班牙革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的方面，亦即争取民族和地区人民自由权利的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使我们远离那些对这一斗争十分敏感的广大劳动群众，使我们远离民族主义者出身的左翼力量和人民群众，而有利于劳动者中民族分裂主义倾向的发展。

西班牙共产党在历史上一直很注意这个问题，把它作为是信守自决权的结果。从而出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但政治上和组织上同西班牙共产党完全一致），巴斯克共产党，加利西亚共产党和最近出现的巴伦西亚共产党，安达卢西亚共产党，巴利阿里群岛共产党，加纳利斯共产党等等。

现在涉及的是应赋予这个已经存在的组织形式以新的内容，不光是各个组织都有各自的名称，不要把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党的地位降到过去党的省组织所具有的地位，使它们的代表大会和领导机构真正有决定的能力，承认它们具有同西班牙共产党的团结一致不矛盾的法人的地位。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西班牙共产党将获得联邦性质的结构，这种结构反映了决策机构下放。如果不这样做，那就等于将这几年的过程降低成为纯粹的改改名称而已。

### （九）民主集中制与少数派

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通过选举产生各级负责机构，在行动上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自觉接受党纲和党章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少数派有权自由地维护自己的见解，其明确的界限为不得搞派别活动或搞有组织的流派，这是指不得建立领导机构或对其成员强迫执行纪律，或出版发表分裂性言论的刊物，或设立自己的办事处。上述行动的任何一项都可称之为搞派别活动。

当党内存在与通过表决所产生的官方意见不一致的政治

见解时，就出现少数派。因此这只是指政治见解上的少数派而绝不是政治行动上的少数派，党内在政治行动上必须是统一的。从定义上讲，少数派的特点不可能是永久的，而是围绕讨论和决定的各种问题和主题不断在变化着的。我们应该允许少数派在讨论中自由发表看法，而不能允许少数派组织起来作出采取政治行动的决定，那实质上就变成搞派别活动。

这里意味着非戏剧性地接受无组织的、不固定的思潮，也就是说，正式承认意见的多元化并不是一件坏事。

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应当坚信，党内保留少数派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将会鼓励人们在通过决定时应更加负责任，仔细地权衡所有的因素，并且多数人通过决定时意识到决定必须接受公众的批评，从而决定具有更高权威。

少数派的问题不可能用消灭的办法去解决，但也绝不能用让他们参加领导机构来换取他们在全党面前沉默的办法去解决，而应该把让全党都知道他们意见作为加强党通过自由讨论树立的信念的方法，以此来解决少数派的问题。

有必要指出的是，允许自由发表意见并不仅是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或是去适应既成的事实，虽然这是两条很有分量的理由。还有其他一些与我们想制定的方针相协调的带根本性的理由。

首先，我们党不想采取正面的和暴力的手段来夺取政权，也不想通过暴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想通过民主途径掌握政权，和通过维护和进一步促进自由权利来维持政权。为此就要求党在组织上更加开放，而不是迷恋于为设想中的所谓国家危机时刻而把自己准备成准军事部队，更多的是想在

社会组织和国家体制民主变革的漫长过程中为进行干预而教育自己并使自己与之相适应。

其次,如果党想真正表现为一个多元的革命集团(指在社会成份方面以及在基本纲领取得一致的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允许有各种思想的存在),那么就应该接受真正允许它起这样职能的结构。

### (十)党的革新问题

西班牙共产党的必要革新的基础应该是党内生活民主化,根据西班牙不同民族的现实而采用联邦制,使基层更多地参与各种决定,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机构,健全它的各种机制,以使这些机构永远服从于党的普遍意志。同样,应该是使各级组织政治上不断年轻化。

革新的关键是在领导和基层之间,以及党的形象与社会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所谓新的关系是指把基层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就是领导人应更多地下到基层委员会去,反过来,党员也能更多地参与领导,参与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以使由授权制订政策<sup>①</sup>所带来的最消极的方面在党内不再产生影响。

革新党组织还意味着使机构的运转更为灵活和完善,但首先意味着党的机构与全党之间——书记处和党的各级委员会

---

<sup>①</sup> 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大会表决时按各省、区代表团为单位计算票数。——译者

之间、各级委员会与党员之间具有另一种关系，即领导应更多地建立在真正能力而不是盲目信任的基础上，使党的机构真正置于党的普遍意志之下而不是与之相脱离和取而代之。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党的专职干部的作用，选择和更替的标准，生活和工作条件，考虑到当党不再需要他们工作时他们重新回到社会的可能性，创造条件使更合适的人成为专职干部。

领导机构职能革新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为它们创造获得文件资料 and 情况的前提条件，以及建立能使它真正发挥作用的集体工作和作出决定的制度。在这一方面，全党开诚布公的内部争论永远是有利于对领导机构工作进行监督的一个因素。

最后，党的革新也是要做到从基层到领导各级在政治上年轻化。也就是说，把那些有能力深入地推动党的民主化和发展党的作用新观念的人吸收到党内和结合进各级领导中去。这些人应该具备把握瞬息万变的社会的新现实的才干，以及学习新的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的才干。当然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工作方法和能力的问题，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无论是年龄还是个人政治经验确实都有可能对适应今天政治的需要带来困难。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愿意看着我们党内平均年龄的增加而无动于衷，那么党在政治意义上实现年轻化的问题就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平均年龄的增加都意味着使党同我国人民，首先是同与劳动者的现实疏远。



## 附件五

### 西共十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

	票数
1.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963
2. 马塞利诺·卡马乔	911
3.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	838
4. 欧拉利亚·平托罗	813
5. 霍尔迪·索莱·图拉	784
6. 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迪亚斯	782
7. 格雷戈里奥·洛佩斯·雷蒙多	771
8. 弗朗西斯科·弗鲁托斯·格拉斯	762
9. 恩里克·库列尔·阿隆索	750
10. 曼努埃尔·阿莫尔·德乌斯	719
11. 卡洛斯·帕里斯·阿马多尔	704
12. 胡利安·阿里萨·里科	698
13. 皮拉尔·阿罗约	697
14. 西普里亚诺·加西亚	690
15. 圣地亚哥·卡里略·索拉雷斯	687
16. 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	661

17. 安德雷乌·克拉雷特	656
18. 埃内斯托·卡瓦列罗	656
19. 米克尔·努涅斯·冈萨雷斯	649
20. 胡利奥·塞克拉·桑切斯	649
21.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	647
22. 何塞·路易斯·努涅斯	642
23.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	634
24. 皮拉尔·布拉沃·卡斯特尔斯	632
25. 何塞·马丽娅·罗德里格斯·罗伊	625
26. 曼努埃尔·卡马拉·费尔南德斯	623
27.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迪斯	612
28. 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	605
29. 阿曼多·洛佩斯·萨利纳斯	604
30. 莱昂诺尔·博尔娜奥	602
31. 伊格纳西奥·加列戈·贝萨雷斯	601
32. 佩德罗·马尔塞特·坎波斯	598
33. 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贝尔加拉	595
34. 何塞·路易斯·洛佩斯·布利亚	594
35. 海梅·萨托里乌斯·贝穆德斯	591
36. 埃梅里托·博诺	590
37. 马丽娅·萨尔塞·埃尔维拉	590
38. 安东尼奥·冈萨雷斯·比埃特斯	589
39. 安东尼奥·马丁·利略	583
40. 托马斯·图埃罗斯·特鲁埃瓦	576
41. 爱德华多·萨沃里多·加兰	576

42. 奥罗拉·莱昂·冈萨雷斯	575
43. 胡安·弗朗西斯科·普拉	571
44. 西格弗雷多·多明戈·鲁希诺	571
45. 阿道夫·布里埃尔·博尔克斯	568
46. 佩德罗·博利瓦尔·雷维尔特	564
47. 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	562
48. 圣地亚哥·卡里略·梅嫩德斯	560
49. 何塞·加西亚·梅赛格尔	557
50. 阿古斯丁·戈麦斯·普埃尔塔	554
51. 奥拉西奥·拉腊·帕尔马	553
52. 胡利奥·佩雷拉·德拉富恩特	551
53. 何塞·路易斯·因绍斯蒂·卡顿	549
54. 安东尼奥·罗梅罗·鲁伊斯	548
55. 费利克斯·佩雷斯·卡拉斯科	547
56. 卡门·罗内依·阿尔瓦雷达	546
57. 胡安·伊格纳西奥·卡斯塔尼奥	545
58. 弗朗西斯科·帕莱罗·戈麦斯	545
59. 安塞尔莫·奥约斯	545
60. 哈维尔·苏亚雷斯·苏亚雷斯	544
61. 维森特·古铁雷斯·索利斯	542
62. 马里亚诺·费尔南德斯·福斯蒂	538
63. 胡安·博斯科·迪亚斯·乌尔梅内塔	538
64. 伊格纳西奥·拉第埃罗·科尔托	532
65. 圣地亚哥·莱亚尔·马丁·罗莫	531
66. 曼努埃尔·安吉塔·佩拉贡	528

67. 哈维尔·特列恩特·克萨达	526
68. 胡安·佩德罗·萨莫拉·苏亚雷斯	526
69. 佩德罗·德迭戈·加西亚	523
70. 曼努埃尔·巴列霍·贝尼特斯	522
71. 米格尔·莫兰·迭斯	519
72. 胡利奥·塞铁恩·马丁内斯	517
73. 安东尼奥·帕洛马雷斯	515
74. 阿·希门尼斯·卡斯蒂略	515
75. 何塞·索里亚诺·巴尔克罗	514
76. 尼古拉斯·佩雷斯·普拉森西亚	512
77. 加夫列尔·马丁内斯	506
78. 拉蒙·奥尔马萨瓦尔	496
79. 诺维托·布埃纳切·莫兰蒂尔	494
80. 何塞·马丽娅·冈萨雷斯·赫雷斯	493
81. 皮拉尔·佩雷斯·富恩特斯	493
82. 塞萨尔·略尔卡·特略	492
83. 维森特·萨拉戈萨	491
84. 特塞米·坎特拉	482
85. 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	479
86. 蒂娜·纪康·奎斯塔	476
87. 霍尔迪·博尔哈	463
88. 华金·萨莫罗	451
89. 维森特·卡斯卡拉·克雷马列	443

## 中央委员会当然委员

费利佩·阿尔卡拉斯·马萨茨

何塞·马丽娅·科罗纳斯·萨尔塞多

何塞·加兰·佩莱斯

何塞·安东尼奥·加西亚·鲁维奥

拉裴尔·戈麦斯·索里亚

安赫尔·格雷依罗·卡雷拉斯

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阿圭列斯

罗伯托·莱尔特松迪·巴拉尼亚诺

马丁·席尔万

路易斯·马丁内斯·费尔南德斯

何塞·卡洛斯·毛里西奥·罗德里格斯

阿道夫·皮涅多·西马尔

阿古斯丁·桑切斯·特里格罗斯

何塞·巴莱罗·冈萨雷斯

卡斯蒂利亚——莱昂